



圆 明 园 丛 书
圆 明 园 劫 难 记 忆 译 丛

译丛主编：[法] 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Campagne de Chine
(1859—1861)

中国之役：1859—1861

BÉZIAT

[法] 贝齐亚 著

Souvenirs D'un Officier

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

BOISSIEU

[法] 布瓦西厄 著

陈建伟 译

中西書局



上架建议 历史/回忆录

ISBN 978-7-5475-01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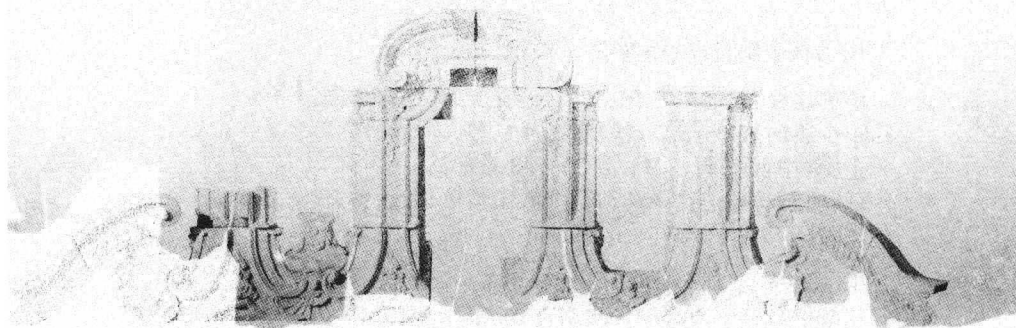


9 787547 501566 >

定价：35.00元



圓 明 園 丛 书
圓 明 園 劫 難 记 忆 译 丛



译丛主编：[法] 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Campagne de Chine

中国之役：1859-1861

BÉZIAT

[法] 贝齐亚 著

Souvenirs D'un Officier

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

BOISSIEU

[法] 布瓦西厄 著

陈建伟 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之役：1859—1861/(法)贝齐亚著；陈建伟译。
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法)布瓦西厄著；陈建伟译。
—上海：中西书局，2011.1(2011.3重印)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布立赛，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主编)
ISBN 978-7-5475-0156-6

I. ①中…②陆… II. ①贝…②布…③陈… III. ①第二次
鸦片战争(1856~1860)—史料 IV. ①K25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4662 号

圆 明 园 丛 书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中国之役：1859—1861

[法]贝齐亚 著

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

[法]布瓦西厄 著

陈建伟 译

责任编辑 李 琳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156-6/K·025

定 价 35.00 元



出版前言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这是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150年来，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帝150多年的精心营建，占地350公顷，建成了200多座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和园林，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园中除了中式宫殿和园林之外，还有乾隆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47—1759)间，由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著名宫廷画师、建筑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等设计建造的西洋楼。王致诚在乾隆八年(1743)11月1日写回法国的长信中对圆明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夸赞，称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这封信及其内容，对18世纪欧洲大陆卓兴中国园林之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建筑学家邱治平在《圆明园》一书中对圆明园的价值作过一番相当精到的评论，他说：“圆明园堪为世界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材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浩繁，显示出

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园，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称为文化艺术博物馆。”布立赛先生则用更易为人们理解的比喻作了评价：其价值远远超过现在法国的罗浮宫、凡尔赛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总和。可就是这样一座其中也包含着法国人、意大利人智慧而设计建造的圆明园，却毁在了欧洲强盗之手。

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吉利、法兰西两国，为何要派遣“远征军”征战中国，劫掠并焚毁早已被欧洲人推崇为人间仙境的圆明园？联军多少人马？海军、陆军、骑兵怎么组成？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两军如何协调？深入中国的联军后勤保障如何保证？战争期间，外交谈判情况如何？战争经过怎样？在英法军人眼中的清朝政府、清军部队、中国民众是怎样的状态？等等，这些情况，在中文的历史记载中只有泛泛的语句、概括性的言辞。因此，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劫掠和焚烧了圆明园这样一个概念性的结论。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没人能够解答。因而有无数的国人甚至是非常有名望的专家学者都误认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是八国联军。就这样，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的一系列细节、过程……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淡去了，国人的记忆也就模糊了……

2000年10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参观了颐和园后，来到了圆明园。圆明园里的一片废墟、苍凉空地，深深地震动了这位法国学者。2003年，布立赛先生在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揭开了被西方主流社会刻意掩盖了140多年的历史真相。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了解，到2010年6月，法文版《1860：

《圆明园大劫难》已经累计销售2万册。2005年9月,因法国《欧洲时报》的支持和推荐,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中法文化年”期间出版了中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关注。在与圆明园渊源甚深的达园宾馆举行的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上,布立赛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中国文化深厚的爱,展现了他无尽的中国情结,并对英法联军的反人类、反文明暴行表示强烈谴责。他说:“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征战,与19世纪帝国主义掠夺完全一脉相承。”“1860年英法对华‘远征’,尽管军事上和外交上有所成功,但却以最惨重的方式告终,即劫掠焚毁圆明园。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布立赛先生在会上表示,希望和中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愿意把他撰写《1860:圆明园大劫难》所依据的英法联军将军、医生、翻译、外交官、士兵等人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提供给中国学者研究。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译丛就是由中西书局和布立赛先生、著名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博士从150多种两国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精选的15种亲历记录:英军7种,法军8种,外加《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

中西书局立足“中”“西”二字,非常关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观念差异和交流、摩擦、争吵、战争等各种形态,十分重视本译丛的编选、翻译、编辑、审校和出版工作,特别约请著名翻译家许钧和王大智、汪洪章、应远马等先生承担翻译重任。

这些图书,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异常珍贵和重要的。因为它们亲历者在战争结束后的1860—1875年间出版的战争回

忆录，比如联军统帅英国将军格兰特就是在1875年7月审定回忆录书稿校样后去世的。有的是亲笔撰写，有的是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有的是口述记录，较为真实可信，且叙述细致、丰富。布立赛先生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前言》中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构成了丰富、生动、真实和珍贵的史料来源。尽管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这毕竟是胜利者写成的历史，还得看看战败者所写的历史。”诚然，这15部回忆录，不仅有表达人类正义，回国后真诚悔恨，认为战争可耻的——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更多的是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论，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对清朝政府、清朝军队、中国民众的丑化等。如法军上校杜潘说，联军占领天津后，当地“居民都能够理解我们远征的目的——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大肆破坏这个国家，而只是为了帮助解决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又如葛罗在回忆录中记述联军的共同说法：联军并没有像恭亲王所说的那样洗劫了这座宫殿，只是根据战争法，分享了战斗胜利所带来的战利品。夏宫后来遭到洗劫并被部分烧毁，那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盗匪所为。此外，也有对中国与英法文明差异和观念差异造成冲突的非常详尽的客观记录。在记叙中，不仅存在着史实的误差，也存在着观点上的问题。比如，法军首先进攻并抢劫圆明园，但举火焚烧圆明园的是由米启尔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师。这个观点，中文史料也有相同记载，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布立赛先生都已采信，也已被一些中国学者采纳，并在其著作中作出表述。但是，译丛中的多部回忆录都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法军虽然反对焚烧圆明园，但他们主张应当焚烧紫禁城。因此，英法侵略军的罪孽是同等深重的，恐怕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外学者依据中文、英文、法文，以及俄文、日文等相关文种

的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对英法各自的历史罪孽、历史责任进行认真的研究，作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抢劫已然可恶，焚烧罪孽更深！又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蒙昧时代在 9600 万年之前；将钦差大臣所携关防误认为是皇帝玉玺；在引用清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时，将其他清朝官员误认为早已革职查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另外，还有不少将地名、人名拼写错误，如将同仁堂误为同济堂等等。这些误差和错误的存在，深刻表明了，当时的英法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很不了解，存在很多的误区。为了完整地向学界呈现回忆录的原始状态，提供回忆录记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在翻译、编辑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存真原则，照实翻译，照实编辑，照实出版，希望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注意辨别，并注意对于美化侵略战争、丑化中国的言论，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史料。

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主任十分重视圆明园史料研究，积极支持并承担了全部出版经费，资助中西书局选编、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供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了解这一段惨痛历史。相信此译丛的出版和其他圆明园研究成果的刊布，有利于圆明园管理处查找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线索，推进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浙江大学历史系郑德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许钧教授帮助审核译稿，纠正了一些译稿中存在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错误。值此译丛正式付梓之际，谨向圆明园管理处及陈名杰主任和三位教授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推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纪念圆明园罹难 150 周年，还原历

史真相和历史细节，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反思历史，祈福未来，为共建人类和谐未来而努力。

中西书局

2010年9月28日



序 一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 1995 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 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 10 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 150 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 8000 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

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 1860 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La Fabius".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with the first letter "L" being large and stylized. A horizontal line is drawn across the bottom of the signature.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 现任参议员
巴黎 2010 年 7 月



序 二

今年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上海中西书局的来函，信中提出希望翻译出版一套由当年参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官兵撰写的战争回忆录。

2010年10月18日，将是北京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纪念日。

本人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于2003年末在巴黎出版。经由徐忠良先生的倾力相助，该书的中文版于2005年夏天在中国顺利出版发行。在他的建议下，我在该书附录的150余种参考书目中精心挑选出一批较为重要的书稿，撰写者包括当年亲历战争的著名军官、外交官、翻译官、记者、军医等等。

这套丛书中首先当推法军首领库赞·蒙托邦将军所著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因其在1860年9月21日率军攻占八里桥时的卓越表现，蒙托邦将军被拿破仑三世授予“八里桥伯爵”之爵位。但由于种种因素困扰，此书在其完成70年后，也就是1932年，才由蒙托邦将军之孙付梓刊行。

此时蒙托邦将军过世已久，在书的前言中他提到：“曾经多少次我提起笔想把当年的人和事记述下来，在已经出版的有关此次远征的书籍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或无意地对这次远征行动的曲解，

每当此时，我就更急于将自己的写作计划付诸实施。”这段文字没有注明日期，但应当是写于他临终之前。作为远征活动的幸存者，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回忆录的出版。但最终，八里桥伯爵也未能如愿。

人们不禁怀疑其中的隐情。当年，对于他率领法军抢劫圆明园的行为，舆论界始终毁誉参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于他的儿子（1889年去世），也无法做出是否要坚持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决定，想必，他是害怕面对种种批评的声音。

丛书也收录了葛罗男爵的《黄皮书日记》，他是当年随联军远征的法国全权特使。黄皮书（等同于英国的蓝皮书）汇集了当年的外交事务信函往来，内容涉及中法两国在1860年间的谈判。需要指出的是，葛罗男爵是一位极其坦诚的人，性格温和沉着，并与中国清朝的钦差大臣恭亲王相处融洽——这与他的英国同行、傲慢的额尔金勋爵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作为英法联军的翻译，年轻的埃利松伯爵也从另一角度见证了这次远征行动。他的行文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披露了远征行动中大量的细节与内幕，他笔下对圆明园的描写尤为出色。但由于此书字里行间对英国同盟军做了非常不客气的叙述，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这本《翻译官手记》推迟到1886年才得以在巴黎出版。

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暴徒，他从北京圆明园掠回了大批的艺术珍品，并于1862年在德鲁欧饭店大肆拍卖。然而他的这本《远征中国》却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当年英法联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疯狂抢劫圆明园的可耻行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此并无丝毫羞耻之心。

海军上尉帕吕在《远征中国纪行》中以一个海军军官独有的视角

展现了这次军事活动。如果当年没有海军的从旁协助，这次远征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实现。在法国，他以一名爱国者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者著称。

此外，贝齐亚上尉的《中国之役：1859—1861》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正是他以一种异于大多数盟军战友的口吻，首次使用了“劫掠”一词，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定性为犯罪行为。

作为随军医官，阿道尔夫·阿尔芒著有《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他通过大量的信件，试图以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描述陌生的异国世界，此书内容的有趣之处远非其简单的书名所能体现。

布隆戴尔将军并没有随远征军前往中国，他留守在巴黎的战争指挥部，以监督军队的军事行动。他的法语书名同帕吕的如出一辙，内容也均出自官方的书面报告。尽管如此，这本书对国家军事行动的部署和考虑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一书汇集了大批被法军从北京圆明园掠回国内，并奉献给当时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艺术品。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被展示在枫丹白露城堡的一个侧殿，距巴黎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此类作品众多，我尽量从中选出最具历史价值的，最富教益意义的文稿，并努力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其实还有很多较好的文稿，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在内，尤其是吕西·阿尔芒的《远征途中的私人信件》、弗达比翁的《中国的战争》、远征行动结束后病逝于中国天津的柯利诺将军所写的《回忆录》，以及夏西隆、莫特雷西、盖互雷、拉弗雷的手记，等等。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套丛书未能收录诺戈尼的《中国战事记忆》一书，该书已经绝版，或许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能觅到它的踪迹。远征结束后，随军官员约翰·路易·德·诺戈尼带着大批令人

瞠目的赃物回到法国，并对这种偷盗行为百般辩解，声称他是向北京的中国军人以及商贩购买的！为此，他还编写了一本图册目录。对这部分内容，中国的读者也许有较大的兴趣，从中可以了解当年被英法联军夺走的文物细目。也许将来某日，我们可以看到此书的出版……

伯纳·布立赛

巴黎 2010年9月19日



序 三

咸丰十年（1860）十月，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惨痛的文化劫难。但是，西方的学者不愿意正视历史，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而中国的学者，由于缺乏有关的史料，特别是英法联军方面的史料，无法对侵略者的罪行进行充分的揭露。140多年过去了，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关于这场文化浩劫的论著问世。

2000年10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来到了圆明园遗址，一代名园的残垣废墟及其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他为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感到愤怒，也为身为法国人而深感羞愧。回到巴黎，他想更多地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在查阅图书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很少，更没有一部关于圆明园的专著。于是，他决定写一部论述圆明园的史书。他多方搜集当时亲历这场侵华战争的将军、士兵、外交官、翻译官以及随军的医生、牧师、记者等留下的文字记录，进行深入研究，并多次到中国考察收集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全面反映这场文化浩劫的力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文版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和人民群

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并十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和批判了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他们购买了该书中文版的版权并无偿提供给浙江古籍出版社使用，并帮助组织专家进行翻译，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出版。

2005年8月31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法国《欧洲时报》、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皇家大饭店隆重举行《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首发式。我应邀参加，见到了伯纳·布立赛先生，并得到了由他签名的赠书。

2005年9月5日，我参加了中国圆明园学会、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达园宾馆联合举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伯纳·布立赛先生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愿意将他手上所有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和资料提供给中国的专家学者，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再写一部关于圆明园的史书。先生的慷慨，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英文、法文的书籍和资料，能够阅读的人不多，影响有限。翻译出版，工作量很大，而且不会像畅销书那样得到高额的回报。在注重经济效益的今天，谁愿意为一座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的皇家御苑作出牺牲呢？

但是，社会总是要发展的。伯纳·布立赛先生已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后面的路，有识之士会继续走下去的。为了表示感谢，我将由我主编的一部近一百万字的关于圆明园的大型资料汇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1999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赠给了伯纳·布立赛先生。

2005年10月，我收到了徐忠良先生寄来的《圆明园图书系列计

划》，其国外部分就列入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附录的 150 多种英文、法文图书目录，准备选择其中“有价值且不雷同的予以翻译出版”，希望我帮助筛选。读了这个计划，我对徐忠良先生的见识和魄力深感钦佩。身为清史研究工作者，对于如此盛举，岂能置身事外？就我所知，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2007 年，是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这年 4 月，徐忠良先生来到北京，约我主编一部反映 1980 年以来关于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的争论情况的书。篇幅与《1860：圆明园大劫难》相当，装帧风格也与之相似，书名定为《圆明园重建大争辩》。我 5 月交稿，10 月 17 日晚，徐忠良先生就将还带着油墨芳香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200 本，送到定于 10 月 18 日上午开幕的纪念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场了。

后来，徐忠良先生调到上海中西书局工作，我担心计划会因此搁浅。2009 年 9 月，我看到了由徐忠良先生拟定的《圆明园图书出版合作方案》，提出备选图书 14 种，准备将其中的 10 种翻译出版，以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2010 年 6 月，我因公到上海调研，见到了徐忠良先生并看到了刚刚制定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出版方案。列入方案的图书，英文 7 种，法文 9 种，其中两种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审阅备选书目后增加的。16 种原著，均由伯纳·布立赛先生提供。期待已久的这套历史亲历记忆译丛终于可以得见了。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在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之际出版是很有意义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为伯纳·布立赛先生《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立赛此作有助于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恨战争这一苦难之源。”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中法两国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践行“记忆责任”的结晶。它不仅可以推动有关圆明园历史的研究，提高人们对圆明园的认识，而且可以推动中法文化交流甚至中西文化交流。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具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多。如果“记忆责任”也成为普世价值，世界和平还会远吗？

王道成

2010年8月12日于北京



序 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统称圆明园。占地 352 公顷(5280 亩)，其中水面面积约 140 公顷(2100 亩)，有园林风景 100 余处，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是清朝六位皇帝在 150 余年间倾心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汇集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胜景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有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优游享乐，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它与紫禁城(故宫)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被清帝特称为“御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政务之所。值得一提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占地 100 多亩的西洋楼。那是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意大利建筑师、宫廷画师郎世宁等人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最有名的“大水法”，主体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海晏堂、谐奇趣、方外观、黄花阵等著名建筑。总之，圆明园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优秀造园艺术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景观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

到和谐完美。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也是一座收藏极为丰富的皇家博物馆。园内各殿堂内陈设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收藏有许多国内外稀世文物。园内珍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淳化阁帖》等珍贵图书文献。文源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曾对18世纪中叶欧洲兴起的中国园林热潮，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凝结着人类智慧结晶的世界名园却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最终沦为一片废墟！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惨痛劫难，更是人类文明史的空前浩劫。同时，又是中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一种激烈碰撞，给中华民族留下痛彻心肺的残酷记忆。圆明园犹如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史册，具有撼人心魄的价值，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也成为了中华志士仁人雪耻奋起的警世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为积极保护圆明园遗址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1976年，中共海淀区委、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1980年8月，全国著名的建筑、园林、文物、美术专家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并发起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1983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正式确定将圆明园遗址整修为遗址公园。1988年1月，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6月，圆明园又成为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0年和2001年，《圆明园遗

址公园规划》分别获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长期不懈的努力，遗址的保护整修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已初步形成绮春园、长春园、福海、九州四大景区，既有浩瀚的大型水面，又有亲切可人的湖泊，更有山水环绕的河溪，保持了水体的天然风韵，又按原有的植物配置，形成了以松、竹、荷、柳为主题的植物景观。近年来，又陆续完成了含经堂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工程、圆明园唯一残存古建筑——正觉寺修缮主体工程、西部九州景区的保护展示等工作。至此，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圆明园遗址向社会公众开放。

圆明园管理处作为圆明园遗址的日常管理机构，既是遗址的保护者、整修者，也是圆明园的研究机构和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积极寻访者及圆明园历史文化的宣传者。圆明园管理处充分认识到圆明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多重意义：它不仅具有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历史文化价值，更寄托了全世界华人的一种特殊情感。长期以来，圆明园管理处非常关注圆明园的历史、建筑、园林、文物等基础研究工作，积极支持专家学者开展各方面的研究、考察和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并与专家学者和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网络媒体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套由上海中西书局推出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圆明园管理处新近支持和合作出版的重要研究史料，并以之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

中西书局的徐忠良先生，作为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学术委员，自 2005 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期间组织翻译出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来，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圆明园，先后组织出版了著名圆明园历史学家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和著名建筑学家郭黛姮教授撰著的《乾隆御品圆明园》、《圆明园样式雷研究》等重要图书。他调到上

海中西书局工作后，紧紧抓住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的历史时机，又与布立赛、王道成先生和圆明园管理处以及即将成立的圆明园研究院联手，精心编选英法联军将军、外交官、翻译官、一线指挥官、医官、牧师等关键人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出版的战争回忆录 16 种，予以公开出版，力求为圆明园研究提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多年来，圆明园管理处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积极关注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寻访、回归和修复，致力于圆明园遗址的考古、整修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展览展示。如 2009 年圆明园管理处发起组织的赴美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工作，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发现 400 多张文物照片，寻访到一些圆明园文物，带回一批中西文的圆明园研究资料。2010 年 10 月，正值各界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原流散在北京地区，现已回归圆明园内的珍贵石刻文物首次集中向游人开放；持续修复了半年之久的 150 件圆明园文物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我国古代建筑科技史上成就卓著的杰出代表——样式雷图档，真实再现了圆明园的建造史；法中友好协会将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第一位痛斥英法联军恶行的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雕像；同时，我们将举办大型主题纪念晚会，通过“文明的对话：梦回圆明”、“世纪的交响：沧桑巨变”、“盛世的复兴：和谐起航”三个篇章来表现圆明园 300 年的沧桑巨变，展示和谐盛世给圆明园带来的勃勃生机；将邀请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和著名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圆明园遗址前对话圆明园；我们还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起举办了“勿忘国耻、励志腾飞——中国航天成就展”等活动。

诚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历史学家布立赛、王道成先生的

序言和中西书局的出版前言所言，我们几方面倾注巨大心力和财力，精心组织编选、翻译和出版的这套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在1860—1932年间或亲笔撰写、或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或根据口述记忆笔录的亲历回忆录，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教训，还原历史细节，追寻历史真相，实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提出的“记忆责任”；是为了进一步反思历史，倡导和平，营造一个“勿忘历史、倡导和平、憧憬未来”的文化环境；是为了倡导中西文化交流，消除文化理念差异造成的误解，弘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坚决避免圆明园悲剧的重演。

圆明园管理处 陈名杰

2010年10月3日

目 录

出版前言 / 1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 7

序二 伯纳·布立赛 / 9

序三 王道成 / 13

序四 陈名杰 / 17

中国之役：1859—1861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 3

第1部分 日记 / 5

第2部分 见闻 / 109

第3部分 信件 / 131

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 205

正文 / 207



中国之役：1859—1861

[法] 贝齐亚 著



内 容 提 要

贝 齐 亚 上 尉

工兵上尉贝齐亚的日记《中国之役：1859—1861》于1903年才出版，在1902年他死后不久。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上尉在远征回国之后即出版他的书，他当然不会得到上级的同意，并且他在军队中的晋升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他可能不得不因此而离开军队……

正是因为贝齐亚（最终升为将军）凭着他的坦率和勇敢写了本书，便与某些用冠冕堂皇的口吻，亦即官方的口吻，写的书形成了对比。那些书避而不谈军人和外交人员所犯的错误。可以说他的亲身经历特别宝贵，因为他展示了军功章的另一面、对法国来说不那么光荣的一面。

上尉批评并揭露了与他一样的军官们及其上级的不胜任。因为他，人们知道了此次远征的指挥远远不能说是完美无缺（法军方面的运力不足，在北塘泥滩登陆的英法联军的组织混乱）。

尤其是，贝齐亚上尉揭露了军中一个有身份的人物，即杜潘中

校(原名保罗·瓦兰)，谴责了其在洗劫圆明园时的行为。他讲述了瓦兰如何在半夜将在未经搜索的地方偷来的珠宝和大量黄金搬走。

贝齐亚将军的书可能是所有法国军官所写的著述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但是它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完全不是官话套话，它谴责了法国军队在北京所犯下的掠夺行径。

伯纳·布立赛



第 1 部分

日 记^①

1859 年 12 月 1 日

部里寄来的公函将启航的日期定为 10 月 28 日，并按照海军的安排，在港口停留两天。我们原指望 30 日晚上或最迟于 12 月 1 日起锚。我们匆匆赶往土伦，从敦刻尔克到土伦仅花了五天时间。我们担心，在与法国联系不易的情况下，如此漫长的长途跋涉和将要持续几年的远征所需的军需品如何解决。此外，令我们感到沮丧的是，抵达土伦后，我们得知登船时间仍不确定，而出发时间更成问题。我们不禁拿它与我们出征克里米亚和意大利作比较。1854 年 12 月 3 日晚上，急电命令我们从蒙彼利埃出发，和一支 40 人的工兵小分队一起从马赛登船，在登上带我们去凯米施的军舰之前，我们不得不等上 20 天。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我们也有过同样的麻烦。在登上连接里昂和圣·让·德莫里耶讷的列车前，我们必须在里昂

① 此处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没有。——编者注

停留 10 天。我们不得不申请早日出发。在土伦，就好像在马赛和里昂一样，区别只在于地点和日期的不同；在发出命令和执行命令的时候总是会被不确定的因素所左右。

法国平均每年都维持着 35 万名公职人员，每个人都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工作，不用操心别的领域：公职领域大家各自为政，互不干涉，以至于这种人类机器很难协调一致地运行。大臣确实拥有集中的权力，但由于他只是通过其下属各部门的局长得知信息，这些人更加必需，因而比他更加不可撤职。隶属于这些部局机构的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唯唯诺诺，噤若寒蝉，唯恐遭致打击报复。工作上缺乏沟通衔接，导致在执行命令时互相推诿，极不负责任。

这种状况对国家、军官、士兵来说都总是难以忍受的，哪怕不损害事情的成功。官兵们被迫住在登船点，行色匆匆地进行必要的采购，却被所有的商家敲诈，他们原本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从商家手中买到这些劣质物品。从国家的利益角度，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每天花 3000 法郎租用的船舶，由于没有命令，1 个月都无所事事；另外一些船被改装成了运输船，却派了其他的用途。在这些重要的和预备性的活动现场，最好有政府代表，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拥有全权以满足正当的要求，甚至提供有益的建议，最后与那些总是要求其自主性的地方政府达成友好一致。以免产生不计其数的扯皮，士兵、官员和国家总是其中的受害者。

不管推迟我们启航去中国的理由是什么，12 月 1 日，在 250 马力的军用混合运输船“汝拉山”号上，我们只是集合了一下，要知道军舰将在港口至少停留两天。随便看了一眼，我们就发现船上的布置比较简单。

前一天匆匆观看船上的布置所产生的印象令人担忧。在船的中央和统舱里，蒸馏机和厨房的左右两侧，有三排并列的床架，没有

光线和空气，站在两排床架之间都无法动弹。

在这些一排排床架的每一端是臭气熏天的牲畜群。铺位的排列情况是，军官的床铺不在第一排，他们必须跨过同伴的身体才能到达自己的床位；如果其中一人生病，邻居也会被感染。

我们比士兵的情况要稍好一些，但肯定不如舷窗附近的牲畜群。军事当局已经承认，30名军官将要在热带地区行程5个月，暴露于猪圈鸡舍散发出的气味中，并不停地吸入离第一排床架0.5或0.6米处的厨房和蒸馏机排放的气体！

当局没有丝毫犹豫地让这些军官混住于士兵中间5个月，这些士兵在每天4次的配给时间里占据了留给他们的狭窄空间和厨房之间的位置，这一疏忽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十分缺水，所以在这样拥挤的地方要洗澡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整个行程中，如果我们没有窒息而死，那我们将被迫生活在这必然损害我们健康的恶臭气体中。看来，所有的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造成这个局面的官员，既不理解这种极端失礼也不理解其危害，是没有资格担任公职的。毫无疑问，如果海军大臣能看到这样的布置，他会立即将造成或容许这种事态的军官或工程师撤职，或者至少将他们停职。人人愤慨，抗议四起；但是，一如既往地，每个人都推卸责任。海军尽量避免安装受谴责的设备，军舰工程队唯有执行命令，未曾想到这会引起强烈抗议。从那时起，我们放弃了对地方当局的任何希望，我们必须联系当时在土伦的蒙托邦将军，以及肯定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困难条件的皇帝的扈从。

12月3日

我们的行动有了令人高兴的结果，蒙托邦将军前来察看军舰，

而后发现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他写信给大臣，告知我们的合理意见。我们请求得到被牲畜群占领的空间，这尤其使他感到触动。这些有趣的动物引起了主管当局的关注，他们似乎最关心两个舷窗之间的装置，认为应该尽量远离厨房。

12月4日

皇帝本人通过非正式和正式的途径得知我们的处境，派了副官卡斯特诺上校作为全权代表，前去土伦了解情况，他有权当场作出决定。这个消息很有效，促使了海军军区司令的来访，他以最亲切和蔼的方式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并答应下令改善不能容忍的布置。于是，前两天不可能的事，现在完全有可能了；此外，舰长应海军军区司令的要求，答应把我们安置在空闲的船舱内。

12月5日

事实上，从早上起就有一个海事工程师，就是负责我们最初的装置的，或更准确地说，固定床架的这个人，来到军舰上并开始当前的修复工作。那天，人人都觉得当局使我们所处的处境荒谬且不合适，大家都在设想和预测将要到来的变化。

12月6日

虽然不是十分舒适，但是为酷热时期作好了储备，显然我们的布置有了改善。住所由两个宿舍组成，在蒸馏机和厨房的左、右两侧，还是临近牲畜群；但是相互隔离的双层铺位，使得我们每个人

都能方便地在各自的空间走动，并且也使我们可以单独向士兵发放配给。

12月7日

我不知道人们热情地满足我们的请求是否与卡斯特诺上校的到来有一些关系，我只注意到，新的布置在皇帝派遣人员来视察之前已经完成。我们之前处境的所有痕迹已荡然无存；我们最主要的抱怨已经没有了，我们承认我们实际的处境已经是可以忍受了，但是士兵人数实在太多。立即有一个150人的工兵连下船，我们都表示满意。卡斯特诺上校离开时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不是只在开普敦停靠一次，皇帝允许我们中途停靠三次：特内里费、开普敦和新加坡。

12月8日

我亲爱的朋友，在敦刻尔克与你最后一别，我保证根据你的意愿记录这次行程中我所经历的所有感想，以及到阿耳戈的这次新出征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我的自我主义将保证回忆的准确性，会每天来激起你的回忆，我也有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使你的希望落空。思想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我得以重温过去从而缓解现实的痛苦。回国之后，当我拥抱你时，我至少会觉得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变得疏远，离别也不会对我们产生像对庸俗之人所产生的那种有害影响。

8日早上7点，我听到把我们系在土伦港的锚的绞盘开始运作，我立刻站起来，心里有一个难以言表的复杂的想法；我们将开始一

段 4000 法里的行程，在我看来，不向美丽的法国最后一次致敬是大逆不道的，我们即将离开她如此之久，或许是永别！

船开始移动时，我坐在后甲板上，在这个残忍的回忆时刻，我听凭我的心徘徊在珍贵的往事中。我看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慰藉，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我想着这痛苦的分离，想着我刚刚流了这么多的眼泪。我想知道，在这些泪水和悲痛的背后，是否有一种情感，一种害怕危害如此亲爱的人的想法；最后我对自己说，难道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眼泪不应该成为我们行动的最终原因吗？我为自己带来如此多的痛苦而自责；在某种情感毫无由来地占据我的心、扰乱我生活的时候，用粗暴的手段逃避而造成这些痛苦感到自责。但是，在这个看似雄心勃勃的表象之下，有一种反对这些本能冲动的理由，为我的远离找到了充足的借口。

除了对父母的孝心及其引起的歉意，还有对填补内心同样有益的、同样必要的友谊。我回忆起曾经的幸福时光，与人分享意见和情感的温馨时刻，对一个亲爱的人的满满的信心，以及这样一种信念——我们不是生活在孤独中，在犯错的时刻、在寻找依靠的时刻、在软弱的时刻、在面对危险需要无私的保卫的时刻，人们总是会得到没有讽刺挖苦的金玉良言。在令人悲伤的遐想之时，我的双眼仍然停留在法国海岸线上，好像要将这作为我最后想法的证人。

一点一点地，物体开始变得模糊，陆地与海浪混合在一起，一会儿就消失在地平线最后的波涛中；我刚刚最后一次缅怀过去。但是，大海如此漂亮，阳光如此灿烂，我似乎重新燃起了希望。再见了，父亲母亲！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我所有亲爱的人们！再见了，美丽的法国！我将心留给你们，只希望有一天回来能在友谊的庇护下求得一处慈父般的安身之所。

12月9日

在开始描述我们的生活细节之前，我应该先让你了解一下我们将被迫在里面生活 5 个月的“流动监狱”。她的名字取自我们的边疆省份：“汝拉山”号，自重 3500 吨，250 马力，是皇家海军的混合运输船。由甲板，一组高炮，一组低炮和船舱组成。最大的部分是后艏斜桅，长达 80 米，高 12.40 米。她的外表没有任何装饰，被漆成清一色的黑色，这也正象征了船上所有人的悲伤情感。船的内部十分脏乱，管理不好，布置得极为糟糕。被囚在内的我的不幸的同伴人数如下：

两个炮兵连，人数·····	460 人
一个架桥兵连，人数·····	100 人
一个工兵连，人数·····	144 人
全体水手·····	180 人
最后，军官人数·····	35 人
总计·····	919 人

一切都由一名浅栗色头发的护卫舰舰长指挥，他有一只相同毛色的狗。自从这狗闻过我的狐皮大衣之后，就成了我的死敌。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应该加上第二部分，才构成船上完整的集体。包括牛、羊、鸭、鸡，还有数量可观的其他动物。

动身之前，我们在这个动物园中有个位置，它既不符合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的肺也不好，北面是猪圈，东面是这些牲畜的脏水。我们的投诉是如此有效，从而战胜了所有不正当的要求。我们的地理位置还是跟以前一样，而且恶臭也没有任何改变，但是至少我们被分成了 16 个类别，并且跟别的水手分隔开了。我们生活在这些

两层的大橱子里，每个人配有一个写着铺位号的“抽屉”——2米长，0.60米宽，0.60米高。就在这糟糕的壁龛里，我们经受着热带和赤道的高温。

因为年资，我在这个房间里选择了一个上铺，因为如有必要，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为了爬上铺位，方法很简单，如同做体操：手腕支撑着抬起身体，腰部用力挺起，到达枕头的高度，用力抬腿至水平位置，这样人们马上就可以将身体部位调整到舒适的位置。要想轻松地到达铺位，只要做这样一系列鲤鱼打挺的动作就可以了：如果想避免意外，一旦躺上了床，就最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一不小心抬起头，头上就会撞出一些包，抱怨也无济于事。人们的双脚也会踢到某种铁瓶子，这种铁瓶子起的作用截然相反，它失去平衡时会影响睡在下铺的人的安全。我会很好奇看到一个梦游的人顺从于这样的困倦，科学在大自然的这种怪现象面前自认失败，我为此提供了一个治疗的方法。

12月10日

我已经意识到独处的需要；经常与跟我同类的人接触让我感到疲惫。人生来就是在迷失的时候生活在集体中。我到处寻找一个角落，一个能把我的思想和我的心隔离起来的地方，一个能让我稍稍沉湎于过去的地方。在人生最美好、最丰富的第一个阶段，懵懂无知但却因为无知而如此幸福的阶段，和无关紧要的人有什么可做、有什么可说的呢。人确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动物；所有的创造物都对现实生活感到满意的时候，唯有他，只有在幻觉中、在想象的虚幻中才能找到幸福。神将要向他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满足他，他的命运是在别处？让哲学家们深入研究这一奥秘，我们回到可悲的现实中来

吧。我的探索并不顺利，一点都不，我的朋友，谁能使我逃避我那919个不幸的同伴的眼光，这还不包括关在笼子里的那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睡得很晚，这样我至少能够单独度过一些时间，天空和大海将见证我内心的渴望和想法。我将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篇章托付给这些不会说话的证人，在他们的见证下我将重新审视我生命中最崇高的征程。再见了，朋友！我等待着梦乡的到来。

12月11日

幸运的一天，好事成双。一个属于我的小房间，属于我一个人的；以及一个迷人的晚上。你记不记得伟大的天才狄德罗的一句话，人们指责他的无神论，他在最纯洁的宗教情怀的崇高影响下写道：“大地是一个祭坛，由人类供奉，由天堂照亮。”昨晚我在最迷人的夜晚凝视着星光以及海面优美的波浪，又回想起这个优美的句子。甲板上一片寂静，船在海浪中安静地保持着平衡，没有给我的思考带来任何扰乱。灵魂沉浸在奇妙景致的魅力和诗意中！伟大的上帝！我的朋友，人们只看见海天一线。当人们幻想此刻在天穹中发光的每一个点都是同一个世界，想到保护我们的这艘脆弱小船随时都会被海浪吞没。

人类疯狂的傲慢是多么的无能和渺小啊！他自命为造物主，却甚至不了解组成这个世界的宇宙万物，不了解他居住的星球；他忽视了他眼前发生的所有现象的基本原因：他自身的存在，对他自己来说将永远是一个谜；他的生命在危险中消逝，而他自己却毫无意识；他始于一声痛苦的尖叫声：新生儿的啼哭。他在长时间的呻吟中变得无力：垂死之人的最后一声叹息！可悲的君主制，只会带来苦难！可怜的君主，既不了解他的王国也不了解他的国民，他的

王权只是一顶带刺的花冠，他的权杖只是一根枯木！然而他却可以带着某种满足欣赏人性的不断进步，但是当他慢慢长大，他危害到一些大自然的力量，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真实的创造物，他发现了这点但什么都不去创造。当他面对创造物并且想找出这种普遍和谐的原因时，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分子原始混乱的能量造就了万物，并将他们发射到受引力定律控制的空间，但是这种能量对他来说是一个谜，并且永远是一个谜。通过这种逻辑的连续推断，他不可避免地得出最高存在、最高力量和最高意志的想法。他天生的呼吸本能之声暗哑了，只听凭于他的判断能力，他很自然地与18世纪的另一个无神论者伏尔泰大声说：“如果不存在上帝，就应该造一个出来！”

12月12日

在上一封信的开头我跟你说过，很幸运地，我有了自己的一个小间，在那里，我可以一个人回想过去，一个人，没有旁人，我可以在我的思考中想起那些被我留在法国的亲爱的人们样子。你知道我的卧室吧，我的朋友，我现在把它改装成了工作室，使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地方，我将在这里接待我所有的朋友。

为了赋予我的小房间新的用途，我需把房间内部稍作整理，这有必要描述一下。抽屉在右舷，这是最大的一件家具，竖着放，并且很幸运地在舷窗旁边。是的，我的朋友，我的年资给了我享有好位置的权利。就是通过这个小小的开口，灵感、空气和光线穿透过来，我让大自然毫无束缚地分配给我这些。在船上内部通道的旁边并不是这样，邻居们可以随便往我的宿舍里面看，我用一根细绳把一块漂亮的湖蓝色帘子围起来，很雅致但更加牢固。床脚，沿着

船舷隔板，政府施舍的这 0.60 米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晚间休息，属于我个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改装成了图书馆。

很不幸地，我们被迫大量减少了图书馆的藏书量。除了所有的小说类图书，我努力将各种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收集起来，简直是大杂烩；历史、哲学、流行歌曲、通俗读物、宗教作品、梯也尔、孟德斯鸠、贝朗瑞、莫里哀，以及正如丰特奈尔所说的“出于人类之手的最美丽的杰作”——《效仿基督》。这本书一直跟随我到克里米亚，到意大利，这次跟着我登上了去中国的征途，这本书是在远东战争启程时，一个迷人的女子送给我的，因为她在夏至时成为了一名新贵。

我越是回到现实，就越意识到女人不到 40 岁不会真正可爱。40 岁之前，她们卖弄风骚，自大，或者腼腆。她们歪曲夸大她们的优点，或不知道发扬光大其优点。唯有 40 岁的女子，敢于表现自己的本色，并且如果幸运地她的内心没有变老的话，她拥有那些年轻女子所没有的细腻情感。但是我们现在远离了我可怜的小屋，现在你跟我一样了解它了，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每天都来这个狭小的偏远小屋度过一些时间，你在这里可能找不到太多同伴。希腊智者苏格拉底曾说过，小屋子如果能坐满真正的朋友就是快乐的了。我不敢奢望比苏格拉底更快乐。

12 月 13 日

直到这一天，海洋一直风平浪静，我们甚至指责它太过温柔了。当我们还看得见巴利阿里群岛时，微风习习，我们的行程也比较缓慢，但是，一过了福门特拉岛，风就变得猛烈，海洋也更加汹涌。今天早上什么都跟我们过不去，狂风肆虐，还有直布罗陀海峡

的逆气流使我们偏航；尽管船长反感蒸汽机，反感我们使用机器，尽管考验不很严峻，我确信我有水手的勇气和精神，并且我刚刚对我的时间作出了安排。

当船的清洁工作完成时，已经将近早上7点钟，我开始洗漱。我们每人每天都能分到半升浑浊油腻的水。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已经被几只昆虫占据的液体时，我被吓得后退了几步：但是，如果哲学不能在这些困难时刻帮助我们，她又有什么用处呢？开始的时候我很不情愿地用着这不知名的蒸馏物，现在，所有的不快都消失了；我在我的皮肤上洒上这层无名液体，没有任何的顾虑。这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一种新的相似行为，这是自然主义者不曾想到的。洗漱一完毕，我就上甲板取黑夜毒药的解毒剂，同时呼吸着早晨纯净的空气。9点钟，一声沉闷的军号告知我们早饭时间到了，似乎要把著名的《比戈神甫的大盖帽》的旋律撕裂一般。人们说船上的瓦岱勒是一名优秀的糕点师傅，但是他忽视了布里亚·萨瓦兰最基本的告诫，尤其是沙司的问题，他似乎一点都不熟悉。11点钟，全体水手都到甲板上祷告，在船上神甫的带领下背诵祷告词，神甫似乎知道祷告词越短越好。我也跟着向神祈祷，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散步，直到下午4点，我才回到我的工作室。4点30分，跟早上一样的军号告知我们晚饭准备好了；为了稍微缩短晚上的时间，我们尽量延长这一消遣的时间。晚上6点，神甫重复早上的经文——由一段天主教经和一段圣母经组成：之后马上开始惯常的大约一小时的集体散步，接着通常是一局惠斯特牌或者一次阅读。

除了对军官们的不合宜的安顿以及漫长的征途等烦恼之外，还有船上两盏灯发出的浓密而收敛的烟雾，将饭厅变成了游戏厅，像一个铺着有害的绿色地毯的低等酒吧。最后，10点钟，在对邻座

稍作调侃、确定了远征中国的作战计划并追思过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上了自己的床。你看到了，我的朋友，我们的生活很安详，而时间过得很快，我相信我们会持续这样直到最后，没有太多的烦恼。

12月14日

天气比昨天更糟，尽管是蒸汽船，我们不得不放弃进入海峡的打算。我们试图停靠在欧洲底部的西班牙海岸，但是水太深，我们被迫在这个临近陆地、有一定危险性的地方抛锚了。

我们在船上筹备了一场悲伤的仪式，一名水手在土伦启程之前掉进了海里。这次事故以后，他的健康明显变坏，而且他坚持不接受任何治疗；恳求和强迫都不能让他遵医嘱服药，他说，他只等待着精力的恢复。那天晚上，带着大自然会拯救他的想法，他去世了。此时，所有的水手都在甲板上，他被放在嵌入舷窗的一块木板上，神甫站在尸体身旁。为了使尸体不浮到海面上来，人们把他绑在一个沙包上，并用柩衣把他整个包裹起来。神甫做完祷告，随着他的一个手势，人们抬起木板一翻转，尸体就掉入了海浪之中。一阵隆隆的鼓声告诉全体水手：仪式结束了。

这次沉没的场景，就如海军所说的，已经给人们留下了痛苦的深刻印象。这个葬礼仪式缺少丧葬应有的哀悼。

这是海军的惯例吗？还是我们船上特有的变通？人们忘了按照要求升起为了志哀降下的半旗了吗？

可能我们也需要尸体投入大海的痛苦印象。我们确信，我们的肉体将会变成蠕虫的捕获物，葬礼的场景使我们感到屈从，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厌恶情感，也没有激发我们的本能。

通过研究各个民族的习俗，我们发现了对死者表达最深切的崇敬，宗教的想法往往与墓地的种类相关。因此伊斯兰教徒切去敌人尸体的手足以阻止他们享受天上的幸福，而罗马人则用奴隶的尸体喂池塘里的鱼或者竞技场里的猛兽，他们认为这些都属于另一种自由。

因此，除了这些当地的习俗，我们心中存在着一种天赋的本能，即我们对我们所爱之人的墓地怀着一种崇敬。正因为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我们尽可能地延缓了我们所爱之人的肉身的腐烂和变形。基督教教义宣扬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将尸体沉入大海，却破坏了所有这些本能；她又把我们带回到了罗马的竞技场，使我们一下子倒退了二十个世纪！

12月15日

风向变了，在蒸汽机和船帆的帮助下，我们最终战胜了以每小时六节的速度流入地中海的水流。临近中午，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直布罗陀海峡，能够很好地仔细观察它了。

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即1704年，英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人们无法进入其中，它通过一个150至160米的沙土带跟大陆相连，并在地中海入口处形成了一个能够安全容纳一支强大舰队的港湾，英国以这一令人生畏的地理位置出其不意地获得了王位继承战的胜利，并从此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

抵达了我们寻求庇护的西班牙海岸，我们看到了大不列颠的国旗，飘在悬崖上，让人不可触摸，好像人们害怕由安插在各个天然或直接在海上加工而成的人造岩洞中的炮兵连发起的一场新的泰坦

之战。在南边，眺望7海里远的非洲海岸的休达港，我们发现高出海平面约40米的陡坡上有一座四层楼高的灯塔，附近驻扎着炮兵连。这整个的要塞，一部分是避弹室，另一部分是露天的，构成了直布罗陀海峡的防御系统。在悬崖西边的陡坡上，正对着阿尔赫西拉斯，坐落在港湾对面的海岸边的是英国城市以及让西班牙人永远感到耻辱的防御工事。

安达卢西亚最南端的山脉通过一个一衣带水的沙土带与直布罗陀相连，扼守着只在吹南风时开启的阿尔赫西拉斯湾。这就是英国以不守诚信得来的，并且，尽管法国和西班牙曾四次联合试图抹去这一从Cid孩提时代起就存在的耻辱，但直至今日英国还是占领着这里。

12月16日

西班牙海岸消失在黑夜中，我们陷入了沉思和悲伤。我们刚刚目睹了最美丽的南部海岸全景，我们仰慕阿尔赫西拉斯和塔里法，它们在海边优雅地俯身，像两个迷人的女人，像两个安达卢西亚人对着海浪照镜子，在一个美好的晚上最后一次倾听即将离开的情人。

大自然穿上最漂亮的华服，赋予这些地区最宝贵的资源，人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存、爱恋和歌唱。

天空如此纯净，大地如此肥沃，地表如此多变，在这美丽的西班牙，所有这些都带来温柔的遐想。不要问他的工作，也不要问他的精神压力，他只懂得心灵的休憩和诗情画意。这些傲慢的西班牙贵族，目光炯炯，想象丰富，淳朴敏感，敢于冒险，优雅地登上了他们装有弓箭和吉他的帆船，歌唱着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祖先，去

征服新的世界。

这就是蒂尔和塞维利亚的女儿加的全盛时期，其起源可追溯到赫克力士擎天柱时期。因此，航海者只能与这些自然力作抗争；斗争的宏伟适合诗歌之灵魂；到达了被征服的国家；掠夺被征服者，不必考虑未来。西班牙海盗闻名遐迩，他们掠夺财富并且遗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曼陀林和一张世界地图，一条通往新的黄金国的航线。这是塞维利亚和萨拉曼卡人们培养爱情、发展美术和文学的时代，是欧洲各民族因内战而不再有进步的时期！

西班牙黄金时代被称为傲慢的僧侣的圣茹斯特，是弗朗索瓦一世难得的对手。今天，人们徒然地在这分散在海洋上的三、四块土地上寻找查理五世古老统治的痕迹。逐渐地，这些北方的野蛮孩子，这些自然界最底层的人们，要求工作和职业，公民的权利，有一天他们终于觉醒并且感到自己足够强大，强大到要求获得解放和征服世界。傲慢的卡斯蒂利亚人身戴艳丽的镀金饰品，通过借来的华丽服饰，这些被掠夺来的而非创造的财富，我们发现了第欧根尼新的衣钵，他知道如何寻找大陆，但却不知道繁荣和生活的真正原因。

当世界通过工作和基督教复苏时，西班牙宣布了罗马教廷信理部的权威，在人类的殉教者名册中加入了一个新的名称，宗教公判大会（公开焚烧异教徒），这如同一个血淋淋的纪念碑，向后人解释一个伟大民族的衰落。历史记载，三个世纪里，智慧、力量，大自然赋予西班牙人民的所有这些丰富的品质，都沉睡在道德奴役的阴影中。如果一个民族不生产，忽略大自然赋予她的力量，就会很快失去她的个性。西班牙不只是把失败记载在她的编年史中；她在自己的无能中看见英国狮子对抗世界的旧主人，来抢夺她领土的一部分，强行要求实施英国的法律，要求野蛮民族偿付赔偿，侮辱查理五世的国旗。

在萨拉戈萨稍作停留，人们相信了再生这回事；这只是回光返照的瞬间。但是，西班牙听到这个莫大的耻辱时颤抖了，她只听取她的荣誉的劝告。额头发红，她尖叫着要战争和复仇；未来会向我们证明，这是绝唱抑或是一个民族的觉醒。这些民族就像凤凰，应该能涅槃重生。

12月17日

让我们在所有这些哲学思考中安置一个弱音器，进入也富有想象的现实生活中，即使现实生活不那么诗情画意。鉴于此，我自告奋勇授予这名水手荣誉勋章，因为他以他的职业表达了最振奋人心的、我所知道的最独特的表述。船长做了一个噩梦后来到了甲板上，他心情恶劣，眉头紧锁，两眼发直，面容紧张，水手一点都没有弄错，他尽可能地避免他的出现，慢慢地松开他的索结，当人们问他这么做的理由时，他偷偷地朝后面看了一眼，回答说：“船长顶风了。”从今天上午起，船上有 919 名类似于船长的指挥官，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做了噩梦，而是这些自然力在嘲笑我们的努力，我们没有沿子午线往开普敦行驶，而是走了一条与赤道平行的路线；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特内里费，但我们却被迫驶往马德拉群岛。你现在能理解今天早上甲板上的那阵尖叫声了吧：船长，顶风了。

12月18日

风变小了，但是却进行着最后的肆虐。天穹乌云密布，海天一色，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

12月19日

我亲爱的朋友，我刚刚观看了一场壮丽的表演，这使得人类对神圣的力量满怀敬意，但也显现了人类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的智慧和自豪的情感。

我不清楚是否有危险逼近，不清楚我们将命运托付的这些人心中心中是否有过瞬间的畏惧，但是我很确定斗争的宏伟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经历了一切波折，丝毫没有考虑我们的顾虑，没有担心我们是否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死亡会给我们带来恐惧或懊悔，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的注意力十分警觉，我们的精神被悲伤的念头支配着。这就像我们美好的孩童时代，在戏剧表演中，眼睛紧紧地盯着那著名的海难中的沉船，我们气喘吁吁地跟随着置景手法的变幻莫测，新的场景使我们眼花缭乱而不是痛心。

现实唤醒了我们在小说中体会到的同样感受，在最高存在的最高思想中汇合，这个场景的唯一目击者，我们命运的主人，我们信仰和希望的审判者。

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有暴风雨的预兆；船长立刻仔细审查情况并确定航行的方向，我想参与斗争的所有阶段。我和夏隆以及德莱赛上尉一起艰难地到达甲板窗的栅栏，把我获救的希望托付给一根强有力的铁棍。不断地在天空与大海中悬浮，被雨水和海浪淹没，我们力撑这一感人的场面直到白天的最后一线光芒。天空布满厚厚的云层，使得我们航行的路线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大海猛烈地摧打我们脆弱的船体，随时准备挖深渊吞噬我们，或者把我们抛上半空；她好像在跟我们的疲劳玩游戏，不一会儿，以保护神似的愤怒

掀起我们的小船，差点打翻它，泡沫噼噼啪啪地淹没甲板，似乎要发泄她那被抑制的不耐烦和暴怒。

在地平线上，闪电似乎为我们的死亡判决划出了火红的痕迹，风向每时每刻都在改变，而风力总是在不断地增强，使得缆绳瑟瑟发抖，似乎在唱着挽歌。甲板上，人们被强力推搡着，虽然各个方向都系着缆绳，以保护人们并使船的操纵更方便。船长的命令、乘务长和大副尖锐的哨声越来越近地回响在桅楼中。

大海波涛汹涌，船只颠簸不止，所有牲畜都发出痛苦的叫声，发狂地奔跑，寻求抵御死亡的庇护，他们完全不理解，船上的一切都陷入了混乱，让他们感到害怕。像是一个巨大的狂欢节，所有的东西都通过一种奇特的幻觉变得有生命了，在疲惫不堪和摇摇晃晃的人们四周表演一种地狱般的舞蹈，只差祭酒和人类的祭品了。

在这混乱之中，船长神情严肃却冷静，目光交替停留在船只和云霄上，好像为了探查未来的神秘，查看每一个云团，向越来越近的地平线询问我们的命运，发号施令，集中力量好像为了与大自然争夺权力和威望。

船只本身，在冷静和丰富经验的引导下，不断被吞没，在突然矗立于海洋深处的高山影响下呻吟着，但又重新自豪地前进，如同向大自然进行新的挑战。

夜晚终于来临，夜幕给所有这些场景蒙上了一层悲伤的面纱，留给人们对恐怖的自由想象，一声惊呼在回荡：水泵！听起来就像是死亡的预兆，使最顽强的人都感到心头发毛。所有这些脆弱和毁坏，这种似乎藐视一切障碍却又屈服于人类智慧的力量爆发，形成了一个无法形容的威严的画面。这幅画缺少动感，色彩单调，而颜色是赋予风景创作以永恒灵魂的神奇火花。

12月20日

不幸的是，大自然的暴风雨造成了一定损失，这使全体水手深感惋惜。死神时刻威胁着这些无辜、脆弱的羔羊和凶猛、冷酷的公羊，猪、火鸡和鸭子。死亡的阴影弥漫着整个家禽和有角牲畜家族，在她轻率的愤怒中，她很高兴看到我们饥肠辘辘，夺走动物的生命。

12月21、22、23日

浓雾和逆风使得我们无法在特内里费靠岸，船长决定从这里和帕尔马中间穿过，朝佛得角群岛方向驶往好望角。但是3天里，天气情况都不允许我们按照这条路线航行，我们停留在特内里费境内，承受着坦塔罗斯肉刑般的折磨。终于，第四天，天气突变，坚持不求助于蒸汽机的我们的专制的船长也有所好转，这使得本该完全放弃的希望又重新燃起。

12月24日

24日早上，我们心中的疑惑又一次升起了：特内里费消失在水平线的雾气中，靠近海岸是危险的，正当我们要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之时，一束阳光消除了我们所有的忧虑。空中的云一点点升高，就像拉开了帷幕，升起无数锥体，水域中曲折的沟壑和峡谷也一览无遗。

在一个吹东风和北风的锚地，我们看到了岛国首都圣克鲁斯港的轮廓，它位于一条锥形火山山脉上，这座火山的投影可以投射到

欧洲的最高峰之一、海拔 3600 米的特尔德峰：有白色柏柏尔马的内斯特，在使蔓延的熔岩层上的玄武岩土壤肥沃后，似乎要休息一个多世纪才能确保它的建筑的安全和命运。

微风迅速把我们带到了锚地，3 点钟时一名领航员在炮声中被我们叫来帮助，他让我们把锚抛在两艘法国运输船的旁边：“莱茵河”号和“伊泽尔”号，离城市大概 1000 海里。尽管我们很焦急，我们在登陆之前必须等待当地一名医生和一名政府官员的卫生检查。

我们 1 点钟进城，之前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开始有了很多乞丐和游唱者，他们走街串巷，不为别的，只为用鼻音浓重而又单调的嗓音把人们从午睡中叫醒。在屋顶观景楼^①的百叶窗后面，人们看到扇子在摆动，似乎在驱赶梦想的最后一缕气息，又像在回忆现实。这些亲爱的女士们，像胭脂花，只喜欢星星的明亮。爱人来到窗下，一遍遍重复着同样的忠诚誓言。他靠近时，美丽的罗西娜伸出神秘之手，轻轻地打开百叶窗上隐蔽的气窗；她只在幸福的时刻开启。屋子本身已经成为爱情的帮凶。

我们到达的那天是圣诞前夜，马路更加繁忙了，更多的曼陀林，更加欢快的歌声。行人提着的各种颜色的灯笼，像是对官方照明设备的不公正抗议，在四面八方摆动和交织着。马路上和广场上，人们处处都能碰到卖圣诞糕点的商人，用难消化的面团和碎肉做成的糕点——使所有的化学分析都无用武之地。

海上吹来习习微风，天气温和，所有这些异常的快乐在我们看来有一种独特的诗意，这很符合我们的想象。不幸的是，我们时刻都被为数众多的乞丐唤回到现实中，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更多乞丐，

^① 西班牙房屋建筑方式。——译者注

他们总是对我们说：喂，给我一个铜板吧。这是对法国通行的独特习惯的善意批评。因为在开始一句话之前，我们认为首先要通过开场白式的提醒引起对话者的注意，外国人很好地注意到了这一点。阿拉伯人对我们说“Dis-donc(喂)”。

在这占西班牙人口一半的大群乞丐中，有一个8岁的小孩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戴着一顶破旧的阔边毡帽，神情自豪，这个伊达尔戈人身上没有戴任何饰物，很脏，人们把他从睡意中叫醒。自从他出生，慈善机构不得不庇护襁褓中他的身体，他从来只穿些破衣服，他从事的行业显然是祖传的；但是，尽管如此不幸，他双眼却热情似火，生活得无忧无虑，满足得如此彻底，似乎大自然无视逆境的存在。为了让他更快乐，我们给了他一些似乎他很想要的四分之一铜板。他立刻跑去买了一支雪茄，然后请求我们允许用我们抽的雪茄点燃他的雪茄。这个年轻的乞丐一方面伸手求乞以满足某个需求，另一方面天生玩世不恭，真是不幸，我们很遗憾。

钟声结束了我们的散步，午夜弥撒开始了，我们随着人群走。从建筑的角度看，这座教堂没有任何独特之处，人们看不到任何一种风格。这是一个庞大的建筑，内部有一个中堂，两边矮矮的，由一个圆形的祭坛连接在一起。有一些相当漂亮的油画，裸体雕塑和大量式样蹩脚的镀金饰物。到处散落的几个代表信徒席位的垫子，是圣地主要的装饰品及动产。

每年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耶稣诞生图的浮雕，生动地呈现了一个本地艺术家变幻的想象中所激起的全部场景，展示给公众。这确实是一个奇怪和不合时宜的杰作，它激发了幼年耶稣周围的人的热情，以及当时应该在这个马槽附近的历史人物。汇聚了由一名优雅绅士陪伴着的、身着十九世纪女裙的夫人，带有明显职业特征

的国民警卫队队长，一名消防队员，以及大量的黑人。在画的最下面，在一个大概是祭坛装饰屏一部分的天窗，出现了一个伯利恒人，突然从沮丧的神情中惊醒，伸出右手挡住前额，以调整视野。如同一个加冕的场面，伯利恒的居民已经采用了法国人的作风，这里的压轴戏是：人们成群走出城市，到云顶去欣赏一个新宗教最重要的祭礼；最后，马厩的入口就托付给了躺在十美分买来的纸箱里的两只小狗，他们被当成了看门人。

进入教堂时，夫人们挨个在基督出生的画前好奇地询问，笑着指出每个人物的独特之处。虔诚地瞻仰之后，她们满足地坐在垫子上，伴随着管风琴演奏的华尔兹舞曲或波莱罗舞曲，以及一个亲切的微笑，交谈在钟声中结束了。她们的穿着一般都很差，但有着种族的区别。

看到这些美丽的西班牙女人优雅地靠在这些石柱子上，就像花儿靠在她们的茎秆上，漂亮的头巾系在浓密的头发上，随着活跃的交谈摆动，这些挑逗的眼神，用折扇遮掩着，是她们所有情爱幻想的秘密心腹，听着管风琴欢快的调子，人们相信，这是在音乐会或者说舞厅，我几乎要说这是在闺房中，而不是在这供奉最高存在的神社。

在西班牙，宗教主要表现为教士和对声望最高的圣像的狂热崇拜，这些圣像取代了每座房子中供奉的旧的家神。西班牙人不进行祷告，这种与神的灵魂的交流方式。在宗教意义上不存在任何道德思想。敬神的弥撒，特别是圣诞弥撒，通常是爱情故事或用语的来源。我们需要离开此地以休憩片刻。

我们打算拜访特内里费的旧首都拉古纳。我们只剩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睡觉。我们的房间在宪法广场一个叫盖兰的法国人家里，他经营咖啡店、旅馆和餐厅。我们很难恭维他的烹饪技巧以及他房

子的舒适，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伤心的记忆。房间里的家具有：一张帆布床、一张桌子和很多蚊子，把墙上的石灰乳都覆盖住了。我们由衷地希望不要吸引这些敌人的注意，冒着窒息的危险躲避它们的攻击；但是，我们一上床，攻击铺天盖地而来，并且策划得如此精密，我们只好自认失败并把战场留给这些食人者。我们的伤口证明了我们可怜的勇气，荣誉保住了。我们在一条石凳上找到一处避难所，这张不乏诗意的沙发。在灿烂的星空下，沐浴在海边，地平线的曙光初露，开始描绘海岸线的起伏，在一个沉睡在曼陀林最后的和弦声中的城市中心，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不幸。

12月25日

6点钟，要带领我们去拉古纳的全体水手们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五个人坐上一辆马车，由四匹当地的马拉着，马虽小，但是精力十足，在1小时15分钟内，我们匀速跑完了在山边回旋的弯弯曲曲的新道路。

我们刚刚穿过的这一地区有一种被洪水淹过的凄凉景象，最后一场洪水在8天时间里夺取了好几个人的生命。仙人掌、甲壳虫或野生苦艾仅在几英尺远，在这些荒原之中，震撼着行人的双眼。过去，覆盖整个山的森林使大地保持着绿色，调节着热带地区的降雨，激烈但不致命。

为了方便地灭绝这个国家古老的土著关契斯人，西班牙的统治者把这些美丽的森林变成了一片巨大的沙漠，政府的漠然不会想到要把这里重新变为居住地。金丝雀们逃离了这新的野蛮的征服，去了更好客的地方美化那里的孤寂。

拉古纳植被茂盛，一直延伸到距特内里费峰北部山脚20公里

的奥罗塔瓦。如同它的名字所显示的，这个城市从前是一片海拔700米高的沼泽地，因为安的列斯岛的新占有者变得干涸，这是征服者的唯一善行，在特内里费最好的港口加拉奇科附近地区扼守着通向奥罗塔瓦的通道。

这些从前都是沼泽的不卫生的地方，很快住满了人，拉古纳成了安的列斯的首都。但是，自从1706年火山爆发摧毁了港口，商业活动转移到了圣克鲁斯，圣克鲁斯继承了古都的声望和头衔。拉古纳的大马路上一片凄凉。戴着徽章的破烂衣服下面掩盖着高贵，她将自己的痛苦和骄傲隐藏在这个坟墓里。

奇特的厄运盲目地惩罚这个世上众多的后代，使他们无视未来，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只看到祖先的过去，同时也有他们光荣的传统以及衰落的原因，或更确切地说，是物种再生的天意，在每一个统治期限限制了繁殖，并将种族繁衍的任务托付给了别的更为强壮的物种。

拉古纳凄凉的大马路上覆盖着厚厚的绿草，房屋坍塌，徽章半毁，提醒着新大陆的征服者：这只是一块巨大的坟地，不久就只生活在回忆中。

我们带着不能参观安的列斯的绿洲奥罗塔瓦的遗憾离开了这个城市，那里没有冬天，热带的高温因为无边的植物带来的清凉而变得温和。英国富有的工业家正是来这个永恒的春天恢复他们衰弱的健康：在橘树园和柠檬树园中，在一望无垠的海边，在包裹着火山壁的茂密的森林中。

回到圣克鲁斯后，在返回到“汝拉山”号之前，我们可以参观这个只在夜里稍微浏览了一下的城市。圣克鲁斯通过拉古纳和加拉奇科港的战利品发展起来几乎不到一个世纪，位于一片荒芜的土地中部，其存在完全应归功于商业，这里是安的列斯岛最佳的锚地。

此外，还应归功于特内里费首都的头衔。特内里费的入口有两个堡垒保护着，第一个浸没在海中，有装备精良的低炮，而第二个堡垒的炮火朝着拉古纳的马路，炮筒很长因而没有危险。大部分的房子都有院子和摩尔人风格的内部长廊，外表的开口没有规则：或者说她只遵从一个规则：隐秘的气窗，通常在离地2米的地方。

圣克鲁斯拥有的3个广场中，最漂亮的是宪法广场。非常朴实的一座房子，写着总督府的名字，以及一个高于圣蜡节巴黎圣母院大理石雕塑的方尖碑，为傍晚前来散步的人提供习习凉风。西班牙人把关契斯人的灭亡归咎于纪念碑上的经文；为了讨好他们的统治者，他们十分小心地在方尖碑座底雕上关契斯人的最后四位国王，把这些妇女献给圣蜡节巴黎圣母院。

在广场旁边、海边一个平台上的植物园值得一些赞许。法国领事巴特洛先生是其创始人，人们说他在奥罗塔瓦乐不思蜀。

法式风格在特内里费岛民中有很多的新拥护者，头巾只为了抵抗疾病的传播；为了寻找当地的服装，需要深入到人群中，向这些乡村的居民讨要。戴着阔边毡帽、穿着凉鞋的男人，整个季节都包裹在一块宽大的羊毛毯子中，在肩膀处以束带夹住；两条重叠的宽松裤子，第一条在体侧成凹形，长至膝盖，这就是他们全部的衣着，一点都不起眼。女人们穿黄色羊毛的短衬裙，镶着黑色的长条和头布。这样的着装已经很雅致了，如果不说高雅的话，人们不知道会弄出什么样的怪事情，19世纪时发明了这种难看的圆帽，这对男人来说是永远的耻辱。

安的列斯岛的贸易几乎被英国人独占了，他们带着棉布或羊毛织品来到特内里费，并从巽他海峡买走马勒瓦西酒或马德拉酒和胭脂。除了一些缝纫用品从马赛寄出，法国与特内里费的接触很少；当时我们找到几个在圣路易斯定居的同乡，他们已经开始做一点小

生意了。

当地人垄断着不费力的行业：杂货店主，烟草商或理发师，最后这种行业的标志性的工具相当原始：一把剃刀和一副 X 型剪刀，这把剪刀把一只强有力的手臂刺出了一束喷射的血，静静地汇聚到刮胡子盆里；表明了当地理发师的双重功能。

粗粗的浏览可以对加那利群岛的现状有所了解，特内里费是其七个主要岛屿之一。至于古时的历史，她或许被包裹在人们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中。从亚速尔群岛到佛得角群岛，难道我们只看见旧大陆的残余，柏拉图的亚特兰提斯，亚马逊女战士国？或者，难道这不只是些大自然任性的创造物？几名勇敢的航海者或偶然或为了躲避暴风雨而居住于此，从而繁衍后代。很不幸地，西班牙在其所有的征服中都印上了毁灭的标记；破坏加那利群岛，将近三个世纪以前，挖掘了关契斯人的最后一个朝代的坟墓。西班牙毁坏了所有的建筑甚至民族的语言，抹去了所有传统，忘却了过去的历史。

在这些废墟中，甚至难以追溯这个岛屿最后的占有者的根源；人们诉诸于猜测，基于稀少而珍贵的文献，由一名西班牙修道士在隐修院的缄默中精心收集。我们翻寻历史，加那利群岛曾以“幸福岛”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纪元开始之际，在毛里塔尼亚国王朱巴二世回归之时，岛上因为生活着无数的狗而得到了加那利(*canis* 犬属)这个名称。此后，人们多次拜访该岛，2 世纪末，托勒密在耶罗岛穿过作为他世界之系统起点的子午线。

14 世纪中叶，罗马教皇把加那利群岛让给西班牙，但是直到 15 世纪末，西班牙才真正成为主人。居住在岛上的关契斯人特别漂亮、温柔、勇敢，他们是身材高大的农民、诗人、音乐家，并且对舞蹈充满激情。一双凉鞋，一件山羊毛大衣和一顶插着长羽毛的帽子就是男人们的服饰；女人们已经知道了胭脂的作用，她们身材

苗条，体形优雅，吸引人们的注视，她们浓密的头发，辫子散乱披在肩膀上，一条鹿皮裙包裹着身体且刚好盖住膝盖，这是唯一的一件艺术饰品。

关契斯人的习俗对我们来说几乎完全陌生，我们只知道他们有致力于发展农业的国王，虽然没有忽视建筑艺术。他们居住在散布于安的列斯岛上的天然洞穴中，这给他们提供了安全的庇护，并且不用花费多少财力。此外，一夫多妻制是明确允许的，香料防腐的方法也在使用。他们把身体内的所有东西都掏光，用百里香填充，然后把尸体放在火盆上方，直至油脂全部熔化。当整个操作完成时，盖上一块山羊皮做的披风，然后放进山洞里。

关契斯人只崇拜一位神，人们要到高山上向这位神祈祷。有些人认为这些特点与卡比尔人渊源相似，因而认为关契斯人从非洲来。但对这些迹象本身，我们最好看作是蒂尔的一个殖民地，或者红海北部的一个部落，其与周边地区习俗和信仰相似；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奉行体力法则的蛮族所不知道的。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埃及人和关契斯人使用香料防腐的方法，而且，在这个高山上被崇拜的独一无二的神身上，天与地之间神秘的祷告中，我们找不到关于西奈山的模糊记忆，这座横跨大洋历经几个世纪的山上已经插上了摩西的旗帜，直至特内里费顶峰。我们回到猜测中，西班牙人的破坏行为不允许人们再解开这个神秘历史的面纱。

1 月

离开法国登上如此遥远的征途，我可以想见我父母的悲伤，我能感觉得到我即将分离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暂时的悲伤。我自

己，则已经历了一些动摇和悔恨的时刻，我不止一次感觉到我的勇气衰退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生来就荣华富贵，当我们觉得足够坚强去要求在社会中拥有一定的位置，我们必须知道：作出牺牲才能得到这些。

当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克服这些感受时，当年龄没有为我们的心智带来足够的成熟时，为了掌控自己的心，必须隐藏软弱直至新的考验使我们变得更坚强，使我们无视嘲笑，直至某种激情燃起。

但是，我想在离法国 4000 法里的地方所寻找的，既不是遗忘，也不是心灵的干涸。我们的幸福太过于依赖感觉，所以我想把自己的这一小部分弃置于这个世界。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当人们看着日子在天空与大海之间一天天地过去，每个白天的尽头，人们交替看着天穹、闪烁的星星、纯洁的云朵，随着无边无垠的大海波浪的起伏，我们一点点感受到她的灵魂，灵魂被一个甜美的梦所捕获，在这宏伟的场景中召唤他最美好的记忆。

狄德罗说得对：“大地是一个祭坛，由人类供奉，由天堂照亮。”只是此时的神甫不想独自一人。不管主宰他的宗教情感是什么，他回到过去寻找一个能分享他感受的朋友。在这沉思的生活之中也有心灵的一部分。在这一同样的心中，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失踪、忘恩负义、不幸，磨灭我们幻想的所有残余，好像为了声明她神圣的本质是世上无可及的。在每一个民族跳动的心脏中，都能看到上帝赋予她在这个地球上的使命的特征。

西班牙人不懂爱情，他们的眼睛闪烁着感官的快感，但是这只是他们展现的没有互相分享的一种幻觉。她们就像点缀夜晚的萤火虫，在空中跳着闪闪发光的阿拉伯舞，一被人捉住，她们就会熄灭。爱情就像音乐，而她们只有一个音调，一再重复以至令人生厌。

人们对爱情下了很好的定义：一个微笑和一滴上帝的眼泪。在西班牙，人们不知道怎么笑也不知道怎么哭，感情变化没有过渡阶段，从哈哈大笑到剧痛，人们不知道这情节的剧情。他们的爱情使人颤抖，就像刽子手的眼里只有鲜血，一点都没有同情。只有法国懂得这种微笑和上帝的眼泪。

在查理五世的故乡，人们写阿那克里翁风格的诗；在德国，人们写哀歌；在英国，人们写史诗；只在法国，人们懂得感情的细腻变化，人们知道如何在不违反自然常理的前提下，逐渐从喜剧转到悲剧。

良好的公共意识揭露了吕克莱丝·波日雅的十二副棺材，并总是为高乃依的杰作《西拿》喝彩，从第一幕开始，一直是悲剧的，死亡之剑一直在奥古斯都头顶悬而未落。

最普通的人也知道破坏，但很少有人懂得要跟自己的情感作斗争并成为它的主人。这种斗争总是能够激发杰出人物的才智；这就是现在加布里埃尔成功的秘密。

人们指责法国人多变，正是她带给了法国人最高的荣誉。恰如含羞草对外界刺激十分敏感。多变性也有不利之处，但是她至少避免了僵化。使法国人民成为主要的文化传播者，那是因为就像蜜蜂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采蜜一样，法国人民养成了良好的文化品味，并且把它作为模范。同样的城市，因为亚西比德任意变化而骚动不安，把雅典人的情趣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起当作遗产留给后人。

1月

有人真诚地相信情感的多样性，上帝创造人的同时也创造了母

爱、上帝之爱和同伴之爱，有同样多的不同的特色；人们感知的能力将被分成不同的小格子，使得人们以相当的动力逃离压力。好像感情被贴上了标签；人们不太谴责，这在我们看来显然违背了自然法则。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种特殊的爱的能力来到这个世上，表现为各种各样不同的感情，它赋予他们色彩、情趣，它构成了人的个性。一棵树被要求在其所有枝条上产出大小不同的水果，但是只有一种味道。

人们热爱上帝，就像爱他的母亲和他的同伴一样，这些感情中无疑会有细微差异，他们中的其中一种可能被发展出来了，不包括对其他情感的损害，但本质是一样的。

仁慈是对隐藏着的爱的首要考验，是涌现在它的无知中的内心世界的展现，它在所有的人性中表现出来。孩子和守财奴，向那些只知道仁慈的人散布仁慈。博絮埃说：“仁慈就是基督教！”

基督耶稣的修道士给上帝只带来了傲慢，如果脱去了棕色粗呢的衣服，人们将会发现里面是王室的大衣。他想通过变为隐修道士来欺骗上帝，就像他出席他自己葬礼的时候欺骗那些人们一样。拉瓦利尔小姐在隐修院只想找到一个爱情的庇护所，人们可以在她的单人小室里找到带有基督影像的路易十四像；并且这既不是亵渎，也不是渎圣。爱情就是她的借口！

一个男人，只是个家长，不爱他的孩子，是自私的，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他对他的家庭就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对他的拐杖一样，或者像年老的贺拉斯，高乃依笔下这个没有心肠的人。

同样地，人们通过演奏辨认一个艺术家，不管演奏的是哪一个片段，因此我们能够抓住我们每一个人情感中的特色，不管讲出的是什么话。

2 月

从特内里费到好望角，路程漫长，一路平安无事。通过赤道不能被当作娱乐消遣。这是一种带有神话和宗教色彩的令人讨厌的狂欢。通过赤道的前一天晚上，一名身材高大、带有一个大喇叭的水手，即“热带老爹”，从中帆顶端向值班长官询问航船的国籍和目的地，质问为什么胆敢在他主人的地盘上冒险。他要求知道船载的确切状况和乘客的名字，这些都应该在第二天呈交给海神。“热带老爹”到达前的几个小时，他的天文学家穿上巫师的衣服，用一个六分仪来测定航位，以极其怪诞的方式摆放着，然后操纵着船只。一场豆大的雨预示着海神尼普顿的到来。他出现在一个改造成凯旋马车的澡盆里，被3个代表海豚的水手拉着。安菲西里特在他的旁边；一个洗礼神甫随之来了。天文学家把这些情况告知军舰后，仪式开始了。海神坐在他象征权力的高高的宝座上主持仪式，由四个卫兵护卫着，他们被委托执行海神的命令并使反抗者驯服。

军官们一个一个被召唤来接受赤道的洗礼。把祭献物放到一个木碗里作为洗礼神甫的酬金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并坐在一个滑槽盖有平板的圆桶上。他们让我们发誓绝不侵害水手的荣誉！仪式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宣誓用的喇叭里倒入一杯海水，然后粗暴地掀开盖着圆桶的平板。这天早上的一切都那么滑稽可笑，洗礼只是一次坐浴。

如果甲板上的士兵都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就会花很长的时间，我们用从中帆落下的水代替浸没。那些试图躲避洪水的人被仔细地搜寻，并且我们把喷水机对准他们，这很容易就替代了一般洗礼的效果。

最后到了晚上，这些水手在两次酒会中间给我们做了一次戏曲表演，《露西》第三幕的二重唱和《小丑的爱情》。德布劳有点天赋；其他人只是滑稽。演出在对安德列·谢尼耶的最后时刻的叙述中结束，由一个水手朗诵——一个刑满释放的苦役犯，白天的激动夺取了他所有的才能。他的声音，就像他的记忆，使他失败了；他请求观众们的宽容，观众们很能理解，毫不吝啬地为他喝彩。第二天我们得知安德列·谢尼耶的感情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执勤军官尴尬地看到诗人留在安菲西里特旁边，与之分享情感和喝酒的方式！

2 月

19 日，我们到了好望角附近，想着第二天早上就可以进入开普敦了，但是大海变得如此凶险，非洲海岸的狂风如此猛烈地横扫我们，我们被迫离开陆地并向南行进。

在 20 日的一整天里，“汝拉山”号成了海浪的玩物，像极了钢琴上那些为了标记节拍的节拍器。最后，经过两天像颠倒的钟摆一样的颠簸，船只终于恢复了平衡。大海和海浪也变得比较温和了，而且我们也能安全地继续航行。

22 日，即航行了 77 天以后，我们看到了桌山，山脚就是开普敦市。

因为山脉特有的形状，这里别有一番景色；在海拔 1200 米的高处，有绵延几法里的页岩平原，布满红色的粉末，紧紧地裹着氧化铁。因为大自然的奇特变化，通过一块斜坡与大海相连并绵延大约 1000 米海岸线的地貌突然之间直立起来，尾部是一块很平坦的平面，叫做开普桌。

左右两边都呈半圆形，各有一堵火山扶壁：狮头山，因其岩石

的形状而得名；以及魔鬼峰，朝着西风的方向，有时候风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这里的逗留让人难以忍受。就是在这半圆的漏斗形洼地中坐落着城市和桌湾，为过往船只提供了南风 and 西南风的危险庇护所。

在离桌湾 2 法里的东南方向，有一处十分理想的锚地：西蒙斯海湾，正对着佛尔斯湾；但是英国政府把它征用为专有的海军基地。就是在那里，人们在海军上将的住所旁边汇集殖民防御的军需品，舰队大炮和堡垒防卫着海湾入口。

进入锚地，我们得知远征的所有运输船只都已经比我们先到，除了“伊泽尔”号与我们同时到达。甚至有几艘运输船在两周的停泊后已经重新出发。唯独“汝拉山”号和“伊泽尔”号的船长没有用蒸汽机来穿越宁静的热带地区和赤道区。其他所有人都在想：除了大臣的规定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托付给他们的这 1000 个人的健康保障在哪里，整个征途的成功或航行的速度都托付给了这些人。他们已经被尽可能快速、安全地完成航程的想法控制了，尽管担心在驶往中国时，因所有驶向中国的船只中转停歇之地都在开普敦，那么开普敦是否拥有足够的煤炭以满足平时的消耗。

这些评价十分符合逻辑，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用 50 或 60 天的时间来完成从法国到开普敦的行程，而不是我们刚刚所花费的 3 个月，尽管“汝拉山”号被证实速度很快。人们对此次延期甚少给予解释，几天以来人们传言我们的船只遭受巨大的海损，或者一场使得我们不得不在非洲停留的传染病。

另一个失望在等待着我们：英国的邮船前一天晚上已经离开，我们的信件要在邮局等上 1 个月！愁上添愁，我们没有一个人收到从法国的来信；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信件命运的消息，这些我们本该在到达时收到的信件。带着这些令人沮丧的感受，我们靠岸停

留一个星期。

码头的地板十分糟糕，铺在桩基上，并向海水中伸出了数百米。破烂的状况给殖民地贸易带来了一种十分凄凉的感觉。

我们下船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找一家旅馆。我们刚刚忍耐了一个半月；一盘烫手的四季豆干，一盘或多或少腌过的炒猪肉，跟几罐少见的绍菜^①拌在一起。我们迫切地、马上开始吃一盘符合我们饮食习惯的、温热的菜。开普敦有四家大的旅馆，以及几家接受外国人的私人住宅。

我们选择了说法语的商贸旅馆。老板舒茨是荷兰人，法语说得很好，并且非常热情好客，我们还必须承认，虽然经常会过分，但我们依赖于他温和的性格请求他原谅我们的要求。在成为旅馆老板之前，他是一名药剂师；这个职业似乎不怎么赚钱。药剂师（化验师和配药师）同时也是食品杂货商、香料商和药品杂货商，星期天兼做烟草商，因为在假日只有他的店铺可以开放。

舒茨先生有一天意识到，发展这个只占四十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人口的职业会成为一个骗局。他离开了药房成为了服务员，希望从这些健康或患病的人的收入中得到更多的好处。他的这些预料似乎非常成功，但是他应该以他的荣誉承认，烹饪并没有受到他以前状态的影响。可能我们指责他没有在他的房间里感到舒适自如。我的房间甚至没有钥匙，我向他指出这一点，他回答我说钥匙没什么用。

尽管他这么回答，我对服务我们的马来佣人的忠诚完全不放心，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我错了。在开普敦殖民地，人们既不会谋杀，也不会偷盗，更不会乞讨。在这一小群商人当中，动物的生命

① 一种必要时可加热水做成汤汁的干草。——译者注

对客人来说是如此珍贵，工作如此多产，治安如此有条理，犯罪和对财产的侵犯只能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在这里徒然地寻找工业城市的祸害：衣衫褴褛的穷人，为了每天的面包伸出手向公众讨要救济。确实，工业施加的辛苦劳作、前途无望、只能勉强满足家庭的物质需要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开普敦人的习惯可以说明这里人们生活富足。

当地人分着做那些报酬较高的辛苦活，并且他们是如此节俭以至于两天的薪水就够他们生活一整个星期了。

两个世纪以来文明统治着非洲这个孤立点，战败者永远要为胜利者服务。英国人摆出一副欧洲人的仁慈的捍卫者的样子，将仁慈置于物质利益及其原则之间，奴役当地被征服的人们，给他们带来了不平等。这块殖民地是地球上唯一拥有如此多人种的地方。

在高加索种族四周聚居着由最后的占领者带来的马来人以及埃塞俄比亚人，主要分四个种族：何腾托人，卡弗尔人，布西曼人和莫桑比克人；所有的种族都不得不在文明的奴役下屈服。

除了实质上自由的体制，还有一座无法逾越的城墙，即高加索人的自豪。她保留着独有的禀性，智力的作品，本性中保留了对家庭的关心，做艰苦的工作和农活。就像我刚才说的，通过强迫分居在非洲南部地区的各个不同的部落穿着欧洲的服饰，她带来了不平等。

这个方法具有双重好处：为国家产品寻求新的出口，并与英国假正经的习俗更为一致。我们不能想这种使人震惊的夸夸其谈，没有使我们回想起这个美好的想法，我们不再记得哪一个作者在谈论一个女人的时候说：她太无知以至于没有了廉耻心。犯错前的夏娃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这个判断的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明。我们试图相信，廉耻心是经验的结果。

在荷兰人征服之前，当地人可能还没有跟第一批居住者一样的

品位，他们戴一条用箭射落的鸟的最漂亮羽毛串成的颈饰。冬天来临之时，他们披着羚羊皮，而虎皮或者狮子皮则是专为部落首领留着的。

在脱离野蛮生活进入文明之时，这些人民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和自由。

欧洲的服饰对他们来说就是奴隶的制服，这些英国的被征服者穿着写有伯明翰或曼彻斯特的工厂名的衣服。在游客的眼中，何腾托人、布西曼人、卡弗尔人和莫桑比克人都只是穿着欧洲服装的黑奴；但是每一个种族都有与其智力对应的不同的性格和职业。最难看的种族，无论体形上还是精神上，是布西曼人，他们是何腾托族的一个分支，他们的嘴唇厚而下垂，几乎贴住脸部线条，他们的四肢细长，身材矮小，让人以为是介于人和猴子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动物。他们的缺点总是使他们成为邻邦的受害者，人类的贱民，他们逃离人类，把人类看作危险，退回到非洲中部离殖民地最远的地方，在他们居住的这些荒芜的地方只看见敌人。

布西曼人以树为庇护所，他们对旅行者来说是很可怕的，从树顶用毒箭刺穿这些旅行者。人们在开普敦很少看到布西曼人，在这里他们对于观光者来说只是一种稀有的动物，英国法律也无力保护他们不受来自其他非洲种族的鄙视，甚至经常是仇恨。

何腾托的其他部落居住在非洲西部，在英属领地北边，比布西曼人更文明和强壮，女人们有着特殊的体型，裙子对她们来说毫无用处；也许这应该归因于他们习惯把孩子挂在她们身上。此外她们特别难看，这引发了博物学家们的好奇和惊讶。

新教牧师使这些部落皈依了基督教。数量众多的何腾托人遍布殖民地的农场，他们是牧民，在地里干活，驾着套有 18 头或 20 头牛的圣经中的牛车，穿过山间的崎岖小路艰难地开辟了一条大道。

当他们来到开普敦市，他们忙着挖土，这份工作薪水高，足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

卡弗尔人聚居在非洲东海岸，在英国统治范围之外，他们比何腾托人保留了更多的自由，在智力和身体发育上，他们比何腾托人高级很多。在他们的部落，他们没有丢弃任何习俗，他们的服装还是跟以前一样，传教士在那里很少能发展新教徒。他们有时候在农场干活，比起何腾托族，农场主更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很少侵犯所有权原则。当卡弗尔人来到开普敦时，他们穿着一一种印第安长袍。

莫桑比克族是卡弗尔族的一支，智力不如卡弗尔族，长得更难看，但是更加诚实，他们人数众多，散落在开普敦城内，因为缺少多芒热的分公司，他们在这里从事一项最有利可图的职业。

除了非洲的种族，英国人带来了马来族人，跟我们只有肤色和扁鼻子的不同。马来人的智慧能够胜任所有的工作，但是普遍来说他们更多地从事理发和裁缝行业。与文明的接触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凶残天性，原先他们在马六甲海岸像海盗一样令人生畏。

除了这种只是作为劳动工具的人种的混合，开普敦殖民地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欧洲人组成，始于1650年荷兰人的统治时期，后来一些因为撤销南特敕令造成的血腥后果而逃离法国的人又加入知识分子群体。开普敦于1795年和1806年被英国人占领，直至1815年才离开。

法国因素太弱以至于不能形成稳固的根基，它逐渐消失，最后只留下一些名字见证他们的根源。克拉伦斯是地理位置极好的一个小镇，在狮头山的东脊上，还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雨果、维利尔斯和马赫比的后裔。开普敦位于连接欧亚两大洲的海岸线中间，一直是航海家觊觎的地方。在路线中间的两个锚地——桌湾和西蒙斯海湾，为它提供了两个足够安全的庇护所以抵御被称为暴风角的大海

的狂怒。

荷兰人一开始建立他们的亚洲领地时，就意识到这个地方在物资供给和防御上的重要性，便占据这里并建立了一个城市，成为了殖民地的首都。后来，这些荷兰人失去了独立性，转由法国统治。英国在东印度继续着路易十五已放弃的征服事业，拿下了开普敦并通过 1815 年契约最终占有了这块领地。

统治伊始，英国人便经常受到工业利益的启发，给予贸易和个人以充分的自由，条件就是要承认他们作为新的主人。大多数从前的占有者都归顺了，一些不愿屈服的人退居到了非洲东海岸的纳塔尔港，他们在那里以捕鱼尤其以狩猎为生，这就是他们野猪名字的来源。

在土著居民和凶猛的野兽都被征服了的土地上，欧洲人一小群一小群地散落在整个疆域内，总数约有 15 万人。这块土地从海边向内陆一直延伸了 200 法里，直至沙漠尽头，也是文明的尽头，在那里有一个被三、四千人的驻军防守的军事哨所。

殖民地的首都开普敦是一个有着两万至两万五千人口的城市，这个城市好像是一天之内矗立起来的，所有的建筑都如此相像。在一个温度达 35℃ 的地方，长方形的宽阔笔直的马路上有各种铺面，马路上完全没有阴凉处，这是伊万在其中国游记里让我们所希望的。只有二层的房子，造在一层看不见的平台上，房子的单调比太阳光的强烈反射更让人眼睛疲劳。居民们白天从不出门，除非带着彩色雨伞，彩色雨伞的颜色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帽子上插着一根具有散热作用的管子。

开普敦用纸板做房屋模型，孩子们在棋盘上对房屋进行布局：它有一个漂亮的植物园可以散步，总督的府邸就在这里，还有一个种着很多树木的非常漂亮的地方，一头止于图书馆，另一头止于桌湾的防御工事。

一个筑有棱堡的防御工事，难以抵御重大的攻击，因为这些高高的砖石工程完全暴露在进攻者的炮火之下。城市四周，直至几法里的范围内，有一些村庄，人们与干燥的土壤作战。植被变得十分茂密，人们种植各种各样的欧洲水果，和非洲水果摆在一起。

沿着通往魔鬼山的路，我们发现了布德·博谢村和康斯坦斯村，后者被未开垦的荒地隔开，就像沙漠中的绿洲。康斯坦斯的土地生产的葡萄非常珍贵，在欧洲很有名，只有两处葡萄园可以生产这种葡萄，一个是冯·鲁昂先生的，取名康士坦奇亚，另一个是克洛埃特先生的，他自己取名为大康士坦奇亚，它也是最古老的，一个世纪前由荷兰总督创建的。它起创始人妻子的名字，她只想在一个迷人的地理位置建一座乡间别墅。目前的业主是一些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他们都很了解苏格兰人好客的规矩，克洛埃特甚至非常敏感细腻，用描绘帝国主要乡村的画幅装饰其客厅。

康斯坦斯出产四种葡萄酒，邦达克、弗龙蒂尼亚克、康斯坦斯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最受好评的，起码最受欢迎的，根据价格，是邦达克和弗龙蒂尼亚克。前者是用浅红色葡萄酿制的，人们加以着色，用一种不好的、连黑人都蔑视的小葡萄，这种小葡萄在法国南部有染匠的称呼，他们具有跟染匠相同的用处；它会染色的特性给酒带来一定的苦味。邦达克的味道居于黑加仑酒和托卡依葡萄烧酒之间。弗龙蒂尼亚克与前者一样受到普遍好评，它无非是麝香白葡萄酒弗龙蒂尼昂，在法国 1.5 法郎就可以买到一瓶。克洛埃特的一位祖先是洞察人们心理的行家，他认为我们可以大胆地把希望寄托在人性的虚浮上，不畏惧任何最小的失算。他在法国南方人不知道的弗龙蒂尼昂发现了一种鲜为人知并且甚至在他的家乡也不受好评的好酒，因为不幸身为一个同胞，他被以一个十分合理的价格出售，并带走了几棵葡萄树以及当地酿酒的方法，他把这些带到康斯

坦斯，这里的土壤很适合种植葡萄树，并且成功地提高了弗龙蒂尼昂酒的质量，甚至名字都没有改变，这种酒在开普敦卖到了12法郎一瓶。康斯坦斯的其他酒也有密切的关系，白葡萄酒和里韦萨尔特葡萄酒，红葡萄酒和法国南部上等的干红葡萄酒。

植物园的后面部分一直延伸到桌山的半山腰，是唯一可耕种且真正美丽的地方，除了这里，人们必须走上2法里才能在这灼热的土壤上找到清凉的植被——山脉的水土逐渐流失到大海或某些内陆山谷中。水源的匮乏对农业的发展是个永久的障碍，人们只能找到一些绿洲来耕种，开展一点点贸易，交易动物皮毛和酒，不久就帮助固定了这种昌盛的关系。

人们陆续迁移远离了附近地区，前往大洋洲或美洲。不管当地居民怎么训练劳工，总是与生产所需不成比例，甚至当生产要求一定的工作完美性的时候往往缺乏劳动力。因此石匠奇少，而对其的要求却很高，因此尽管开普敦市背靠着页岩山脉，却完全是用砖头建成的，只有少数建筑物例外。

居民们的品行正直，与城市建设的方法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对旅客的精神产生影响。人们认为，英国的文明已经从单一转变过来了，从拉芒什海岸直至非洲的底部。她绝不向大自然让步，在那里她同样吃烤牛肉，喝黑啤酒，并在炮声消失中宣告日落，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呼吸着夜晚的凉爽，商店都关闭了，房子变得孤零零的，人们走在荒漠里，只能看到本地人。诚然，这少数的商人把自己在开普敦的居住只是看作临时的流亡。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发财，他们也只考虑临时的，这一点已经流传了两个世纪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没有很突出的建筑物，马路没有铺砌，尽管冬季有暴雨。出了城，水就很稀缺了。

殖民政府是完全与市政府和所有居民分开的，根据纳税额度，

居民有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选举资格和被选举资格，负责制定管理殖民地的法律，这些法律在得到了总督的批准以后生效。犯罪相继提交给两个陪审团进行审查：皇家检察官首先陈述犯罪事实，如果确认有了起诉的理由，诉讼将在法庭进行，由一个法官和第二个陪审团组成，第二个陪审团最终判定是否有罪。罪犯只有向殖民总督请求宽恕，总督是王国里最有权力的人之一。

在民事案件中，法庭由一个最高法官和三个陪审员组成；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担任控诉双方中一方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在开普敦一方的律师也在场，此辩护律师甚至从好几个商人手中得到 10 基尼的年金，并且负责保护他们的公民利益。人们几乎无法解释政府检察院的这种不合理状况，只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奇怪的习俗，当社会的公共利益与顾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检察院的尊严和独立经常被破坏，人们会担心失去法律的保障。

就如我们所看到的，政治体制和监狱系统复制了英国的那一套，但是荷兰元素统治了整个议会，这些固有的行事惯例在宪法中总是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各种法律如刑罚，受到这种对权力毫无限制的状况的影响。英国政府不惜重金在殖民地保持一支 8000 至 10000 人的军队，为他们提供保护。殖民地的预算也由议会投票决定，预算应当满足当地的所有费用支出，三分之一用来支付部队的军饷。首都只负担完全由英国人组成的公共服务部门三分之二的开支，以及由女皇指定的总督和法官的巨额薪水。殖民地的繁荣很早以来已达到了顶峰。

一天，吃晚饭时，与我们住同一家旅馆的一个人热切地找我们说话，两眼生气勃勃，一开始我们难以听懂；我们不懂英语，但是在他手势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明白了他有法国血统，他的祖父曾住在尼姆。这个应该学会过责骂法国的人此刻正处于遇见同胞的快

乐的顶端。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如此美丽多娇，甚至她的受害者都不憎恨她，我们越离开她，对她就越依恋，并且这种思念渗入到我们的思想中。

人们经常把英国作为爱国主义的典型例子，这在我们看来是没有很好地理解爱国主义这个词的意义。英国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本能的团结，大自然在弱小种族中激发的与共同敌人抗争的个体力量，这是一种社会保守主义的本能的变种，本质上主宰了个人利益，但是在这个想法中不存在自我的概念。当英国人大量聚集时，不管在美洲、大洋洲、亚洲或是非洲，它完全脱离了自己的祖国母亲，例如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站起来与英国对抗；对他们来说，爱国主义的精髓是一种商业利益，而远远不是在其发展中排斥个人利益的牺牲。

在法国，我们坚信自己的力量，这个想法并没有占据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爱国主义是被一朵花唤起的一种情感，是对钟楼的回忆，是对风景、微笑的思念，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大自然把我们安排在这气候温和的地带，像对待孩子一样厚待我们。各种才能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有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和所有的物质需要，以及他们的满足。这就是法国人对殖民一点都不热心的秘密，然而，我们失去的所有殖民地都从心底对我们保持着忠诚，法国的道德力量是如此之强。她的牺牲者们毫无怨悔地不为自己着想；那些垂死的被流放的人们并没有怨恨，向他们的子孙表达了这种爱国的悲伤情感，这种情感在有幸遇见一位同胞时不禁流露。

4月20日

在与海军军官们一起连续度过了4个月的航行生活以后，阅读

维克多·雅克蒙的评论，我们感到十分震惊的是一封 1829 年写的信阐述了我们的感受，信的作者十分客观，其公正的判断和个人才能使他能合理地评价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功绩和才能。我们在想，30 年的距离，是不是只是一个巧合，两个例子如此相似，或者整个海军部队并不是在其成立时就注定要遵守同样的法律的，无数的例外也无法颠覆这个规则。事实上我们认为找到了一些决定性的原因，都会导致相同的后果，不论何时何人。

大多数的海军军官都是从布雷斯特学校毕业的，这个学校录取 14—17 岁之间的学生。考生接受的考试主要是为了判断他们在数学方面的相关才能。被录取的机会是如此地不确定，以至于没有一个年轻人，我们应该说没有一个孩子，注定要投身海军，如果他们通过了初级考试，也只有两、三次航海的经历。因此布雷斯特学校的报考者从 12 岁或者 13 岁就开始他们的专业学习是至关重要的。他放弃了，或至少是忽视了文学学习，几乎完全地投入到抽象科学的学习中。

录取程序规定的这些不正常条件，必然导致对身体发展的严重伤害以及对智力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令人惋惜的干扰。事实上，合乎逻辑地发展的大自然，首先要求感觉器官的改进，作为心灵与外部世界沟通的中介。在身体发展之后接着的是心智和记忆力的发展，记忆力聚集所有感官传递的信息，产生判断，最终完全吸收人类的知识，甚至推迟其期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时期中都有能够超越而不损害人性的阶段。

罗马人将第一阶段的年龄设定为 15 岁，在这个岁数才穿上成年男子的长袍。今天，公共教育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即给人的身体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政府为其垄断的行业都设置了最低年龄要求，迫使孩子们比大自然规定的时间提早进行学习。当人们比较各种官

方强制规定的这些大纲，以及从事例如律师业、医学业、工业等等自由职业的人们的能力的自由发展，人们惊讶于社会中的这两大划分之间存在的巨大区别。诚然，后者服从公众指令的规则，并在他们最初的学习中曾犯了我们指出来的毛病。但是，一旦摆脱了国家令其公民都接受的智力水平，他们的学习变得成熟起来，吸收学校里所有难以消化的精神食粮，只有将近 30 岁的时候，社会酌情允许他们进入实践领域。

被置于社会的对立面，政府与社会有形式上的冲突。政府需要国民具有良好的习惯，教育体制带来的有害影响控制着人们，可以说自幼并且当工作完全耗尽时抛弃了他，即使他没有在痛苦中死去。

如果我们审视海军军官的培育模式，这种席卷各个行政行业的教育弊端有一个更严重的特点。每当孩子刚刚能自食其力时，当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向他微笑时，享受快乐，对感官的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吸引着他时，当人们已经考虑到国家强加给其选定者的要求时，心灵的才能才刚刚开始发展。

这些纤弱的人，他们磕磕巴巴，在 10 岁时经历了一场严格的、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考试，因为人们不得不让步于大纲的苛刻条件。为了实现这一已经变得寻常的奇迹，人们停止了身体力量的努力，选择那些弱小、顺从的孩子，并使他们服从一种矫形式的教育，用可怕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引导海军的大纲。

结果很容易预见：对身体健康的严重伤害；精神上，感官的停止；从智力的角度：几乎完全没有了推理能力；人们把科学知识扔给了记忆，没有时间分析它包含的学识素养。以经验论形式呈现的科学毫无异议地被接受了。尤其是在巴黎，存在着一些培训学校，这些年轻的孩子们用 3 年的时间被培训参加公立大学的考试，人们

致力于在综合工科学学校或圣西尔军校培养海军学生，就像培训马一样。

17岁或18岁的时候，布雷斯特的这些年轻人已经会命令别人，他们人情味淡薄，在这个刑法上还是受监护的年龄，社会赋予了他们一份重要的职责。这个特殊的状况必然令他们滋生出一种令人讨厌的过分自豪，并且与他们获得的学识素养一点都不匹配。他们职业本身的义务经常把他们与社会的其他人孤立开来，也剥夺了他们很多通过与各种知识分子接触而受教育的资源。

在船上，所有的事情都以同一个模式进行，任何东西都不能纠正缺点和错误；粗暴的性格只有变本加厉。无论其个人倾向、意愿和智慧，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使得海军军官有过分的自豪感，这绝不能由智力的优越性来解释。海军是贵族最后的庇护所，好像她继承了依附于法国骑士古老回忆的贵族的高贵名声，她有一些不足，人们总是因此公正地指责她：自豪以及对科学惯用的一种蔑视。

为了捍卫我们刚刚反对的教育体制，人们声称海员只能从小培养，对他来说，将道德因素和对航海的感情改变成为一种习惯，几乎是必需的。结果比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不幸的是，为了推翻这个预言并培养出优秀的水手，实际上必须使他们尽早适应这种艰辛的困苦，也许是人们必须承受的最困难的困苦，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危难时候，水手应该训练有素以面对风暴的危险，因此年轻人应该服从这条严厉的纪律，这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危险总是存在，但是需要便利的自然条件。

在这个苦难的人身上，在这个运转的机器身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期望天生的向往；但是这些努力在组成海军的这些精英分子的智慧面前毫无用处。他们将很快意识到，他们被卑鄙的诱惑欺骗了，大自然收回了它的权利，人们决不会破坏感情的增长。在航

行的长期孤寂中，他们在新或自然的情感中寻找诗歌的食粮，一种心灵的满足，不久又回到港口，海军军官只是梦想着在家庭中寻求一个安全的港湾，而且是稳固的、对他的未来有利的位置，尽可能避免分离的痛苦。这就是海军军官普遍草率结婚的原因，其中勉强只有三分之一的军官在远征中国之前经过了赤道。因此，这么说不确切的：降低海军学校录取学生的年龄限制，人们就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还有另外一个推理可以推翻这个说法。大约从 1820 年起，综合工科学校每年培养 3 到 4 个军官，他们直接进入海军，没有进过特殊的军事技术学校。这些军官比从布雷斯特毕业的军官晚四五年开始见习期；然而，结果我们看到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得到高级军阶的比例要高于从布雷斯特毕业的学生。我们不能因此承认，前者的录取条件对他们的能力以及理论和实际知识都是有害的，但是观察到的事实，很明显证明人们应该预料得到。以同等的智力，从综合工业学校毕业的军官显然因为他们获得的知识而更加优秀。事实上他们的优势在于更晚开始学习，由于在从理论过渡到实践之前能更好地理解知识，他们的学习更加成熟，并且在能够更好地评估事物的年龄选择他们的职业——除了声誉、制服、迷惑人的诗情画意之外，更多的考虑对遥远国家的征途以及海军严峻的职责。

尤其是在未来，由于蒸汽机几乎绝对的统治，力学和物理科学的学习将成为一个必须的条件，在综合工科学校学习的重要性更受肯定，并具有新的优势。

几乎只在 1 年以前，刚刚出版了一部最杰出的著作之一，它必将被载入海军的史册：美国海军中尉马里发现的气流和海流理论。除了严谨的统计，作者的思考上升到了地球的普通物理学，这要求

对抽象科学有深入的研究。有两名军官是作者的翻译，他们是综合工科学校的校友，现在他们的译本像随身携带的必备指南被大臣强制要求船上的所有指挥官阅读。因此思辨的推理无可辩驳地推翻了必须引进 16—17 岁的海军军官的说法，并且人们能够预见到在实行了综合工科学校的经验后，不久的将来，政府将改正它的错误，军官不再只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承认两件事情，就是用一件事情判定另一件事情，相信我们已经充分证明了在稍大的年龄开始教育无疑是最好的。

布雷斯特学校将只是一个应用型学校，综合工科学校或类似的学校奠定理论基础，此外这种方法还将有消除这种极其反常现象的宝贵优势：船舶建造者不会驾驶船舶；航海者，在其目前的理论知识情况下，不能建造船舶。政府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海军主要是从综合工科学校出来的学生，最近甚至有警察局到这个生源丰富的地方挑选人才，不久海军就会被这些学生控制，并且综合工科学校还会继续保留专门培养海军的荣誉，就像她已经为工兵连和炮兵部队培养人才那样。

除了海军军官，船上还有医生，其中一个医生很坦诚地对我们说，如果人们对海军医生的级别有强制性要求，海军就会缺少外科医生；事实上海军医疗的现状跟他们繁重的学习负担以及海军所要求的牺牲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达到与海军中尉相当的职衔，从这个角度看，船上只有六、七个人例外，符合要求成为负责人或监察员。同样地，我们医学院的所有学生能够达到这个社会认可他们从事医生职业之时，他们还会将眼光投向别处吗？他甚至宁愿选择陆军的某个职位，尽管他要求属于军需处，但至少可以跟他的家庭在一起，不用遭受痛苦的分离。

因此国家没有任何权力要求海军医生进行深入学习。其医学知

识将会打折扣，在一两年的专业学习后就被接纳为候选人，掌握全体水手的生死。这个开始费力学习科学的年轻学生将会得到一份从业证书，他将会登上一艘船，献出他所有的激情，被选定做这些棘手的手术，治疗重症。在民事社会中，刑法将惩罚违法的医疗行为，海军医生的证书允许他结束这些人的生命而不受处罚，国家授予他此项权力。在陆地上，死者有时候会被追授荣誉，但是大海在死亡的神秘中注入了不可捉摸的空虚。

参与航行的第三类人是警察，他们向这些当选者陈述了毋庸置疑的金钱方面的好处，可惜在船上警察没什么权力，只有船长权力的一小部分。他们应该只记载自己的行为以及结算账目；在陆地上，警察的重要性更大。军需处的所有职权与海事检察员的管理联合起来，检察员在港口对军需处有实际的影响。一年以后人们赋予综合工科学校的这些学生助理警察的职位，并且这个决定肯定会增加对警察的尊重。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因此进入海军的各个机构，因此人们能够预见不久他们将拥有最高的统治，迈出公立学校如此期望的统的第一步。

新 加 坡

4 月 26 日

从巽他海峡到新加坡，我们在两排岛屿中间航行，岛屿被一种无法言喻的美丽的植被覆盖着，如此浓密紧凑。几个分散的小岛，叫做“两姐妹岛”和“三兄弟岛”，看起来像绿色的花篮。在一个常绿的公园盆地，大海几乎总是平静的，除了爪哇海季风转变的时候，人们只感受到丝丝的凉风，只令水面荡起些许涟漪。我们知道

海盗对于航行者来说是多么危险，停留在这错综复杂的曲径的平静中，许多小湾为无数马来人的独木舟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在收到海盗头子给出的信号后扑向他们的猎物。

航海者还有一个新的障碍要克服，水很浅的海洋，沙洲形成的暗礁到处都是，对这些暗礁的谨慎迫使我们只能在白天航行，增加了危险。今天，荷兰人与海盗之间的激烈战争，尤其在海军采用蒸汽机以后，大大减少了这些海盗带来的担忧，海盗几乎只攻击印第安人和一些中国的帆船。但是尽管海盗行为不再造成危险，总是有必要带着手提探测器前进以避免沙洲，这些移动的沙洲经常露出水面。在此处的航行被迫缓慢地进行并且要求时刻保持警惕，但是船在各种漂亮的海域中航行，看到陆地对航海者来说是个如此巨大的诱惑力，以至于白昼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每一个黄昏，太阳重新西落，最幸福的人都无法想象，最灵巧的笔都无法勾勒。

尤其是廖内海峡，呈现出一副令人陶醉的景象：不计其数的岛屿交错缠结，在每一个方向都能看到这个在海中勾勒出的英国花园无边的青翠，像湖泊一样平静。

新加坡的锚地被岛屿的护墙围住，岛上的植物竞相争彩。我们刚刚参加了一次名副其实的演出，《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仙女们很幸运地拥有一根魔法棒；如果我拥有她们的法力，我将与你分享我的惊讶和赞赏，为海盗频繁出入的海域中被森林覆盖的土地上有刚刚兴建起来的城市。工业在这些无人居住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可以与巴达维亚相媲美的城市，她剥夺了一个国王，付给他的王国大量的金钱，她在几平方法里的地方与虎蛇相争，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她建立了一个拥有2万人口的城市，包括这些最不相容的民族：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

以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贸易为重点的新加坡，生来就与身为海

域之王的巴达维亚竞争。这个奇迹归功于英国在巴达维亚的最后一个总督斯坦福·莱佛士先生。1815年当他被迫把爪哇前占领者的官邸让给荷兰人时，他在海域中寻找一个能够补偿英国失去巴达维亚的损失港口。他发现了新加坡锚地，正好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对船来说是个安全的庇护所，他以给被废黜的国王60000皮阿斯特以及一笔可以转移给其孩子的24000皮阿斯特的终生抚恤金为条件。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极好，他不需要再召集太多人来创建一个城市，以各种免税政策和安全性吸引贸易。买卖黑奴是被禁止的，但是中国人不在这项规定内。他们航行至中国海域大量招募中国人，他们为这些中国人支付到新加坡的费用，但是在到达目的地后把这笔钱算作相应的工作量，只有在薪水累积超过这个数额时他们才是自由的。从这一刻起，他们可以享受完全的自由，甚至可以回到中国，资源的短缺以及英国政府熟知的中国人与生俱有的唯利是图，坚定了他们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所有移民的中国人都留在了那里。

他们过去是、现在也还是殖民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和印度人逐渐过来，一点点扩大人口，并在英国的保护下，每个民族保留了各自的习惯、风俗、服装和宗教。人口确保了未来，需要考虑发展贸易。新加坡提供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地理位置——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中间。英国海军的数量足够强大，以确保往来产品的贸易和流动。为了增强信心并增加盈利，她与海盗行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政府使得新加坡成为了一个免税港。

这个荒凉的国家曾经只有海盗居住，可以说全世界都不知道她。英国更为关注目的而不是手段，已设法建立了一个15万人口的城市，居民必须与猛兽争夺每一寸土地，这些野兽至今还会来到两法里外的海岸寻找他们每天的猎物。特别是老虎，横渡马六甲海

峡，是最令人害怕的；这些野兽使得很多人牺牲了，并给这离城市不超过两法里范围的地方的殖民化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人们确实应该颂扬英国工业的精神，除此之外，还有对人类该负的责任的严厉指责。当人们走进那些令民众昏头昏脑、自甘堕落的鸦片馆，当人们在一个为防备窥探的目光而小心地关闭着的房间里看到，死尸般的男人因为过度吸食鸦片及其引起的恶果而全身伤痕累累，当人们身处这些因为英国的贪婪提前造成的葬身之地，人们不得不诅咒一个不惜用如此的方法致富的国家！种鸦片每月产生 15000 英镑的收益，与白兰地的收益相当，为政府支付了殖民地的所有费用。人们还应该谴责另一种令人可惜的使用过度，在新加坡，人们将武器和大炮摆在马路上公然出售。海盗们在英国警方的眼皮底下公开购买武器大炮，并且在自由港的保护下武装他们的船只。购买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只要不损害商业利益，海盗们一点都不担心；但是如果武器装备似乎给文明国家的商船带来了危险，人们让海盗们从港口离开，为了尊重他所享有的免税，不久以后，在大海上，人们追捕海盗，抢回前一天卖给他的大炮，这些大炮明天将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笔收入又回到了政府的钱柜里。在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上，很可惜没能找到商业活动精神，一种无与伦比的、与英国政府和新闻界每天表达的想法一致的、并且与人性更为和谐的美德。

香 港

4 月 30 日

香港呈现出一种比新加坡更加奇怪的现象。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看，斯坦福·莱佛士先生的创造已经在一片优越的土地上实现

了。生存的物质部分是有保障的，人们在那里可以完全不靠外来的援助而生活。1842 年以前，香港只是一块没有植被的悬岩，整个岛都是荒废的，人们只能看到少数几间渔民的屋子，就像人们在邻近岛屿上看到的，好像嵌入岩石当中的那些小屋。在广州附近，在一串岛屿中间的宽阔的锚地，香港的地理位置使英国政府想到，可以比欧洲、印度和美国捷足先登，在那里重点发展对华贸易。它幻想着广州的破灭，并把其竞争者的首批建筑物丢到干涸的悬岩上去。未来并不会惩罚所有这些希望。

广州长期以来居住着百万人口，有着丝绸织造，珍贵的生漆，以及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人们将瓷器上的最受尊敬的绘画以及最出色的雕塑归功于这些艺术家，但是，在 20 年里，人们在这块悬岩上凿出了一个有着 5 万人口的城市，这个城市曾四次成为殖民地的首都。人们在地面上撒下泥土，创建了许多城市，城市里的工业家要求锚地每个晚上都能休息片刻，享受凉爽的海风。

英国想要建立一个工业城市，她只创建了一个货物集散地，但是一个巨大的中心，是中国和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往来的首个停靠点。为了吸引中国人，她不追问过去，她同意免税，宣称自由平等，保证所有新国民都受法律保护。

晚上在香港闲逛是危险的，偷窃甚至在大白天都还相当频繁；但这个城市住满了人，这也是英国政府的主要目的。

广 州

5 月 7、8、9 日

对螺旋桨的一次足够长时间的修理使得我们有时间参观广州，

这个离香港大概 20 法里的地方。我们乘坐一艘叫做“德鲁莱”号的很小的蒸汽船，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位勇敢的上校，他的死是所有人的遗憾。

坐落于离江口 5 法里的地方，广州首先受两条砖石防御工程线的保护，在河的入口可以看到这两条防御线穿越了无数的门洞。它们的面积和防御位置很容易从背面被侵袭，使得它们能被敌人毫无危险地摧毁。今天这只是一堆废弃的遗址；有了更好的防御，这个地理位置使得接近这个城市变得不可能了。

渡过虎门之后，我们来到广州的港口黄埔，在这里分散有欧洲工厂、报社，主要是鸦片贸易，集中在锚地的船上，其他的在陆地上众多的商行中。走近这个城市，人们首先看到一块高起的陆地，从几百米的高处俯视大海，围有堡垒，底部外接一座 0.60 至 0.70 米厚的围墙，切成雉堞形成一道连续的壁垒。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就驻扎在这统治整个城市的筑有雉堞墙的宽阔营地上。

本地人被禁止穿过欧洲租界；在这个小山脚下，也就是虎门的左岸，以前在河边被占领的土地上聚集了 80 万人口。这一地区人口拥挤，缺少空间，因而人们占用河道，河上居住了 10 万巨大的流动人口，蔓延到河的另一边，并把河南郊区变成了一个拥有 20 万人口的城市。

因为屋顶的特殊形状，这个城市首先给人一种很独特的面貌，但是一下了船走上这些狭窄肮脏的马路，弥漫着从本地人的点心店里传出来的令人恶心的气味，时刻都会与苦力或者轿夫撞上，富有艺术性的想法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厌恶和怜悯的情感。走过了一个汉人区市，参观了一家人老死一生的破旧房子，观察到公共卫生的完全缺失之后，人们更能理解这惨白、铁青的脸色，提前衰老构成了中国人最突出的特点。中国的官府或者衙门与这个城

市的普遍面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有着无以计数的建筑物的建筑群十分优雅并且设计完美，可以抵挡炎热的高温而又不阻碍空气的自由流通。

寺庙是除了衙门之外唯一值得注意的建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建造的。供奉佛像的庙宇，由善和恶两个准则主宰，摆放着功德箱和香炉，人们在里面焚烧祈福的纸钱以及僧人及其随从在重大仪式中穿戴的饰品。寺庙对所有来人开放，前面院子里是赶集商人和算命人；对面就是戏院。比起祈祷，寺庙更是一个消遣的好地方，中华民族完全不讲宗教情感，就像没有所有其他的道德情感一样。

广州拥有中国最杰出的艺术家，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漂亮的绣花披肩、漆。人们把南京的瓷器送到广州上漆，我们甚至在那里碰到了一位很优秀的雕塑家。参观所有这些让人非常好奇的作坊，尤其是织布作坊，人们惊讶于如此原始和落后的方法能织出如此华丽的布匹；但是越深入中国，这个民族就变得越不可捉摸。她处于最发达的文明的入口，似乎只要向前一步就能赶上所有的先进文明，当人们再深入一点探秘，就会被精神和道德的缺失所吓倒，很容易辨认出太古文明的明显痕迹，但是好像我们面对的是一大堆坍塌的断壁残垣，无法再重新整修，因为道德被淹没在恐怖的动乱中。人们也许会知道这些原因，但是在下结论之前我们还是希望能更好地了解这种奇怪的特性。

广州呈现出了一个独特之处，激起了外来人的惊奇和兴趣；10万人口在帆船或舢板船上度过整个一生，船上杂乱不堪；人们在船上生老病死，他们的思想从来不会超过河岸的界限。正是这条河流每天哺育了他们并且使他们能够从事一项落后的产业，让他们赚得几枚铜钱以满足家庭的所有需要。

在这个流动的城市中间，到处都能看见一些刚刚着漆、装饰讲

究的小船，我们以为看到了富裕和舒适的迹象，但这却是放荡的标志和邪恶的象征。鹿园里单调的歌舞会为中国的绅士服务，他们每天都要借助于吸食鸦片产生幻觉并耗尽幻想。

上 海

5 月 25 日

我们在出发的前夜回到了香港，螺旋桨修好了，5 月 15 日我们就能出发去上海了。不幸的是，当时正值东北季风转换期，西风尚未形成。我们一进入台湾海峡，大海就变得如此暴躁，风那么猛烈，我们只好放弃赶路，艰难地用尽了机器的所有力量与之斗争，才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我们用了八天时间完成了这段路程，通常人们只要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能完成。

所有的运输船都在吴淞港集合，到达吴淞港时，我们得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伊泽尔”号在台湾海峡对岸的厦门港沉没了。所有乘客和水手都获救了，人们捞回了大部分的货物，包括炮兵连的全部马具，军需处三分之一的物资，火药，炮弹，以及工兵连近四分之一的物资。这次损失更让人感到惋惜的是，船长阿莱格爾得到了大家的同情，他开着一艘有建造缺陷的船只却能设法保持着最高的航速。不幸的是，他拒绝了一个领航员的带领进入厦门，因为他已经看到两行航标描出了航道，并且离“索恩”号停泊的锚地也只差几百米的路程。他认为无需帮助。但抛锚时，船撞上了海平面以下几米的岩礁，没多久，他只能放弃了。

蒙托邦将军，他的参谋人员和各职能部门长官住在离我们锚地 6 公里远的上海。人们在上海建造了一家医院，一个军用面包厂以

及很多马厩，我们花大价钱为军需处、警卫队、工兵连租下了房子，为军官们租下了一幢独立的房屋。根据这种安排，上海似乎是被选择作为物资集散中心，能让人们更相信这一点的是：在道台、耶稣会会士以及商人的请求下，昨天傍晚将军命令突袭叛军，或者至少是一次侦察，派了200名法军和400名英军出击，以了解我们即将在白河与之战斗的清政府的敌人的位置，我们在汉江两岸和清政府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6月5日

结果，这些军事行动使我们被迫在上海留下一支武装力量，如果这些叛军胆敢仗着人多势众来攻击我们，我们可以进行还击。

总司令显然也充分考虑了以下因素：英国人和美国人尤为关注的商业利益；耶稣会会士的安全；需要维护中国皇帝对中国最富裕省份的统治以便条约的执行。

蒙托邦将军首先向这种人道主义情感作出了让步，目前的职责在于防御我们的军事机构不受侵犯。但是人们也许会寻思让上海回复到远征前的状况，并且把我们的机构设在我们已经与英军一起占领的舟山或其他岛上。十分值得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在上海的出现会引起叛乱分子的注意，他们此前还没有这样的企图，他们占领南京已经7年了。

他们可能看到了我们的作用，目前我们把他们看作敌人、可能需要与之战斗或至少要防御的敌人。此外，上海的不卫生似乎不利于建立军事机构，尤其是医院，它建在一块旧墓地上面，病人在砖石水泥还没有完全干燥之前就被关在了里面。

在工兵连长官到来之前，军需助理布隆多先生就已经在一份提交给大臣的报告中质疑了在上海建造医院，那么为什么工兵连上校到达时却发现地基已经完成，甚至还是在军需处的领导下完成的呢？最后，还有第三个理由，我们认为不应该占领上海；我们把一部分兵力留在了广州、舟山，我们将不得不把军队留在上海、芝罘，在那里人们正在直隶湾准备登陆；我们必须占领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登陆点，它将成为我们行动的基地之一；一路上，我们把人数不多的部队在好几个地方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小分队，而此前，因为送往澳门医院的伤病员，我们部队人员已经减少了。但从以前战争的经验来判断，没什么好害怕的，所有这些缩减加上无作战能力的人员，我们的力量战时最多减少到 4000 或 5000 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信我们的部队最终会胜利，无论人数多少，无论处境好坏。

战士们都有这样的信心，但是这些措施没有带来任何不好的结果，而对我们出现在中国海域已经妒红了眼的英军，则企盼我们的部队日益缩减，以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诚然，总司令拥有那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训令和文件，他们能轻易地消除我们的疑问，所以这只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个人感受，因为我们作为战争主要力量对真相一无所知。

在冉曼准将的命令下，六艘军舰已经出发了，赴芝罘登陆。舰队其余船只因上海的动乱局面而推迟了，我们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后果，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不久以后能跟第一支舰队汇合。总司令很关心士兵，招募了 1500 个苦力干最辛苦的活，路况糟糕时则叫他们运输各种军火物资。

此时我们有 800 匹马；没过几天，远征必要的野营用具将从日本和马尼拉运到。根据海军军官的报告，我们能够在芝罘找到一些

骡子。马匹和骡子不够用时，就用苦力代替。

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在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像使唤役畜一样使唤中国人，但是我们是跟一个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战，因此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自从我们到了这片海域之后，除了中国人就找不到别的领航人；在港口，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食物；在广州，他们要求得到我们的保护以抵抗叛乱分子；在上海，中国军队跟我们一起打击叛军。通过北京的报纸，他们都知道我们要跟他们打仗，他们很希望我们战败，但是这是一个与政府有关的问题。他们只知道眼前的利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经无法区分我们是为了英国商业利益还是中国商业利益而战的。

芝 罘

6月1日

六艘军舰在海军准将卜罗德的命令下从上海出发，载着第一支登陆部队驶往芝罘。蒙托邦将军还在等待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的到来，将军把指挥权交给了冉曼准将，冉曼准将与各职能部门长官以及海军少将沙内一起驻守上海。

芝罘已经进入了视野，命令于第二天早上5点登陆。卜罗德准将在这次行动中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精神，足以对付更强大的敌人。当35艘小艇在准将的命令下排成一行时，这些中国人还在沙滩上惊奇地看着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在准将“皇上万岁”的呼喊声中逃之夭夭，在这个微妙的状况下，准将看到了法国命运的支点。

对国家元首的这种热情表达，军人们虽能理解，但此情此景下还是感到有些意外。

我们驻扎在芝罘的一个半岛型的山顶，但被迫在营地和一座山脉之间的宽约 1 公里的狭小平地上逐渐展开，这座山脉与连接我们和大陆的地舌相垂直。这个地方土壤肥沃，耕作良好，玉米和小麦是基本的农作物。菜园也和我们法国乡下一样照料得很好；气候十分适宜，尽管温度多变且突然，需要持久的保健预防措施。饮用水尚需改进，但是确切地说是通便而不是有害的。

7 月 7 日

直到这一天，军队的卫生状况令人十分满意，6000 人中只有 50 个病人住院；而上海的 700 人里有 66 至 80 个人住院。人们只能感到遗憾，这么多的人在一个点上，但是对士兵十分仁慈的冉曼将军认为应该尽可能缩减人数，以符合上级的命令。我们来到了中国，带着只是与政府而不是与民众作战的想法。

当民众利益因我们的存在受到损失，我们对其进行了补偿；我们乘了 60 只帆船以方便在白河登陆，但是我们支付了运费，人们避免一切可能损害商业的事。

尽管做了所有的努力，烟台的村庄在我们到达时几乎空无一人，但渐渐地，那些地方又重新住满了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日常市场，可以供应一个 2 万人口的城市。更不幸的是这里甚至还有一个马市，随着施密茨先生从上海来到这里，我们被迫接受很多甚至超出军队所需的马匹。芝罘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优良骡子，平均价格为 50 至 60 皮阿斯特，可以替换日本矮小的马。不幸的是，政府忽略了这个资源。蒙托邦将军于 5 日到达以后，我们接收了所有送来的骡子，并且补充的军马已经足以运输大炮和工兵连的物资。

我们较浅的地方得知了“快帆皇后”号失火的消息，她几乎没有时间驶向澳门海域较浅的地方，全体水手和乘客，其中部分乘客是工兵连的士兵，都获救了，但是所有的货物都没了。载着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的英国远洋轮船“马拉巴尔”号也在离开锡兰的时候于加勒角遇难了。人们从水里捞回了一部分货物。这是自从我们出现在中国海域之后的第六次灾难：“伊泽尔”号、“快帆皇后”号、“马拉巴尔”号、“木卫二”号在岷港附近，英军的“亚历山大”号、“查班”号。

我们如此焦急地等待着远征的启程，因为9月份以后，在芝罘下锚对海军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直隶湾的航行在西季风转换的时候也是特别危险的。因此很有必要在月底前就开始行动。

总司令似乎也是这个想法，他宣布最迟23日启程。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行动的秘密，但开展这次斗争有三个可能的方式，我们似乎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也许是唯一危险的方式。我们决不想指责总司令及其参谋们的才智，也不想谴责他们把我们培养成合格的评判员的能力，但人们可能无法主宰局势的发展，人们不能完全自由地作出选择。

1859年英军因为贺布海军上将的失误（我只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考虑）遭受了一次完败，将军随后递交了认错书；就是在大沽要塞前英国的国旗受到了侮辱，可能也是在那里，英国人想要报复中国。自尊心决定了战争的场地，此外，两支联军的海军都想各自表现一番，在这次远征中，这样的想法或者说压力把我们留在了白河河岸。

因此，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所指出的，我们被迫向大沽要塞发动进攻。在这种推测下，我们必须忍受一次艰难的登陆，在一个长达几海里的有很多潮汐的沙滩，我们可能只攻击敌人唯一的

一个位置，他们在那里作好了防御准备。我们缺少榴弹炮，我们在铁铸的防御工事后面找到了不容易受直接火力攻击的地方，四周围着几条壕沟，但是根据特里科中校的报告，至少有一条满是水的壕沟，我们匍匐的地方基本上是沼泽，可能被洪水淹过。因此，这种情况下，需要担心的不是敌人，而是附属的和天然的防御工事，它们可能在沼泽地中，这样的防御对法军来说即使不是不可逾越的，至少对一支远征小部队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保有士兵并保存他们的体力。

在进军天津之前，我们想摧毁所夺取的要塞的障碍栅，其桩基耐得住两艘英军蒸汽船的同时作用力，在目前的情况下，“伊泽尔”号和“快帆皇后”号的海难令我们失去了所有的防水导火索，因此我们不能用弹药摧毁这些障碍栅；这些工作将延缓军队的进程，使我们不能享受大沽第一次胜利带来的对我们有益的敌方的恐慌，并会使敌人作更好的防御准备。在我看来，这些就是选择这个攻击点的诸多弊端，但是却有一个好处，如果胜利的话：战场离天津只有20法里，并且海陆两军可协调行动。

除了这个攻击点，似乎还有两个更有优势的可能方案。第一个，沿着白河以北的北塘河岸，直到从长城通往天津的御街；第二个方案，从长城直达北京的道路，再从半路岔开，沿着第一个方向前进。

从北塘直接攻击天津，方便我们至少在半路上与海军接头，如果没有从交叉的桥到天津的运河。这看起来跟我们普遍的担心更一致，并且可能在政治上更可以让人接受，如果人们担心在进入帝国首都的时候皇帝逃离北京。

第二个旨在进攻北京的方案将要总是通过一条在中国少见的御街才能实行，那里的道路周围都是河流，而这些道路通常是唯一的

交流通道。因此运输和行军是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触及到中国最高统治的御座，如果不担心弃城导致的混乱以及中国政府失去威望，因为这将使中国陷入无能为力并使整个国家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但是我们会担心，在另一个攻击点成功的攻击会带来同样的结果。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是各方面都不错的计划，但有一个反对意见。从北塘到天津和从长城脚下出发到北京的路线，后者是前者的两倍长。我们估计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大约有 50 法里，因此必须有运输手段保证部队 10 天的供给。我相信我们当前的运输能力能够满足军队的需求。

我们拥有 1000 个苦力、1500 匹马以及大约 200 头骡子。炮兵部队以及其他服务部门的特殊需要大概占用了 100 头骡子、500 匹马和 500 个苦力，假设我们让每一个运输者至少承担 70 公斤重的货物，除去牺牲的和不能战斗的人员，我们能够为这个至多有 5000 人的移动部队至少运输 70000 公斤的供给。仅凭这一方法，再给每个士兵 2 公斤的物资，我们能够保证军队至少七天的食物，因此为了实现这次战争，只需在每个人的身上背 3 天的食物就足够了，姑且假设我们在路上找不到其他任何食物，这其实是不会发生的。自从我们进入中国以后，我们有了当地人的帮助才能开展行动，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所需的食物，并且一直跟随我们到战场上，帮我们运输军需品。

对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民族来说，政府的问题与个人物质利益无关；他们宁愿看到我们的行动失败，并接受天子的所有许诺，但如果他们看到这场对中国的战争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帮助我们打赢。总之，我们认为，从军事角度看，最有利的战斗方案是从北部攻打。然而，也许攻打大沽的方案会获得多数票。

离开芝罘赴直隶湾

在卜罗德准将指挥的、杜耶上尉参加的一次无效的侦察之后，施密茨中校和中校参谋杜潘以及布热瓦上校于7月12日乘“西贡”号出发执行侦察任务，结果导致我们放弃了在白河口南岸登陆的计划。在10法里的范围内，沙滩上到处都是大片淤泥，宽达400至1000米。蒙托邦将军根据杜潘中校对地面的困难作出的报告，与英军进行协商。协商决定两支联军在同一个地方，即北塘河口北岸登陆。英军对登陆点的选择启发了法军，显然我们的盟友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可能并没有因为看见我们的第一个方案搁浅而感到不快；他们艰难地容忍着我们的协同作战，在他们眼里法军是无足轻重的，法军参战只会有利于法国的商业和法国人的人身安全。

登船的命令好像在20日，马匹于22日上船，军队在23日和24日登船，没有带领部队的军官于25日登船。

离开芝罘之前，已经组织了一支移动先遣队，由3个步兵营、两个半战役炮兵连和山区榴炮弹连组成。这支先锋队中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只有一个军官不知道这些安排，他就是……

25日早上6点，我们都到了船上。登船有序而快速，值得人们对海军给予公正的赞美。近1点钟时，总司令通知工兵连上校立即支付芝罘营地的租金，根据一个不包括利韦中校在内的委员会的评估，一共为2000皮阿斯特。委员会的评估报告于25日晚上6点送达工兵连上校，使其能在上面签字。第二天我们接到命令毫不延迟地支付被占场所的租金。26日6点1刻，全体舰队出发，分三路纵队航行，右边是巴热准将，中间是卜罗德准将，第三支由炮艇组成的纵队由布热瓦上校指挥。各舰相隔两链（400米）距离；纵队的最

前面是“福尔班”号、“信息女神”号和“杜舍拉”号，由蒙托邦将军、沙内少将和葛罗男爵指挥，后面是“山林女仙”号（卜罗德），“复仇女神”号（巴热）。

两艘侦察艇在纵队的左右两边航行，这就是整体的部署，最后每艘蒸汽船带着2到3只登陆用的帆船。

英军的舰队也以类似的方式排列，两支队伍应该在一个确定的地方汇合，由一只前桅帆挂有旗帜的英军蒸汽船确定地方。根据俄国将军的报告，登陆最后的准备工作就是在那里进行的，这个俄国将军住在北京，对蒙托邦将军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拜访。敌人只能抵抗5000人，但是恐怕将军隐瞒了部分实情。由他带领军队至芝罘，令人相信所有的猜测，他已经接受了与蒙托邦将军共进晚餐的邀请，丝毫没有受重大问题困扰的样子，但是一知道两支舰队同时行进并在同一地点登陆的时候，他突然对这件事显得很不自在，他脑海里突然想到要离开沙滩并回到他的船上。晚餐一结束他就从将军处离开，并且第二天施密茨中校对他的拜访只是一场无关军事的谈话。我们应该将在北塘河的汇合归功于这次友好的拜访，北塘河可能没有严密的防御，没有加固的障碍栅和大量的兵力。

27日早上10点，我们与英军舰队汇集，他们的军舰比我们先到约定的地点。我们在离北塘七至八法里的地方下锚并等待命令。28日，我们又向前行进了12海里，在将近傍晚4点钟的时候下锚，29日各职能部门长官被召唤至“西贡”号上，由施密茨中校汇报战争会议的结果，工兵连上校没有参与这次会议。

离开芝罘之前，炮兵连上校知道了他的纵队的组成，我们是唯一不知道与自己相关的事情的人。命令登陆时军队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大约2000人和12门大炮组成，只包括两个工兵连中的60个人。装备和工具一点都没问题，人们想这些可携带的工具能够满

足夺取炮台旁边村庄的需要，如果我们进攻北塘河右岸的炮台碰到顽强的抵抗。

7月31日凌晨，登陆开始了。出乎预料，恶劣的天气阻碍了这个计划，登陆未能成功。

北塘登陆

8月1日，命令开始登陆的准备工作。早上7点，士兵和炮兵6至8人一组被安排到由炮艇或小蒸汽艇牵引的小艇上。英军以同样的方式在我们的右边前进，由小船组成的整个队伍开始前进。近10点钟时，全速朝向优美地蜿蜒着且景致独特的北塘河口前进。

五艘法军炮艇和四艘小蒸汽船载着2000人，以及英军的2500人同时出发了。通过了河口，那里只有3.50米的深度。我们在快4点30分的时候到达离海滩几链的地方。5点钟开始全体登陆，已经有一支轻步兵部队先行登陆了。我们一开始陷入了一块1500米范围的淤泥里，淤泥一直没到人的膝盖，在淤泥的边缘是比较结实的土地，我们很简单地洗了洗脚，这块土地一直延伸到作为连接北塘和白河的道路的河堤。

登陆就像是我们远征中国这出剧的第一幕，在上海和芝罘的长时间的令人不快的停留只不过是序幕。由总司令命令的这些无效的侦察主要在白河西部一带进行，我们由此知道，在这片几法里范围内的地方是不可能登陆的。

我们放弃了在白河西登陆的计划，这已经是原则上决定了的事情，我们向离白河只有2.5法里的北塘河东驶去。河岸两边有带内堡的两个炮台（两个内堡在右岸，一个在左岸），防御着河口右岸，北塘村就在那里。在满是泥浆的海滩上登陆，其难度很大，再说我

们对这个点完全没有进行严密的侦察。河堤北面是沼泽地，是被北塘河的洪水淹后留下的，或是低地的雨水积聚却没有流入河里造成的。

因此河堤是攻击村庄的唯一入口。从地面进攻，地理位置非常糟糕，我们的进攻应该与海军联合起来，他们将从河口向炮台开火。

尽管我们右边的英军十分接近村庄，轻步兵却比他们先行到达河堤，并准备开始进攻。此时蒙托邦将军下令，为了等待英军，我们轻步兵的先头部队暂停前进，根据两军总司令的安排，英军本应在我们前面。这次谦恭使得我们延迟了半个小时，我们本来应该在白天的这个时候行进，这对我们很不利。幸好中国人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里登陆，那些炮台以及村庄毫无抵抗地向我们开放着。

当天晚上，这个位置被两军的先锋队占领；其余的军队在河堤上宿营。第二天早上 2 点通知我们，要塞布满了地雷，应该马上拆除。我们找到了三处地雷，第一个布置在入口，其余两个在通往骑兵营地的斜坡的下端。这个装置由横轴周围一块可移动的木板构成，两个骑兵根据它的移动进行活动，点燃放置于直径为 0.35m 至 0.40m 的炸弹内的火药。这个装置安放在木板的四个角上，可以用四个炸弹的爆炸包围走在上面的部队。

北塘是一个在低地上用黏土建造的难看的村庄，在周围的沼泽地上挖掘沼泽以抬高地面，这里没有任何资源。漫延的淤泥，污水满地，臭气熏天，给我们在这里的不可避免的停留带来更多的不快，直到海军给我们提供充足的食物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进。不幸的是，海陆两军指挥不统一，导致混乱，造成令人十分惋惜的不断的迟缓。

第一批到达的 2000 人没有足够食品。军需处没有为他们派发，

人们给了我们一些变质的米饭，海军不为已经上岸的部队派发必须的物资，而是继续运送其他部队登陆，这使得局面更加糟糕。所有运到的物资都在无序中装卸，行李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被扔在海滩上。大部分人像无头苍蝇一般乱走乱窜，没有人为这莫名其妙的混乱承担责任。后果不难预料；士兵缺少食物，是真实的痛苦，并且被迫在这个不卫生和污浊的地方延长他们的停留，自从我们到达后，所经之处时刻都能碰到的散乱的动物尸体使这个地方变得污浊不堪。

工兵连长官影响力不够大，工兵连总是成为受害者，人们没有预料到在北塘又遭受了一次侮辱。大家在芝罘已经要求制造棺材，不久以后，经过反复的有效的观察，经部队所有军官的要求，我们仅要一些工具和木板，军需处声称没有。在北塘，工兵连接到建造墓穴的正式命令，并且威胁上校如果不服从命令就收回他的指挥权。尽管我们提出了抗议。上校将抗议意见向总司令作了汇报，总司令决定工兵连不用提供挖墓人，但需派一名监督以管理墓穴的挖掘，当时已有3到4名士官被任命为专员，管理村庄的治安。上校虚弱到不能再承受更多，最后确定工兵连派一个监督作为挖墓人的主管。

8月3日进行了一次侦察，参加者由柯利诺旅的一部分和1200至1400名左右英军组成；工兵连的30人在贝齐亚上尉带领下占据了联军队伍的头阵，修路并扫除地雷。行进了7公里的时候，我们遭遇鸟铳的扫射，向我们发射小铁球。清军骑兵在一块开始变得坚固的土地上形成一个半圆，依靠一条中央壕沟，向我们必须经过的河堤纵射。

8月12日战斗

8月12日早上6点，我们果断地向敌人占据的位置行进，英军

在队伍的前面。行进了七、八公里，我们碰到了一支中国军队，主要是清军骑兵，像8月3日那样摆阵。战斗马上开始了，英军在右侧，为了让骑兵实行转换动作，法军在左侧支援，以相反方向的运动进行，而军队剩余的部分在壕沟上笔直前进，以壕沟为口形成一个裙摆状的阵势。

所有的阵地都很容易地被攻克了，敌人退回到一座桥后，前面是一条满是水的壕沟，水流经整个新河庄。敌人在这条壕沟后面进行了一会抵抗，就撤退到离新河4公里处白河左岸上一个筑有雉堞墙的广阔营地塘沽。

刚刚获得的胜利给了法军总司令轻易夺取工事坚固的敌营的希望，命令法军进行了一次被证明是无效的进攻。我们进入一条四周被沼泽围住的、从新河通往敌营的狭窄的堤道。走了两公里，敌人开炮攻击了，纵射整条道路，我们陷入了困境。炮兵连试图反击，但是因为没有消灭敌人的炮火，我们慎重地撤退了。这次毫无结果的进攻美其名曰火力侦察。我们的英军朋友对这次失算感到高兴，他们原本就不想参与。

第二天进行了一次真正的侦察，而昨天的经历证明了真正的侦察本应在昨天进行的；这个任务托付给了中校参谋杜潘，由贝齐亚上尉带领50人协同侦察。他们沿着白河查看到，地势向着河流的方向慢慢升高，变得更加坚固且适合炮兵作战。只需修建几座单孔桥，便易于进攻，我们在那里马上开始架桥并于当天晚上完成。

14日 袭击

14日6点，两支军队，英军在右边，在这块小小的沙滩上整队，攻击800米外的敌人，部队的行军整齐划一，好像在演习场地

一样。唯有右岸的敌方大炮有点令人担忧，它们可以将我们拦腰切断，可能会使我们遭受严重的损失。前一夜，就是这门大炮开的火。联军海军决定在晚上消灭它。英军造成的迟缓使这次计划失败了。第二天，我们在进攻前先把它打哑了。对敌营的开火没有成功，接下去的战斗不是很危险，虽然有几个人受伤。

8点钟，两军的24具大炮在离清军营地400米处架好，进行了45分钟密集炮轰，此时我们待在原地等待炮轰的效果，一共发射了2000颗炮弹（800枚法军炮弹，1200枚英军炮弹）。要塞用黏土建造的土墙很好地抵御了这次考验，炮轰只对围墙造成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损坏，不可能找到一个有效的突破口。我们撤回了进攻；我们有理由认为炮兵最终应该消除这些防御，壕墙上的这些敌军现在对我们构成了极大危险。如果在离开法国的时候，炮兵连的指挥没有要求迫击炮，将会使此次战斗变得更加困难。在报告中，完全是忘记了，幸亏在土伦有人向他提醒这些大炮的重要性。鉴于此，他向皇帝口头要求了6具可携带迫击炮，但是14日，人们甚至没有想起要使用这些迫击炮。

塘沽营地的前面是两条灌满水的壕沟，云梯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工兵连其实早已备好这些云梯。据说，离开北塘的时候，有人曾向总司令报告过此事，但我们还是收到命令把这些云梯留在了村子里。

一了解到使用云梯的必要性，就急忙派60个苦力以最快的速度从13日至14日连夜把这些云梯运到新河庄。我们知道了它们在壕沟上的作用，希望以后同样的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9点钟，参谋长施密茨中校受总司令的委托，在部队冲锋的最前线指挥，带领部队战斗。云梯一半交给了海军陆战队，一半交给了苦力，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没等云梯运到：他们游泳穿过壕沟并占

领了已经被防御者放弃的大门。在我们右边 150 米处的英军果断地爬上了护墙，并穿过了两道壕沟。

我们无疑受到了命运的青睐。敌人来不及挖断贯穿第一条壕沟的堤道。他们仅仅毁坏了桥，从这座桥可以最近地穿过壕沟。当我们进入炮台时，在这 1200 米×1000 米的巨大围墙内，少数敌人还在我们的左侧进行抵抗，但是他们很快就利用河道的掩护从小路逃走了。

这次袭击使我们 30 名士兵丧失了战斗力。中国军队遭受了重创，在壕墙上留下了 15 具大炮，两具铁的，其余是铜的。

18 日之 战

18 日，根据总司令的报告，工兵连上校奉命渡河，并摸清一个桥头堡的位置，这可以保护军队从河的右岸通过。他带着 100 个工兵以及 150 个左右的海军，他们用舢板船渡过河流，进行必要的侦察。我是上校的助手。

我们对登陆的河岸没有进行勘测，我们对防守河岸的敌军力量忽视到了极点，也忽视了那些阻止进攻的障碍物。

8 点钟，只有 35 名士兵上到六艘舢板船上，这是我们可以拥有的唯一一批人。很快登陆了，尽管是在潮水低潮时陡峭的河岸的淤泥中。这 35 人集中以后，上校指挥其中 20 人组成一支小分队，进入一条通向登陆点的小路。上校委托我带领剩下的 15 个工兵，任务是搜索位于我们左边河岸的小梁子村。我们眼前是一片果园，有一条条灌满水的深沟。要在这样的曲径中找到敌人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

上校选取的这条路在一道茂密的篱笆旁边，我们看不清这道浓

密的植物屏障里面的情况。我冒昧地提出：在这样一个陌生且隐蔽的地方可能布有重兵，安排 36 人分成两组进行搜索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够的。我得到的答复是，敌人应该是放弃了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有力的保证下出发了。到了我们选择的两个方向之间的第一条横路，我们打算汇集在一起，以缩短去桥头堡的路途。

沿河岸走了大约 300 米，我们来到了一条断头路，从封闭道路的路障发出的激烈射击招待了我们。我们在第一道堑壕的掩护下进行了反击，等待留在河对岸的其余工兵的支援。因此我们把小分队分成了三部分在路障处行进。果园的左右各一队，而第三队则正面攻击。敌人溃败，丢下了几个重伤员，从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往一片宽阔的平地逃去，我们能看到其中一条路的尽头。此前，上校认为向护卫舰舰长若雷吉贝里带领的海军请求支援是明智的。

这次新的支援使我们左右两边的局势明朗，西边，保护着我们一直推进到果园的边界。在我们眼前的这片平地完全没有植被，被两至三千人占据了，主要是骑兵。面对这样强大的兵力，上校派我去向总司令汇报河右岸的局势，并向他要求一个营的支援以最终占领我们刚刚攻克的据点。第二支轻步兵营马上就被派出了，因此我们可以从各个方向展开我们的队伍直至长 1500 米宽 1000 米的果园边界。地势很容易防守，即使军队人数减少很多，我们确信可以毫不担心地守住阵地。

这次战斗最终使我们占领了河右岸的阵地，这是几天以来两位总司令最担心的事情。自此以后，我们威胁着敌军向天津的撤退。

白天的荣誉毫无疑问主要归功于工兵，他们在两个小时里经受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在剩余的时间里都在战斗，但是由于上校影响力不大，或者说完全没有威望，官方报道只提到了参与此次行动的部队首领的名字，忽视了上校汇报的其他军官的名字，并且工兵

连在这一天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得到明确。

8月21日之战

最普遍的想法，尤其是在夺取河右岸以后，就是攻击南边的炮台并且切断北边炮台防御者撤退的路；但是英军反对这个观点，坚决要攻击最后几个炮台，总司令不同意这个作战计划，不准他的人手参加这次战斗，只留下柯利诺旅长协助这次行动。

21日早上4点，联军向河左岸最上游的炮台行进；在此期间，海军用四艘铁制炮艇向左岸下游的第一个炮台发射了1500至1800枚炮弹。

工兵连的100人参与了行动，由迪普埃上校指挥，我是他的助理。大约5点钟，中国的炮兵连开火了。我军处境危急，正面受到炮台的各种火力的攻击，以及下游接近斜侧河口的炮台火力的扫射，因为上游右岸大炮或隐藏的防御工事以及安置在村庄里的最危险的一个榴弹炮连的攻击，我们只能斜向行军。

我军炮兵部队在右，英军在左，大炮后面的步兵尽可能隐藏在突起的地势后面。在这个严峻的防御形势下，我们很后悔没有派遣五个炮兵连而只是派遣了一个。

我方火力瞄得很准。6点钟，英军和海军的火力造成了河口左岸敌方炮台里军火库的爆炸。15分钟路程以外的地方，类似的爆炸在同一条河岸上游的炮台再次发生了。

这是攻击的信号：柯利诺将军马上让部队前进至离炮台200米的地方，观察了四周情况之后，他命令先锋队发起冲锋。一支102人的队伍冲在最前面。一半的工兵跟着这支队伍，一排云梯由苦力扛着，紧随其后的是102团的两个连以及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这

些是参战部队；其余部队作备用。

我们攻击的炮台被两条有水的壕沟围着，壕沟前面是河道，使得接近炮台更加困难。壕沟之间的间隔插着紧密结实的竹桩。最后，壕墙脚下，是布满了铁蒺藜和小竹桩的拒马。这座工事坚固、对炮兵连来说攻不破的壕墙竖起6米之高。如果我们的敌人顽强抵抗，这些很难越过的工事必将使战斗更加激烈。当部队开始进攻时，隐藏着的大炮猛烈开火，此前十分安静的炮台壕墙，涌现出大量的敌军。中校意识到攻击点在河边的凸口陷入了死角，他因此吸引敌军的大部分火力，让我指挥工兵连从英军旁边的城门进攻。运输云梯的队伍向着凸口处行进，我们完全失去了用云梯跨过壕沟的机会。不幸的是，敌人的抵抗变得十分激烈，好几个云梯搬运者因为受伤无法把云梯运到目的地。

我们不得不在敌人猛烈的攻击之下，艰难地游泳到了渠肩。在那里，他们向我们发射了各种炮弹：弓箭、火药、长矛、铁球、树栅，等等，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没有云梯要爬上壕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非常艰难地向前推进，把云梯运过两条壕沟，跨过壕沟中间的那些障碍物，把这些云梯贴到壕墙上。

第一架竖立起的云梯马上被英勇防御的敌军掀翻。好几次用云梯攀墙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此时，在没有云梯的情况下，我军在城门处用十字镐打开口子。最后，6架云梯在壕墙上好几个点架设成功，我们从壕墙的凸角攻了进去，而此时其他部队通过高高的壕墙大门左边挖的洞口冲了进去。

中国人还在炮台内抵抗了一阵，但是法军的刺刀迫使他们逃跑，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要从外防线逃跑，也需要越过我们之前碰到的一样的障碍物。他们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们的都统兼提督被打死的结果，他是在战斗最后被打死的。

英军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但是像以前一样，我们的士兵走在前面，我们又一次得到了首先攻入炮台的荣誉。

求和的白旗马上在所有炮台升起，英法联军与中国军队开始了谈判，最终在将近1点钟的时候允许我们进入这个位于河口的北边炮台，丝毫没有遇到抵抗。

晚上，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占领了河右岸的所有炮台。从此时起，军事行动结束了，外交活动开始。第二天早上两三点钟，障碍栅被拆除，特使们毫不费力地前往天津。

这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使得积极参战的五六百名法军中有150名被杀或者受伤。英军的损失应该更大；敌人也损失惨重，100具尸体被留在战场上，很多人受伤，3000人被俘，518具大炮（其中250具铜炮）以及几面旗帜成了联军的战利品。

反 思

我们在这次对中国人的战斗中占有优势，这次战斗引起了对我们来说似乎有一定意义的反思。我们已经是胜利者，并且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征服了中国或者说中华帝国，他们所有的军队集中在大沽要塞，但是在我们行动之前，这些有能力的军官没有进行一次适时严密的侦察，我们本应根据他们的侦察展开行动。从登陆北塘的一个无名村庄那天起，直到8月21日之战，由于情报不足，连累了军队的形势，正如12日晚上那次没有效果的侦察。另一方面，战斗的命令从没有明确每个人在战斗中的任务，行动的方式也常常缺乏预先考虑，尽管各职能部门长官不断递交重复的请求。同样地，至于工兵连，在离开芝罘的3天之前才有必需的马匹。

那些云梯被视为累赘，13日晚上甚至被忘记带上以致差点耽

误了第二天的战斗，而在21日的决战中，胜利只归功于这些云梯。尽管在战场上，只是用到其中一部分云梯，而不是把所有云梯都运到第一线。这些云梯本来肯定可以缩短战斗时间并减少伤亡人数。

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让这些苦力把云梯搬运到壕墙脚下。当然，人们应该是不敢在对方国家里，把这个危险的并且被认为是最光荣的任务交给农民。在一个我们与之交战的国家里，直至这一天，我们都在用当地人来完成正规部队的辅助任务。与所有预料相反，尽管很危险并且有伤员，这次尝试还是成功了，但这至少是有点冒险的。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越过这些都是水的壕沟的手段还不够，应该看到我们不应该把命运完全寄托在这些云梯上，他们的搬运者自然成了敌人攻击的重点。也许我们可以找一根绳子，两端系上钩子，像缆绳一样钩在壕墙上，这可能是更轻便、更隐蔽并且足够有效的方式。

攻击的时候，士兵因为自己的步枪陷入了困境，当他不能用刺刀时，他只剩一发子弹可以用，并且在装子弹的所必需的这几分钟内，他自己处于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最好像接弦的水手那样武装左轮手枪，尤其是摩擦型手榴弹可以在要开道路时赶走敌人；最后，作为重要的思考：士兵要么不带背包因而不能携带食物，要么背着很重的背包而失去体能，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在此后的战斗中，在武装侦察或交战的时候，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机会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只要求每个士兵能够努力24或者48小时，因为无法运输食物而只好背上背包，这减慢了他的行军速度，并且甚至可能会因为极端的疲劳导致失败。

索尔费里诺战役中，奥地利人没有背着背包，仅因此而比法国人多一个真正的优势，幸好这不足以带来胜利。难道不能给每一个

士兵一个可以系在腰带弹盒两侧对称的口袋，如有需要可携带至多两天的食物而又能避免携带背包？过去的撒丁岛人总是采用这种装扮，这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合理的。

从军事的角度看，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不是没有教训的；在法国，甚至在欧洲，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中国人想成卑鄙的敌人，他们只有木制大炮，或者为了给敌军带来恐惧而在他们的旗帜上画着可怕的龙。他们的胆怯、懦弱甚至卑劣几乎是人尽皆知的。我们相信目睹了 21 日激烈战斗的士兵，目睹了那些苦力奋力呐喊运送云梯、抬走伤员，或者运送弹药，在回法国时会带着完全改变的想法。

无可争辩的，在直隶湾北部的自然条件如愿以偿地积累了这些有利于防御的障碍：沙滩被 1.5 公里的淤泥覆盖着，有些地方甚至有几法里。地面都是沼泽，我们只在被壕沟围着的堤道上行走，这里的大部分地方——从海边直到内陆几法里的地方，可以这么说，在下雨的时候是不能通行的。

诚然，传统使得中国人用深渠和河道把他们建造的要塞围起来。在这个地方有规律地缓慢前进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用黏土建造了大炮都几乎难以攻破的要塞；他们从大自然中积累各种附属的防御工事，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且很难摧毁。

他们用各种口径的各类大炮武装他们的要塞，很多架是可转动的，以便必要时由他们的骑兵向关键位置发起攻击，就像他们在 21 日所做的那样。他们设立了障碍栅，尤其是一排铁桩，在 1859 年挫败了英军舰队的所有努力，并且随后使他们的登陆尝试失败了，面对七八百米的淤泥滩以及三道充满水的壕沟，成功显然是不可能的。

最后，他们表明了，当他们在受像 21 日被打死的都统那样坚强勇敢的人指挥时，他们则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我们的苦力得到了

普遍的赞扬。因此，从军事角度看，这个民族只缺少好的领导，并且需要讲点科学：中国文官权力不大，武官的权势很大，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改变。

至于要塞的整体部署，他们极好地观察到了互相的侧面防御，但是完全缺乏布局。在建造要塞的时候，壕沟和炮台之间有很远的距离，还有其他很容易校正的错误。他们的确拥有难以攻破的木桩，但是这种防御方式使得敌军可以安全地组织进攻，甚至在壕墙脚下组织进攻，并且在壁垒最不危险的地方准备突击。另一方面，大炮的射击很不准确并且他们的火枪非常原始。应该承认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坚定地推行军事改革，中国将变得难以攻破。

这个民族很有智谋，视死如归，不怕苦难。足智多谋、勤劳能干。因为对死亡的这种蔑视，如果人们把现代战争的原则引入中国，就不可能不取得成功。皇帝，或者说他的政府，只希望拥有3亿人口的强大的中华帝国能够对抗所有反对其法律或独立的尝试。拿下了大沽要塞之后，两位特使，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动身去天津，他们去那里缔结和平条约，即之前在北京签署的条约的批准书。

天 津

天津城有三四十万人口，大部分人住在郊区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沿着白河和大运河两岸一直延伸四五公里远，那里安置了一个砖石建造的矩形防御工事，有1400米长，1000米宽。这个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墙围住了这座古老的城市；两条街成直角，沿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根据中国的习惯穿过整个城市。它们一直通往城墙四边上中央的四个城门，每扇门都呈拱形，同时在这些边上形成了

一个不完全的侧面防御。矩形的四个角立着四座宝塔，用来向上帝祈祷保护城市。

街道一般都很脏，沿街大部分是泥土房。郊区唯一一条沿着白河和大运河右岸的街道被布置得稍微好一点，街的两旁也有漂亮的店铺并且特别吸引外国人的好奇。在那里可以买到毛皮，一些瓷器以及北京漆器，令人咋舌的价格使我们确信可能荷兰人规定尽可能不卖给夷人。相反地，那里动物种类繁多；水果如梨、桃子、葡萄、苹果，比法国便宜，广受欢迎。

在中国，农夫很关心地里的农作物，尤其是蔬菜，这些农作物以无懈可击且令人赞叹的直线排列种植，四周围着深水沟，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很好的排水系统，也是肥料的重要来源。在中国农业特别受重视；每年的特定时节，在朝臣们的簇拥下，皇帝亲自牵犁耕地；朝廷高官紧随其后，仿效皇帝的做法。

但是在这里，就像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除了这些文明的痕迹之外，还有衰落的迹象。大自然赋予的这些优良的水果挂在经精心修剪的果树上，但没有采用嫁接方法。没有橄榄树。

和平条约

我们的特使到达天津两天后，中国的特使来了，带头的是桂良大学士。外交谈判马上开始了，但是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拒绝见桂良，除非所有的和平原则得到承诺接受。虽然谈判是秘密的，人们还是很好地描述了欧洲外交的进展。

中华帝国做了妥协，同意了所有条件，我们只需确定去北京的日期，以及特使和总司令们随从人员的组成。天子派来的钦差大臣首先提出只允许带一小部分人，不能带武器，以免激怒人民，他们

说，以免激怒清军军队，他们不能对此做完全的担保。

我们在这次申明中已经看出要推卸后续事件的所有责任的企图。两位总司令坚决拒绝了解除武装的提议，但一切都由外交官来交涉，只带上一小队精简的部队。士兵的人数进行了很久的争论，法军总司令甚至考虑派出不超过 200 人的仪仗队。

英军拒绝了这个大量精简人数的想法并且表现得十分坚决要带上炮兵连，至于我们的炮兵连，大部分都改装成骑兵仪仗队，以护送总司令进入中国首都。

9 月 6 日下达了动身的命令，由大约 1000 人组成的仪仗队，从各兵种抽调人数相同的小分队和一些参谋人员组成。

第二天，和谈破裂，晚上，所有的外交事务都停止了，这是又一轮的战争。

早上 8 点，又出现了和平的转机，但是为了加速事态的发展，第二天人们让冉曼旅和一个英军旅动身了。

9 日，我们在离天津 5 公里处扎营，运力不足，勉为其难地运输必需的物资。两个炮兵连的每门大炮均配备了 128 发炮弹；根据沙内少将的命令，我们不得不放弃从白河经过；海军声称一艘捕鲸船都不能再从这条河流上航行，因为河水很浅，并且少将已经有一辆马车以及跟着军队陆路行军的搬运夫。

从新河出发的经验使得我们放弃了长途行军的计划；路线设定为最远是 4 法里。沿着河流，我们首先感到惊讶的是，每行一步都能看到帆船毫不费力地在河上航行，海军的想法开始变得令人怀疑了。

11 日，架桥兵抢了几艘帆船，作好了跟随军队水路行军的准备，带上了行政服务所需的大部分物资。这次经历是决定性的，从那时起，水运定期进行，令海军十分尴尬。

英军比我们领先一天的路程，抢夺了所有的资源，掠夺村庄，这没有妨碍总司令在每个宿营地对偷盗下达最严厉的禁令。中国人使我们十分注意军纪，几个士兵已经因为微不足道的偷盗，损害了穷人和当地人，我们被看作是毫无廉耻之心。

抢劫的恐怖在军方的脑海中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到达天津之时士兵没有柴火，马匹没有草料，而士兵接到命令，无权进城索要。尤其是10日，我们带着所有物资在离白河500米的一块潮湿的低地扎营，在一块高粱地中间，高粱秆正好可以做饭。而连下几个小时的雨使我们无法安顿，直到第二天我们才考虑砍柴，这使得士兵可以烘一烘他们的衣服。

14日，我们已经在挺进北京的路上了，离天津大约15法里：中国特使与我们汇合，要求我们停止向前推进。我们让步了，我们的外交接触重新恢复。皇帝的堂兄怡亲王在通州与巴夏礼先生谈判，巴夏礼先生是英国驻广州领事，远征翻译跟着他，中国人同意了所有要求。

我们没有出席这次会晤，葛罗男爵只在18日派了他的秘书与负责营地和军需的军官一起去。我们显然在被英国的外交牵着走。

尽管没有在条约上签字，特使们认为和平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重新组织了仪仗队，陪同特使和将军们前往通州，部分人前往北京。

17日，几名英军军官在特使的安排下与巴夏礼先生汇合。葛罗男爵派自己的秘书兼翻译德·美理登、杜吕克神甫前往通州，杜吕克神甫是精通中文的传道士，几天以来都很想为我们提供帮助。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停留在河西务；将军要求军需助理杜比和几个军官与特使的秘书汇合，以便在纵队到达之前准备好必需品和营地。这支小先锋队只比我们领先几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定于17日

启程，要在两天内完成行程，而这些先生们则直奔通州。他们在路上没有碰到任何防御装置，自由地进入了城市。

特使的秘书巴士达先生一到，就被引荐给了中国的亲王，亲王向他保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迎接联军。营地在离通州两法里的地方，在那里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所需的物资。

有了这个保证，在场的军官们准备与纵队汇合，每个人都准备向总司令作详细的汇报。因为急需获得情报，各自分头行动。他们于7点30分与部队汇合。

将军派去视察为他准备的住房的军官第一个回来，离他不远处是一名参谋和一名会计。在他们回来的路上，这些先生们惊奇地看到五六千个清军骑兵排列在路的两边，带着明显敌对的阵势。几个小时前中国亲王给出的和平保证成为一纸空文。联军内盛传中了敌人的圈套；特使们被中国政府戏弄了。

桂良接连地要求：护卫队不应携带武器，并应尽可能地精简人数，尤其是不能由炮兵连护送。坚决拒绝了第一项提议，我们只好在接下来的提议中作出诸多让步。法军减至600人，英军1000人，我们只有两个炮兵连可以支撑这些力量，只有很少的军需品和子弹。

3个炮兵排改装成仪仗骑兵队，手无寸铁地从天津赶来为特使和总司令胜利进入北京造势。

我们人数的单薄使得中国政府更加背信弃义而特使们则更加轻率。

总司令得知消息，据说出现了一支上万人的强大的清军军队，于是马上作好了战斗准备。

法军占据路的右边，炮兵连的600人在中间，正好把部队平均分成两部分。联军力量的削减使得我们不能依靠右翼的英军，我们与他们隔了大约1公里。在我们的对面，在流入白河的一条运河边

上的一个村庄里，有为数众多的步兵和清军骑兵。英军还需要包围去通州的道路，这条路使得中国人可以绕道攻击我们的队伍。在面对如此多的敌军时我们的处境会变得很困难。只有我们的镇定才能挽回特使们的过失。

所有人都在焦急中等待，在这可能没有出路的情形下，直到10点钟，传来三声炮响，这是战斗开始的信号。中国军队刚刚抓走了一名从通州出来准备返回英军营地的英军上校，还有返回法军营地的会计官阿代尔先生及其勤务兵。在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中，会计官和勤务兵被打死了，英军上校，双手染满了鲜血，飞奔回来报告；在他逃出敌围的时候，清军向他连发三炮，这暴露了中国政府的背信弃义。

联军因此开始行动了。英军在我们的左翼前进，两翼沿着运河匍匐前进并换了一次阵地，试图击溃我们面前黑压压的敌人。炮兵在这次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似乎希望我们不能拉来大炮，或者，至少，在长满被割成0.50米高的玉米秆的土地上，大炮难以自由移动以免对他们造成威胁。他们身边则有刚刚布置的炮兵连，显然是在知道了他们特使的成功之后准备的，中国特使刚刚大大缩减了来到通州的部队力量。幸运的是，他们所有的预料都被我军4门大炮惊人的灵活性和步兵的精神打破了，其中工兵连的80人走在最右边。

我们成功地连续夺取了沿着运河的3个村庄，并且清军军队在3个小时内都逃走了，成功是毫无疑问的。这次战斗对敌人来说伤亡惨重，但没有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只有五六个人受伤以及一名军官战死——非洲轻骑兵中尉、总司令的随从达马斯先生。

此时，我们在张家湾村扎营，这是我们占领的最后一个村庄。我们等待着冉曼将军的剩余部队的到来，他和英军的第二旅被留在

河西务，以便向通州进军，并根据事态发展，进军北京。我们没有关于军需助理杜比、炮兵连格朗尚中校、杜吕克神甫和戴斯克鲁斯先生的消息，他们被中国人扣押在城里。英军也不知道他们的几名军官以及首席翻译的命运，首席翻译巴夏礼同时也是一位外交官。

9月19日

昨天晚上，柯利诺将军和冉曼将军的剩余部队以及他的每个团的80人一起抵达，他们先前被挑选陪同法国代表团进北京城。听说他们21日将作为突击队发起进攻。清军军队在通州；我们跟第一天一样，对被中国人囚禁的人质的命运一无所知。

通州之战

1860年9月21日

我们浪费了两天时间来等待柯利诺将军从河西务带来增援的军队；英军大概有5000名士兵。我们是2000人，也就是说，2000名士兵，40000发储备子弹以及每具大炮100发炮弹；我们甚至没有要求所以也没有指望从天津得到新的增援。帆船舰队又登上了白河，带着两周的食物，沙内少将带领着400名海军。

21日早上5点半，两军开始行进，英军领头；将近7点半的时候，在通州西边，我们看到了中国军队，大部分是骑兵，排成半圆，形成包抄之势。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条通往北京的道路和一条运河；敌军很可能防守着这两条通往天朝首都的交通要道。法军继续前行，英军在我们的左侧，并形成一個圆形，中心在我们的右

侧。布阵与 18 日所采用的几乎类似。

柯利诺将军刚指挥先头部队组成方阵准备应战，清军的一支炮兵队就首先开火了。先锋队在我们的左侧继续前进，其余部队在右侧开展行动。工兵连的任务是掩护柯利诺将军指挥的炮兵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稍微等了一会儿英军的到来，英军炮兵在敌人阵地中引起一些骚动，但是并没有摧毁他们。因为英军行动非常缓慢，柯利诺将军被战斗的渴望驱使着而孤军深入。这个行动使他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在离英军和我们的右侧大约 1 公里的地方，他只有 3 个连和半个炮兵连可以进行抵抗。他可能在各个方向被包围并与其余部队隔离。

在一次小规模的对射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清军骑兵开始行动，组织有序地向着我们交战的前线快速推进；两军相距不过 600 米。此时，英军在我们的左翼开始作出部署，负责右翼指挥的蒙托邦将军因此布置了一队狙击手，以保护因位置插得太前并且每个人都想独自抵抗而无法进入方阵的炮兵。

炮兵随后收到全线冲锋的命令。柯利诺将军身边聚集着他的部下，一直顶着敌军接连不断的进攻，最终英军骑兵赶到，向清军军队猛攻，这些联合行动成功地抵御了离我们仅 100 米远、并且好像要歼灭我们的这支庞大军队的努力。

清军骑兵撤退后，我们随即前行，并且几乎立即找到了通往北京的道路和运河。英军仍然处于落后我们相当远的距离，仅以他们的精神力量，伴以时不时的开火，支持着我们。大量的清军骑兵在右侧行进，而位于运河左岸的中国步兵在这次行动中暴露，开始了持久的射击。清军英勇顽强地保卫着一座石桥，但是我们的精密武器以及士气战胜了所有抵御。清军不得不放弃，尽管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 10 倍，随后我们控制了运河的两岸。1 点钟，战斗结束了，

我们在左岸安营，而英军在对岸驻扎，在接近北京 2 公里处的上游。

在离天朝首都 2.5 法里的地方击败了一支由皇家亲王指挥的 5 万人的强大军队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我们的特使善于利用的话。不幸的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能力，因为他们第一次的外交失败使得我们损失如此重大。然而，我们可以怀疑皇帝会离开北京，问题将变得无法解决：我们只是摧毁一个王朝，但使得所有条约的履行都变得不可能，除非无限期地占领中国。我们等待着结果，无法预料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我们的武装很可能比战争刚开始时要弱，我们处于离白河口 30 法里的地方，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村庄，没有当局可以商谈，还可能被迫冬季停航。直到遇到清军军队的那一天，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并在隔离中把我们杀死。对华战争是百年一遇的荒唐事，只令我们为了英国的利益而作出巨大牺牲。我们获知人质已经被运到北京，我们希望不会对他们做出任何事情。

进军北京

10 月 6 日，两军于早上近 6 点钟时出发；我们首次调整了行军的次序。一支先锋队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向一个筑有雉堞墙的营地行进，这个营地占据了村庄东面的一部分：据说那里曾驻扎着很多的敌人等着我们，以保卫北京城。像往常一样，我们的预料落空了，敌营已经空无一人，因此我们可以毫无危险地直达北京城城墙之下。我们认为，受同样的情感引导，这些蒙古马队应该已经撤到北京以北 4 法里的皇帝夏宫圆明园，我们决定在当天晚上到达圆明园。

英军迷失了方向，因此无法到达目的地。晚上 7 点钟，天完全

黑下来了，我们在宫殿前面的一座院子里扎营，这是在敌国，在我们所知道的最坏的情况下。我们的四周都是围墙，敌人可以在围墙上面安全地把我们消灭，并且即使敌人不够强大，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担忧。我们将会被自己人误杀，而却以为是在杀中国人。当发现充当守卫的中国官员和4名满人时，我们没有太多惊慌，我们相信遇到抵御时我们会努力反击。一支海军被指派保卫城堡，禁止任何人入内，除了总司令以外。

第二天一早，总司令，只跟他的参谋部人员一起，到圆明园去了，其余人都禁止入内。然而还是有几个人从别的入口翻墙而入。立刻被总司令明令禁止了，将军想要避免偷盗事件的发生，只允许他的随员每人拿一件艺术品，但是大家如此冲动，他们强烈违反将军的命令，如有些人戴着的珍珠项链或黄金项链。人们甚至想要成立一个战利品委员会，下午皇宫被入侵了。

但是，宫殿还有一些地方是禁止进入的。例如一些小教堂，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的大门口布置了哨兵，保护珍贵的宝石和黄金。不久以后，命令确实取消了，但是这些宝石都不见了。

这天晚上，军中一名职位很高的人被人看见于子夜时分牵着几匹骡子来到皇宫，装运从那些未经搜索的地方偷来的东西。有人数了一下他居然拉了两趟。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那桩魔术般的奇事，8日晚上，那些要分给部队的财宝中的三分之一，在宫殿和指定的分发地点之间这200米远的路上，愣是被人搬走了。

不幸的是这个事实确凿无疑，因为有人接连往车上放了两批金条，被人看到了。有人还提到，一些军衔相当高的人可能为此失窃事件开了方便之门。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留在我们身后的是一片废墟和大火，无法掩饰战争中这悲惨的一幕，军队因此失去了尊严，某些人因此失去了荣誉。

可是，从军事的角度看，毁坏宫殿有一个好的结果，可以在不失去它的宝藏的同时更好地进行指挥，但是只有这样，皇帝，以及他的那些住所同样被掠夺的王公大臣们，才能从内心深处受到打击。我们刚刚所做的事情使得他们担忧北京的未来，8月13日，恐惧使得他们在圆明园的一片火光中向我们打开了北京城门，英军在我们动身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一架大云梯进入了，好像为了报复没能参与最初的掠夺。我们很满足地占据了满人区北部的东门。

北 京

特使们在进入天朝首都的时候首先要求释放在通州被俘的人质。中国官方似乎很犹豫，她不敢承认事实真相。我们最后知道所有被俘的人都死了，除了巴夏礼先生，戴斯克鲁斯先生，洛图尔先生，还有几名被交回给联军的士兵。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质在被俘的那一刻起在圆明园宫殿里所遭受的酷刑；他们的双脚被铁链拷着连在一起，双手紧紧地被绑着，难以自由活动，无法坐下。后来给他们的少得可怜的饭他们也吃不了，因为手腕的疼痛，其他犯人都很同情他们，开始照顾他们，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们才感受到了一点人性。

在被押往皇帝宫殿的人当中，有几个是坐在布满钉子的车辆上的。他们到达时，要求吃东西，他们成为中国官员凌辱的对象。没能要回活着的人，我们要求返还所有的尸体，除了杜吕克和英军上尉布拉巴宗。

这件悲伤的事情一完成，大家便以认真的姿态对待和平条约。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作为皇太后的儿子本来该继承王位，被任命为摄政王，全权处理谈判事宜。在我们离开通州的两天前，当我们在为和平做准备工作时，皇帝已经逃走了，给他的臣民留下了一

个公告，在公告中他宣称要与蛮夷战斗到底并且要砍下敌人的头颅。

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特使的保证，我们最终知道了事实。英军好像没有为他们的行动延缓感到懊恼，我们向他们提供了留在北京的想法，但是葛罗男爵不这么想，已经在中国首都住了2年的俄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想要加快这些事情的进展，因为俄罗斯公使馆的有力斡旋，和平条约最终于10月28日签订。

之后还开始执行作为人质家庭专用补偿的支付（法国为150万法郎）。条约应于3天后签署。

24日早上11点，葛罗男爵以不很庞大的军事排场在北京为法国特使准备好的衙门里安顿下来：101团的300名士兵由普热上校指挥。

和平条约

1860年10月24日

同一天的2点钟，额尔金勋爵离开北京的营地回到礼部，恭亲王在那里等了他一个半小时之久，以签署和平条约。英国特使的护卫队包括各个兵种共2000人。它的前面是参谋部人员和数量众多的各级官员，从城门出来迎接。在总司令的命令下，禁止法军进入北京城，24日应该是天子和维多利亚女王之间签署了和平条约。接下来的一天是与法方签署类似条约的仪式。

为了规避将军的规定，我只得与我的一个朋友夏隆上尉耍耍花招。我十分迫切地想看到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之间举止和风度的差别。

在英国特使到来之前，我们能够进入礼部。在一个满是清朝人的庭院尽头，有一个门厅，一面开着，通往几个配有最简单的桌椅家具的房间。护墙板糊着遮盖度很差的糊墙纸，红色的呢绒铺在桌子和扶手椅上，墙上爬着弯弯曲曲过早开花的植被，这些形成了我们将要看到的外交场面的基本格局。在门厅的入口，在第二层地面的左右两边各放着四张对称的桌子，堵住大厅通道的是两排数量颇多的桌子和椅子。

到了大厅，我们看到一个 25 至 28 岁之间、眼神黯淡、目光斜视、看起来很疲劳的年轻男子稳稳地坐在四张桌子中的一张前面，此刻显露出一种畏惧或者仇恨的情感，我们可以从他闭合的下唇的一道皱褶看出来。被众多各个级别的官员包围着，恭亲王——皇帝的弟弟，等了额尔金勋爵两个小时，对这种侮辱变得很不耐烦。所有的官员，以及亲王自己，戴着礼仪的朝珠，一串垂至胸前和颈后的念珠。丝质长袍的两面都有毛皮，且在一个正方形的刺绣框内根据文官或者武官的不同绣着鹤或者龙，这些构成了官服，再加一顶镶边且顶上根据官衔分别有红、蓝、白或铜的帽珠的帽子就完整了。中国武官的帽子还插着一根孔雀羽毛，插在帽珠下面的玉环上。

恭亲王的服装只在肩部、背部和胸前的环形刺绣图案上有别于他人，表明他是皇族成员。英国特使的随行人员坐在右边，位置与恭亲王的随行对称。

当额尔金勋爵的轿子到大厅时，中国官员簇拥着看起来简直想摆脱这些礼节的恭亲王，走向前迎接他。两位特使之间的外交问候是冷冰冰的，没有一个人讲话，每个人都落座于为各自准备的桌前。

双方特使交换了各自授予全权的文件，开始阅读和平条约的条

款；尽管每一个特使都已经完全了解这些条款，双方还是提出了很多意见，持续了不下两小时的时间。亲王第一个签署了和平条约。当额尔金勋爵准备用女王的印章在条约上盖章时，人们让中国官员散开，按照额尔金勋爵的命令准备好照相器材，从而使英国特使的随从可以重现这一场景的详细情况。

片刻之后，额尔金勋爵重新上轿，其仪式与他来的时候一样。

第二天，与法方举行了一场类似的仪式。葛罗男爵的随行人员跟额尔金勋爵的护送人员相当。我们的特使修养很好，没有让亲王等，他很准时地赴约，他和中国特使的关系可能更加随和，没有那么威严。亲王显然表现得更有好感，待葛罗男爵就像一位朋友一样，并且陪同男爵一直到座位前。他对我们特使的这种友好迎接证明了他有能力改变前一天的仪式。

与法国签订的和平条约有一个附加条款，北京古老的圣文森特教堂将归还给天主教徒，这座教堂建于1657年，因为一项禁止基督徒进入城内的法令自1839年被遗弃。26日，我接到命令进行紧急修复工作，使得这些建筑能够容纳来参加死者祭礼仪式的军官和部队，为那些因为清军军队的背叛而牺牲的人质歌唱并致敬。

教堂位于北京城北部的西门附近，呈拉丁十字架的形状，底座很低。它的风格十分朴素，无法归类为何种建筑风格。入口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杂草丛生。30年来中国人都没有想到利用这座建筑，这是他们在北京城唯一的教堂，却任凭风吹雨打。我们看到散乱在墙上的灌木丛，风把他们的种子带到这里来。那些石板地被从厚厚的泥土中钻出来的树木毁坏了，只能看到拱顶的壁画。她们呈现了基督母亲生活的好几个阶段。这是一个老传教士的作品。

毫无疑问，这个作品包含的不只是宗教思想；而是对家属的一

种缅怀，也可能是这个传道士牺牲和勇气的一种懊悔。

我需要 48 小时才能砍倒淹没了这座教堂的原始森林，并为神圣的祭礼仪式准备好足够的设施。有 300 名士兵以及同样多的中国人帮助我，尤其是北京主教孟振生及其助理主教董若翰的帮助。

29 日早上 10 点，就像我保证的那样，我们能够在遇难者的坟前为这些死者祷告。所有人都在这场仪式中静默，我们在离法国 6000 法里的地方打开了基督教的一个新纪元。这天早上，我让中国人自己把他们在 1859 年拆掉^①的十字架安装在教堂顶上。

再次打开这座教堂，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和宗教的满足感，同时有一种为过去的遇难者悲哀的思想，就像我们为之祷告的那些人一样。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高兴为重温这些情感作出了贡献，试图把与这座教堂一样盖着长长黑纱的国旗与救赎的象征结合起来。

第二天，上校收到下面这封来自总司令的信：“上校，在昨天的仪式中，我注意到了教堂得到了很好的翻修，请接收我对此的祝贺，并为指挥这次修复工程的贝齐亚上尉记上一功。”

北 京 城

1860 年 11 月 1 日

出 发

当我在童年的时候听说起北京，我总是把她与《一千零一夜》中

^① 僧格林沁，一个预言者，说只要基督教的十字架还竖立在教堂上，就不可能打败叛匪；僧格林沁将此事禀告皇上，皇上遂下旨将十字架打碎。——原注

的形象联系起来。这正是我的思想为了召唤神明所选择的城市，作为仙女和迷人的宫殿的故乡。今天我没有了幻想，因为想要看的东西太多。直到我回法国的路上这些幻想才又回来，在穿越将我们隔离的 6000 法里之时，让记忆抹去时间在整个中国造成的毁坏。通过重建被破坏的古迹、忘却了民族的道德堕落，伟大帝国的无知以及所有这些古老文明的碎片，在中国与现实社会的状态形成了强烈对比。总是沉浸在幻想中的想象力的作用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

北京由四个城区组成；也就是说用围墙围住的四个区域，在中国叫做城区，这是由防御工事围住的住宅群，总是用砖石水泥或黏土建造而成。南面是汉人区，是一个从北到南宽 4 公里、与之垂直的一边长 6 公里的长方形。当 200 年前满族毁灭明朝后，他们把老城区即北城区留给满族人，并把中国人驱赶进入他们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有了今天北京两个主城区的名字——汉人区和满人区。

满人区就是中国的老首都，是一个边长 6 公里、几乎正方的形状。她由两个同心的城区组成：黄区和蓝区（或紫区），因为各自城墙的颜色而得名。满人区的每一面都有两个城门，从城门开始的 40 至 50 米宽的马路在直角处交叉。南面是唯一一个中国人和满人的公共场所，有 3 个城门，一个门正好位于被北京巨大的城墙封闭起来的城区的轴线上。我们还在汉人区的围墙上看到两个门，从东西方向延伸至满人区，整个北京的这两个城区外墙上一共有 18 个门。这个城市只有单层的房屋，里面是数目不少的外人不能进入的四合院。

这些房屋的大部分，就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可以看到朝向马路的围墙上有一个门，离大门有一两米的距离，为了防止行人窥视或用好奇的眼光打探庭院内部，院子里有很多树木，使人宁愿相信

到了一个有着 30 万人口的巨大的村庄，而不是到了中华帝国的首都，整个北京城有 300 万人口。任何对中国首都比较了解的人似乎都难以接受北京的人口如此庞大，100 万可能是一个更接近真相的数字。

没有任何商业或工业的迹象可以改变这种第一印象；到处都是些破破烂烂的房屋，随着时间的流逝处于半毁状态的公共建筑，水库和干涸的湖泊，处处是废墟，这是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任意破坏的结果。

皇族亲王和一些王公贵族居住的“黄区”呈现了一种比满人区更悲凉的面貌；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倒塌的宫殿，荒废的寺庙，一个巨大的水库曾经灌溉着两座高山，保护着“蓝区”抵挡北风。现在水库也干涸了，长满了沼泽植被，就像衰落的印章，刻在整个中国的脑门上。

美丽的夕阳西下呈现的景象，使得湖面大理石桥上、各种寺庙，以及水库四周或者分级排列在西山上的凉亭和宫殿里的参观者，能够用想象力重现明朝时期的快乐时光。顶上有一座女皇丧葬纪念雕像的假山南面的山脚下，是年轻女子的宫殿，她们被培养成为禁宫里最体面的夫人……一种鹿园，皇帝经常提前去那里挑选陪他过夜的妃子。在祭祀祖先的山东面^①，东西两侧扇形建造有一些亭子；自从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之后，人们用铁链锁住以示惩罚，所有人都禁止入内。

传说满人入侵的时候，明朝最后的皇帝没能逃走，因为他听从一个大臣，松开 12 匹马，这些马时刻为他和他的几个宫妃的逃跑作准备，他因此被迫自杀。今天，这些呈现了旧时行乐的景

① 此处应指景山。——译者注

致的亭子成了废墟，甚至包括皇帝居住的蓝区宫殿的那些城门。

蓝区或紫禁城周围都是充满水的沟渠，还有一条有双重护墙的围墙。里面围着住有三宫六院七十二位嫔妃的宫殿，一座古老的藏书阁，一些塔以及用处各有不同的宫殿，例如大臣们集合的宫殿等。大臣们住在满人区，沿着黄区的城墙，直到蓝区的城门。

每天，皇帝听取四位军机大臣，满汉各两人，汇报政事，他们类似于国防部长（国务大臣），是皇帝的顾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列最高官职的助理。召见大臣时，皇帝坐着，大臣跪着，直到皇帝垂顾允许他跪在垫子上。所有的问题在呈交给皇帝之前，由六部尚书先行审阅。

1. 吏部，主管文官升迁；

2. 户部，主管户籍财经；

3. 礼部，主管祭祀大典、公共建筑、佛塔、寺院、皇帝的婚姻和各类仪式；

4. 兵部，主管战事、中国兵法等；

5. 工部，主管公共工程，包括船舶建造；

6. 刑部，主管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

7. 1861年1月23日，皇帝任命了一位新大臣，总理各国事务。

官吏等级中，在这些大臣之下相继为各省巡抚、驻守拥有某一主要中心城市的官员道台、各个级别城市的官员，最后是村镇的镇长。每一级官员，除了最后一个级别的官员没有授职，每3年换任。当在任官员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时，儿子在守孝期间应自动离职。

皇帝上朝、宣旨之后，一天里剩余的时间都用来跟他的女人们和太监们玩耍，他们是他惯用的陪同人员，达300人之多。

中华帝国衰落的原因

我们对中国研究得越多，就越确信这个有着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完全没有道德生活。这个国家只关注一件事情：物质生活，这是唯一的信条：完成各种规定的典礼，或者说连接过去未来的纽带。这个固定化的原则甚至被应用到性别准则中，如果这些表达不互相矛盾的话；中国人用他们天赋的智慧奴颜婢膝地重现几个世纪以来传承下来的东西，他们只给后代看祖先留下的踪迹。家庭亲情是唯一还能够支撑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大厦的原则，只能显现往事以使中央帝国的最高法律更有影响力。儿子尊敬他的父亲，人们寻求做父亲的资格只为了在他死时能够获得一块墓地，就像他为他的祖先准备的那样，这些葬礼就像在家族祭坛前的那样。在战场上死去的儿子，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职位以光宗耀祖，从此祖先也可以享受这种荣誉。

荣誉、尊严或者宗教情感，把人们与神以及类似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其实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在组成中国社会的各种元素中，也毫无团结之心。事实上人们因心灵而集合在一起，远比因物质利益而集合要好得多。在其他国家，比起那些在理解前必须进行争论的很难下定义的散乱的利益元素，国旗的概念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能够构建一个社会的一致性，并通过一种崇高的冲劲来保卫疆土。

迦太基从来不能与罗马相抗衡。汉尼拔回天无力，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孤军奋战孤立无援。在中国，一切都促进了帝国的衰落，她的疆域之广使得当权者无法亲自判断，不能了解各地权贵剥削掠夺弱者，监管成为了一种错觉，尽管试图努力预防人性中的

这种致命趋势。这种努力本身就是促进衰落的一种新的有力源泉。每隔3年更新一次官员，他们被安置到远离他们之前治理的地方。除了这种措施的行政弊病之外，官员鲜有兴趣获得并保持民众对他们的认可，一点都不关心公用事业工程的完善，只想着照他们前任的榜样，这可能就是帝国没落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解体的缘由。

从那个时候起，每个人活着只为自己，只关注自己的家庭，在这里他可以创造一切肉体享受的元素，这由荒谬的尊卑关系维持，其中有妻子，尤其是小妾，小妾在家里只不过是一个取乐的工具，一件家具，一个奴隶，她甚至不能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旦小妾做了母亲，孩子就由合法妻子抚养，她是家里唯一公认的母亲。

最后，为了获得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没有足够的军事头脑以及对战术的足够了解，以成功对抗西方军队。因此，一切都促使她走向屈服和没落。

外部迹象

从北到南，从广州到北京，帝国内部叛乱此起彼伏，中国王朝的使节十分不满并且粗俗地说道。这种恐惧钻进了每个人以及中国官员的心里，他们放弃职位来向我们寻求庇护，在广州，在上海，在天津。革命每一天都获得胜利，政府没有能力阻止。根据僧格林沁的建议，达官贵人们响应皇帝逃到了热河，这使人担心王朝的灭亡，这可能是天子不在期间，我们暂留北京的直接结果。我们还没有拟好的征服计划在此刻挽救了清朝，但是这些反叛者必然会加剧我们使帝国遭受的衰弱，加剧帝国承受的丧失人望和屈辱。他们把我们看作辅助力量，或者说盟友，他们的勇气、人数和希望只会更加壮大。

1 月

快到 1861 年 1 月的时候，蒙托邦将军收到大臣的一封信，试图向他解释命令海军远征交趾支那的原因。他说，海军在远征中国的时候表现得十分令人不快，命令他们远征交趾支那就是一种弥补。

此次远征交趾支那是徒劳之举，海军表现平平却因为形势的需要而履行这一责任，以此作为弥补，这让人感到惊讶。相反地，如果这是个严肃的解释，那么使政府下达命令给将军远征中国，远征交趾支那应该基于同样的动机。这不仅牵涉到法国的利益，还涉及到陆军——毫无疑问的，在指挥陆军方面，一名将军比一名海军准将更能胜任。当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时，这种补偿方案是我们不应该有、尤其不应该出现的一种不幸的想法。

英军海军在中国之战中的表现也很一般；这场战争结束时，英军海军认识到自己也应该寻求补偿以引起政府对她的认可。她重新上溯这些河流，一直航行到内陆 200 法里之处，他们研究沙滩的水文地理，跑遍所有不为人知的海域，绘制地图，这在未来的航海中将大有用处。总之，她总是用自己的特长提供重要的服务。如果我们在中国北部进行一场战斗，在我方海军无法提供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求助于这些资料，而我们并没有参与这些工作，那么，我们获得成功也不很光彩。

1861 年 3 月

现在，在击败了僧格林沁的军队后，他们开始威胁首都，在那

里他们发现，在皇帝不在的时候，只有一些官员指挥和代表着政府，这些官员曾恳请皇帝不要放弃北京，向他指出了离开北京将会引起的所有不幸。这些人从内心里把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后果推卸给天子，他们内心的忠诚在动摇，如果没有对皇帝的敬畏，这种情感就不可能存在，叛乱分子甚至在政府内部也找到了拥护者。

全副武装来到中国，是为了签订贸易和联盟条约，而这种成果只有英国人和俄罗斯人享有，我们破坏了宗教般的、甚至是迷信般的崇敬，对天子的这种崇敬情感深深地扎根于老百姓的心里；在对圆明园进行焚烧毁坏以后，我们动摇了这种盲目的信仰，这种围绕在皇帝神秘生活周围的玄奥的崇拜。一方面我们通过摧毁权力宗教建立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通过与政府的战斗促进了掠夺和革命的发展，其参与者被统称为叛乱分子。

4月5日

根据从巴黎寄来的最后的训令（4月2日），军队的形势似乎进入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新阶段。

从离开法国起，当人们知道海军和陆军各自指挥权的独立性之后，众望所归任命蒙托邦将军为远征中国的唯一的前线指挥官，任命沙内少将为远征军司令，更有问题的是，他也是远征交趾支那的司令。

和平条约在北京一签订，海军的准备工作使得传言更加可靠，1861年1月17日，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些传言。沙内少将带着几乎所有的舰队离开上海，运载着蒙托邦将军给他调遣的军力前往西贡。根据我的回忆，这支在海军指挥下的小部队，由13个海军陆战连、第二轻步兵营、配有4架十二发炮和3架四发炮以及3架山

地炮的一小队炮兵，最后还有工兵连的一部分士兵组成。一共大概有 1800 人；加上登陆的部队，总人数在 2500 人左右。据说，根据陆军大臣的指示，这大概是海军所能指挥的陆军的最大限度。

但是蒙托邦将军向沙内少将的请求作出了让步，保证一旦气温状况能够融化把他们困在天津的冰冻，就向西贡派遣第 101 团的第二营。此刻，这个承诺实现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远征的意义，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只想通过夺取安南人控制的路线确立我们在西贡的地位，而海军陆战队得到命令最终占据它，从各方面看都有优点：为了贸易以及作为海军基地，以使之成为法国新的殖民地。事实上，从军事角度来看，根据我们对东方民族特点的了解，我们似乎不应该指望在西贡与安南政府签订严肃的和平条约。这些支那人毫无疑问地明白，我们在他们国家心脏从南到北的胜利进军，会受制于巨大的物资困难，并且他们可以一直反抗我们到某一个时刻。因此，一切都使人们相信，2 月 24 日和 25 日占据的西贡路线，并且很可能连同之前占领的在一个很有限的区域非常容易防守的几个防御工事，是托付给这些军事力量的最终任务。

根据来自巴黎的最后通知，整个远征似乎重新提上日程并规模更加庞大。根据白天得到的信息，皇帝和陆军大臣命令蒙托邦将军担任前往顺化的军队的总司令。

我们不禁陷入了猜测，把这个新的部署与既成事实，以及不等所有没有任务的部队重组就把他们相继召回法国的命令联系起来。这次撤退甚至已经开始实行了；架桥兵和总司令的护卫队已经登船了。

蒙托邦将军的困境无以言表。为了进行一次类似的远征，我们现在的状况已经不如初冬时有利了。我们的军力分散在天津、上海和西贡，兵员因受伤和牺牲而减少，有部分部队已经开始动身回法

国。几乎所有的马都卖了，军需品没有继续供应，因为预料很大一部分军队将离开；另一方面，叛乱分子在上海和天津的城门口，是否应放弃这些据点，还是由英军独自担当守卫据点的任务？

霍普·格兰特将军刚刚又上溯扬子江，一直航行了 200 法里。他发现了被叛军毁坏的地区和城市，并且每天都有抢劫发生。此时的中国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可能明天就会四分五裂，最狡猾或最幸运的武装力量将统治部分地区。

我们应该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远离，把所有的军力带往顺化吗？顺化沿线筑有防御工事，显然会比没有侧面防御的大沽对我们进行更加顽强的抵抗，并且迫使我们竭尽全力。这是问题所在吗？最后，一个完全个人的考虑使得蒙托邦将军不敢卸去沙内少将此刻执行的指挥权。这个复杂的局势本身可能会引起担负全部责任的人态度上的犹豫。

如果我们只遵从军队的要求，蒙托邦将军就会集中他的军力，暂不考虑之前众多的政治考虑，尽可能快地前往岷港，试图在顺化取得一个与在北京得到的同样辉煌的战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下一封邮件带来明确指令并决定军队的行动，不管要与什么困难抗争，不管军力的减少，我们对胜利毫不怀疑。

交趾支那

交趾支那，1861 年 5 月 31 日

5 月 25 日，在对人们为我们所作的部署完全无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到达了西贡。总司令在交趾支那南部短暂停留 24 小时后于 9 日动身去法国。人们对这次仓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最普遍的看法

是：因为战损、病员以及天气原因，削弱了军队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远征顺化。总司令要求政府增派 10000 人以夺取安南首都并在那里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我们打算在西贡等待这些行动的结果。

一到日本，人们就通知我们继续回法国。同时才我们得知：炮兵连中校拉波塔利埃尔；工兵连上尉贝齐亚；得病才 3 天的军需副官博纳米，尽管身在医院还是要求留在交趾支那，直至他收到军需官布隆多的命令；各职能部门的长官；他们应准将的要求返回法国，这与蒙托邦将军在其经过时所作的安排相反。

参谋部的长官只是一个新近晋升的年轻上尉。他应该在我们离开后的两或三个星期后与瓦索涅将军一起登上“欧洲人”号，也就是说在知道总司令在巴黎作出的指令之前。

事实上，陆军的编制因此被破坏了，海军只希望要一些忠心的士兵，他们等级很低，不会阻碍它的任何计划，随时准备满足它的变化。对海军来说，达到这个目的尤为重要，因为交趾支那问题是海军造成的。大家都知道蒙托邦将军刚刚被任命为交趾支那总司令，任务是进攻安南首都。军队处在这样的状况，总司令并不认为能够进行这次远征，从而火速地出发，把感受反映给政府。

海军出于利益考虑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原来的方案变得更加困难，借给它的陆军部队也按照海军的意愿被派遣了任务。陆军担心未来，但是没有人人为它辩护，没有人考虑它的利益，它不得不毫无怨言地忍受他们所处的境况。尤其是，它痛苦地看到，与远征开始时统帅他们的瓦索涅将军给予的保证相反，在将军离开时，他们不得不受“欧仁妮皇后”号舰长的直接命令，这是位勇猛的、有功勋的上校，他对进攻志和的命令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鸣金息兵集合他指挥的海军纵队。海陆两军之间的敌对从一方面来说是彻底的、强

烈的并且多疑的，完全不能互相倚靠，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很可悲的。

关于交趾支那问题的未来，双方更有分歧。我们看到两个阵营中各个级别的拥护者如此富有激情，至少他们自己相信自己是对的。从完全的立即的放弃，到征服交趾支那，模仿英国征服印度，所有的意见都成了家常便饭。可以肯定的是，以瓦索涅将军为首，没有任何一个军官曾在西贡和美荻的稻田住过2个月，他们并不认为交趾支那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商业和军事体系。此外，他们不允许任何没有参与最后几次胜利的人对此有任何反对意见。在这几场战斗中，人们根据牺牲的人数来决定影响的大小。

被海军称为老基地的基地比沙内少将的新基地早了3年，在组成新远征的这些精英部队前没有得到什么优惠。幸而法国向这片海域派遣军队。为了弄明白，政府只需听取西贡的意见，它只需在放弃或征服交趾支那之间作出选择。

放弃或征服，问题因此变得简单，并且不允许我们提出对上述情况毫无价值的意见。为了研究一个纬度横跨 11° — 19° 的国家，评估这个民族的习俗，国家的特点，行为方式、禀赋以及意向，不容置疑地，只需要在那里生活2个月，生活在因为最近的战争变得惶恐的人群中间，我们决策的变化令他们对未来感到担忧。接受一下这个观点也是合乎逻辑的：要了解这个国家的生产、财富、行业、需求以及贸易，只需要在西贡或者美荻的红树上度过2个月。但是，我们尊重比我们先到的、曾经在赤道附近的沼泽中生活过的人们的经验，我们只想表达一些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这些看法唯一的好处就是不带有对西贡的任何成见，对此人们有充分理由否认我们。

在我看来，交趾支那的问题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政治

的、贸易的以及宗教的。每一个方面当然都不能完全孤立地看，不能用抽象的方法来研究。我们也没有力图重现标志每一个阶段的突出特点，使得这次分析得出的评断没有在这些大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迷失方向。

西方所有的海军力量，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尤其是英国，都在中国或印度的海域上拥有一席之地；法国是唯一例外的国家。法国的国旗被禁止在世界的这一半飘扬。只有在印度，在这个归顺了英国的泱泱大国的三四块小区域内，人们允许法国国旗飘扬，条件是不能背信弃义，只能依靠大不列颠进行防卫，我们从维也纳条约起就遭受这样的屈辱。法国在亚洲施展的影响也在最近的几次战争前被抹去，记忆完全被遗忘，以至于人们以为看到了载着中国军队的舰队，以为我们是英国人的雇工。



第2部分

见闻^①

中国习俗

丧事要穿白色。人们总是把帽子戴在头上，自行脱帽是失礼的行为。人们看书写字都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在中国，左边是地位最高的位置。有客人时，一家之主总是站在最后一排。进餐从点心开始，并且在吃饭前喝东西。学生学习以及老师教授的时候声音都很大。人们吃热面包，也喝热的酒。向女士问身体怎么样是完全不合礼的。女人们不同男人一起吃饭，从来不跟男人一起散步，不同她们的丈夫一起出门。人们一点都不害怕死亡。

丈夫不能选择他们的妻子，通常只能从德高望重的夫人們的女儿中选择小妾。人们通常在四岁、五岁或者六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有时候指腹为婚。孩子都是合法的，把合法的妻子称为妈妈。夫妻只在新婚之夜才能第一次看见。丈夫死后与他所有的妻子合

^① 此处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为“注释”。——编者注

葬。处女被分开埋葬在一个与家族墓地隔离的地方。女人没有权利分得家产。男性子孙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聚居在父亲的房子里。双亲去世后，他们分割家产然后各自为家。有时候，父母活着时就用年金的方式进行财产分配。儿孙的妻子可以受婆婆和小姑的管教。未婚的人例外，他们会招致反感，因为人们不接受一个适婚的人不结婚。没有子嗣是一种凄凉。没有子嗣的弟兄们有时会聚在一起，每人选择一名他们所收养的养女，并把她交给他们的侄子，此后他们的侄子就必须先后跟她们住在一起，直到为他们的叔伯生出后代。

女人不随丈夫的姓，结婚的第二天她们回娘家住上几天，在一年的不同时期，她们在娘家一共会待上两三个月。也有离婚的情况，离婚的女人能再婚。

中国人双手抱拳互相打招呼（因为他们的长袖子），同辈之间问好说请请；晚辈要跪着，没有长辈的允许不能自行站起来；在官员面前，人们总是要下跪。

在长辈面前禁止戴眼镜。他们要叩首三至九次。主人陪着客人一直到门口，站在左边稍微偏后一点的位置。首席在大门口对面的左侧。他们的谈话有很多修饰语，比如：贵人，贵姓，等等。人们经常赠送礼物甚至银子。穿着礼服互相拜访。当去到别人家里时，先呈递名片。与上级说话时，中国人不自称其名，一般以小人、小的等第三人称自称。

皇 帝

自从现任皇帝的祖父的第18个年头以来，皇帝们不再只为了去圆明园——他们的凡尔赛而离开北京。这些皇帝不再拜访各个省

份，因此官员们横行霸道。百姓再也无法亲自向皇帝申诉，因为那些应该了解这种抗议的审判官把自己出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

与中国普通老百姓相反，皇帝很早就起床了，这个时候大臣们应该在左右伺候。皇帝任命四名军机大臣，满汉各两人。他们每个人都兼任其他官职：他们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早上是他们议事的时间，每件事都得到几句御批。官员和亲王总是跪在皇帝面前说话。皇帝的子女从某一个年龄开始离开他们母亲的宫殿，在他们的父亲面前，服从与其他臣民相同的仪式。如果拜访时间太长，皇帝允许放一个坐垫让觐见的人可以蹲着。

皇帝一动不动地坐在一种壁龛或者御座上，只对呈交给他的事务写几句御批。年轻的时候他总是跟他的女人、孩子和太监们度过所有的时间。他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为了让皇帝挑选皇后，20或者30个女子慢慢在他面前走过，皇帝指出令他满意的女人的编号。三个贵妃分别站在正前面(或者中间)、左边(或者东边)以及右边(或者西边)。

当一个贵妃或者嫔妃死亡，皇帝可以把一名贵人、常在或者答应等提升到这个等级。在他的帝国里，他是唯一一个有权在她们中间选择嫔妃的人。除了上述所有女子，皇帝还有很多其他女子可以代替那些死去的。每一个女子都有自己的住房、家当以及侍女：她们只有在礼节允许的时间才能看到她们高高在上的丈夫的脸。如果皇帝在本来分配给一名女子的时间内召唤另一名女子，根据皇宫的规矩，后者可以告诉敬事房，敬事房有权对皇帝进行劝谏。

皇帝的日常起居由护送或伺候他的太监打理。皇帝经常跟妃子一起骑上一阵子马。人们猜想这是为逃往满洲作好准备。他所有的女人都满人。皇帝出巡时，所有的铺子连同住宅都要关门，不允许任何人出现在他经过的道路上；皇帝从来不坐马车，都坐轿子。

皇权的继承人在死者的儿子当中选择，父亲传给儿子，或者在皇族内部传递。人们称皇帝为天子或者万岁。

内 阁

皇帝的所有事务都由四个军机大臣——皇帝的顾问或者说国务秘书商议。他们再把事务转交给六个不同的部门或者说内阁处理。

1. 户部。
2. 礼部，主管仪式、寺庙、典礼和婚嫁。
3. 吏部，主管文官升迁。
4. 兵部，主管战事和中国兵法。
5. 工部，主管公共工程，包括船舶建造。
6. 刑部，主管罪行和审判。
7. 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主管外交通商事务。

中 国 官 员

省府官员任期只有3年，期限到了他们就被换任、革职或升职。以此避免他们缔结实力强大的同盟。在我们的年代，官位可以买卖，很少有官员真正获得学位。举人、学士和大夫得到了铜钮却不是官位。

当一名官员被授予某个职位时，皇帝赐予他一套带纽扣的刺绣服装，上面饰有五爪黄龙。这套朝服1年只穿两次，皇帝的寿辰日和新年的第一天。在这件衣服上面，官员们穿着长袍，胸前的刺绣方框内有两种图案。文官的图案为一只鹤朝着太阳飞去，太阳用红丝线绣成的圆圈表示；武官的图案为一条龙或者象征兵权的例如长

枪、盾牌等。

如果这位贵人来自皇室，那么刺绣图案为圆形，此外肩膀上也有，服装颜色为黄色，其他所有地方用深蓝色丝线。这些官员构成了中国的上层阶级，生活完全依靠皇帝给的俸禄。有两类官吏：一类有职权，另一类没有职权。有职权的官吏还可以分为两种：文官和武官。中国官职包括四个类别一共八个等级，每个类别有两个等级。最低的类别是四品，区别特征是饰有铜质帽珠的帽子；低级的铜质帽珠没有纹饰，而高级的铜质帽珠经过精工制作。只有在这个类别中才能看到大夫甚至举人的帽子都经常有铜质帽珠，但却不是官员。三品的帽子上不是铜质帽珠而是白色的帽珠，低级的帽珠晦涩不明，高级的通透明亮。二品的是蓝色帽珠，一品为红色帽珠。

这种分类普遍适用于所有官员。武官圆钮上的玉制或者玻璃长管里还插着一根孔雀羽毛，但是这种区别装饰不仅限于武官，皇帝经常授权文官也插孔雀羽毛，在这种情况下羽毛的数量代表受宠的迹象。

没有职权的官员同样也有受圣宠的象征物，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同胞没有权力，他们的官位只是因为行善、救济以及援军而授予的荣誉头衔。

中国编年史

中国的年代史与 70 年代的版本十分一致。根据 70 年代版本，人们认为从诺亚洪水到耶稣诞生一共经历了 3258 年。中国人一直追溯到皇帝的起源，比较确定的是尧帝，公元前 2367 年在位，从诺亚洪水到尧帝时间过去了 900 多年。当诺亚的后代在洪水前 200 年甚至 300 年的时间到了中国，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在尧帝之前统治

的六位传说中的皇帝。

语 言

文字由 214 个基本字符构成，人们称为部首，还有 500 个字符与前面的字符连用，确定最后的含意(主题)。

带有女字旁的部首研究起来特别有意思，是表达所有情感的基础，尤其是不好的情感。

中国历法采用阴历。1861 年，新年的第一天是 2 月 10 日。

根据标记辨别中国的产品

中国制造的有一定价值的大部分物品，底部都有一个用汉字或者满文写的标志，表明这件物品制造时的皇帝年号。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标志都是四边形的，另外的情况下，尤其是瓷器，人们在明代末期江西景德镇所制瓷器上面只能找到四个汉字，这些物品至少有 200 年的历史。

满文代表着目前的朝代。最著名的盛世时期是 1650 年到 1708 年的康熙朝，以及结束于 1796 年的乾隆统治时期。

医 学

中医主要用草药和鸦片治疗体虚无力和大部分炎症，但是他们也知道某些金属的作用。他们用砒霜治疗发烧，只有奎宁例外，他们对此完全不了解。汞在某些病症中被使用，但是从来不内服；他们认为装在小药瓶里面的红色药丸很有疗效，他们专门用这些药丸

来治疗发烧。在中国，每个人都可以行医，那些漫天卖弄知识并出售自己的药品的江湖郎中自然拥有最多的客户；他们也会算命，这大大增加了他们在中国人眼中的价值。

在我们所经过的城市里，没有任何的公共救济所接济穷人。我们看到了几家私立的慈善机构，如育婴堂，但是政府完全不介入这样的慈善举动，政府鼓励甚至奖赏这样的行为但是不参与。

英军在天津建造了一所 30 个床位的医院，每天可以接待 200 位门诊病人。他们还引进了接种疫苗的方法，这很有可能在中国推广普及，如果中国官员的习俗和无知不构成阻碍的话。但是中国人在天花肆虐的年代就知道接种，他们把天花病人感染的病毒接种到没有感染的人身上。

因为缺少药物，法军医生无法仿效英军，法军在整个战争时期都缺医少药。

鸦片吸食者

通过在没有完全成熟的鸦片植株(罌粟)上切一个口子，鸦片以液体形式被提取。鸦片种子也含有一点鸦片成分，但是分量要少得多，也需要通过压榨或者蒸馏的方法提取。鸦片液体与少量淀粉掺和在一起，使其更加结实并且容易运输，贸易买卖中交付的是一个直径为 0.08 米或者 0.10 米的球状物。中国人买来这些鸦片丸并进行提纯。为吸食者提供的鸦片膏呈现为一种粘稠的黑色软膏，人们把它装在小瓶子里，从瓶子里取出来吸食。

吸食者的头部靠在一种方形的搁脚凳上，细长的圆柱形烟杆在他的旁边，在离同一母线的两端距离相等的地方凿两个小孔(0.12 米或 0.15 米左右)，一根挑针，一个装鸦片的烟斗，以及一盏油

灯。挑针被浸到小瓶子里，挑出一个粘稠的小球并进行水合，然后放在油灯火焰上方，使得所有的液体蒸发，而鸦片膏呈白热状态。因此小球从进入烟杆的其中一个孔吸入，用一种形状很特殊的盖子盖住，吸食者从另一端吸取鸦片蒸汽。这些操作中的每一步，也就是人们统称为鸦片烟管的东西，在公共烟管吸上三、四口就要 20 枚铜钱（两苏）。熟练的吸食者每天要消耗一盎司鸦片，相当于一皮阿斯顿的花费。

鸦片的作用与酒精类的产品的作用十分相似：在一个感觉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人们感到十分兴奋刺激，然后是一种全身虚弱瞌睡。如果加大剂量，这种狂热兴奋会一直上升到妄想的程度，之后的疲惫虚脱也更加强烈，而相比之下之前的状况显得更加有精力。不久，这种习惯性的长期吸食会导致生理机能的衰弱，然后是脊髓的衰退，最后往往就是死亡，或者至少是精神错乱或变得迟钝。

鸦片问题以及 1842 年和 1844 年条约

皇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被派往广东阻止鸦片贸易，他没收港口的鸦片并且颁布了好几项政令。英国驻中国商务代表义律艰难地逃过了一死。战争爆发了，炮轰广州开始了，于 1842 年 8 月 29 日在南京签订了一份条约。中国人割让了香港岛，赔偿 2400 万美元，但还是禁止鸦片的销售，舟山岛被放弃了。人们指定了五个这些野蛮人可以出入的通商口岸。

中国人为了抵消野蛮人的影响拆东墙补西墙，各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刺萼尼先生被派遣出席仪式，因为没有国家贸易，要求传教士享有自由布道的权利，并且把中国境内找到的传教士毫无损失地

带回到边境或者沿海地带。条约于 1844 年在广州缔结。

1850 年，新的皇帝不承认之前的条约。叶名琛被派往广州，进行各种掠夺。最后，1856 年 10 月 8 日，一艘属于一个中国香港人的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被拦截，全体水手被囚禁，英国旗被叶的士兵撕毁。

西马糜上将攻克了几个要塞，但是攻占广州他的军力还太弱。只有在 1858 年 10 月 14 日才有了新的增援，我们在那里才像叶名琛一样成为了主人。法国由里戈准将和葛罗男爵代表；英国由西马糜上将和额尔金勋爵代表。我们奔赴白河，在位于北京河口半路上的天津签订了天津条约。这是对在北京签订的条约的认可，继进攻白河要塞之后引发了 1860 年战争。

交 趾 支 那

19 世纪末期，当前的王朝在法国有条件的帮助下重新登上了御座：1. 放弃岷港半岛及其港口；2. 开放通商口岸，自由贸易；3. 自由传教，信教自由。

嘉隆国王继承人明命拒绝遵守这些条约，1858 年 9 月 1 日，里戈准将攻克岷港并保卫其六个要塞，损失很小，只有 5 个人牺牲。有 11 个要塞保卫的西贡也在我们的力量下沦陷了，可以说是不战而胜，因为只有 3 个人受伤。

财 政 问 题

中国没有货币，铜钱不能称为真正的货币，一枚铜钱约值半生丁。这种钱只能用于小买卖，很难进行大交易。当地人在交易中用

一种银票，上面有在社会流通中积累的很多商人的签名。总是用纯银铸造的银锭很少被使用；银锭在熔炉里定型，先在里面熔化，然后按重量塑型。银锭表面的任何一个标志都不表示成色，其价值根据体积的大小而变化。人们最常见到的是 1 两（8 法郎）、4 两或者 45 两的银锭。

外国人因为习惯或者认识到制造流通纸币的困难，被迫在中国港口建立的商行建立一种有实际价值的货币，用于与本地人或者欧洲人进行的所有交易。墨西哥的皮阿斯特被一致同意采用，这是唯一一种流通的货币。人们用银两来计算，但是用皮阿斯特来支付，银两不是一种货币：人们不知道由什么决定这种货币的选择。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人与墨西哥之间多样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行长期的邻里关系，这两个国家有着类似但没有头像的货币。

皮阿斯特被引进中国之后，变成了一种价格可变的商品，随着食品的供应而波动。每 15 天，其价格都在香港和上海依法设定。在欧洲，一皮阿斯特大约值 5.37 法郎；来到中国，它因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以及运费而必然增值。那些在战争时期财政部拨出的皮阿斯特升值到 6.60 法郎。商人只有在其跌至 6 法郎、5.90 法郎和 5.80 法郎的时候才抛出；在我们到达香港时，这是所允许的最低价格。

众所周知，以前，在中国之战、交趾支那之战和这两场战争之间的间隔时间，香港的价格没有超过 6.10 法郎。商人把货币看作一种商品，显然最好是把钱借给提供最高保障的买主。

在这个方面，法国政府应该最满足条件；能够以最好的条件获得商品的就是最好的债务人。那么，如何解释海军在牙医诊所总是以 6.60 法郎的汇率支付皮阿斯特呢，并且更重要的，我们已经找到一位领事证实可以以现场价格达成交易。

一到香港，军队的发饷人拉法耶先生能够以 6.0 法郎的价格达成交易，而在同一天，我们还是支付 6.60 法郎给牙医。我们怎么能够理解海军的购买轮船的行为：“西贡”号 40 万法郎；“德鲁莱”号 20 万法郎；“阿龙普罗”号 120 万法郎，总共为 180 万法郎，而得到关于这笔交易的公众传言的军队发饷人，认为应该告诉 X 先生，他准备买这些军舰，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 120 万法郎成交。其余的 60 万法郎由牙医诊所提供，大家都知道，正是这个诊所把几天前以 5 万法郎买进的“德鲁莱”号以 20 万法郎的价格售出，真是一笔利润极高的交易。

我们试图接受这种漫不经心和无能为力，来解释所有这些事实。后来，海军以 30 至 40 皮阿斯特的价格从香港运来不是很好的牛肉，而在上海，好得多的牛肉只要 20 皮阿斯特。我们在远征队伍到达前的 2 个月就把钱寄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调查地方资源方面的这种极大的疏忽。鉴于这些事实，我们必须放弃运输香港的牛肉；我们在上海购买牛肉。每公斤牛肉 1.25 法郎。当陆军的经营部门接替海军之后，交易以 0.90 法郎的价格达成。

最后，由中国政府支付的战争赔款，以及从开放给欧洲人的各个港口征收的关税中抽取的款项，已经由海军人员当场收取了，诸如……。比起人们提供的纯银的银两，我们宁可选择一张在香港兑现、根据皮阿斯特和银两之间的相对价值以皮阿斯特支付的支票，但是商人要求这笔交易（1000 皮阿斯特）打一个折扣，我们同意了，当时我们有一艘军舰可以轻松地运输这些要卖到香港的货币，根据其皮阿斯特的重量之比，我们获利极大，皮阿斯特总是含有大约 10% 的某种合金。

这些显然都是令人懊恼的事实，很可能招致人们控诉造成此类交易的这种应受谴责的漫不经心。

加那利群岛

这些岛屿的名字来自单词犬、狗，罗马人这样命名它们，因为那里生活着不计其数的狗。曾经居住在那里的民族叫关契斯族。我们很高兴得到这些居住者——以前的大西洋人、阿拉伯人或腓尼基人的最新断言，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最公正的；首先，根据莫里提供的佛得角各岛屿的最新地形，在一次灾难中，从亚速尔群岛到佛得角，只有一块陆地被淹没。此外，根据我们对这个民族的了解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到高山上向唯一的神祈祷，给新生儿擦圣油，完全解放妇女，用防腐香料保存尸体，这些习惯比起所有其他民族，他们与腓尼基人最接近。他们确实住在洞穴里，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习惯归因于：他们认识到在这块完全被自然原始的庇护覆盖的地方，生活在洞穴里更加方便。此外，这里的人并不是不知道建筑技术，我们发现了好几座石屋，其中有兰萨罗特皇帝的宫殿，他住在一个类似于封建堡垒的地方。

加那利群岛以前叫做“幸福岛”，在我们的纪元将要开始之际，因毛里塔尼亚的朱巴二世而闻名；此后，航海家们和托勒密曾几次到访，将近2世纪时，加那利群岛的七大岛屿之一——耶罗岛，正好穿过地球的子午线。14世纪中期，西班牙占领了加那利群岛，但是直到15世纪末，特内里费岛的归顺，才使她真正成为这些岛屿的主人。

一段时间之后，关契斯人以及他们的历史渐渐消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破坏了一切，她甚至毁坏了大自然的恩惠，砍伐了这些为生活在这里的最后的后代提供庇护的美丽森林。贝当古先生运来的骆驼，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金丝雀几乎全部消失了。

鲨 鱼

这个名字从 requiem(为死者超度的祈祷)派生而来，是为航海者唱的丧歌。然而，捕获这样一个敌人总是一件很大的喜事。1860年1月26日，我们在南回归线捕获的鲨鱼有2.50米长，嘴部长0.20米，呈直径大约0.30米的圆形。第二天的整个白天，我们看着它的两条舟狮鱼^①围着船四处溜达，看得出它们因为与自己凶残的伙伴分开而局促不安。鲨鱼死后两个小时还有心跳。它的心只有一个心室；肝脏里含有丰富的动物油。

季 风

我们把因为陆地环境变热引起的有规律的风叫做季风，比如在沙漠里信风方向的改变。撒哈拉沙漠产生的大西洋季风，从赤道一直延伸到北纬13°；由满洲和西藏戈壁沙漠产生的印度洋季风和中国海季风；由北美洲沙漠和盐湖产生的墨西哥季风和太平洋季风。季风的风向截然相反，这与信风不同，互相之间总是倾斜0.50米左右。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的方向大多是东北向和西南向。要知道在赤道以下的地方没有季风。每次季风持续5个月，然后转换方向持续2个月，在太阳经过的时刻，春分或秋分，也就是说当太阳出现在一个半球或者另一个半球，使得气温变热或变冷的时候。

东北季风在秋冬时节产生，西南季风在春夏季节产生，4月或5月初以及9月季风转向。中国海每年有三次季风，但是可以把第

① 总是跟在鲨鱼旁边，吃鲨鱼吃剩的东西的一种鱼。——译者注

二次季风看作是第一次季风的转变。爪哇海有一点反常，赤道以下只有这片海域有一次季风。

当太阳一照射到北半球时，西北风让位给东南信风。这两股风分别叫做西季风和东季风，与上面所讲的季风方向相反。春分时季风在4月转向，伴随着日夜不停的暴风雨，造成了大量的龙卷风，风不再只是阵风，随后是平静。龙卷风高达150至200米，直径达7米，人们不知道水是被吸来的还是从云层中来的。

我们前面说过，季风只在北半球发生，除了一个特例，人们很容易通过观察得出这一点：地球上的沙漠几乎都在这个半球，自然就有从北部来的被加热的信风，上升到大气层，被从南部来的信风替代，这些南信风没有遇到赤道一样的障碍，穿过平流层或者至少改变了之前的位置。

这些信风变得越来越湿，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在西南季风时期看到的雨季。在非洲，这个状况给它赢得了季风(时节)的名字。事实上，一年主要分为两个时期：雨季和旱季，季风现象也能很好地解释海风的周期性。

因此，当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加热了陆地，使得陆地的温度很快就超过了海洋温度；白天的海风，太阳落下几个小时后开始。更晚一点，当太阳西斜时，陆地一点一点冷却，温度甚至变得比海洋温度还要低；因此有了海平面上的空气，上升到大气层，并扩展到大陆上空，替代了晚上的海风。

墨西哥湾暖流

大海海平面上和海底下都有海流纵横交叉，但是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墨西哥湾暖流。墨西哥湾暖流从加勒比海一直流向墨西哥

湾，环绕整个海湾，经佛罗里达海峡流出，最终流入大西洋，根据地球的运动方向向东北方向流动，在英国海岸线和比斯开湾消失。墨西哥湾暖流呈深靛蓝色，宽度不一但是界限分明，深度尚不可知，水位高，从墨西哥湾到爱尔兰海岸温度则逐渐降低。在 1000 海里的海面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尽管在其流动的路线中碰到逆向的水流和风。在佛罗里达和古巴之间经过的最大流动速度达 5 节。

墨西哥湾暖流的原因至今不明；人们认为它源自密西西比河，信风使得墨西哥湾水位抬高，就像斜坡上从高处流向低处的河流。但是，另有一些有说服力的经验表明，墨西哥湾暖流流量相当于 3000 条密西西比河，海湾沿岸的海平面不比大西洋的海平面高，最后墨西哥湾暖流流动了 1000 法里也没有与其经过的大西洋海水混淆，没有改变其性质，这些特点使得人们相信前述理论缺乏根据。

在对其来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人们认为有一个根本原因，一种生热或者发电的现象。她的颜色证明，就像其他经验确认的一样，她的含盐度比附近的水壁要高，这种水壁以某种方式成为了她在大西洋中的海床。事实上人们知道，在大海无边的绿色中，海水越蓝，含盐度越高。制盐人很了解海水的这种物理性质，而且也懂得淡红色的出现就是结晶的开始。就是这个现象使得阿拉伯海湾有红海的名字。

墨西哥湾暖流流动时从来不与周围的海水混合：它有两条非常明确的界线，使得它看起来像一条真正的热水河，在液体介质中流动，温度较低。它水位较高，这可以通过被遗弃的小船的漂流看出来；这些船从来不能通过暖流并且总是在碰到暖流边界的时候被抛回来。这股暖流的深度还不清楚，人们假设大概等于 200 呎（336

米)，最高温度为 30°C ，经过 200 法里的路程后温度几乎不会降低 1.5°C 以上。

因为墨西哥湾暖流才形成了纽芬兰浅滩，由冰层带来的极地岩屑堆积而成，这些冰层在这里融化。这使得冬季在这片海域的航行变得可能了，并使得英国披上了这件华丽的绿衣，得到了绿海的名字。

海 湾 流

除了墨西哥湾暖流，还有海平面上和海底下其它的水流，对此应该毫无疑问。他们在海中流过就像在空气中一样。海面上的水流可以通过某些物体在一定的方向有规律的运动观察到，例如瓶子。人们还可以通过海洋某些区域温度的升降确认这一点。人们得出跟空气一样的结论，即存在从赤道到极地的暖流，还有从极地到赤道的寒流，寒流可以通过极地的冰层向热带区域运动来证明。

海平面以下的水流可以直接通过系在救生圈上并浸没到不同深度的水中的浮标来验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看到救生圈运动的方向与海平面上水流的方向以及风向相反。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归纳得出这些水流的存在。事实上，热带地区是蒸发最厉害的地方，因此也是含盐量最高的地方。如果海平面下的水流不存在，人们会看到海盐的沉淀，一点点地形成岛屿，汇集起来并且封闭这些区域的通道；那么最后就无法解释海水中含盐量几乎一致了。

生产热带植物如葡萄等的马尾藻海就是地表运动的中心。那里的水很平静，就像在一大片不断被人们旋转的液体中间。海洋的最深处在大西洋北部，有 7620 米深。海洋的平均深度为 3500 米。对这些深度的探测是在布鲁克的松扣测深器的帮助下完成的。

沉 思

最坚定的决心，最不能动摇的意愿，也开始减退并后悔。最信誓旦旦的许诺总是令人怀疑，模糊了幸福的视线。自从我们离开法国边界之后，我不止一次感觉到这种怀疑的悲伤；在未来，我的勇气在变弱，在这种孤独的神秘中必须全副精力召唤我的毅力以阻止我的惶恐。

那么，是什么让人没有意识到这场内心的战斗，在离祖国4000法里的地方，远离慈父般的屋顶，童年的温情，以及所有保护这种温情的存在并且我们可能要永远与之说再见的所有情感！意愿可能会扼杀心灵的呼喊，但是大自然却几乎没有对滥用法律的政令提出抗议。然而现在我在去中国的路上。理智使我奔赴异国他乡。她告诉我，人生来没有一种声誉可以保护他的摇篮并且此后使其更容易地攀登费力的社会阶梯，她告诉我，一个有足够力量在社会中要求并占有一席之地的人，应该能够顶住苦楚并且作出牺牲。我不需要在这种垄断宠信的任人唯亲的偏袒中寻求残酷，我忍受着这一规则。

头几次的考验很不顺利，在海上，我将会继续因为自己的出身低微而吃苦，虽然世代好名声。但是，我在背井离乡或者说是旅途中，寻找的既不是心灵的遗忘也不是心灵的干涸。在演出中这真的可能发生，这样的演出每天都更新我的感受，给我的沉思带来新的营养。狄德罗非常精确地说到：“大地是一个祭坛，由人类供奉，由天堂照亮。”但是，这里的神甫不会独自一人祈祷。在这无边的浩瀚之中，提醒人类的虚弱和无能，处于可怕的无知之中，灵魂逐渐地害怕处于这样恐怖的神秘之中，不敢测探大海，或不敢注视天

穹，她被孤立弄糊涂了，回想起往事，从过去的那些感人的情感中寻找与其本性更相关的印象。因此心成了航海静思生活中的一个庇护所。我们以为永远死去的这颗心，已经被痛苦的裹尸布掩埋了，突然又出现在这些废墟之上。我们不由自主地，它抵抗所有的考验，统治我们徘徊于废墟之上的幻觉中的所有经验，好像在宣告它神的血统，宣告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无法达到的神的纯洁而热烈的感情。

昨天，在这个同样的地方，我一个人，没有任何嘈杂声打断我的沉思，船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包括值夜班的水手，在向我们致敬的高高的主桅杆上睡着了。我凝望着几乎快要停止移动的牧羊星座，想到了爱情，而不是白天的狂欢或者希腊人称为性爱、拉丁人称为丘比特的冲动，想到了这种主宰所有人命运的情感、人与人之间无限和谐的因与果。是爱使得孩子因为母亲最初的亲吻而微笑。此后它引发了国民对国家的崇高忠诚，从被爱者的朋友身上，我们发现了它——不了解本身并在慈善的名义下波及全人类的爱情。它以生命的名义，使分离变得不残忍。它摇晃着襁褓中的我们，带着在更美好的世界重逢的温柔希望，用裹尸布把我们包裹起来。然而，这种感情是如此的千变万化，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

虽然处于同样的自然规律之下，各种族、各民族甚至各个个人因为气候、教育和处境呈现出多么大的反差。但是，既然人们给爱下了这么好的定义，那么这种微笑和神的眼泪在哪里呢？在西班牙？那里的一切都很戏剧，人们只知道荣誉、嘲笑和创伤。在德国？在日耳曼人无休止的哀歌中。或者在英国？这个对微笑和哭泣知之甚少的国家，几乎不了解音乐。法国才是这种情感真正的故乡，因为这里所有的感受都是变化的，因为我们懂得所有真正表达爱情的句子，从幸福到痛苦。

人们指责法国人多变，就是这一点带给了法国人最崇高的荣誉头衔，这是对细腻之处的深刻感受。如果说这种多变性有危险，那就是她要避免僵化。让法国民族成为真正的开化者的是：她在前进的道路上像蜜蜂一样在花丛中采蜜，形成了各个民族奉为模范的好品味。这个同样的城市因为亚西比德的心血来潮而变得骚动不安，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外，把古雅典的品味作为遗产留给后人。

牧羊星座刚刚从视野中消失，想象力苏醒了，我给那些畜生他们所要求的休息。

僧格林沁奏稿

(1860年8月26日)阴历7月的第10天

奴才僧格林沁跪奏，夷人复更条款，毅然试使其未可之和平政治得以承认。奴才以亲王之名，恳求皇上继而狩猎，以便进剿事。

近日，因北岸两药库几近一时被燃，以致臣扼守之大沽炮台失守，然非兵力不厚或御敌不力。

臣恐今实难使该夷从，且其所开各条更甚于前：然臣业已布置一切，严防天津至通州要隘。若通州临战，则京城士气或可大振。然胜败全决于时势。如若战败，则累累人民将离京，且此种恐惧欲延至军中。皇上圣恩，奴才感愧无地，却无以仰慰圣怀。

审度时势，奴才终觉今惟有请众王公大臣并骁勇善战者齐卫京师乃上上之策，如此皇上之出行或可顺利，且途中定受应得之礼。奴才俯祈皇上效仿先帝，木兰秋狩；暂离京畿，留众王公大臣与所

剩兵力汇合并歼灭该夷。

倘车驾在京，不但势难兼顾，尤恐震惊圣驾。

奴才以众王公大臣之名谨奏请旨。如此奴才等可权宜择机，毋庸受任何疑虑之牵制。

奴才具已密陈，谨祈圣鉴。奴才实无可能以平常之法奏明，故委以桂良恭呈皇上。

今大清国皇帝、大法国大皇帝切愿将两国不协之处调和，以复旧好，是以各特派全权钦差大臣商定订立条款如下：

法国驻中国特使

副本

北 京 条 约

一八六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北京。

今大法国大皇帝，让·巴蒂斯特·路易先生，帝国议员、法国特命全权钦差大臣、皇家“荣誉勋位”一级勋章获得者、多个一级十字骑士勋章获得者葛罗男爵；大清国皇帝，皇室成员、特命全权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奕訢，彼此既将所奉便宜行事之上谕及钦奉全权之诏敕公同较阅查核，俱属妥当后，即将所立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

大法国钦差大臣于己未年五月进京换约，行至大沽，该处武弁拦阻前进，大清国大皇帝甚为悔惜。

第二款

大法国钦差大臣进京换约时，或于途次，或在京师，大清官员

俱以相宜钦差之优礼接待，俾得任便称其职守。

第三款

从换和条约之日起，咸丰八年在天津所定之和约暨遗补之款，除现在所改之款外，即日均应一一施行。

第四款

己未年在天津所定遗补第四款内载，中国赔补军需银二百万两，兹以删去；今复议定，赔补银共捌百万两。在此数内，已收到去岁粤海关缴银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两零。其余银两，宜在中国各海关每年收税银若干，按五分之一扣归。其交银之时，系三个月交一次，首次宜于咸丰拾年八月十七日起而于十一月二十日止。但所交之银，或纹银，或洋银俱可，其银应交大法国驻扎中国之钦差大臣，或所派之员亦可，但限定于十月十八日在津郡一盘现交银伍拾万两。将来大法国驻扎中国钦差大臣暨中国大臣各派委员，会议定立如何交收银两，如何立定收单等事，再为妥定。

第五款

中国今所赔补之银本系为军需，又为法国商人及其所保护者在广东省城所有行内物件被百姓或烧、或劫。将来大法国将此赔补之银，均公允分摊与被累之法国人；其银扣一百万两，派与法国民人及其所保护者，为补其害，或慰其苦，其余皆抵军费。

第六款

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第七款

从两国大臣画押盖印之日起，直隶省之天津府克日通商，与别口无异，再此续约均应自画押之日为始，立即施行，毋庸俟奉两国御笔批准，犹如各字样列载天津和约内，一律遵守如此。大法国水、陆二军，俟在天津收银全五十万两。方能退出天津，屯占大沽、烟台二口，待至中国将所赔之银全数交清后，所有法国武弁占据中国各地方均应退出境界。然任水，陆各大将军于天津扎兵过冬，而俟所定赔补之现银给清后，则撤大军退出津郡。

第八款

戊午年所定原约互换之日，所有法国屯于舟山之军立当出境，续约条所定应缴银五十万两缴清之日，除统兵官暂驻天津过冬谅不便即行撤兵外，应如第七款内所言，即驻津各军亦应离城，退至大沽炮台、登州、北海、广东省城等各处驻扎，俟续约所定赔补款八百万两全数缴清，以上各驻军再当悉数撤回。

第九款

亦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家眷，一并赴通商各口，下法国船只，毫凭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法钦差大臣查照各口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

第十款

戊午年所定之和约第二十二款内有错载之字样，即系凡船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钞银五钱，现在议定，凡船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钞银四钱，不及一百五十吨者，每吨纳银一钱，嗣后大法国船只进口，俱按现在议定之数输纳。

右续约于京师妥定，华、法两国钦差全权大臣各画押盖印，于降生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



第3部分 信件

1869^①年 11 月 29 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到了土伦，一路顺利，只是稍微有点延迟，因为炮兵连和我们在同一天到达土伦，在每一个车站都引起了堵塞。我们启程的日子还没有完全确定，依照海军的习惯，他承诺的总是比兑现得多。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在 2 日上船以便能在 4 日装帆。我们在船上的安置并没有更加便利。“汝拉山”号上共有 40 名军官，我们悬空在两块甲板中间，并且在这些床铺上休息，一种刻板的吊床。幸运的是，一路上我们的同伴只有炮兵连和工兵连的军官，他们使得这次横渡变得十分愉快。似乎我们不会在里约热内卢靠岸并且将笔直向好望角驶去。我在土伦碰到了几名同学，大家都士气高涨并且很高兴参与这项活动，除了提供提前的物质利益外，这次活动还提供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太

① 应为 1859 年，原文误。——译者注

可能的特殊利益。我们满怀信心地启程，如果每一个人都不会把为我们的远离而痛苦的父母抛在后面，我们会很高兴，这是远征的唯一坏处：可能还有真实的军事危险。至于疾病，我以前的健康和卫生习惯保证了我的未来。希望你们放心，如果可能的话，耐心地等待归程。我尽可能经常给你们写信，但是如果没有从邮船上拿到信件时请不要焦虑不安。尽管我想给你们写信，还是会有意外情况阻止我们很有规律地通信。我到土伦再给你们写信，在我启程的日子或者前一天。我请求你们把留局自取的最新信件寄给我。再见，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上帝用你们的温情照料着我，我能够在用很多痛苦的经历换来的休息和安静中向你们表达我所有的情感。

从心底里爱你们。

你们忠诚的儿子

12月3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在12月1日上船，但是我们启程的日子还没有确定，可能是明天或者五六天之后。我们猜测可能大臣希望在锚地的所有船只同时动身。此时有9艘船，每艘有800至900人，但是船上布置令人很不满意。蒙托邦将军在巡视了参与这次远征的船只后，写信给大臣，陈述了军官们的正当要求。我们等待着命令，要担心的是：根据观察，海军十分疲累，为了确保他的状况我们没有马上前进。我询问了圣·安东尼的一位幸存的伙伴，他住在我的旁边，并且条件好很多，因为他给了全体水手好处。我在好望角等待你们的来信，直到1月10日你们都可以把写给我的信寄到这里。如果，意外地，我们有了另外一个停泊处，我会告诉你们。此外，你们可

以确信你们所感兴趣的所有事情的准确性，但是不要把信件中的任何信息透露给报社；我的名字也不要出现在公众中。再见，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衷心地爱着你们。我出发了，在完成了本世纪最有趣的一次远征之后，我将带着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不久就能再见到你们的信念与你们重逢。

12月5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似乎定于明天出发。因此这是你们从土伦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我们的第一个停泊点在好望角，在到达之前给你们写信是不太可能的了。然而，如果我们在路上碰到能够带上几句话的回法国的船只，请不要怀疑我抓住这次机会向你们诉说我们的遭遇的迫切心情。多亏我们反复的请求，最终我们的住处获得了一定的改善，我们没有带着太多的失望出发。大概2个月后我们就会到好望角，我希望在那里收到你们在12月31日前写的来信。在向下一个停泊点出发后，我会从好望角告知给我寄东西的地址，下一个停泊点还不能确定，甚至可能在我们到达上海之前都不能确定。再见，亲爱的爸爸妈妈，试着忍受这最后的分离，不要太痛苦。想着我的回归以及我们重逢后体验到的幸福，在比目前和未来都要更好的条件下。想着这次远征并不比远离严重，并且我已经挺过了很危险的情况，没有发生不幸。上帝还在保护我，我对此抱有希望，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十分由衷地感谢我所有真正的朋友以及他们给我带来的好处，告诉他们对我来说他们的记忆永远都是珍贵的，并且我在远方就像在他们身边一样，我对他们持有同样的情感。所以，再见了，请接受我最亲切的拥抱并且

相信我给你们带来的这次痛苦对我的将来是必要的，你们将会拥有我的未来的最好部分。

12月15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看得到直布罗陀海峡了，能够通过看守摩洛哥海岸的舰队船只告诉你们横渡中的一些细节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们在8日早上7点——一个舒适的时间离开土伦，很顺风并且心中充满了希望。在海上航行了3法里之后，指挥官关掉了船只的动力，展开所有的帆向巴利阿里群岛东面驶去。白天是最顺利的，我们最终结束了令我们很不耐烦的海军的一切拖沓行为。我们对其他方面都是更加满意。我们在船上的住宿在我们的要求之后有所改善，皇帝派了他的一名助手告知我们在到达中国之前我们有三个停泊点：第一个是特内里费，我们将在8天后到达那里，第二个好望角，第三个是新加坡。这次旅程被分成了好几部分，这样的安排稍微打破了5个月单调的海上生活。离开法国的时候，我们漂泊的目光凝视着海岸，好像要让他们作为我们最后的思念和心跳的见证。我们想要尽可能延迟这次刚刚开始长久分离。但是在情感的忧伤的思考中，好像为了驱散心中的悲伤，太阳明媚，大海温柔地抚摸着船边，似乎促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幸福的征兆直到这一天都没有停止。我们只遗憾风平浪静的时刻，这将会推迟我们的行进。在我们的时代，地中海往往给航海带来重重困难，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十分温顺了，我们只能指责他温和的性格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丝毫不适，并且从一开始我就可以安排横渡中的消遣。

从晚上10点到早上7点，我在宿舍的一个角落休息，8米长、

2米高、2米宽的一个空间。我们一共有16个人住在这个空间，在两个相连的床架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大橱里自由地安置了一个2米长、0.65米宽、0.60米高的抽屉。这个小间首先容纳了幸好完全伸直也只有1.67米的我的身体，其次是一个手提箱，一个旅行袋，和其他一些用途各异的几件小物品。其中一件物品使我下定决心以自己的资历在第一层占据一个位子，如有必要，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由于我年轻时从事过体操训练，进入这个小间就变得很简单了。我抓住一根横梁上的两个吊钩，手腕支撑着抬起身体，腰部用力挺起，到达枕头的高度，用力抬腿至水平位置，这样马上就可以将身体部位调整到舒适的位置。要想轻松地到达铺位，只要做这样一系列鲤鱼打挺的动作就可以了。一旦就位，就最好少动。如果摇摇头部，就会撞到手提箱，它与我分享了分配给我的0.60米；如果我的双脚活动幅度过大，就会严重影响到下铺的睡眠。前天早上5点，我听到从下铺传来一声恐怖的惊叫。这叫声混杂了恐怖和顺从。下铺有一个人睡得很不踏实，刚刚在下铺洗了坐浴，但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放在抽屉脚的白铁器皿。

再见。

特内里费在望，12月21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能给你们寄一封关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信，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虽然大海，尤其是风向的情况都不适合在特内里费下锚，我们认为今天会幸福得多。你们会收到两封信，一封关于直布罗陀海峡，从中你们可以得知我们在地中海的航行情况，从另一封可以了解我们横渡部分大西洋的情况。

穿越直布罗陀海峡途中，天气晴好，我们很好地领略了西班牙和非洲海岸的景致，穿越之后我们于16日和17日在大洋全速航行。我们的航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说，风向对我们很有利，我们计算了离开第一个停泊点后的时间，已经作出了向岛屿前进的宏伟计划。奖章是如此的精美，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到相反的情况。但是应该有一枚，就像世上所有事物一样。17日晚上，风向急变，风变得如此猛烈，我们必须停止前进。18日的整个白天，我们沿着与赤道平行的方向朝马德拉驶去，而不是向南方航行。19日有了一个新变化，风变得比较顺了，但是接近中午时大海咆哮了，海浪冲到船上，并且好几次阻止了船的前进，在甲板上碎成浪花。这一切都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一刻都没有延迟地包围了我们，并且将持续24小时。

为了忠于享受我们在去中国的途中必然会产生所有情绪的计划，我想成为这个侏儒人与自然力之间战争的见证。大雨倾泻，大风使得所有绳索颤动，大海似乎急于掀翻我们暴露于它的狂怒之中的脆弱障碍物，一切好像是一个大杂烩。我们在甲板上从各个方向拉起了绳索，为了使水手能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并且避免被抛到海里。每摇晃一次，船的倾斜度就更大，使得在甲板上的一切移动都不可能了。你所看到的景象有点戏剧化，不太真实。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受好奇心的驱使，我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桅杆脚的一根铁杆上，并且我的带风帽的军大衣确保我不会感冒。这样安置好后，我可以在暴风雨期间观赏这个壮丽而又骇人的场景。

大自然在她的丑恶和美丽中都是伟大的，她通过解释掌控我们命运的上帝的存在支配着人类脆弱的感情。然而，除了对这种相对脆弱的确信，肯定还有一种骄傲的情感，揭示了人类的起源！有了一只手表，一个六分仪和一张卡，航海者现在就能够环游世界，就

跟在陆地上观光的旅游者一样安全。他认得出暗礁，了解水流的速度，并且懂得通过各种方法的结合使得原本会令他毁灭的事物变得顺利。我们的船在这次考验中名副其实，我们没有遭受任何海损。不幸的是，我们必须为那些使全体水手印象深刻的损失感到遗憾，我们丢了3头牛、几只鸭和几只羊；唯有我们动物园的逆来顺受的动物们在这场可怕的狂风中避开了，但是我发现它们的勇气并不能抵抗这种强烈的摇晃，它们令人心碎的尖叫声证明它们并不冷血。

当有人来告知我不可能在特内里费停泊的时候，我正在写信，特内里费只有一个外海锚地，锚地的情况因为东风变得十分糟糕。又一次失望。我害怕在一个半月内停靠好望角之前不能告知你们有关我的消息。再见。

在大海上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一直护送我到了特内里费，不用担心我的健康。我已经从这个岛上给你们写了两封信说明我是怎么成功地克服横渡过程中的所有劳累的。今天，我们是完全的水手，大海似乎一直是我们的成员。因此不要为我担任何心。如果你们能作为我们卑微的存在的见证，通过挖掘内心，你们会经常发现这不可避免的对远离的伤感，但是你们会对动物的旷达和逆来顺受感到惊奇，满足于四季豆和以各种方式伪装的猪肉。现在请对我的健康放心，允许我在特内里费向你们致敬。

12月24日早上，我们已经靠近陆地但是不敢上岸。靠近那些隐藏在厚厚的雾气中的海岸可能会有危险。我们正要放弃最后的希望时，一线阳光驱散了他的担心。云在空中一点点地升高，像戏剧表

演中升起的帷幕一样，千万条波纹，就像水面形成的深深的棱形，凿出了错综复杂的沟壑和山谷。在外海锚地的底部，吹着东风和北风，我们一眼瞥见岛屿的首都圣克鲁斯的侧影，投在锥形的火山山脉上，日落之下山脉的光环与海拔高达 3600 米的特内里费峰的山脚连在一起。微风很快地把我们带到了锚点，3 点钟，一个在炮声中被召来的领航员，让我们把锚抛在两艘法国运输船的旁边，离城市大概 1 海里。尽管我们很焦急，我们在登陆之前必须等待当地一名医生和一名政府官员的卫生检查。我们 1 点钟进城，之前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开始有了很多乞丐和游唱者，他们走街串巷，不为别的，只为用鼻音浓重而又单调的嗓音把人们从午睡中叫醒。在屋顶观景楼的百叶窗后面，人们看到扇子在摆动，似乎在驱赶梦想的最后一缕气息，又像在回忆现实。这些亲爱的女士们，像胭脂花，只喜欢星星的明亮。爱人来到窗下，一遍遍重复着同样的忠诚誓言。他靠近时，美丽的罗西娜伸出神秘之手，轻轻地打开百叶窗上隐蔽的气窗。

我们登陆的那天是圣诞前夜，马路更加繁忙了，更多的曼陀林，更加欢快的歌声。

我一千次全心全意地拥抱你们，并在此请求你们丝毫不要为我的健康担心，在沿着美洲^①海岸航行了 2700 法里的路程后，我的健康状况还是很好。

再见。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意外，糟糕的天气阻止我们在特内里费停靠，我们能够拜访加那利群岛首都圣克鲁斯的新希望都在这次停泊

① 应为非洲海岸，疑为作者误写。——译者注

上。如果我不能下船，我会尽可能把我的信件通过要登陆的运输食物的船只寄给你们。正如 21 日我跟你们所说的，一场猛烈的东风使得我们不可能下锚，我们不得不进入特内里费帕尔马之间的海峡，然而，我们刚登上这条新的道路，这场将我们困在这片海域 48 小时的风转向了南方，随后就平静了。在这次意外的耽搁之后，我们今天作了一个新的尝试；这次会更顺利吗？上帝也希望，但是风向如此变化不定，我们一点都不能确定。我们刚刚来到甲板上，看特内里费峰顶，长久以来它都被认为是欧洲的最高点。但是根据那些毁灭所有诗意的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五六座比特内里费更高的山。我没有荣幸参观这些高高的山峰，我只是远远地看过勃朗峰、布格拉夫峰以及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山峰。它的确是一个漂亮的老人，但是它没有特内里费的优雅轮廓：独自在岛屿上矗立着，几乎同一的高度，海拔几百米，毫无对手地突出在一片广阔的范围内，从 40 法里的高度俯瞰大海。我一点都不晕船，这使得我能够一直想着我在法国的朋友，告诉他们不要忘记我。再见。

巽他海峡，1850^①年 4 月 12 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在好望角给你们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可以让你们更加放心我的健康状况，并告诉你们我没有收到任何一封我希望在那里收到的信件。我们快 5 个月没有收到法国来的信件了，5 个月的不确定。我们所处的状况是几个世纪以来的道德忍耐。我们徒劳地尽一切努力克服怀疑引起的恐惧，我们的幻想总是在晚上破灭，只能安心地

^① 应为 1860 年，原文误。——译者注

浏览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人寄来的信件。我想我们会在香港寄出所有的信件，但是还有3个星期残酷的等待。

我经常听说分离对情感造成的不利影响；我可能是由一团特殊的泥土捏成的，在我看来真相正好相反。距离使得祖国的风景更加明媚、更加适合居住。离法国越远，我在记忆中找到更多。这种自然的情感慢慢增加，友谊变得更加珍贵了。可能是一种类似的感觉把水手们送进了婚姻的殿堂。他们在这个世界寻找一个人，使得思维能够顺从地停留。

他们懂得，如果没有绝对孤独的时刻，他们的存在是空虚的，这种孤独有其严肃性，但是也有不便之处。他们为了在远处爱他们的妻子而结婚，这可能是爱她们的最好的方式。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方法有其弊端和危险。综合考虑，我还是更喜欢在陆地上尚在使用的更淳朴的方式。我想你们已经从我的上一封信中知道了我对特内里费的详细感受。我将带领你们一起穿越没什么兴趣的大西洋，并且毫无征兆地进入开普敦。

2月19日我们会停靠，想着能够在第二天登陆，但是大海变得如此汹涌，海岸边的风如此猛烈，我们只好放弃这块陆地，向南驶去。两天的时间里，“汝拉山”号成了海浪的玩物，像极了钢琴上那些用来标记节拍的节拍器。最后，经过48小时像颠倒的钟摆一样的颠簸，船只终于恢复了平衡，2月22日的早上就看到了桌山的轮廓，山脚就是开普敦市。

因为山脉特有的形状，景致有一种特殊的容貌；在海拔1200米的高处，有绵延几法里的页岩平原，布满红色的粉末，紧紧地裹着氧化铁。因为自然的奇特变化，通过一块斜坡与大海相连并绵延大约1公里海岸线的地貌突然之间直立起来，尾部是一块很平坦的平面，叫做开普桌。左右两边都呈半圆形，各有一堵火山扶壁：狮

山，因其岩石的形状而得名；还有魔鬼山，朝着西风的方向，有时候风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这里的逗留让人难以忍受。

就是在这半圆的漏斗形洼地中坐落着城市和桌湾，南风 and 西南风吹来，这是一处危险的庇护所。在离桌湾两小时的东南方向，有一处更安全的锚地：西蒙斯海湾；但是英国政府把它征用为专有的海军基地。就是在那里，在舰队大炮和防卫者海湾入口的炮台的保护之下，人们在海军上将的住所旁边汇集殖民防御的军需品。进入锚地，我们得知构成远征舰队的所有船只都已经比我们先到，除了“伊泽尔”号与我们同时到达。人们很不理解，被认为速度很快的“汝拉山”号姗姗来迟，几天以来人们传言我们的船只遭受了巨大的海损，或者遭遇了一场使得我们不得不在非洲停留的传染病。还有另一个失望在等待着我们：送往英国的邮船前一天晚上已经离开，我们的信件要在邮局等上1个月！愁上添愁，我们没有一个人收到从法国来的信。就是在这种完全不利的感受下，我们靠岸停留一个星期。码头的地板十分糟糕，铺在桩基上，并向海水中伸出了数百米。破烂的状况给殖民地贸易带来了一种十分凄凉的感觉。

我们下船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找一家旅馆。我们已经忍耐了一个半月乏味的饮食，一盘四季豆干，一盘或多或少腌过的猪肉，跟几罐少见的绍菜拌在一起。我们迫切地、马上开始吃一盘符合我们饮食习惯的、温热的菜。

开普敦有四家大的旅馆，以及几家特别的商店接受外国人。我们选择了说法语的商贸旅馆。老板舒茨说法语，并且非常热情好客。在成为旅馆老板之前，他是一名药剂师；这个职业在开普敦似乎不怎么赚钱，这里的人只知道三种疾病：眼炎，白喉，以及有时会蔓延的天花，因为马来人不愿意接种疫苗。药剂师（化验师和配药师）同时也是食品杂货商、香料商和药品杂货商，星期天还是烟

草商，因为在假日只有他的店铺可以开放。有一天舒茨先生认识到，在这么健康的气候下想要医治人们的疾病是种欺骗，他离开药房成为了一名服务员。他的这些预料似乎非常成功，并且我们也必须承认，因为运气，他的烹饪没有受到旧业的太多影响。

再见。

香港，5月5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星星显然总是保持着良好的形状。从巽他海峡出发的航行开始了，我们就好像在穿过一个湖泊。我想要一根仙女的魔法棒，让你们亲眼看看与大海相邻的赤道地区呈现的壮观场景。从巽他海峡到新加坡，我们在两排岛屿中间航行，产品的富饶难以描述。几个零落的小岛，叫做“两姐妹岛”和“三兄弟岛”，看起来像常绿的公园盆地里鲜艳的草木篮。大海几乎总是平静的，除了季风转变的时候，微风只令水面起了细细的涟漪。我们知道海盗对于航行者来说是多么危险，停留在这错综复杂的曲径的平静中，许多小湾为无数马来人的独木舟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在收到海盗头目给出的信号后留下自己的战利品。航海者还有一个新的障碍要克服，水深很浅的海洋、沙洲到处都是，为夜间下锚增加了危险。今天，荷兰人与海盗之间的激烈战争，尤其在海军采用蒸汽以后，大大减少了这些海盗带来的担忧，海盗不仅攻击印度人，也攻击一些中国的帆船。但是尽管海盗行为不再造成危险，总是有必要带着探测器前进以避免沙洲，这些沙洲移动后经常露出水平面。

无法抵挡廖内海峡全景的诱惑。不计其数的岛屿交错缠结，在每一个方向都能看到这个在海中勾勒出的英国花园无边的青翠，像

湖泊一样平静。在我看来，人们从来不会厌倦欣赏大自然，大自然的美总是朝气蓬勃的。——但是在这里，还是应该把赞美归功于人类。新加坡是最近在一块地上建造起来的一座岛屿，人们从这里的原始森林的主人——老虎手中夺取的。贸易在这块无人居住的、可以与巴达维亚相媲美的地方发展起来。

这个奇迹应该归功于 1815 年条约之前英国政府在巴达维亚的最后一位官员斯坦福·莱佛士先生。他痛苦地看到返回到他的领地的荷兰人在中国海域上拥有最高统治权。他知道巴达维亚的重要性，想要停止它的发展，为它创造一个竞争者，安置那些毫不关心金钱的英国人，面对荷兰人领域，他们更加道德，但是也是因为这点更加沉稳。他需要扩展人口，准备一切。斯坦福先生受印度公司的支持，主管这个任务。他废黜了国王，付给他的王国大量的金钱。在 30 或 40 年时间里，他创造了一个 20 万人口的城市，把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些最不相容的民族结合在一起；控制繁忙的贸易有 400 名印度兵就足够了，这是三四百欧洲人唯一的保障，这些欧洲人被这个地方吸引，来这里寻找财富。

禁止贩卖黑奴，但是有自愿来新加坡的中国人，他们被卖给一个支付路费的人。当他们的薪水累计到可以支付路费时，他们就自由了；他们是新加坡的未来。对财富的期望打消了回程的想法，他们留了下来，因此这个殖民地繁荣昌盛了。今天，新加坡是一个巨大的货栈，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商人在这里聚集交换产品。

最后我在香港收到了法国的来信。读着这些替你们传达关切的信件，在 5 个月的等待之后向你们表达我感受到的这种喜悦是无用的。

跟我的叔叔说，我们看到了落日，她用最灵巧的手法展现出无法想象的生动。当绚丽到极致后，就变得安详了，赤道就是这样的

例子。

我们还要在这里停留几天，因为修理螺旋桨的紧急任务。重新集合的时间还没有确定，可能会在上海附近集合。英军在舟山集合，他们已经在那里登船了。

再见，亲爱的爸爸妈妈，全心全意地拥抱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我对我的命运充满信心，我的主张和希望都不过分，缺席者总是有错的，很可能这是对的。

上海，1860年5月8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根据特殊的安排，“汝拉山”号仍旧在吴淞港停泊下锚，我刚刚收到命令，要我登上明天出发的“涅夫勒”号前往芝罘：要翻译一个中文词的时候，拼写法派不上用场，因为当地人的语言用符号而不是用代表发声的字母代表想法，我们只能依靠词语的发音。

我们到达上海后，7年来占据南京的叛乱分子在整个省展开活动，并声称威胁中国官员和上海城。这个消息，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谣传的，都给一般的移民带来了不幸的结果；河上都是搬运的帆船。这些叛乱分子在中国人当中引起了恐怖，招致了普遍却又足够正当的惊惶。业主们没有任何居住的地方，男人们也没有，更不用说妇女了。当他们成为帝国最富饶的南京省部分地方的主人时，他们砍了无以计数的头颅，但是在中国，这丝毫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人口快速增长，空地马上被填满了。叛乱分子真正最可悲的习惯是在毫不告知的情况下毁坏珍贵的瓷厂和丝织厂。

上海的欧洲贸易因为这些掠夺者的到来变得动荡，试图把他们的恐慌告诉蒙托邦将军。500名海军步兵已经下船来保护这个有着

10万人口的城市，并且必要时击退可能会出现的四五万叛乱分子。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法国民族，勇敢的民族……必须坚定有把握，不把这个行动当作一个笑话。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在广州的概况。我们保卫皇家、与叛乱分子斗争，在上海，应道台的要求，我们有500人下船保卫财产、宗教和中国家庭不受政府内部敌人的破坏。而在白河，我们却努力推翻这个政府，它是上海和广州十分关心的对象，或者至少我们会杀死尽可能多的人并且向它施加最苛刻的条件；诚然这一切都因为贸易利益变得更加复杂，利益使得人们的想法像感觉一样改变。可以确定的是我就像寓言中被人取笑的火鸡。有光线以后，我会告诉你们更多。

在这个奇怪的国家还有一个更加怪诞的现象，这里的人行走时不断地遇到惊讶的事物，就像在尼克莱一样。我们要在这样一块土地上作战，这里很难，或者说是不可可能，找到可以行车的路线。但人们明智地保留了可以利用的运输方式，我们在牲畜无法经过的通道征募了2000名中国苦力，他们的任务是运送部队、行李、各种物资以及带着炮架的大炮跟在军队后面。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严肃的，不能出一点差错，并且我们不能用这些粗俗的想法来评价中国。这个民族最令人好奇。此刻我尽力挖掘维系中国人的纽带，我现在只对这个庞大文明有些大概的了解。

今天我会给你们写信，但不是现在，因为我急着准备出发并且希望你们能从下一班邮船收到我的信，如果我到了芝罘再给你们写信，你们就收不到了。——上一封信中我跟你们说过，我收到了授予我萨瓦军事骑士勋章的通知。如果可能的话，我请求你们通过邮局给我寄一个这种小十字勋章，系上一段饰带。你们可以向邮局询问寄给我的方法。萨瓦十字军事勋章有四个尖端，系着蓝色和红色

的轧纹饰带。我想要的勋章尺寸大概在 20 以下。你们可以根据 1860 年 2 月 18 日的说明上画的十字勋章去找。

香港，1869^①年 5 月 15 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因为机器的损坏，我们已经在香港停留了两个礼拜，我们的出发似乎明确定在了星期四。在锚地停留的时候，我们接连看到载着部队和远征必需品的船只经过。我们不只是在等待炮艇以及应该是作为军医船的“杜佩雷”号；但是我们不能在她到达之前行动。

9 月份季风的转换使得在中国海域的航行十分危险，因为海军是我们行动的主要基础，为我们提供必需品的唯一方式，我们很有可能不等这段时间过去就展开军事行动。更迟一点，也就是 10 月份，季节的严酷可能是另一个新的障碍。另一方面，8 月份异常的高温无疑是提前进攻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我们不考虑一个重要的政治理由，即速战速决给中华帝国以决定性的震撼打击。6 月底或者 7 月初应该是首次进攻行动的最后期限。

主要的机构已经确定了。澳门将会有一家大医院。上海会有一家二流医院和一个储存各种物资的仓库。我们想在直隶湾的入口处安置并完成我们的部署，那里有临时的仓库、基本的救护车或临时医院，最后我们选定了登陆的地点，通过大海与这一系列的部署相连。但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意外状况可能会改变这次部署，但是一切都使得我们相信我们会在这些基础上采取行动。所有的船只都收到了立即向直隶湾入口处的登陆点前进的命令，我们会在战争开

① 应为 1860 年，作者误写。——译者注

始前在那里整顿军队。

拖累行动的最大阻碍是运输不可或缺的马匹的困难。为了减少马匹的数量，我们放弃了用这种方式运输军队的物资。我们刚刚在广州招募了 1000 名中国苦力，负责尾随军队运输食物。在这次对中国之战的部署中出现的奇怪现象是：在这个缺少陆路的国家，尽管马匹是唯一的运输物资的方式，但是使用马匹却也十分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不认为炮兵连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我们等待着从马尼拉和日本来的 700 至 800 匹马，以供我们使用。5 月底我们都将在北直隶会合，并且认为 6 月应该进行全面整顿。因此当你们收到我的信时，我们很可能已经开战了。

我们在香港的停留使得我能够参观离英国殖民地 20 法里的广州。广州被一条名为广州河的河流分成大小不等的两部分。河右边的河南区，大约有 10 万居民，是主要的瓷器生产地。广州最大的部分在河的左岸，是一个有着 100 万人口的“马蜂窝”，人们住在狭窄、肮脏的街道两旁，官员的轿子很难通过马路。在那些看起来最简陋的地方，在贫苦的棚铺里，我们惊讶地发现最华丽的中国绸布，绣工精致，上色浑然天成，证明了这个奇怪的民族的耐心和手艺天赋，他们的聪明才智令人惊讶。我们似乎面对一个过早衰败的文明，一个经历了人类灾难遗留下来的文明。它似乎只缺少团结一致的精神，因此难以汇聚全民族的力量。再看得多一点，我们就被他的空虚吓倒了。中国人完全没有敏感性，没有情感和宗教的感情，他们只有感觉。

每一座房屋都有它的菩萨，被几根大蜡烛照亮着，这是惯例，但是寺庙不能使人集中心思，四周围满了食品商，里面是吸烟室、会谈室和饭厅。寺庙和衙门是唯一比较引人注目的建筑，寺庙构造新颖独特，衙门因为建筑面积之大，更像一座城市而不

是宫殿。

广州最独特的区域是游民居住的地方。沿着河的两岸，有无数的小船，里面住着将近 20 万人口。一艘舢板一般住一户人家，这些人没有别的住所。他们靠捕鱼以及渡河南区或者广州来的居民过河赚几个铜钱为生。他们多数生活在水上，依照祖先曾经占据的位置在河岸占有相应的地段，他们的后代也一样。广州的这一大部分人口分布在河两岸连续的淤泥堆积形成的广阔平地，部分在涨潮时会浸在水中，因此通常应该建造在木桩上。包括 500 名法国人和 1000 名英国人的欧洲人，位于俯瞰整个城市的高处，有一道连续的围墙将可以俯瞰广州的所有地方圈在内。中国人心甘情愿地归顺于这支小军队，此时他们很高兴有这样一支军队保护他们不受叛乱分子的攻击。

与北方的作战计划相反，我们可以很放心地在广州的马路上转悠。但是我们不能用传统的观念来评价这个奇特的民族。在所有艰难的航道上，就是因为那些领航的中国人，我们才能在香港建造登陆的船只。这些中国人帮助我们运输军队的物资，并且多半也是因为他们我们才知道直隶的各个地方，在那里的航行也顺利无比。他们只有一种宗教和一种政治：利益。我们与中国的皇帝作战，只打中国政府。他们很希望我们被打败，天子每天都通过北京的报纸告诉他们，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北京的报纸，但是我们此刻是一颗要爆炸的地雷；他们不想失去这个增加皮阿斯特数目的机会。中国人缺少道德观念可能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如果有一种理念和政治观念主导他们，中国不久就会侵占全球。他们会越过亚洲边境并且很快来到欧洲，肯定没有另外一个民族比她更加具有侵略性、更加勤勉劳作并且人口增加得如此迅速。弥补了中国人的精神空缺，我们就把这个民族塑造成了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者。

10日我收到了你们3月26日写的信，我从开普敦给你们写的信已经向你们解释了我的信件耽搁的原因。为了避免你们担心，我同时及时地向你们指出：尽管我尽了一切努力定期向你们寄送我的信件，不受我意志左右的状况有可能使得信件不能定期寄送。邮船每两周一班；请相信我会守时，但还是可能会有变故。再见。

天津，5月20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一艘负责将柯利诺将军死讯带到上海的中国邮船今天晚上出发。我得到了准许给你们寄一封信。柯利诺将军当时留守天津，总司令不在，他是因冬季停航留守天津的法军最高指挥官。他是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精力异常充沛，他的健康状况在整个军事生涯中一直很好，似乎可以击退疾病。

但是因为染上天花，没过几天他就死了。他是被一名身体不适的将军感染的，在1月2日出现了症状；4日，确诊感染天花。潜伏期一直延续到了12日。那一天，他的状况很好，能够接受来访并且批阅公文。我是众多拜访者中的一个，在他的床边待了一个小时。当天晚上，一个更严重的并发症出现了。他的整个上半身都麻痹了；有一会儿，医生希望麻痹只是暂时并且局部的，但是将军自己并不这么幻想，并且表明自己快要死了。他要求马上口述并且签署了助手按照其指示书写的遗嘱，并请求奥马莱上校和我署名作证我们见证了他的最后愿望。14日，麻痹继续扩散，但病人神智还清醒，就像上帝想要亲自见证他临终的命运，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垂危。最后，在15日晚上5点，心跳停止，将军立刻就死了。直到最后一刻，将军还有意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数着他还能活的时候。

间，向他的执行者交代遗嘱问题以及他最后的指示，那么平静，那么清楚，以至于让我们觉得他的健康状况还很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死亡面前如此淡定，这既不能减少目前的痛苦，也不能减轻未来的恐惧。他的尸体被安葬在天津我们为他准备的一个墓地；根据他子女的意愿，以后可能被运往北京或者法国。这个可怜的将军刚刚因为这种传染病的暴发死亡了，幸好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受感染者很少。自11月底以来，我们对越过白河冰冻的期限等诸多事项仍无把握。人们使我们相信能在一个半月内得到解脱。再见。

上海附近，5月25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尽管从香港到上海的航行没有什么趣事，我总是准备好一封信可以在我们到达的时候投到邮箱，以防邮船离开的时候我却没有给你们写上几行。季风的转换大大耽搁了我们应该在5天内完成的行程。我们被困在了台湾海峡，大海如此恶劣，逆风如此猛烈，我们不得不放弃登陆，船只显得十分无力。恶劣的天气持续了4天；在被水手们所称为的猛烈的微风之后，是厚厚的浓雾，在船四周几百米范围内遮住了地平线；新的失算使我们的航行变得没有把握并且很危险。然而没有发生一件意外事故，但是我们的行进极其缓慢，从香港到上海，我们一直走了14天，这段路程对蒸汽船来说一般只要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能完成。

我们听说人们在上海建造了一家医院和一些军需仓库；为了继续上校到达时刚刚着手进行的事务，我们有可能在中途停止行程。尽管上海的物质条件可能更好，我不隐瞒你们，我尽一切可能跟随军队一直到要进行整顿的港湾。

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把一个装满各种物品的箱子委托给了我在综合工科大学的一位老同学、“复仇女神”号驱逐舰上的二副维莱中尉，他奉命回法国。箱子寄给我的一个朋友萨朗松先生，一名营长以及工兵连达莱斯梅斯将军的战地副官。他请我替他妻子买中国双绉，他把中国双绉拿出后，会把剩余的东西寄给你们，他将会用购买披肩的一部分钱支付海关费。“复仇女神”号1个月左右以后起航，6个月后回到法国。

我刚刚得知我获得了圣·拉扎尔骑士勋章和撒丁圣·莫里斯骑士勋章。

上海，5月26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刚刚到达上海，所有舰队都在那儿汇合。我们还没有任何有关出发前往直隶时间的确切消息，很可能我们要等特使们的到来。英军全部到了香港，可能从那里出发，回到港湾入口处的临时登陆点。我们一起占领了舟山。

有一些完全矛盾的消息，我会向你们细细道来，并且请你们关注报纸的报道。但是不幸的，我们从香港来的邮船得知一个确凿的事实。“伊泽尔”号运输船运载了大约100名乘客、军官和士兵以及150名水手，在进入厦门的时候遇难了，他们去那里是为了避开我们在台湾海峡遇到的恶劣天气。所有的乘客和水手都获救了，人们希望能够拿回丢失的物资，包括几架大炮、圆炮弹、火药以及军队的药品。“索恩”号运输船接收了这些遇难人员，把他们带到了上海。当我第一次去海军部的时候，我的名字被登记在“伊泽尔”号的乘客中。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好运改变了这个决定。虽然营救是

完全成功的，但是遇难并没有因此变得不令人讨厌，尤其是在人们不会游泳的情况下。

再见。

上海，5月31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上一封信中我跟你们说到我被告知获得了圣·莫里斯骑士勋章，应该说是萨瓦军事骑士勋章，人们告诉我，这比前一个听上去更加好听些。

我们刚刚得到了有关“伊泽尔”号的消息，所有装载的货物都获救了，包括人们最为担心的炮兵连马具；只有一些很容易弥补的海损。这是一次不会影响远征的金钱浪费。

大部分的船只已经到达上海，总司令下达了出发的命令。六艘运输船：“加龙河”号、“莱茵”号、“纪龙德”号、“山林女仙”号、“敢闯”号以及“卡尔瓦多斯”号，明天早上起锚；其他的运输船几天以后起航。正如我跟你们所说的，这次远征前往港湾入口处的芝罘，以便在战争开始前进行整顿。然而，有可能总司令会应中国官员的请求留一部分军队在上海，他们害怕叛乱分子的靠近。自从这些起义者占领了中国最富裕的南京省以后，他们毁坏了当地主要的丝绸和瓷器作坊，因此，欧洲人的贸易损失惨重。当我们最终来保卫这些商业交易时，人们寻思，并不威胁中华帝国的存在，而是通过镇压叛乱分子，夺取被他们占领了7年的南京，以恢复人们的信心，是否会更好？如果自尊不是我们此次行动最主要的动机，那么智慧会明确地指示我们作出决定。在大沽吃了败仗，我们想要雪耻，但是我们也不支持起义者到处毁坏并杀戮，而不进行任

何的建设，他们在中国人当中引起了相当的恐慌，因此中国人在我们要与他们作战时却请求我们的帮助和保护。马匹的问题稍微推迟了战争的开始，我想我们无法在7月底或者8月中旬前作战。

再见。

芝罘，1860年7月8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很高兴在上一封从上海寄出的信中提前告知你们，以后邮船可能无法定期航行，在我们到达香港之后邮船一直都是定期的。我被迫停止1个月写信，希望不会引起你们的担心。

6月1日，在海军准将卜罗德的命令下，六艘军舰从上海出发，带着第一批部队向芝罘前进。蒙托邦将军在等待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的到来时，将陆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冉曼将军，冉曼将军与各职能部门长官及指挥海军的沙内一起留在上海。横渡十分顺利，7日，福州已经进入了视野，命令第二天早上5点登陆。为了想象中的战斗并获得胜利，我们作了一切准备。中国人不认为政治困难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在他们的思想中，除了构成社会基础的物质利益，民众不应该操心其他的事；对政府来说，要带着军队为侮辱天朝旗帜的行为雪耻，双方各自职责分明。

我们在白河以及去天津的路上遭到了抵抗，在其他地方，我们发现到处都是跟芝罘一样没有敌意的居民。我们在纬度 $37^{\circ}36'$ 、经度 $116^{\circ}42'$ 的形成半岛的一个山峰上扎营。即将到来的新部队以及马匹，被迫安置在处于我们的营地和1公里以外的山脉之间的平地上。这个地方非常富饶并且耕作良好。那里的农民似乎学了很多珍贵且有价值的东西。天气有益于健康，尽管气温时有变化，因而需

要注意保健。水是唯一不能满足需求的，这里的水含大量的氯化钠和硫酸钙，这至少是轻泄剂，就算我们没有过多使用。军队的卫生状况比较乐观；6000人中只有50人生病住院，而在上海七八百人中就已经有70至80人生病。

当地人给我们供应了大量食物，他们每天都在营地附近形成可以供应一个拥有2万人口的城市的菜场。同时我们只能为这个稍微过大的集市感到有点遗憾，因为很关心士兵的冉曼将军认为，应该遵照上级指令尽可能减少开支。

我们带着这样的想法来到中国：与中国政府作战，而不是与民众作战，因此我们与分裂中华帝国的行为相抗衡。对那些因我们的短暂出现遭受损失的个人，我们支付了60艘帆船的运费，这些船被认为是军队登陆所必需的。我们秉承人性展开行动，而不是进行破坏。我不知道这样的态度是否能让中国人对我们的力量有一种崇高的看法，但是这更符合我们西方的习惯和文明。此刻这就是我们的行动方针。

蒙托邦将军于5日与沙内少将一起到达芝罘。我们都认为15天或20天内我们会回到白河两岸的那些登陆点。当然，我不知道作战的计划。一共有三种计划。在我看来，我们无疑将会选择最难执行的那个，因为英国人想要在他们被打败的地方雪耻，此外，我们可能必须得保持在我们的舰队的视野之内。这就是说我们要进攻大沽要塞，而不是分两路北上天津或北京；这一方案路程更长，可能10天或15天之内都不能有舰队的协助。这些方案难分伯仲，但再晚一点就可以看到哪个更佳。

你们已经从报上知道了“快帆皇后”号失火的信息，是在澳门搁浅的时候发生的。她载着大量的军需品。

芝罘，1860年7月22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自我7月8日最后的那封信之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我们一直待在芝罘，等到出发的那一天，除了因为30℃的高温出汗就没有别的消遣了；我们习惯了一切，甚至是泉水。幸运的是，我们刚刚收到26日动身的命令。据说，在白河口南边进行的一次侦察，确定了在这些登陆点中的任何一个地方登船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据传，将军作出了在北边登船的新部署，在已经被英军选择的北塘河两岸附近。

我们亲爱的盟军作出的决定能够使我们的处境明朗化吗？在作战计划中，尽管他们人数更多，但他们却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了我们，这再次证明了大不列颠精神从来不会失败，不管在哪个纬度，它照样很适宜。为什么要改变它？我们愚蠢地把他们的缺点当作优点：把他们的呆板称作绅士。

工兵连大部分属于“快帆皇后”号的遇险人员，他们刚刚陷入了一个十分窘困的境地。所有物资都丢失了，甚至包括他们经常穿的衣服，因为高温如此严酷，只能穿最轻薄的衣服，大部分人获救时只穿了了一件衬衣和一条亚麻长裤，光着脚。人们尽可能挽回损失以及船上的物资。

特使们在远洋轮船上也丢失了他们所有的行李，包括他们的国书，依照原则，他们拥有全权：必须最大程度或者最低程度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我全心全意地拥抱你们，以十分良好的健康状况，很高兴地看到你们将永远不会违反约定、在处境糟糕的时候出售这些消息。

你们的儿子

北塘，1860年8月8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正如我所告诉你们的，26日我们从芝罘出发前往北塘河。法军舰队有35艘船，排成三路纵队，各由一名海军少将指挥。英军在我们的右翼，有100艘船，以同样的方式布置。离北塘有70海里，我们缓慢地航行，从而使得帆船能够跟上我们，而不发生意外。

4月1日早上7点，下达了命令，所有的部队都登上能容纳60人的小艇，随后我们离开了舰队离北塘口13公里处的锚地，在小蒸汽船或炮艇的牵引下向河的炮台前进，这些炮艇在我们登陆时从水路进攻。

凌晨4点，我们离村庄还有约2个小时的航程，当登陆的命令下达时，英军应该首先进，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领了头阵。轻步兵开始了行动，我们在水中前进，在几米的路程内水一直漫到了腰际，随后，是一段厚厚的淤泥，向着通往村庄的河堤一直延续了1公里。到了连接北塘至天津以及白河的宽约6米的道路上，我们很不满意地发现我们被沼泽包围着，北边是因为北塘的淡水，南边是因为潮汐。

这种意外的环境会使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如果中国人突然出现在这个攻击点，如果中国人没有放弃这些炮台而退回到白河。晚上我们毫无阻碍地进入了村庄，但是，我们幸运地在这些炮台里找到了可能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三组地雷。离开之前，中国军队在必经之道布置了一种可怕的装置，每一个装置有4个0.35米至0.40米直径、装满火药的炸弹。震动就可以使它们爆炸，它们在第一批运输炮台的士兵脚下肆虐。

我们发现村庄里的人们手无寸铁，我们后悔士兵犯下的暴行，使得六名妇女自杀了。唯一留在炮台里的那些大炮是木制的圆柱体，里面衬了铁。

3日，我们组成了一支军事侦察队，有1200名法军和1500名英军，将军命令我领先部队200米，如果可能的话，发现并清除中国人可能在路上布置的地雷装置。我没有发现任何一种地雷，但是在距离北塘河5公里的地方，我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清军骑兵，似乎在进行准备工作。我立刻把情况告诉了带领炮兵连前进的将军，但是在多数的榴弹炮被升起之前，我们遭到了50余颗子弹的扫射，幸好瞄得不准，这使得我们有必要进行防御。我们在两侧展开狙击兵，炮兵居中，就这样前进了约2公里，追击敌人，我们靠近的时候他们秩序井然地陆续退出了这个阵地。前进了7.5公里的时候，将军认为继续向前侦察是无用的，我们停留了2个小时反击中国人，他们总是用轻型长炮向我们发射子弹或者铁球，迫使我们退回北塘河。现在我们在等待行动的决定时刻，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准备好交战，我们很可能要在夺取白河要塞之前进行一场战斗。

我给你们寄了一个在北塘发现的中国木制印章的盖印，我们在那里还看到了巴黎的立体镜和女式小阳伞。

再见。

在白河附近的新河营地，8月17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8月12日早上6点，我们开始行军，为了与离我们2法里的、也就是如你们所知道的北塘村的中国人决战。8点钟，大炮的首发

炮弹射向了清军骑兵。反抗十分微弱，敌人聚集在筑有雉堞墙的营地里，这个营地同时是新河庄内一座桥的头部。不顾中国人连续乱射的子弹，我们快速攻下了围着水沟的保护敌人的壕沟。直至白河左岸的所有敌人的阵地都被我们占领了，此刻我们必须转向河边的炮台和各种防御工事，以防敌人靠近，尤其是海岸边。13日我们忙着进行侦察，在流向白河的小溪上建桥，最终为军队第二天的行动开辟了一条捷径。

我是杜潘中校指挥的仅有50人的侦察队中的一员。我们观察到了约1法里外的筑有雉堞墙的敌营，这是在塘沽新建的一个长方形营地，一边靠着河的左岸。

我们占领的新河庄通过围着水沟的河堤与筑有雉堞墙的营地相通，村庄左侧是无法通行的、布满沼泽的土地，沼泽地的水深随潮水的涨落而变化。村庄的右侧是一块宽150米的完全的沼泽地。从这个角度看，地势缓缓升高直至接近白河，这里的路面更加干燥。就是这个在敌营西北面的平原，被一致地认为是最有利的攻击点。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平原尽可能地使军队远离了从河下游岸边发起的激烈抵抗。

14日早上6点，联军在我跟你们说过的平原开始行军；像往常一样，英军在我们右侧。我们一出现，就有一支位于河右岸的小炮兵队向戴着头巾的纵队开火，并且从同一侧河岸更远的地方组织了第二次进攻，正面攻击我们。我们因此处于一个真正危险的军事形势，如果除了中国人我们还要担心另一个敌人。右边，两座炮台面对面排开，左边，筑有雉堞墙的营地的炮台，没有任何障碍物或者庇护可以掩护纵队，其次，在一个如此多沼泽的地方行进也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们没有放弃缓慢的围攻。英军猛烈地攻击河右岸的那两座炮台，并且在半个小时内使它们哑火了，向敌营的行军一直

继续着。两军就像在军事演练一样联合展开行动，一点都不担心中国人的炮火。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劲敌，两军会陷入僵局。我们有点看不起对手，他们只是依靠天然的防御令人生畏，我们必须通过那些障碍物才能攻击他们。8点15分，英法两军的炮兵连猛烈扫射，持续了45分钟并且射了2000发；9点下达了冲锋的命令。参谋长施密茨中校带领着纵队向左斜着前进以夺取新河庄的河堤，避开了中国人来不及毁坏通道的第一条壕沟；到了靠近敌营的第二条壕沟时，我们趟过了漫至肩部的水，然后用云梯铺成一条不太潮湿的通道，最后用旧有的、但是被中国人毁坏的桥的碎片又填成了一座桥。我冲在了前面并且协助搭建了这座桥。

我们到达敌营时，留下来的少数几个抵御者逃跑了，退回到左岸的坚固炮台里，这个炮台是大沽要塞的一部分，英军于1858年在那里受挫。联军炮兵的火药对防御工事的土墙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炮击逼得敌人后退，使得他们的攻击不再那么致命。我们发现了一些中国人，10来个因为受伤已经死掉的，然后是室内的50个伤员。显然大批伤员以及牺牲者已经尽可能地被转移了。在一个人们如此尊重祖先，更确切的说，尊重祖先骨灰的地方，我们只好放弃罪恶的灵魂。我们这方损失不大。据我所知，法军只有20来个受伤，1个牺牲，1个断肢。英军应该损失了30人，以及丧失战斗力的50人。

后天，我们又要开始行军。这一次我们很可能要渡过白河，以攻击右岸的炮台，并让左岸的敌军在陷阱中被捕，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捕获右岸的大批敌军。我们希望用10天时间到达天津。

在刚刚结束的袭击中，我们的战利品有几面旗帜，13架英国或者美国制造的铜炮，以及几架铁炮。

这次小小的胜利之后，我们进行了升职。工兵连中校利韦已经

被任命为上校，迪普埃少校被任命为中校，比我大3岁的阿利泽被任命为营长。可能就快要轮到我了，不幸的是，总司令无权任命或者替换空缺，并且担心工兵连军官死后不会有空缺。

从17日起，发生了两件大事，可能使军事行动上句号，使得我们可以马上向天津行进。18日，工兵连上校收到在河右岸进行侦察的命令；我是他的助手；我们认为要让军队靠右岸进入，只需侦察桥头堡的形势。

再见。

天津，1860年9月8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在你们上一封信中，你们对我在“汝拉山”号上的生病稍有指责。事实上，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右眼患了很长时间的眼炎，我在诊疗所待了一段时间。但是世上的好事总是伴着坏事而来，我获得了病后假期，比起我的那些住在可怕的集体宿舍里的同伴们，我留在了一个位置相对较好、分配给船上32名军官的地方。今天，我一点都没有感到不适，并且从各方面来看我的健康很好，尽管我们在这遭受着33℃高温的天朝。

我向你们简单地描述一下中国之役的各个阶段，包括序幕，我们一共有5次行动。在上海长时间的停留，以及在芝罘整顿军队花去的时间组成了这场军事悲剧的开场。第一次行动于8月1日在北塘展开。在一个淤泥滩上，泥滩边上是一条河堤，我们晚上就在两块沼泽地之间的河堤上休息。第二次行动于8月12日进行，战斗中，背信弃义清军骑兵在几个小时内都任凭我们长驱直入，直至白河岸边的新河。第三次行动，随着地势的升高，我们看见了在右侧

流动的河流。英军顺着白河的水流，我们在对面的左岸占据了塘沽的一个筑有雉堞墙的营地。第四次行动只是一个特殊的插曲，但是却有着实际的重要性。为了占据桥头堡，我们一行 250 人渡过河流，最终占领了右岸 1000 平方米的范围。最后，第五次行动，也是最重要和最激烈的，是中世纪古战斗的一次真实再现。

我不打算再赘述已经告诉过你们的细节，并且我担心跟你们分享我纯粹军人的思考并不令你们感兴趣。我只是想为那些确实被埋没的勇敢的中国人平反，以后我会让你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品行以及政治社会特点的评价，今天我只关心他们的军人精神。

在法国，甚至在欧洲，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他们想成可卑鄙的敌人，他们只有木制大炮，或者为了给敌军带来恐惧而在他们的旗帜上画着可怕的龙。他们的胆怯、懦弱甚至卑劣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我们相信目睹了 21 日激烈战斗的士兵，目睹了那些苦力在弹雨枪林中奋力呐喊，替我们运送云梯、抬走伤员，或者运送弹药的景象，在回法国时会带着完全改变的想法：显然大自然在港湾的这一点上很好地支持了中国人，为他们积聚了有利于防御的障碍物。

沙滩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着，河堤上都是沼泽，我们几乎只能在四围都是壕沟的河堤上行走，从海岸直至内陆几法里的大部分地方在下雨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无法通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途径是无法攻破这些炮台的，但是尽管他们对大炮的操作很不熟练，他们的武器也十分原始，我们还是必须认识到他们有先进文明所具有的元素或者说残余。

他们用黏土打造的要塞是大炮不可摧毁的，几乎没有突破口。他们积累了各种各样附属的防御设置，布置得十分完善。他们用各种口径的各类大炮武装他们的要塞，很多架是可转动的，以便必要

时由他们的骑兵向关键位置发起攻击。最后，他们表明了，当他们受像 21 日被打死的都统那样坚强勇敢的人指挥时，他们充满了力量和勇气。

作为我们搬运工的中国人，或者说苦力，得到了普遍的赞扬。因此，这个有智谋的、勤劳能干的和视死如归的民族似乎只缺少好的领导，并且需要讲点科学。

中国文官的权力不大，武官的权势很大，这是政府所希望的，或者说十分希望的，中华帝国的 3 亿人口能够抵抗所有侵犯他们法律和独立的企图。

21 日以后，特使们掌握了事态的主动权，天子向天津派遣了 4 名高官作为全权代表，至少大家是这么认为的：但在签署条约的那一刻，委托给中国特使的权限受到新的限制。我们很快就下达了准备行军的命令。明天，部分军队，即冉曼将军旅，动身前往北京。我们认为，军队准备一直推进的打算，足以使中国特使们重新获得作为钦差大臣必不可少的权利。

我是仪仗队的成员，在任何情况下，我希望去北京，跟各军种抽出的一部分士兵一起，护送特使和总司令去签署和平条约。每一个参战国获得的战争赔款为 6 千万，并且人们公平地规定允许派遣一名公使驻留北京。

再见。

通州营地，9 月 30 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相信上一封信已经向你们介绍了天津城的一些情况。我不会再回到一个同样无趣的话题上，但是为了让你们理解我们所说的

“中国的和平”这个概念，我必须追溯这些事件的经过。

占据大沽要塞后，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回到了天津，在那里等待着和中国政府谈判。天朝派了4名钦差，为首的是桂良，全权代表他们的主子和特使商谈。尽管这些谈判是保密的，人们还是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欧洲外交的一些进展：中华帝国将依次签署和平条约，一切都达成一致，我们只需确定去北京的日期，以及特使和总司令们随从人员的组成。天子派来的钦差大臣首先提出只允许带一小部分人，不能带武器，据他们说，“以防人民暴动”。

14、18日和21日的3次事件使得我赢得了3次提名，我被提名为营长。我位列前茅，蒙托邦将军的一个副官明天随邮船离开以请求皇帝批准所有的提议。因此，你们可能比我更早知道我的提升，如果方案获得批准的话。

工兵连的60名战士中有2名军官和17名士兵受伤，这多少有点严重。再见。

北京，10月19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在9月18日至21日期间为了等待留在天津的食物和军火物资，我们不得不停留在通州。敌人的背信弃义是如此彻底，我们只能向北京进军，直捣政府的心脏，束缚其手脚。有一个危险：皇帝和王公大臣可能会逃走，留给我们一个无政府的局面，并且可能是一个朝代的更替。这些事变太超前了，外交措施难以阻止他们。

10月15日，联军开始行军，并形成战线，准备迎接满人的最后努力，据说他们驻扎在北京防御墙东面的营地里，敌营有雉堞墙保护着。但是我们很快得知敌人不敢在这些地方等待我们，他们往

长城逃去，企图撤退保护皇宫圆明园，那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在首都以北4法里处。我们决定要彻底追击清军军队，我们马上向皇帝的住所行进。6日晚上，我们在宫殿第一个院子扎营，皇宫因为我们的迫近被遗弃了，我们把英军甩在了后面，他们跟不上我们。

第二天，我们得知皇宫对我们被俘的人质所施行的各种酷刑。大家都很愤怒，圆明园被洗劫之后付诸大火；我们只避免屠杀。皇帝夏宫圆明园（明代和元代的财富^①）位于北京北部4法里的地方，离长城8法里，是皇帝的偏好之所，一年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他和他的侍臣住在那里，被无尽的城墙围着，这里有着大量的宫殿，一些坐落在假山顶上，另一些位于因为主人的心血来潮散布着的湖边，在一个曲径错横的几法里大的公园里。在参观完这些美妙的景点时，我们每一刻都有新的惊讶，但是，除了其中几个特殊的宫殿，这里就像整个帝国一样，在古老的富丽堂皇的片段中我们看出了毁灭和没落的迹象。不仅视觉受到惊讶的冲击，想象力也停止了，受到了废墟的样子的撞击，印象中不能接受的强烈反差的撞击，而不是被现实中的伟大所震撼。在皇帝的这些地产内部，仅有的财富是玉、绸缎和景泰蓝、一些珍珠和珊瑚，我们还发现了少量的黄金和白银，已经分发给部队。

9日，我们向北京挺进，以形成包围之势，壕沟在11日晚上打通，同时炮兵在北墙70米处一座供奉孔子的寺庙脚下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在我们右翼的英军进行着类似的工程，我们已经准备好开火，13日中午，在规定期限的最后一天，城市无条件投降了。

联军马上围住了B门，并且占领了左右两侧威胁着我们的约四五百米的城墙，而特使们尝试着恢复陷入僵局的和谈。他们首先要

① 圆明园始建于清朝，此处应为作者误。——译者注

求释放人质。不幸的是，除了受政府的一个科学使团委托的戴斯克鲁斯先生，他们只交回了扭曲的尸体，还有炮兵连被半烧焦的格朗尚中校。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所处的形势。不再有政府接待我们，每一个官员都不敢面对我们，他们害怕被报复，我们只通过信件与皇帝的弟弟恭亲王进行交流，我们不知道他的确切住址。

皇帝向满洲的山上逃跑了，今天甚至传来皇帝自杀的传闻；另一方面，据说叛乱分子借此机会向首都逼近。我们的外交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时间紧迫，我们已经切实地感受到了寒冷，急需考虑冬季停航。总司令刚刚对此下达命令；明天，一个工兵连动身回天津，为所有军队的扎营作好准备。但是，我们的一部分军队留在北京不是不可能的，虽然，如同我们可以相信的，英军打算留下一部分军力在首都。他们可能已经把中国当作印度的附属国，由他们选择一位傀儡国王；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宫相的权力。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促进英国势力将来的发展，而没有获得任何利益。

我们的贸易过分谨慎小心，不敢在离法国这么远的地方冒险，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精神使我们不能进行这些远离祖国的投机事件。祖国实在太漂亮了，土壤如此肥沃，生活如此舒适便利，我们不会远赴他乡，冒着严寒酷暑，寻找无用的财富，当我们幸运地挺过了这个长时间艰辛又危险的航行中的痛苦时，渐渐地，对战争厌烦了，法国人站在一边，只有英国人还会独自留下，如果他们还没有在这里发现在印度威胁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俄国人在华的影响力尚不明确，虽然俄国使团已存在多年，但他们在等待有利时机。因此英国的敌人既不在法国也不在欧洲，而是在黑龙江上。一个新世界的利益在亚洲互相搏斗；就是在那里，文明带着新的元素重生了，而在西方，文明逐渐衰老了。

今天我不能向你们细述北京的细节，在北京城内不允许自由通行，我们在等待和谈新尝试的结果，毫无疑问，这次结果不会比以前更顺利。我希望能通过下一班邮船向你们稍微描述一下组成这个巨大肮脏的国家的3个城市。

提醒我记得那些会很想念我的朋友。这几乎是一种想象的努力，在这么远的地方确实要考虑他们。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血肉之躯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这些吸引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对一个生活在适合娱乐和遗忘的国家的人来说，远隔六千法里思念朋友是尤为难得的。

而对于只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中的我们来说，自然地我们经常跨越这个空间，使我们忘记了现在。

再见，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全心地拥抱你们，祝愿上帝永远保留我对你们的爱。

所以骑士勋章没有被出售。迦太基必须被摧毁！再见。

北京，1860年10月30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不知道和平是否到来，但是至少条约已经签署。24日午后2点，额尔金勋爵带着2000人以及整个英军参谋部离开了北京城墙内的衙门，回到礼部，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已经在那里等了勋爵将近一个半小时。总司令命令，所有法军都被禁止入城。整个白天都用来签署维多利亚女王和天朝皇帝之间达成的条约。第二天，我们要代表法国参加一个类似的仪式。我想更近距离地感受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待人方式的不同，我和我的一个同伴成功地骗过了哨兵的监视，我们甚至在特使到达之前轻松地进入了礼部。在一个很大的

房间的最里面，有着随便摆设着几盏中国灯笼和盖着红呢的椅子，众人的左边有一位 25 至 28 岁的年轻男子，被各个级别的官员围着。他的右边，像他一样坐着的，是一位官员，皇帝的亲戚。

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双眼无神，形体消瘦，似乎被一种忧虑的情感主宰着。只有他的官服的胸前和肩膀上绣着皇室的龙，外切于一个圆形的刺绣图案。一条棕褐色的丝质长袍，一顶鲜艳的帽子和一串朝珠，是恭亲王——钦差兼帝国摄政王的整套服饰。那些官员也都穿着两面衬有皮毛的丝质长袍，戴着一顶帽子，上面有一颗象征各自官阶的帽珠。用不同方式将念珠串起来形成的朝珠，挂在官员的脖子上然后垂到背上。武官通过帽子的帽珠上的一根孔雀毛来区别，帽珠用玉环雕刻而成，所有的武官长袍胸前都有一块 0.40 米见方的刺绣。

当额尔金勋爵的轿子到了前厅时，亲王的所有随从都走向这位英国特使，可以说尾随其后，恭亲王只是带着一种可感知的不快缓慢向前移动。而额尔金勋爵却在等待亲王，直到中国的这位亲王走到他身边时才迈出第一步。外交问候十分冷淡，每一位特使都向着为自己预定的桌子走去。授权书的陈述马上就开始了，接着由翻译低声宣读条款。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当额尔金勋爵要签署条约时，人们让中国官员围成一圈，特使脱了帽子，一位摄影师拍下了房间以及房间里的每个人。2 个月之内你们可能就会在欧洲看到这次会议的抄本。离开的时候，恭亲王护送这位英国外交官到他的轿子，并与他进行了至少十分稳重的道别。

第二天也就是 25 日，主要的事件都重复了一遍，跟前一天一样的方式，但是葛罗男爵比较有风度，没有让亲王等，他按指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他的随从人员跟额尔金勋爵的差不多；像勋爵一样，他坐在总司令的左边，所有其他的军官集中坐在另一块区域。

我们特使与恭亲王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进出时互相的问候语和告别语比较多。葛罗男爵向亲王伸出了手，亲王热情地握了上去。

和平条约由八个条款组成，我还不知道内容。关于法国，还有一个额外的附加条款：前葡萄牙圣文森特教堂被重新用来膜拜天主教，教堂要重新开放，为被中国人杀害的被俘官兵举行葬礼。

第二天我就收到命令，要我考察教堂并汇报安排迎接参加弥撒的军官和一部分军队所必需的时间。我要求 48 小时，得到了批准。这座建于 1657 年的建筑没有什么特色，十分朴素，不能被归类为何种建筑风格。内部呈现为拉丁十字架的形状，底座很低。一切都处于废墟之中。教堂前面的院子杂草丛生，一直延伸到建筑的内部。石板被毁坏了，墙壁成了碎片。30 年来，中国人让这个建筑自生自灭。

在 350 名士兵和 150 名中国人的帮助下，我成功地使得一切看起来都很像样。29 日早上 9 点，神圣的仪式开始举行，祷告由董若翰主教宣读，他肯定来自阿列日，并且他在天朝没有丢掉加斯科腔调。

北京主教孟振生在这个城市隐名埋姓生活了 30 年，这天发表了讲话，有几名中国教士参加：这证明了政府对宗教多么的漠不关心，而牧师们没有忘记他们神圣的角色。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感；因此他们在一个新宗教的宣告中看不到对手。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犹太人，穆斯林，婆罗门信徒，也发现了同样多的基督教徒。

孟振生主教看到他的用来祭礼的教堂时十分惊喜，他多次向我表达他的喜悦，并以个人名义请求我接受他对我在准备时所作的努力的所有感谢。举行仪式的第二天，工兵连上校从总司令那里收到下面这封信：“上校，在昨天的仪式当中，我注意到教堂得到了很

好的翻修，请接收我对此的祝贺，并为指挥这次修复工程的贝齐亚上尉(原文如此)记上一功。”这封信当然令我高兴，但是我最大的快乐是筹备了被关闭半个世纪之久的北京教堂重新开放的仪式。这是一生中值得自豪的时刻。

从24日起，葛罗男爵住在北京；临行前，他想拥有留给法国特使的旅馆，据说这个特使是布尔布隆先生，现任上海全权公使。这几天关于我们即将到达的讨论诸多，这次到达似乎跟卜鲁斯一样被耽搁了，他是额尔金勋爵的弟弟，任驻华公使，在北京代表英国。

战争刚刚有了一个结果，在战争期间，在中国政府和联军之间的外交关系变得十分困难时，我们唯有称赞俄国公使的有力斡旋。伊格那替叶福将军——一位不知名的公使，在战争一开始时就离开了北京，只从当地居民在限令下交付给我们的城门进过城。他所提供的所有情报都得到了确证，促进了和平条约的缔结，我们尤其应该感谢他。

中国政府已经交付了150万法郎，分发给因为他们的背信弃义而受害的7名人质的家庭。英国人因为他们所受的损失数目收到了比法国略多一点的赔款。

因此和平已是既成事实；她会长期有效吗？

不！如果我们放弃大沽要塞。是的！并且中国肯定要打开大门，如果我们用1000个欧洲人占领这些要塞和天津——这个有70万人口城市的要塞。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的信用，他们没有任何感情。要养成他们的道德观念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他们制造迷人的工艺品，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聪明才智，但是他们忽略了荣誉的首要原则——言而有信，当然，除了贸易方面。协议签订以后，他们尽可能地食言，甚至给他们的神烧纸钱，希望用外壳的样子骗过他

们，但是合同一签订，人们可以相信他们不会调换商品。这是他们唯一的优点。

再见。

天津，1860年12月10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这里已经很冷了，白河的冰有0.30米厚，河道已经禁航。此刻，我们享受着类似于圣马丁岛的夏季，冰融化了，河道又可以航行了，但是上天这个最后的恩惠肯定不会持续很久，我们有理由担心我们在海上的交通被阻隔，海滩甚至可能无法停靠。

法军海军在整个战役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怜的援助，他们刚刚警告我们从上海到天津的服务从这一天起结束。如果英军海军不来援助我们，在冬季的3到4个月里我们将完全被抛弃，英军在天津的最高指挥官向我们承诺捎上法国信件，因此我们有了确信，至少这一次，能够寄出给你们们的信件，但不能确定我们是否能够收到法国的来信。这封信通过英国寄给你们，邮资未付，因为天津的邮局不允许贴邮票。鉴于我们的处境，不要对我信件的无规律感到奇怪，只要坚信我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我允诺向你们讲述中国的一些详细情况，这就是我向你们讲的一部分，有待核实。你们在我的评价中看不到任何绝对，我的评价有可能是有误差的，也必定是不完全的。我用整个冬季来更正我的判断。

在研究中国社会之前，先分析构成社会的人，我很少谈及女人，女人对外国人来说总是处于一种神秘的状态。观察中国人的形体，研究他们的性格，按照他们的习惯和才能的发展，在重新回到

道德准则或寻找结果之前，我们最终看到了事实。

形体上，中国人的皮肤呈棕黄色，即使在北方，个子也普遍矮小，身体几乎完全缺乏力量的首要特征；在这一点上，他们从头到尾都只有植物的力量。再说女人，她们有很漂亮的头发，编成一根辫子，垂到肩上，这是满人征服他们后的强制性规定，200 年之后，这个附属的标志成为了一种偏好以及永久的标志。

中国人走路就像做其他所有事情一样缓慢，每个人的方式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天生优越的种族特质。确实，帝国的国民不承认世袭的贵族。包括达官显贵在内的中国官员，国家的知识分子阶级，都位列文、武官阶，由皇帝授予给个人，而不是整个家庭。从前，官职只有在科举后才能授予；现在，政府是如此贫穷，官位可以买卖，甚至往往在出价后强制买卖。可能，我们能在这种条件下，找到解释中国人的这种无区别的方法。在鲁昂，一个主管和一个小人物在他们的上级面前都是本地人，通常只有外表的不同。——中国人的眼睛通常是倾斜聚拢的，就像眉毛一样，当然也有很多例外。他们的鼻子一般都很扁平，高高的颧骨，尖尖的头，这使得他们的面貌呈现为通过一个基地连接的两个锥形。所有中国人的脚都发育得很好，以及他们的手，尺寸很小，很长的指甲形成了区别他们的主要特征之一。人们在天朝经常能碰到很丰腴的人，因为他们深居简出，对未来无忧无虑，可能也因为天生无精打采，这在长满荷花的土地上十分普遍。

中国人的个性普遍比较温和、懒散、像婴儿一样腼腆、十分嫉妒，使得国家的团结一致变得不可能，这也许能解释她面对一个有组织且充满国家情感的敌人时的软弱。言辞激烈、大声尖叫可以理解为是对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愤怒，然而这只是些噪声，随之而来的是平静。中国人的朴实尽人皆知，这在我看来只是一个负面的

优点。事实上，在中国我们从来看不到过度饮用烈酒的阴暗场景，至少在国内没有，白天只要一点米饭就够了；但是人民很穷，贫困是这个社会的伤口之一，而当财富增加时人们加以隐瞒，害怕引发中国官员的贪欲。

很难相信一个餐饮和糕点最发达并且饮用惊人多的高粱酒的民族有这样的天生的饮食节制。我们多次计算中国官员提供给宾客的菜肴数目，有时多达 40 道菜，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十分讲究。这些例外也许并不比狗、挂在广州猪肉铺的鼠珠、或者天津街头卖的蝓蝓更有说服力，但是它们似乎可以证明，在中国节制不是大自然的一种馈赠，而是非自愿的贫苦的结果。在以后的信件中，我将向你们详细讲述中国的人口、中国人的智力和道德生活。我有很多工作，但我不喜欢闷闷不乐。我全心全意地拥抱你们。

天津，1860 年 11 月 20 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和平条约的条款一在北京城张贴公告以及在首都的报纸上刊登，联军就完全撤离了北京。剩下的只是为冬季停航作出决定。蒙托邦将军明天动身回上海，带着一半的军队以及参谋部人员；他把剩下的军队留在天津，听从柯利诺将军的指挥。我作为工兵连主管属于最低的级别，任务是筹建一个容纳 2000 人以及八九百匹马的营地。我拥有一个工兵连和四名军官。委任我为工程主管的命令允许我在完成军队扎营以及军火库和医院的建造之后就马上去上海，但是我恐怕不能利用这个方便，柯利诺将军向我表明他想留下我。当然我的位置一点都不令人难受；我是服务总管，完成这项任务不会有太多的困难，但是上海离法国的邮船更近，两周以后我们就要被冰天雪地封住了，

不可能与舰队取得联系。寒冷的感觉如此强烈，我们只有穿着各种各样的皮衣才能出门；我轮流穿着水獭皮和卷毛羔皮的衣服。我还有另外3件皮衣，但是要留着带回法国。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很好，好像我们已经占领天津好几年似的。当地人都很温和，容易亲近，但这并不排除他们施加在那些死于恐怖酷刑的人质身上的残暴。

他们就像女人和孩子一样，有时候对自己是最强的感到如此奇怪，因此他们大胆地投入到极致的暴行中。除了这些例外，他们总是很谦卑顺从，只有一个挂虑——生意；只崇拜一个对象：金钱；只有一种欲望：感官的享受。汉语是一个有着至少4000年历史的谜语，一种异数，如果我不追溯这种现象的起源，这仅仅是出于对创世纪的尊重。自从我们在中国之后，我全力研究并说明其特性，我内心开始总结，但是还不能解释某些事实。这个冬天我可能会弄明白，我会向你们报告我的发现。

直到这一天，我观察到两个主要的特征：中国人有智慧但没有道德，他们不创造，他们经常回忆往事。中国是一幅反映古老文明的画，穿过几个世纪以后失去了某些色彩，我们在现代文明中找不到它的任何痕迹，渐渐地文明变弱了，不再有足够强度将轮廓固定在画上，最后色彩消失了。

1000年以后，中国将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一个活在蛮荒状态的智慧民族，因为不再有推动国家潜在元素发展的驱动力。有了发展的各种天赋资本，中华民族会变得麻木，不愿意适时利用各种进展。

我忙着研究民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结构。有一位红色帽珠的一品中国官员来到北京，参加高达4百万两白银战争赔款的分摊。预留给法国的其余款项分阶段支付，总额有6千万两白银。天朝皇帝的钦差到天津时，邀请各职能部门长官们参加一个中国节日。前

一天我们收到了一份邀请函，用孔子的语言和行文方式在红纸上书写的。我保留着由董若翰主教翻译的这个纪念物，为了完成对中国习俗的研究，我经常与这位主教联系。人们向我们预告第二天会很嘈杂并且有很多娱乐节目上演，从早上5点直到午夜，一刻不停。

当大仲马让人表演了两个晚上的《基督山伯爵》之后，我怀疑他在模仿中国人的习俗。我们有一顶轿子可供差遣。我很好奇地在当地蜡烛的照明下参加这些庆祝活动。

我们进去的时候，看到东道主起身迎接，向着我们以及所有被邀请的人走来，人们给我们提供了座位和一杯上好的茶。

在像我们一样被优待的观众的对面，是一个剧场，通过舞台的后台和两扇边门投射到房间内。我们的周围是穿着毛皮的各个官阶的中国官员；在最低层坐着平民百姓。室内的摆设只有桌子、椅子和灯笼。整个节日就如节目表指定的那样从早上5点开始。人们依次表演喜剧、悲剧、杂耍，令当地受邀的人十分开心，他们对此类活动从来不会感到厌倦。

在中国，到处都有戏院，尤其在寺庙；这是为了取悦上帝还是为了吸引信徒？不知道这些从明代起就存在的习俗为什么会继续下去呢？这里的中国人还是具有明显的妇女和孩子的特征；他们永远受所有感性的东西诱惑，从来不是理性的。就是通过这些我们才有了想法，并且这也是除了感情之外剩给我们的一切。感官的统治也许是其根源，就像戏院表演中文明的最后反映。使中国人特别感兴趣的是乐器的音乐或噪音。能够从乐器和声音中很清楚地分辨出节奏，声音没什么不对，但是台词对欧洲人的耳朵来说是那么的刺耳，难以忍受。

奇怪的事情！汉语听起来基本上是悦耳的，声调的变化产生了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字，一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在理

解声调的细微变化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地人的音乐没有任何旋律，只是通过尖锐的声音进行演奏；就像在所有新兴或者没落的民族中一样，音乐只有断断续续的拍子。古时候的声音、转调和变调经过了几个世纪以后消失了，就像绘画的阴暗部分。

晚上5点，人们提供了中式晚餐。也就是说，没有上菜顺序，没有叉子，没有杯子。餐巾用一块长4.05米、宽0.12米的长方形吸墨纸代替，这一块餐巾还有另外一个用途，这不会受到中国官员的蔑视，即使是一品官员。事实上，他们只在用餐的很小部分时间使用餐巾，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之艰难作战的帝国的大老爷们的技巧通常使得餐巾毫无用处。我很幸运地坐在一位没有感冒的大老爷旁边，我只是担心他在所有菜肴里乱夹的筷子上的口水，他的筷子伸到每一盘菜里，夹上一口，或者挑着他想吃的菜。我尝试着跟这些先生一样不讲卫生，但是我的缺乏经验使他们发笑，并且他们自以为有义务教我，用他们沾满调料并且还冒着水汽的筷子夹菜给我。我保持着良好的风度，我想起了圣安东尼的朋友，他因为养成了这些习惯不再那么瘦弱了；我的邻座时不时地向我展示他卓越的消化力。每一次展示我都几乎忍不住要向他表达我的不悦，但是和平条约缚住了我的双手。我壮烈地忍受一切直到结束，八点半的时候我出去了，去吃了一顿更舒适并且不那么脏的饭。

再见。

天津，1860年9月29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无论自尊、爱国的情结会受到多大创伤，都应该向英军海军的优点鞠躬。多亏了他们，我们才有这不完整的幸运能够寄出我们的

信件。不幸的是，至少直到这一天，英国的邮船还没有给我们带来法国的信件；1个月以来，我们完全不了解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我们正为了法军海军的未来进行定夺，她放弃了职责以及一切自尊，宣布无法在冬季从上海横渡到天津，而这在英军看来完全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危险。——这样的状况使你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生活如此一成不变，我们唯一的消遣是溜冰者提供的表演，他们在被0.20米厚的冰层覆盖着的白河上来来去去。

俄国人设计了一种类似于帆船的装置，在3块垫板上滑行，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顶点安装了一个舵。这种新式滑板特别优美，并且滑行速度惊人的快。

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方法很原始，尽管他们有和俄国人一样熟练的驾驶员。乘雪橇滑行在一块两米见方的竹制脚踏板上，这个架子被很不牢固地安置在一个装有两块制动板的木框上；操纵着同乡的快乐舵手站在一端，双手握着挠钩，通过双腿的摆动，来操作雪橇。方向的变化稍微有点突然，因为已经获得的速度使得双脚的移动十分困难，我们几乎从来无法很好地把握。幸亏头部没有过多暴露出来。中国人驾驶雪橇就像在城市狭窄迂回的马路上抬轿子一样熟练。

如果他们想要单独在冰上滑行，他们会在脚下绑上两块长0.20米、宽0.03米的竹条，在两根铁棍的支撑下，他们享受着熟练溜冰者的所有快乐。当我们游览中国时，我们寻思这个国家如果没有了竹子会怎么样呢，我奇怪一个如此物欲的民族竟然没有一个纪念竹子的圣堂。这是一种坚硬又轻薄的芦苇，尺寸因为年数的不同而不一；0.20米至0.30米的隔板间隔使其变得特别结实。在他们最幼嫩的时期，可以当作食物，跟百合的茎有点像。随着竹子的长大，他们会成为篱笆以及用来承载负重的柱梁和圆木；用竹子可以

做成一整套餐具，人们用它来编睡觉的席子，挡雨的服装，灌溉的管道，等等。在我们那里，人们看到冰漂浮在水面上，认为这种反常现象启示了上帝的存在。同样地，因为有了竹子，整个中国都应该向上帝致敬，如果中国有宗教情感的话。

去年，在同样的时期，我们离赤道很近，在30℃的高温下，现在我们生活在冰上，气温为零下12℃。人的身体构造如此巧妙，可以毫不费力地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这是一件精密仪器，机件组装得如此完好，能够经得起人类从来无法超越的各种极限的考验。但是当人类失去希望时，身体的组件运作十分不顺，影响了整个系统。就像一只手表年幼的所有者；很好奇想要看到自己组装不同零件的能力，因为缺乏经验或愚蠢，把零件弄坏了。

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唯一生生不息的存在物，但是人类会自杀。我的自杀很缓慢，目前我还没有感受到太多自杀的影响，我很遗憾地看到在中国发生了自杀的事情，不仅为有着极大严重性的事实本身，也为原则的问题。没有别的事物能够使我预料到自杀这件事，感谢上帝和身体零件的健康，我希望能够抵挡得住天朝致命的影响。

我们大家都想要或者几乎都想要参加这次远征，也真诚地为回程祝愿。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民族事实上是最有趣的研究对象，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代替我们无法忘记的内在生活，对此的回忆是伤感和虚弱的孤独时刻最主要的诱惑力。探测未来的神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根据欧洲事件的复杂性，但是我们无法预料延长我们在中国停留的原因。我们得到了在那里能够合理得到的一切，我们只需要动身离开以躲开新的困难，我们的出现会引起的新的困难。对帝国来说这个十分艰苦的状况会导致它土崩瓦解。因此我们希望在5月或者6月左右回法国，到达的时间自然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路程，

经过开普敦或者苏伊土地峡。再见，亲爱的爸爸妈妈，时刻想着我，不要担心，上帝保佑明年我们能够重聚以享天伦之乐。

1861 年 1 月 6 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囚禁”还在继续，根据当地的气候规律，要一直持续到 3 月 15 日。我们因为海上绵延 4 公里的积冰脱离了文明。好像世上的一切事情都凑到一起了，我们在天津度过的冬天温度达到了零下 17°C 至 20°C ，夏天在木和纸的房子里温度高达 30°C 至 33°C ，这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人造冰冻地狱来惩罚虐待孩子的罪恶母亲，显然在这个国家所使用的不完善的取暖方式下，最大的酷刑就是对极度寒冷的体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唯一的原因，但至少有一点可能性。我没有强迫别人使用我的方法，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世上的事情绝不会毫无缘由地发生。有时候回溯中国的道德准则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害怕迷失在中世纪的迷雾中，然而一个虽然不确切但具有解释力的看法能够满足人的精神。很容易设想中国人的做法与其他民族完全相反，冰冻地狱正好是火焰地狱的反面，但是当我们面对着天朝的某些习俗时，我未必会被这个某种程度上被事实所证明的推理说服。

在这里，丧事要穿白色，人们总是把帽子戴在头上，自行脱帽会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人们看书写字都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左边是地位最高的位置，主人总是在客人落座后才坐下，进餐从点心开始，吃饭前先要喝东西，人们总是吃热的食物、喝热的东西。询问已婚妇女的消息是不礼貌的，男人们不能自己选择合法妻子，他们很早就结婚——有时候 4 岁或者 5 岁，由父母操办，他们在新

婚之夜前不认识许配给自己的未婚妻。独身会遭来反感，没有子嗣是一件不孝的事，无子嗣的兄弟们往往聚集在一起，挑选，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人收养一名女子，然后把她们相继送到他们其中的一个侄子那里，侄子必须轮流为他的叔伯们生出子嗣。相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中国人的一连串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反常的事情，确实会让人以为，只要推翻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物，就可以对孔子后人的作风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们难道不会同样这样谈论我们吗？

为什么丧事不穿白色？这难道不是一个比黑色更能表现悲伤的标志吗？这难道不更能表达尊敬吗？在法国，丧事穿紫色，这是王子教堂底座的颜色，从来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选择。

中国人从来不脱帽，首先因为他们剃了一半的头发，并且也可能害怕伤风，也可能是为了模仿法国的法官和军人，他们因为职业的需要养成了同样的习惯。

每一个中文字都有意思，对我来说，从上到下阅读要比从右到左阅读更加简单，右手握着毛笔，从右边开始书写比从左边开始也要更加合理。左边是心脏的这一侧，中国人更偏好左边，那么，我们选择右边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一家之主坐在最末的位置，很可能是因为他比先选择座位的我们更谦虚。

吃饭之前人们总是喝点东西，就像在法国，法国的苦艾酒可能就是从他们的桃子酒演变而来的，人们把它与饼干一起放在桌上供人享用。中国人喝热的东西，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懂得保健。

当地一位米什莱^①在一些关于爱情的作品中告诉中国人，女人

①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被誉为法国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译者注

基本上有病，这些作品的结论就是打听女人的消息是不合礼的。还有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在天朝，一个女人只为了家庭而存在，外人对她是不了解的，外人没有任何得体的理由可以知道她的健康状况。在法国，女人到处交游，每一个人都知道她，丈夫通常因为妻子而为人所知。一个已婚女人的生病，在我们可爱的故乡，是一个公众的不幸，很自然的，她会得到关心。你们不会不知道，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所有衰落民族的立法只有阴历。中国人的历法也处于这个悲惨的境地，他们的历法是阴历。我反复研究这个词，根据科学院的认可，阴历意谓：住在月亮上的东西。我们的国家通用词典确实经常有错误。

来到中国之前，根据法兰西学院 40 位院士的说法，我以为玉是一块绿色的石头，我希望我们的远征至少能指出我们的学者的错误。绿色的玉是最稀少的，在我看来，最常见也是最漂亮的颜色是白色。我准备在我回去的时候纠正这一点，我希望能提供很多的证据，但是代价非常昂贵。我们需要分四次向英国人支付这些物件的价钱。我用了 3000 法郎进行收购，正好是我所有的存款。我期待着月底我们的证券能涨价。如果这些东西都能完好无损地到达目的地，哪怕我的钱都花光了，但我将会有有一个诱人的陈列馆。花钱买这些东西无疑使我有幸能更早地在马赛拥抱你们，因为我的钱都用光了。我已经想到你们会责怪我身无分文地回来。我希望你们到土伦或马赛接我，你们是我的救星，否则我可是有家难回了。这再一次证明了财富买不到幸福。你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等我向你们解释清楚，你们就会理解我了。你们想想看：我这次到了中国，以后不太会有机会再来了。除非上天让我再次来，但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这个辽阔国家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发现了一些特别稀奇的东西，十分漂亮；我得到这些东西没有动手

杀人，确切地说，甚至还被人敲了一笔。反之，把钱存着，回国后消遣玩乐很快就用完了，难道这会更加合理吗？购买这些不再有机会买到的东西，并且享受看到它们的人们的幸福，难道不更好吗？我想你们找不出任何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了，你们同意了。土伦或马赛见。苏伊土地峡。

天津，2月5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因为一个阻止我们与欧洲和上海联系的冰层而与外界完全隔离2个月以后，我们最终收到了从芝罘陆路来的邮件。这是我们迟到的3班邮船的信件。我们接受了皇帝赏给中国军队的物资，但是除了工兵连，委员会认为不应该接受军官们的晋升要求。委员会只批准蒙托邦将军的任命，包括：利韦中校，迪普埃中校以及比我大两岁、晋升为营长的阿利泽上尉。我的提名已经变成了晋升表上的一个数字，一般都要在上面挂上3年。在中国停留了1年以后，我得到了晋升，当初离开法国的时候，上面说不想给我晋升，因为担心这对我有弊无利。这几乎是一个嘲讽：你们看到了在工兵连服务要有多么好的个性以及哲学修养。不管怎样，上帝保佑着我的健康，甚至在生命之上，这是我所想要的一切。

我们在天津度过了最艰难的冬天，超过了我们能忍受的限度，平均温度保持在零下14℃至17℃。胸部受到了严重的感染，但是我希望挺过这次考验，也许我所谴责的工兵连的生活是最好的。白天的时候，我忙着工作，以确保工作根据早上发出的命令被执行，我的小集团似乎组织有序。寒冷的严峻使得我们必须为所有人准备营地的床铺，铺满大部分的房间，用红砖和泥砌成的墙壁

听任空气漏进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能用皮衣取暖，房屋没有为冬天提供任何让人舒适的设施。我们只能期待着临近3月时白河会开始解冻，1个月左右以后全部融化，因为温度几乎会突然上升到零上20℃。

在8月3日的一次侦察中，我骑着马，霰弹打到了我的长靴底，不过只是轻轻地擦过我的鞋子，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中国的皇帝刚刚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在国家直至今今天还处于的孤立状态中，这个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直到目前为止都毫无用处。人们以为这是预示皇帝即将返回首都的好兆头。八里桥战役3天之后，皇帝离开了北京，来到了满洲其位于热河的居所避暑山庄，这个避暑山庄至今还在。

再见。

天津，2月18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在零下19℃的温度下给你们写信，跟你们说白河还没有解冻也毫无用处，我们的与世隔绝还要持续。我还是把这封信托付给一艘中国邮船，它将用一周的时间从天津航行到芝罘（180法里），我很担心它不是从这个站台出发的最后一班。

从1月起，我记下了两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是中国的新年，以及关于我们就要回法国的消息。我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转到最有趣的部分。陆军大臣接到皇帝的命令，向蒙托邦将军下达了准备远征军队回国的安排，让外交部评估开始撤离的时机。为了保证我们的统治，于1月21日被派遣到交趾支那南部的3000人留在西

贡，直到全部完成他们的任务，在我看来这项任务不应该超过3个月的时间，他们不久以后就会回法国，把海军陆战队留在这个新的殖民地。

对总是威胁着上海的叛乱分子的担心可能迫使我们占据这个城市，以保护我们在那里的机构，并且保护在中国这个并不十分好客的地方选择住所的为数不多的同胞的利益。我无法预料这支部队的出发时间，在我看来，造成他们之前处境的危险情况永远存在，除非我们针对叛乱分子重新进行一次远征。这个决定甚至只能推迟这种危险，但不能使其消失。叛乱分子目前占领着整个江苏省，直至位于太湖附近、离上海25法里的苏州府。6月他们已经来到了城门；只有我们的存在还在保护着居民，但这只是威胁中国的暴动进程中的一次歇脚，因此是否占领上海似乎还未确定。

在天津，离开的方针被接纳了，但是（在这个尘世间总是有各种限制）因为法国和英国的公使也不在北京，人们此刻在那里为他们准备旅馆，天朝皇帝坚持留在长城庇护下的热河，外交上找不到撤退的有利时机。她想确保公使们留在北京不会导致外交语言上所谓的纠纷。据估计，军队只能在5月动身离开北京，留下2万人左右，以通过他们的存在影响当地的人心。在一种完全安全的状况下，在中国首都居住二三个月对联军公使来说已经足够可以确保两国政府对下一步工作的缜密安排；这是我的总结。在组成我们军队的6000人当中，2000人在交趾支那，上将又要求了一个营，要求被接受了，调过来3000兵力供海军支配。外交部宣布：9月前不会撤出在天津的2000人。总司令认为军队不驻留上海是不慎重的，我寻思着撤退的方针会是什么呢？我很希望人们不要再向法国请求新的部队来中国，但是我怀疑是否能够使这个想法得到严肃对待。

蒙托邦将军及其随从确实为了离开、以及坚持能促成他们回国的方针作了比较好的准备，我确信他们将先撤退伤员和护士，如果没有更好的安排的话。

这样，我们将保住这些原则以及殖民地。再见。

上海，3月22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3月12日，我从冰层的囚禁中解放出来了，回到了上海，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从1月17日起被提升为工兵连的参谋长，但还是处于同样的军阶。如果我们在工兵连能为了履行职责任命一位下士或者军乐队队长的话，我们肯定会这么做。到上海的时候我收到两封信，一封是弗罗萨将军的，第二封是博德松·德·努瓦尔方丹将军的。他们通知我登上了晋升表，带着赞扬词，虽然值得更好的表扬，但是实际上一切都限于此，因为人们在一年前并没有预料到在高级军阶中可能会有空缺，至少在一年之内我被限定住了，要么更久。蒙托邦将军对我说，他不可能也这么做，我对此进行了挑战，他断定会成功赢得这个赌注。我从来没有这么热切地希望失败。

人们在讨论我们即将开始的回程，但是还缺少交通工具，在交趾支那的军队经过了严峻的考验，约1500人中有230人丧失战斗力。对于结果，人们一无所知。

P…过得很好，你们可以将此告知P…夫人。我们将会每天见面，将会经常谈起你们。回忆就是生活。

邮船离开了，我可以对你们说上一千件事情，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将其缩减到最少。

衷心爱你们。

邮轮离开的时候，正如我们通过占领上海能够预测的那样，我们得知叛乱分子出现在城市附近，他们烧毁了张官渡以及离上海 2 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石家巷，耶稣会士在这里有一所很大的中学。一位耶稣会神甫被杀，还有好几个妇女和孩子。神甫们离开了学校，带着孩子们来上海避难。

我所知道的这位尊敬的勒麦特尔神甫是有着最高功勋的人，我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

上海，1861 年 4 月 5 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开始撤退了，但是根据从巴黎来的最新消息，我们此刻可能还需坚守在那里。仅限于西贡赎回的交趾支那问题此时已经解决了，取得了新的均衡。我们谈论远征顺化的其他提议。在这种假设下，指挥权仍归海军，或者是没有参加远征西贡的蒙托邦将军被选定指挥此次远征？这就是问题所在？在第一种情况下，交趾支那的军队只得到了蒙托邦将军让出的 2300 人的一个营的增援，一个营暂时留在天津，第二个营留在上海。回法国的只有第 101 团，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部，作为工兵连的总参谋的我也是其中一员。这是一些至少有一定可信度的传闻。在第二种假设下，蒙托邦将军带着他所有的军队前往顺化，试图取得新的胜利。现在还很难知道会发生什么，最明智的就是不要想着即将马上回国。

根据中国当前的情形，我认为要毫无危险地从天津和上海撤军是不可能的。叛乱分子以及掠夺者利用我们刚刚消耗的天子的空虚国库，从上海一直散布到北京城门，他们与防御首都的僧格林沁军

队作战，引起了直至政府内部的恐慌。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江苏等地区落到了他们手中。

霍普·格兰特将军带着一支英军小舰队刚刚上溯扬子江并直达内陆 200 法里，发现这个国家已经被洗劫一空并遭毁灭。欧洲贸易的未来所倚靠的这个省的大部分丝织厂，因为这个似乎毫无限制的令人懊恼的形势受到了严重威胁。因此根据可能性，我们被迫保护这个我们刚刚动摇、并且可能导致其灭亡的政府，或放弃与这个注定要进入无政府状态的中国的的所有贸易。我们的国家贸易确实没有受到这个形势的太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放弃这个国家的话，担心后果的英军可能会对我们施加压力。我相信自从我回到上海以后就使你们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现在这已经成为了历史。

在政治领域，中国变成了东方的意大利；也在这里，不幸的是动乱不是一个修辞概念，而是叛乱分子每一次讨伐留下的烂摊子。并且欧洲确实离战火很远，她忙着参观阿尔卑斯山而不知道喜马拉雅山脉；但是世界如此小，所有动荡的问题都互相作用。据说意大利引导我们到了中国，明天中国可能令我们跨越莱茵河。我们命运的奥秘掌握在上帝手中！我们焦躁也没用，上帝从来不让我们获得解脱，总是控制着我们。

上海是我所知道的最讨厌的地方，阴雨绵绵，令人难以忍受的风，以及浸在死水中的中国人的墓地，到目前为止我的健康对抗着所有这种气候。P...也很健康，每天晚上我们都玩上一会儿惠斯特牌、唱唱怀旧歌，以此互相排解苦闷，这些音乐的变体还没有进入中国，我们很希望不会看到它们的到来。

再见，全心全意地拥抱你们。

你们忠诚的儿子

上海，4月19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可能还没理解你们的上一封来信，似乎是对我为人的一种指责。一个医生寄了 2000 法郎给他的父母，你们说，他把天津描述成气候适宜、适于生活的地方，他们应该让上海的伤员撤退到那里。当我给你们写信的时候，我尽量不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你们引以为榜样的医生肯定也会这么做。然而，并不是这些伤员没有经受住气候变化的考验；从这点上来看，上海可能是中国最肥沃的、最不利于健康的地区，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原因不把他们转移到天津。首先，被围困在一个方圆 4 公里的海上冰层 4 个月，这项操作是不可实行的；第二，对有着强壮身体和能够经受任何考验的胸膛的健康人来说，天津才是一个对健康有益的地方；在平均零下 14°C 的气温下，我们几乎全部受到了感染，医生称之为肺炎或急性肺炎。那些不懂希腊语或者不愿意利用这种语言使自己被法国人理解的人给这种疾病起了一个伤风的名称。有了这两个原因以及别的原因，与医生的意见相反，与其要伤员去适应天津的气候，还不如送他们回法国更合情理，我应该在天津买一块已经插好很多十字架的墓地：为那些伤员和牺牲的人。而对活着的人来说，他们可以用 1 皮阿斯特轻易买到 2 只野鸡、4 只小鸡、或 16 只野兔；对那些只吃着 3 种动物的人来说，物质生活并不昂贵，在那些奢侈享乐之地，想要吃蔬菜、牛肉、羊肉以及各色甜点以抵抗战斗带来的极端疲劳的其他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每月要花费 22 皮阿斯特 ($6 \times 22 = 132$ 法郎)，这个花销还不包括军需处提供的面包、酒、油、醋、配给的肉等等。因此，在这块乐土上，在厨师诚实的前提下吃

饱肚子每月的开销大约高达 200 法郎。

在法国我没有预测到，比我经历的赠送礼物更高兴的事，便是保留一个小小的中日博物馆。我已经花了 5000 多法郎收集各种藏品，我打算为此花费我所有的积蓄。根据这个陈述，你们可以相信我最后不会后悔的。

据你们说，P…夫人从她丈夫那里收到了满满的几箱稀奇物品，而你们还在等待我一年前许诺的那箱东西；解释很简单，整个远征期间 P…先生都留在香港或者上海，他为了把东西寄到马赛，总是与商人以及法国来的邮船有来往，他在马赛有个联系人。当 P…先生定期居留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北部游历，离能够确保联系的法国邮船 300 法里的地方，我们好不容易收到了来信，寄送大件包裹是不被允许的：因此我不可能像 P…先生那样做。此外，我在马赛不认识任何人，没法让人从海关接收这些包裹，至于我允诺的那个箱子，就要到了，你们将会比以色列人更快乐，但是必须信守承诺，或者如果你们更喜欢，只要进行推理就够了。1860 年 5 月“复仇女神”号船上委托给我的一位同学的箱子已经完成了寄送，这与之之前跟“复仇女神”号船长告知的安排相反。她已经在近 12 月份起航向法国驶去，这个箱子可能很快就能送到你们手中。当你们收到箱子的时候，我请求你们把那些宣纸画寄给巴黎勒加尔街 5 号的 M. N…。把这个画册寄给他有特殊的个人原因，请再附上两幅或者三幅棕榈叶上的油画，我将向你们高价支付这些东西。有一天你们也许会理解我是多么想把这个纪念品送给 N…一家。

我亲爱的爸爸，我现在已经是营长的军阶，你希望的似乎比我要多。首先请允许我告诉你，似乎有很多人关心我的晋升，所以没有人对这样的耽搁感到高兴，沉迷在他们对你所讲的恭维话中。我

必须给你上小小的一课，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个人：你很轻信并且根本不了解人心，你很坦诚，有一颗好心肠，但不用说也有一些不足，你把所有这些优点给了别人。因此只跟上校、R…夫人、我的叔叔、婶婶以及我很喜欢的这个勇敢正直的小伙子谈论你的儿子。告诉其他人我很好，当他们向你说起我的时候，就说我很幸福。他们很快就会沉默，没有任何的不快，对那些漠不关心的人，这就像别人的快乐。

这个问题一经解决，我就会告诉你没有人危害我，在那里，我可能没有大的后台，但是我也没有任何敌人，完全没有。我收到了两封将军的来信，满是亲切的言辞，人们当然更偏好这些话语，但是毕竟这不是一个反对的标志。N…将军表述如下：“今年我没有参与军阶排列，在我看来，人们太依赖这些名单以至于您会受冷待，只有给予您真正应得的军阶，人们才能更好地确保这样的轮流。我还要说，自从我加入委员会、有机会表明我对没有看到你位列名单之首的惊奇，F…将军支持我为您所说的好话。因此，勇敢一点，我留意到一个对你现在和将来来说都很好的机会，Y…上校接替允许退休的 M. B…”。

我很了解 M. V…，我们的新人事主管。M. B…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一切对他来说都变得无关紧要，除了我的事情。

这就是确切的情形。我在远方，只有很少的位置却有很多的人，商品稀缺。几乎是自然而然无法达到的，我现在被批准升为营长，在工兵连，拥有上尉军阶已经有 20 年了，而未来有可能持续拥有更长的时间。

今天，新闻出来了，蒙托邦将军于 22 日启程回法国；据说我们将在 1 个月启程。我会通过下一班邮船给你们寄去更准确的消息。所以，再见了，并且不久就会再见，我全心全意地拥抱你们，

并建议你们要耐心，我也很有耐心。

我忘记跟你们说，蒙托邦将军为我专门给大臣写了一封信。将军没有直接回法国；他去了西贡，攻打交趾支那首府顺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但是我们普遍认为这次远征今年难以实现，并且皇帝希望军队明年之前回国。

上海，1861年5月3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5月8日我动身去西贡，总司令应该在那里与海军准将一同商量远征顺化的时间。从法国来的最后的两班邮船带来了皇帝给蒙托邦将军的一封信，以及陆军大臣的训令，指出对交趾支那首都进行的武装进攻的可能性，如果武装进攻不成功的话，则确定包围顺化。上述这些愿望，与之前在最短时间及所有情况下撤出中国，以及为所有部队在当年年底返回法国作好准备的命令，很难取得一致。面对撤退的开始以及部队因为人员伤亡的缩减，总司令认为远征顺化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今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敢自己决定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皇帝的心病，他为此咨询了准将并与之草拟了一份关于这两个主张的备忘录。

在这种情况下，准将的意见是马上开始远征顺化，蒙托邦将军立即指挥从中国召唤至西贡的所有部队，带着他们一起从岷港向安南的首都进军：如果相反的，准将与蒙托邦将军的主张相似，远征中国的军队就只能回法国。因此，与从日本动身的参谋部在西贡会合后，我们将全部前往苏伊士并在那里登陆。

因此我有可能在3个月后回到图卢兹或者可能还要一直等到1862年的1月。

总司令的主张不仅是军力缩减的结果，更是因为没有军队驻留天津和上海可能导致的危险。反叛分子已经到了这两个城市的城门。我们的离开可能会使得他们变得更大胆、使中国皇帝的存在受到挑战，我们在中国的贸易和未来也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从现在直至标志中国改革振兴的一个不确定的时期里，如果可能的话，除了无限期地占领天津和上海，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就像我在上几封信的其中一封中跟你们说的，我认为倚靠现任政府与倚靠取而代之的政府同样是不谨慎的。中国已经瓦解了。中国人既没有道德情感，也没有爱国情结，个人像散沙一样，一点都不团结，不能为政府提供任何力量，不管是哪一个政府统治北京，他们都不受管制。如果我们要保卫欧洲物质利益的未来，就完全不应该依靠一国之主的权力或良好愿望，这些都同样不起作用。只有在欧洲军队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安全感，军队会引起当地人的有益的恐慌。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对这个巨大帝国的瓜分会在今天或明天发生，我们的离开会加快这个政治现象向着对北部的俄罗斯人和南部的英国人有利的方向发展。皇帝应该了解这个形势，可能很明智地，不会让这两个欧洲强国成为这个没落国家的主人，但这个国家在有智慧的、强有力的组织的推动下，仍拥有令人生畏的力量。陆军建立之初不是为了充当这个指定的角色，但是海军陆战队至少可以很顺利地接替陆军，即使不能完全取代。

拥抱你们。

新加坡，1861年6月5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当蒙托邦将军回法国前经过西贡时，于5月7日任命我为营

长，代替4月13日牺牲的阿利泽营长。根据同一个命令，我要指挥西贡的工兵连，但是海军为了更自由地行动，不需要我和拉波塔利埃尔中校；因此，在博纳米军需助理离开后，炮兵部、工兵连、参谋部甚至军需处目前都没有高级军官。因此我会跟这些先生一起回法国，除非有一份急电让我们停在苏伊士，等待蒙托邦将军关于远征顺化的命令，这次远征根据部队的实际状况是不可能的，并且如果我们只考虑陆军和海军长官的安排，远征的可能性极小。

我匆匆地给你们写信，没有接上一次的内容，邮船明天出发，我们自己比邮船早几个小时，但是它很有可能比我们先到，我们将在锡兰、亚丁尤其是埃及停留几天。我的信无疑会比我先到，我们没有考虑会在7月20日之前回到土伦，我一到就会电报通知你们。我特别请求你们得知我的晋升后不要太高兴，不要为此到处尖叫，你们在欢庆的时候只能发现那些漠不关心的人或者那些不太高兴接受这件事情的人们。另外，要知道，还需要皇帝批准蒙托邦将军已经提出的任命。

不久见，很高兴就要真的拥抱你们了。

土伦，7月27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对着镜子触摸和审视自己，为了确认和刚刚几个月前还在天津的我是同一个人。我几乎要掐自己，但我不想把这种感受积得太深。还有两个理由使我相信我的同一性：土伦港的味道，我在自己的记忆中重新找到了，以及我在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丢掉的习惯，到了目的地，我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体貌特征的特殊标志，描述中最重要的部分。精神上也没有任何改变，我还

是作为格罗·让回到你们身边；至于外貌，天生的谦逊不允许我对此进行描述。衣着的问题是最严重的，我更换了我所有的衣服和带花边的内衣，人们只能看到齿形花饰和圆花饰。

如果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的嗓子没有被酒精烧坏，我会把我的衣服借给他，让他表演唐·塞萨尔·德·巴萨恩的第一幕剧。这件小玩意儿花光了我所有的钱，因为我的运气很不好，我觉得什么都不贵，我相信了人们在中国皇帝夏宫圆明园中所说的话。

今天晚上我乘8点钟的特快列车从土伦出发，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有可能在10点或中午的时候到达图卢兹。结合以上信息，你们再去车站看看时刻表核实一下，我真的搞不清楚列车到达的确切时间。

最后一次在思念中拥抱你们

你们忠诚的儿子

在海上，1860年2月20日

夫人：

请允许我和 M. N …稍微与您谈一谈，让您了解我每日的思想，在这个漫长的横渡中，首先我们只看到悲伤和单调。将您和我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我的精神跨越了时空，分离并未对情感产生致命的影响。但是我不想让您成为我私心的牺牲品，在我所有的感想中，我会选一个也许能令您稍微感兴趣的。如果我没有这个荣幸，请宽恕我，考虑到在荒无人烟的大洋中间，只看得见水天一线，只能沉思冥想，一切侵袭我们情感的东西都唤起了无尽的想法。灵魂逃出外壳，奔向永恒，去探索未来的神秘，而当被这些抽象的想法压倒时，她又要求在尘世间得到一点安宁，她重新回溯以往的生

活，以再次享受过去宝贵的幸福时刻，这是世上最大的幸福。因此享受生存之幸福就是航海者的快乐，他们也普遍存在伤感和遗憾，我从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

巽他海峡，4月9日

夫人：

您对晚上从非洲最末端浸泡于海水中的山的侧面摘的这片树叶感到满意吗？长着这片树叶的树在克拉伦斯城附近，这是唯一还保留有几个法国名字的村庄。可能，它的存在应该归功于南特赦令中的一个不幸的牺牲者。据我所知，自然主义者称之为普罗蒂亚，一般民众称之为摇钱树。微风轻拂，偶尔有月光透过众多的树木，使它们闪闪发光，令人以为是树林之上有湖水在波动。

夫人，您看到了我努力使您对这片可怜的小叶子感兴趣。我担心她不值得您的热情，如果除了为您而采摘之外我没有赋予它另外的价值。

此刻我们已经有将近5个月没有任何法国的消息了。我们希望能开普敦找到我们的信件，然而预料落空了，信件可能往香港去了，但是还有一段长达3个星期或1个月的残酷等待。我很高兴给您寄去了我在好望角旅途的感受。我必须缩减细节，但是我记得您偏好长信，我请求您的宽容，我抵挡不住诱惑；因为我们离法国越远，思念就越强烈。记忆中的眷恋更深了，友情也变得更加珍贵。远征中国如此改变了我们的存在，不应该把我们归为另类；当然我们在一点点地经受我们所穿越的这些国家的影响，大自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壮观景色。我们会变得更好吗？上帝知道！但是我应该向你们承认，从那一天起我变得如此冷酷无情，因此我打算再一次让

你们遭受收不到信件的痛苦……

夫人，我向您表达了我的感受，不必担心它们的产生说明了什么。您可能发现它们经常与被普遍认可的想法相抵触，甚至可能永远不会与你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一致，但是我希望您能够告诉我您的异议，我将总是乐于试图赢得您对我信念的赞同。

再见了夫人，请相信我对您的家庭永远保留着最愉快的回忆。

新加坡，17日

我们前天到达新加坡。这个是十分值得参观的城市，与开普敦完全不一样。这里的东方人保留着自己的习俗，各个种族——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和欧洲人各自拥有自己独特的体貌特征，显露了他们的根源。直到这一天，我们只知道这片海域中有两个蛮族：英国人和荷兰人，我们很惊奇地看到第三个民族，拥有一支同样强大的海军。

我不知道英国人是否参与了这个消息的散布，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是为英国政府服务的。我们企图使这些勇敢的中国人幻想破灭，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军力，并且只是不完全地知道我们的存在。

再见了夫人，想着我并且请接受我最诚挚的问候。

新河营地，8月26日

夫人：

我日前收到了您的第三封信。因为邮船明天早上出发，我用晚上的一部分时间给您回信，在一顶十分简陋的帐篷里，但这是

一个迷人的夜晚。很不幸的，我没能收到您5月的那封可能遭遇了海难的信件，葛罗男爵到达的时候，我更加懊悔您的缄默使我担心自己变得令人讨厌，我几乎不敢向您讲述我新的感受。我想念您，但没有跟您说起，我请求您原谅我的敏感，这是我不能克服的一个缺点，今天，您又给了我信心，以及一点点幸福；正如您所说的，虽然远离我们所爱的人和物，我们还是可以得到幸福的。被派往国外确实是自愿的，但是这也不能使其变得不那么残酷。精神在一个未知文明所呈现的全新概况中发现了研究的内容，但是心里只有回忆能使这些愿望得到满足；带着怀疑和失望的回忆。只有人类才会想念远方的人。只有人类才会冥想，并且把所有的痛楚都联系在一起；对人类来说，分离就像是向着永恒的分隔迈出的第一步。

这个不幸的母亲，您的朋友，使您变得更加给人好感，从来没听说过遥远的旅行，从不流泪，从不想念她的儿子。所有这些痛楚都是姊妹，所有这些苦难相互了解、相互吸引：您在悲伤侵袭的时候有一个优势，您可以表达出来。我的一个朋友在意大利战争快结束时失去了他年轻的妻子，在他妻子去世前，他克服困难很快地回到她身边，陪伴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然后，他忍住了他的痛苦来到中国，因为担心呆在他曾经幸福生活的地方，会引起他痛苦的回忆。

但是社会的要求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人们理解沉重的不幸不应该使人忘记将来的职责。社会看到了这些在心灵痛苦后还活着并且需要帮助和保护的孩子：除了母爱，还给予他们父爱以稍减伤感，与之分担痛苦。性格的力量不是一个简单、毫无意思的表达，它是真实情感的结果。最不幸的是那些在极度痛苦之后，只看到漠不关心和孤立无助的人。

您通过报纸知道对华战争结束了。结局异常成功，所有的荣誉都属于战士。这次远征是序幕加五幕表演的一场戏剧，结局留给了外交部。序幕在上海和北直隶港湾附近的芝罘上演；主要演员通过古代悲剧的方式使自己被认知。联军双方的总司令、少将和特使都在场上扮演角色。我们在中国最肮脏的地方上海筹备了医院和一些公共机构，用来提供军需并接受军队所有的病人。一切似乎都在预料之中，为了未来进行了有机的组织，军队生活在富足和舒适之中，这一切一直到今天都是不为人所知的。我们只成功地招致了叛乱分子攻打上海，他们直达上海城门口，引起了恐慌，吓坏了有正统观念的中国人；我们的开销很大，我们在一块被沼泽围着的墓地中间造了一所医院，这些沼泽地拥有最有利的条件摧毁病人的健康，人们遇到了贸易纠纷，我们组织军队从芝罘出发，经过6个月的航行后，在锚地停留了1个月，在那些把军队像囚犯一样关在里面的船只上可以看得到上海。在3个月的等待后，我们最终决定从中国，或者说从中国政府最易受攻击的地方进军。

第一幕中，故事发生在北塘口。随着帷幕的拉开，8月1日我们看到了1公里海岸线上的被水浸湿的炮艇。两个炮台保卫着河口，还有一个绵延近2公里的泥滩，在这个淤泥海洋的尽头，地势渐高，似乎给人以希望。

晚上5点，下达了登陆的命令，英军首先下船，但是他们好像在为陷入淤泥之前做着准备工作，因此我们的士兵超过了他们。大约1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有很多困难要克服，泥浆一直没到我们的膝盖，每个人都毫无方向地走着，顾及不了旁人。我们最终到达了一块地势稍高的土地上，我们只在那里洗了洗脚。另一个失望在等待着我们，这块地势较高的土地只是一条河堤，两边是充满水的沟渠，四周各个方向都是沼泽。军队就是在那里重新集合，准

备在海军正面攻打炮台的时候马上进入位于河口的北塘村庄。

我们礼貌地等了英军先头部队半个小时，根据安排由他们在前面行军。纵队的先头部队离村庄只有几步之遥，居民们毫不抵抗地来到我们面前，恳求我们的宽大。白天即将结束，整个军队难以在天黑以前占领北塘，人们只让联军的先遣部队进入，我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要塞。幸运的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形下中国人没有料到我们会登陆，因此我们未进行军事侦察也没有产生不好的结果，虽然军队应该在所有行动之前进行这样的侦察。

8月2日我们进入北塘，在那里一直停留到了11日。12日早上5点，我们果断地开始进军，与敌人决战，通过从北塘通往白河必经的河堤。走了8公里，我们看到了清军骑兵，围着联军到达的地点形成一个半圆，倚靠两个小堡垒，向我们行进的方向开火。战斗马上激烈地开始了，但是敌人被迫放弃了阵地和炮台，退回到横跨整个新河庄、有堡垒保护的桥上寻求庇护。尽管满是水的沟渠使得状况更加困难，我们还是占领了这个村庄，而中国人逃到白河左岸一个筑有雉堞墙的营地，以及位于河流上游保卫着河口的炮台。

同一天晚上，还是没有进行预先的侦察，我们试图拿下通往要塞入口的北塘；我们的左右两边全是沼泽，步兵无法展开。一阵十分激烈的炮轰从敌营发出，接连向我们攻击，阻止了我们的进军：形势十分危险，我们回到了新河营地，并将这次失败美其名曰为火力侦察。

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侦察；由杜潘中校指挥，有50个人，我也在其中。我们发现了一块沿河的平地，十分结实，使得炮兵连能够靠近筑有雉堞墙的营地，只要用搭桥的方式跨过几条沟渠或水渠。我让士兵们在那天晚上搭好了桥，一切准备就绪，

14 日开始第三幕行动。

早上 5 点，英军在我们右边展开，就像在这约 800 米长的壁垒前进行军事演习。炮兵连在 400 米处安置了 24 门大炮准备开火，一半是英军，一半是法军，8 点钟我们开始肆意开火，我们发了 2000 炮弹，突击队前进了。参谋长施密茨中校指挥战斗，我们遵从他的命令；我们必须通过云梯跨过这两条壕沟，但是因为云梯稍微晚到了一会儿，我们游泳过去了，毫无阻碍地到达了壁垒，而狙击兵分散在筑有防御工事的壁垒四周，向那些防御者进行扫射。

当我们进入的时候，中国人通过这个长 1200 米、宽 1000 米的巨大堡垒中的几条小路逃走了，堡垒四周全是河道。这个白天我们损失并不大，只有 30 人受伤丧失了战斗力，我们的火力给中国人造成了很大损失。英军司令的主张如此坚决，因此蒙托邦将军派柯利诺旅长辅助他实行他的计划，自己却没有参与袭击。

工兵连的 100 人被指定协助这次军事行动并指导架设云梯。中校指挥工兵连，我是他的助手。4 点钟，我们离开了营地，快 5 点钟的时候，我们听到大炮开始了第一轮扫射。

白河口沿海的一边受到五道防栅和五个炮台的保卫，四周被涨起的潮水淹没，每一边都有 3 道壕沟，密布着各种附属防御工事，很难突破。这些布防确实使海军难以攻占炮台，我们没有发现英军有什么特别的不成功，尤其是当他们疯狂地从海路攻击时。陆路上，如果几天没有下雨，土地则会比较结实，但是我们也要跨过同样的壕沟以及附属防御工事。河的左岸有两个呈阶梯形排列的炮台，在河的上游并且受河右岸炮台的掩护。

5 点钟，我们看到敌人的炮台对我们进行了猛烈的炮轰；双方炮兵连火力全开，十分猛烈。海军尽管离得很远，大约有 1500 米，但仍用他们的炮兵协助摧毁最靠近河口的第一个炮台。快 6 点钟的

时候，15分钟路程的地方，在左岸的两个炮台里各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标志着袭击的开始。我们向前靠近了300米，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地形，部队在后面按照地形进行排列，等待攻击的信号。7点钟我们命令狙击兵行动，他们应该走在云梯前面，60个工兵跟着他们，随后又是四个步兵连，一共有五六百人，英军人数也一样多，剩余的兵力在稍远的地方留作备用。至于工兵连，中校从右路进攻，我负责带领士兵从左路进攻。我们一到达壕沟的两边，一阵尖锐的连续射击就对我们发起，好几个云梯的搬运者被击中了，我们只能费力地游过这些壕沟，十分困难地通过了壕沟之间的空隙。最后终于到达了6米高的壕墙脚下，炮攻对他们毫不起作用，因为墙是用黏土建造的（烂泥和碎稻草），没有云梯我们无法攻城。在中国人向我们发射的各种各样名副其实的枪林弹雨中：铁球、长矛、弓箭、石块、树栅，我们等了很久，第一架云梯被人从炮台内部掀翻，我们接着架起更多的云梯，有很多都损失了；最后，在半小时或45分钟以后，6个法军同时登上了壕墙，分散了毫不退缩并且要发动一轮更严酷的抵御的敌军兵力和注意力，但是我们士兵的刺刀无所畏惧，我们占领了炮台。

敌人在一片溃败中撤退到河口，我们立刻升起了国会的旗帜，我们给了他们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撤退，1点半的时候，我们未经战斗就进入了第一个炮台。这次战斗使中国人害怕了，在快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统领暨提督被打死了。右岸的炮台也在同一天被拿下，第二天在天津开始了谈判。我们等待着和谈的结果。

对这个如同古老的中世纪要塞的围攻使我们死伤了150名士兵，英军也损失了这么多人。因此比例达到了千分之三百。工兵连的60人中有两名军官和15名士兵受伤。这一次我很幸运，18日我的名字出现在授予军队的众多表彰者当中。

我请求您的原谅，夫人，原谅我讲述的这些战斗细节，我希望这些读起来不会很令人不快，尤其是不会很难理解。

我很高兴收到了您在您的花园真心采下的这朵花。我很珍惜它，您的想念给我带来了好运。再见了夫人，请允许我真挚地握着您的手，并请把我当作您最好的朋友之一。



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

[法] 布瓦西厄 著



内 容 提 要

布瓦西厄少尉

古斯塔夫·德·布瓦西厄的《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从来没有在书店或商场正式销售过，这是一本由作者自费出版的书，也就是说没有编辑。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发起出版这位死于 1870 年普法战争的年轻军官的书信集。因此，1878 年出版的本书十分珍贵。

这本书只有四十来页关于他参加远征中国的情况。但是这些内容十分值得关注。因为，像贝齐亚上尉一样，这位 24 岁的年轻少尉愤慨地揭露了对圆明园的劫掠。十分正直，接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他对自己的同伴在这次远征中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尤其是在北京。

布瓦西厄少尉详尽地描述了皇宫圆明园，同时承认：我们确实参观、搜索、破坏甚至掠夺了一切（因为这是真实的话），并且随后我们烧毁了它。

他对破坏和洗劫圆明园所作的描述令人感到可怕，心寒，在读者内心激起了愤怒。这简直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他写道：圆明园现

在只是一个回忆，数天以前，它是一个可能比凡尔赛宫和罗浮宫加在一起还要富丽堂皇的皇宫。

他补充道，我不知道欧洲舆论会怎么评价对华战争这可怕的一幕：有可能将我们看作野蛮的汪达尔人。

伯纳·布立赛



他从图卢兹寄来的信件只讲述了一些个人情况，都是他对部队生活和对家庭的回忆。他向父母汇报他的日程安排、训练情况、侦察情况、文学消遣及其阅读情况。他负责管理新兵，兢兢业业。在接到新兵的六天以后，他就记住了几乎所有新兵的名字；知道了谁是笨手笨脚的，谁是心灵手巧的；一切都分门别类记在笔记本上，并且几乎记在了脑子里……这项工作，虽然名声不佳，可他却干得不亦乐乎。这是因为新鲜感起作用？可能有点儿。“但是，他补充说，我认为也是因为我永远坚信的一个原则：一项工作，不管它有多么枯燥无味，只要人们真诚地用心去做，一般地说最终都会喜欢它……”

对古斯塔夫来说，1859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万塞纳射击学校或沙隆营地度过。在他以最喜欢的实践方式进行他的军事训练期间，万恶的法国工兵部队让我们的部队参加了不幸的意大利战争，这场战争的荣耀已经揭露了很多的不幸，其公开承认的目标恶劣地隐瞒了秘而不宣的企图：掠夺教会，推翻罗马教廷，统一亚平宁半岛。这一切都明显地预示了德国战争的发生。当局虚伪的保证为这场充满危险的战争招募了很多天主教徒。他们天真地以为是去解放

意大利以及教会，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对于这些不幸的地区来说，革命这个讨厌的桎梏比奥地利帝国压在他们身上的桎梏更加令人讨厌。和大多数年轻的军官一样，古斯塔夫被表象迷惑了，热切地决定并且希望参加远征。他的家庭并不赞成他对这场战争的政治结果和宗教结果的幻想，规定他只能追随他的营的命运，并且相信上帝对他的命运的安排，不要做任何促进或可能阻碍上帝的安排的事情，尤其是在宗教理由很容易被利用的情况下。有一天，他的父亲像有预感似的跟他开玩笑说：“比起这场可悲的意大利战争，我更愿看到你出发去参加对中国的战争。”

这年的11月4日，这个愿望实现了，说实话，他的家庭并不希望如此快地实现。

沙隆营地取消以后，第3轻步兵营被派往里昂。除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的父母，为了响应父亲的想法，并且可能也是因为私下希望能够进行几天的远征，古斯塔夫还补充说：“就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既不是摩洛哥也不是中国，但是却很可能在那里被派往前线……”没有想到，他猜中了，6个星期以后，他十万火急地给他母亲写信：“人们刚刚来我房间，正式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对中国的远征。我有两分钟的时间思考并回答愿意还是不愿意：我回答愿意。如果我有时间征求您的意见，我亲爱的母亲，我可能得等一等才作出决定；但是必须马上作出决定，并且我选择了我早就有意向的一边，我一直对环游世界有很大的兴趣。”

然而还不能确定他是否能被这支将要对一个巨大的帝国进行报复的小部队录取，因为申请者人数众多，并且被派往中国的唯一一个轻步兵部队只有6名少尉的名额，机会很小。但是卡斯特拉元帅的一份好心肠的评价立即为他赢得了任命，他带着军衔，隶属于参加此次远征的第3轻步兵营。时间紧迫，只有准备动身所必需的一

点点时间。他在家度过了这段时间，家里同意他的计划，但并不是毫无痛苦地听任这次漫长又痛苦的分离。

在布雷斯特，他参加远征的资格险些受阻。营里的军医看到他这么年轻并且英俊，认为他很难经受住这次旅程，叫他最好慎重地放弃。他不知道在这具青春的身体里隐藏了多么坚强的气质，并且这个灵魂拥有怎样的精神力量，他的外表只让人看到了挺拔的身姿和可爱的魅力。

在布雷斯特度过了3个星期，等待出发使他的内心感到痛苦，但并没有动摇他的决心。为了安慰他所爱的人和将离开的人而积累起来的那些信件充满了最温柔、最真挚并且最动人的感情。回国的希望和快乐缓和了这些信件可能引起的痛苦。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严肃而崇高的想法，以及他打算从这次漫长而美妙的路程中获得的成果，只会更加坚定他父母给予这个值得赞扬的决定的同意。他20岁的轻松快活也为这长久的分离带来了几线迷人的光芒。他在战斗和旅途中的同伴是些同届同学，这些人都是真正的朋友。他们一共6个人住在同一个小房间，被囚禁在海上的5个月时间里他们跟他们一起过得很愉快，这是友谊的试金石^①。“你们大家都知道，我要求参加这次远征并不是为了离开你们，我是如此地爱着你们，我是多么地想回到你们身边并且能长久地和你们在一起；不，我是想参加一场漂亮光荣的战争；想趁着我还年轻，利用我的一生来学习、发展我的事业，参与一项在任何方面都公正合法的伟大又崇高的事业，这样的事业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碰得到的……”

① 他把这个房间的详图寄给了他母亲，住着的6个人是：贝吕纳、穆蒂耶、加利马尔、加雷、维拉特和布瓦西厄。他们给它取名为“圣·日耳曼村”。“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古斯塔夫说，正像你们所想的，我们亲密无间。”哎！他们太给这个名字以尊敬了：贝吕纳死在了文趾支那；穆蒂耶，只要靠近他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责任和荣誉，在圣·普里瓦被杀了；而古斯塔夫！……——原注

“我利用在布雷斯特的最后时间向上帝忏悔。我们三个找到了维拉尔神甫，我们请求向他忏悔我们以前的罪恶，希望卸下包袱。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向一个甚至比中国还要遥远的国家出发，希望上帝能满意这次即将到来的旅程。

“与我一起搭乘‘罗纳’号运输船的这些少尉真的非常好，让人感到很开心。此次我们一共有12个人从学校毕业，都是20到24岁的年龄，都还没长多少胡子，也不太理智，但是是一个快乐真诚的团体，横渡中的所有疾病和烦恼也影响不了我们的团结，这大大地减轻了乡愁。

“这天早上，我与这位善良完美的P…夫人说再见，她像母亲一样哭着拥抱我，把贝吕纳托付给我（她最好的朋友之一，不幸在交趾支那牺牲了）。在我看来，她几乎就是我亲爱的母亲，听取她的建议、她仁慈的话语并接受她的道别，我好像瞬间又见到了您，再一次拥抱您。”

不管我们多么不耐烦地跟随着古斯塔夫开始了新生活，看到善良富有的他的成长，通过对人和事的思考、体验以及研究而迅速地成熟。我们禁不住还想要引述他在布雷斯特锚地写的最后这封信的一个片段。他的感情在这些倾诉中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啊！人们多么理解对祖国的强烈的爱，稍晚他会表现出这种爱，这种爱源自对家庭的爱，家庭是第一位的和天生的祖国。

他向他的父亲进行了感人的告别，以减轻他对回程的盼望，这个可能比我们认为的更早的回程，之后他又说道：“我亲爱的母亲，我也想对您说再见并且尤其要拥抱您。我带着上帝和我母亲的祝福出发，您知道的：没有什么不幸能伤害到我！因此，再见了，我亲爱的母亲，要对未来有信心，就像我一样。当你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再一次祝福我：您的祝福会在海上找到我。她将成功地把送我上

岸，并还给你们一个更有知识、更进步并且总是一样深情的我。我用尽所有的温情拥抱您……也向你说再见，我亲爱的阿米迪^①，请原谅我忘记了你的生日。我本想给你寄一个比我那难看的漫画更加珍贵的礼物，让我特地去中国给你带回来吧。让我们好好地拥抱并且说再见吧……最后向你们大家道别了。我会不停地想念你们，你们也要想我。我为了一项美丽并崇高的事业而离开。上帝会让我回到你们中间……已经起锚了，我们现在就出发了。所有人都在甲板上；军乐队在演奏；每个人都看着渐渐远离的法国，我向你们保证我的心在怦怦地跳。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轻松，每个人的内心都很沉重……领航员要了我们的信件；再见，再见了！微风袭人，海面平静，并且我的健康状况很好。”

我们希望在6个月的横渡中陪伴他，他带来如此多的幽默和趣味。除了在这次如此著名的远征途中所写下的一切，关于一路行程以及在特内里费、好望角和新加坡停留的细节和感受中，我们将发现很多新颖的、合理的评价，还有很多动人的插曲。其中总是混杂着对家庭对祖国的回忆。他的描写细致入微，但不仅限于个人私事，古斯塔夫的军事描写也十分吸引人。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有趣的一段话，是他写给母亲的，标题是：新加坡一个美好的早上。这是对在旅行途中的一个教堂里复活节领圣体的记述。我们不全部复制，只引用最后几行：“离开这个我刚刚度过了如此美好时光的教堂，我寻思明年这个时候我会跪在哪个大理石或草坪的祭坛脚下？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要试图从他那里窥探未来；我们只有祈祷，如果他愿意把我们长久地保留在他的爱中，保留在爱我们的人的挚爱中，并且使我们在回来之时重见我们所离别的所有人。”

① 他的弟弟。——原注

在香港、吴淞和上海各地停留之后，1860年6月8日，“罗纳”号最后把她的乘客们带到了芝罘小半岛附近。军队在那里等待联军司令将要采取的部署的通知。在芝罘的6个多星期里，军队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地形、进行侦察、制订作战计划，以及对威胁上海并可能使其在远征中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叛乱分子的追击。气候有益健康，食物充足，和当地居民关系良好，这一切都对军队的健康和精神状态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军队对即将要面对的劳累作好了充分准备。直到7月25日，我们这支由8114人、1200匹马和28具大炮组成的远征军才分乘22艘军舰出发，去征服一个有着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英军人数要稍微多一些。

从8月14日起，古斯塔夫开始接受战火的洗礼，奉命袭击塘沽村，这个村庄筑有灵巧且十分严密的防御工事，从北塘和新河战场败退的清军军队撤退到了这里。18日，在他身上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即使不能说很严重，至少对初次经历意外的人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工兵连的一名上校，在第101团一个营的陪伴下，受命侦察白河右岸的地形，并在那里安顿工程兵，以便为即将攻打防御白河入口的炮台作准备，结果受到了从河岸有利地形下发起的激烈扫射，并且不断受到小山丘的阻碍，四周都是葡萄园、果园、各种各样的灌木丛以及很多的墓地，我们的侦察受到严重阻碍。得知这次战斗的危急形势，总司令马上命令第2轻步兵营支援第101团。但是，当营里的大部分士兵在搜寻高地并将清兵陆续赶出那里时，穿过这个小战场的最初两个连突然孤零零地处于一个布满骑兵的平原上。“我们一共可能有120人，”古斯塔夫写道，“属于第二连，我们确实必须面对三四千清军骑兵，他们拥有大约15具大炮，不停地向我们开火。幸运的是，这些骑兵是些满人……我们这样打了一个多

小时，士兵们尽可能地利用墓地作掩护，展开单独行动，现在，我们从六百到八百米远的地方射击，这群骑兵沉稳冷静地抵抗住了我们的射击，但是没有前进！……炮弹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的四周。果园离我们一公里左右，这是我们在清军发起攻击时唯一的退路，他们应该不能追到果园里……营里其他的人没有出现。我们的人在英勇反击的同时也非常担心，不停地朝我们的援兵应该出现的方向看去。我向你们保证，我也不是没有一点担心，炮弹在我的耳边呼啸而过，很突然，但我没有感到丝毫害怕。我一边使自己镇静下来一边安慰我带领的士兵，指挥他们射击；我手拿望远镜，校正他们的瞄准并给他们指出目标。最后，在漫长的一个多小时以后，营里的两个连队突然出现在平原上。这时，我们的士兵奋勇急冲。大家高喊着：前进！所有人都跑步冲向掉转缰绳的清军骑兵，冲向炮兵丢弃的大炮。”

这封信难道不更像是一位老军人写的，而不是一位第一次目睹战火的21岁的年轻军官写的吗？在这个年龄如此天生的英勇，并不是他最突出的特点；沉着冷静，以及对部下的忠诚，对他们生活和荣誉的关心，无不在他身上体现。法国军官和基督教徒的这些情感主宰着他并在他的一生中凸显出来。

三天后，在经过持续几个小时的激烈辉煌的战斗之后，大沽炮台落入了我军手中，古斯塔夫写道：“哎呀！可惜我们不在那儿。”在人们夺取左岸炮台的时候，他所在的营驻守在白河右岸。这不是他遗憾的唯一原因。入河口被攻取了，很可能没有什么能再阻止去年在天津签署的和平条约了。直隶总督或多或少真诚的担保证实了这个普遍的看法。因此人们似乎看到了战争的尽头。“战斗平淡无奇；所有的炮台都被攻占了……我不会要求你们分享我的失望；我不会向你们倾诉我的抱怨……我们所做的开了一个好头，但这对于

一场战争来说太微不足道了：这不值得6个月的长途跋涉……”比他们的军队更顽固并且资源更丰富的天朝外交应该为我们的士兵提供其他的补偿和胜利。

18日事件后再曼旅被安排驻守小梁子村，古斯塔夫经常从小梁子村去参观大沽炮台：“他带着一种特殊的兴趣研究这些炮台。”他在给他兄弟写的一封激动人心的长信中描述了这些了不起的白河防御工事。通过讲述战斗发生的场地、战斗中的波折、应该攻克的各种障碍物、进攻的猛烈和巧妙，他对他的一个朋友杜舍拉表达了公正而感人的悼念，这个朋友因为过早地单独进行袭击而壮烈牺牲在了战场上。除了这些庄严感人的场景，他还画了一幅小小的风俗画，他认为这应该能减少他家人的伤感。

接到了停战的消息，士兵们认为向中国人收取战利品的机会到了。机会、缺吃少穿、战争权的陈旧偏见，使得他们在附近村庄进行了真正的掠夺。“虽然有严格的命令，还是有一些人避开了哨兵，我有了想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念头。有一天我和另外三名军官一起出发。到了第一个村子，我用最温柔的微笑武装自己；我用手势比划让这些大哭的村民安心，赶走了那些无赖的士兵。马上我们就被高兴的人们围住了，他们把我们当做来保护他们的中国高官。所有这些人都跪倒在我们面前，前额叩地。一会儿我们就站在一大圈跪着的人中间，他们双手抱拳，用中文向我们提出最感人的请求。尽管场面有些悲怆，我们还是尽量忍住不取笑这个全新的角色以及这些奇怪的人们……一个特别小心或者说更不胆怯的中国人突然冲出人群，并以最快的速度回来，手上拿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其他人都效仿他，成千上万的红纸出现在我们周围……他们向我们要求安全通行证。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角色一直到结束。我们因此坐在大马路上特意搬来的长凳子上，带着骄

傲的尊严用粗糙的毛笔草草地写着我们头脑中出现的所有保护者的惯用语，而站在我们边上的两个中国人负责给我们扇扇子，赶走我们高贵的脸上的苍蝇，而第三个人则不停地为我们倒满一杯杯热茶……我多想有一根魔法棒能突然把你们带到我们中间！……参谋在北塘发放安全通行证的场面也十分滑稽：人们为居民房标上记号，并用胶水贴在墙上。一些中国人担心风雨会毁坏这些珍贵的纸，便把它们挂在胸前作为布告，头几天我曾碰见一些人穿着这种特殊的胸标在村子里走动。”

我们知道中国外交试图用阴谋和背信弃义，精心策划，企图把毫不戒备的我们分成小部队，拖入包围圈，我们也知道没有结果的拖沓的谈判使得阴谋更加难受更加可怕。

联军于天津城外几公里处扎营。只有一支光荣的仪仗护卫队被允许跟随蒙托邦将军和葛罗男爵进入城市，古斯塔夫也在其中。9月5日，他给母亲写信并充满温情地感谢她给他寄去照片。他随后描述了生活的各个细节、临时驻地丰富的资源以及中国宫殿的奢华和布置，他还描述了总司令和法国特使居住的地方。7日，他的记述突然终止于这句话：最新消息，“新闻：我们被中国人卑鄙地欺骗和玩弄了。一切都被打乱了；条约被撕碎了，或者几乎被撕碎了。外交人员被激怒了，军队摩拳擦掌。所有人都准备向北京开战：用大炮挺进！……”他解释说在准备签订条约的时候，本来条约只能在首都签署，中国的全权代表拿不出他的全权委托书：他根本就没有；他只是中国人用来拖延时间的一个稻草人。此后的事实证明了他的任务是把只带着一支力量微薄的护卫队的外交人员和军队引上去北京的道路，而整个中国军队都在那里伏击他们。在天津的我们还不相信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但是人们识破了这个陷阱，并且我们应该加快解决问题。“得知这个真相，迄今为止都很有耐

心的我们的特使愤怒了；一切外交关系都中断了，他对总司令说：
‘现在轮到您上场了。’”

和平条约不会签订

副歌！

“你们知道我过得怎么样了，我这个有可能留在这里的人！……我下一封信将从北京寄出，向你们讲述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不要对这次行程感到痛苦；大家普遍认为将会太平无事。”相信吗？可能吧；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应该把行程记录下来。

10日，古斯塔夫旅离开天津。途中清朝政府宣布了新的谈判代表。这一次是一个皇室成员怡亲王，由兵部尚书陪同前来议和。他要求我们的部队返回天津，并保证签署条约。特使们的回答是：这次条约将在离北京4法里的通州签署，否则我们将向北京进军。负责谈判的各色中国官员走马灯似的，使联军担心无法完成远征的目标，取得远征的胜利。9月13日，怡亲王接受了指定在通州的商谈；他只是要求特使们只带少数卸除武装的随行人员前往，而联军部队驻守在离通州6公里处的三个村庄。这些条件得到了同意，17日，法国和英国的谈判代表离开营地，以确定此次会晤的细节。

“18日早上，我们前往指定的宿营地；当我们突然看见营地被清军军队占领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得很近了，他们似乎没有要退出营地的意思。我们马上作好战斗准备，并等待谜底的解开。我们看到了陪同谈判代表的巴士达先生和美理登先生，一个是特使的一等秘书，另一个是特使的通译。我在天津认识他们；我向他们走去：‘好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是和平还是战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巴士达先生对我说：‘昨天经过5个小时的谈判，现在我的

包里放着用红墨水签字画押的和平条约。亲王表现得十分可敬并且正直。军需处已经关停了为了驻扎军队而开设的市场；但看看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很担心这个重要的条约（他给我看的是用中文写的，毫不担心我泄露秘密）只是一个新的圈套。”尽管显而易见，人们还是不能相信中国人会背信弃义，努力为那些明目张胆的清军寻找托辞；人们猜想先前的命令没有撤销；尤其担心挑衅会连累谈判代表完成任务，他们大多数仍身处敌营。一场过早发动的进攻可能会牺牲他们的自由，甚至可能牺牲他们的生命……这种焦躁的不确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突然从敌营传出三声炮响，这是战斗的信号。瞬间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整个战线上，传遍了从司令部发出的‘前进’的军号。

“我们的前面是被灌木丛遮掩着的一些房子，房子后面直到村子其他地方都是炮台。我们一切准备就绪了。英军在我们的左边，从正面攻打村庄，而我们从右路绕进……我们向第一个障碍物发射，它没有抵抗住。这个小村庄被占领并被洗劫一空，我们此刻面对着很长的一组炮台，炮台组成一条凹型战线，向我们发射密集的炮弹，从我们的头上呼啸而过。我们冲向这些大炮，而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空无一人了；这些清兵穿过灌木丛和房子逃走了。我们从这一边进入，一刻不停地穿过村子，杀死了所有逃到村里的人，留下一个着火的村子，满地残骸和尸体。出了村子，我们看到一大片平地，被我们其他纵队追赶的不计其数的敌人逃到这里，乱作一团；我们的子弹和大炮造成了他们的大量死亡。全体部队在那里集合并重新整队前进，炮兵连走在最前面，在一条充当道路且横穿整个平地的高高的河堤上，我们不时停下来击毙敌军或者因为地形起伏而突然被发现的敌军逃兵。到处都是被丢弃的炮台和大炮，

有一些已经几乎不能用了，而敌军溃逃十分迅速，恐慌不已。

“背信弃义，精心策划的背信弃义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最后，经过 1.5 法里多的毫不停歇的追击，清兵既不能停步也不能重新集合，我们鸣号休息。那时是 2 点钟；我们 4 点半起床，在战场已经 10 个小时了，胃里除了出发时喝的一点咖啡，什么也没有。我们的外交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军队赢得了一场漂亮的胜利，因为只用了 2000 个士兵和很少的大炮，我们彻底击溃了持有 100 多架大炮的 15000 名清兵，其中 80 人被我们活捉。”

这场胜利只牺牲了我们几个人，但对古斯塔夫来说却是用极大的代价换来的。唯一阵亡的一名军官达马斯中尉是他的朋友，冲锋时被子弹打穿腹部。古斯塔夫每天都看到他，在战斗打响之前还跟他进行过愉快的交谈，而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死在了及时赶来帮助他的神甫的臂弯里。

18 日事件之后，军队占领了位于通州南面 5 公里的张家湾。9 月 19 日，留守后方待命的所有部队在那里重新集合。那一天以及接下来的一天，我们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了多次侦察，我们确定清军并没有被打败，而是在准备一次决定性的反击，地点就在一块巨大平原上，这块平原从通州一直延伸到把白河引入北京的运河。

这样，古斯塔夫用两句话总结战场的面貌和布置。平地的每一侧都有一排有堡垒保护的营房，住着 25000 至 30000 人不等的中华帝国八旗精锐之师；中间的 Oua-koua-Yé 完全被占据了；村子的右边、左边和后面分别是灌木丛、墓地以及众多炮兵、各军种和挂着各种旗帜的步兵的营房；最深处，是八里桥村及著名的八里桥，这里是最后的防御线，由帝国精锐之师守护着：这就是了不起的防御圈，按中国人的说法，联军必定葬身于此。中国人阵地选得很好，一名众所周知的将领——僧格林沁，用狂热和仇恨以及报仇的渴望

和对胜利的欲望激励着众多的战士。

古斯塔夫没有亲身投入这次战斗，但无论如何他是在场的，“我从来没有目睹过那天那样的战斗场面，”他写道，“我向你们保证，这是一场漂亮的战役。我的连队占领了一座房子的院子，其墙壁被用来当作防御；我爬上了房顶以便看得更清楚……清军骑兵离我们七八百米远，长时间没有动静，却突然开始行动并且猛冲向我们的正面防线。这个巨大的半圆瞬间弥漫着战火和硝烟。我们让他们冲到离我们两百米远的前方，然后向他们同时发射；12炮兵队对他们进行的偏弦齐射完全打乱了他们的队列，一次次把他们的阵脚打乱；巨大的炮声吓得蒙古骑兵的马匹惊慌回奔，他们徒劳地想要重整部队，在无用的努力之后，他们撤退到灌木丛后面……柯利诺将军带着4个炮兵队和只有2个连的轻步兵，抵抗着不停地威胁着要包抄他的先头部队的拼命冲击。而在左边，英军的印度锡克骑兵猛烈的呐喊声混杂着清兵的呐喊声……到处都是人、马、灰尘、硝烟、吓人的大炮轰鸣声、射击声、鸣哨声、呼喊声，难以描述，一些崇高同时又恐怖的事物，令人血脉贲张。在这些时刻，危险不再令您动摇：我们忘记了危险。我们忘却了自我。其他人在想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从我所在的位置看去，场面令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清兵不停地重整队列；这是他们第一次一寸一寸地争夺战场，勇敢地赴汤蹈火。清兵像是杀不完的，山腰上、灌木丛后面、墓地后面、房子后面以及运河的后面总是有他们的身影……

“在这场我如此享受的战斗中，我扮演了一个不很起眼的角色。我所在的连队有一支预备警卫队，是在第二线行进的后备部队，每次我到达战场的时候，都已经空无一人了……攻打八里桥的时候也是如此。中国人这道最后的防线被英勇地守卫着。我们看见在桥头

站着—个清兵高举帅旗。枪林弹雨之下，敌军的精锐之师汇集在他周围。这个勇敢的行动使他付出了性命，以及他大部分战友的性命，而这并不是我们在那天感到钦佩的唯一一个英勇的例子。”

这个用四个半小时获得的伟大胜利为我们打通了通向北京城门的道路。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联军只有 8000 人，法军和英军一样多），我们是如何以极少的代价如此迅速地获得胜利：2 人牺牲，15 至 20 人轻伤？中国军队笨拙，武器低劣，炮兵缺乏经验，被我们压着打的清兵从来都接近不了我们，这些都不足以解释这个难以置信的结局；蒙托邦将军巧妙的战术安排以及迅速果断的战略手段，他领导下的其他将领英勇无畏，以及我们的士兵所向披靡的冲劲，充分说明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上帝确实在保佑我们，从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似乎就在亲自引导我们……①

“中午 12 点半的时候，我们已经交战 8 个小时了，而且我们还饿着肚子。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巨大的平原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清兵了；我们开始稍作休息。进餐很简单，我们还没有拿到自己的行李；但是每个人都感到很光荣。在草草填饱肚子以后，我去参观清军营地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在那里发现了敌人丢弃的衣服：军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武器和食物。各式各样的军刀、步枪、长矛、弓箭和匕首；这还不包括猫尾巴帽、皮毛衣服和中国人通常携带的餐具；但是所有这些东西的工艺和质量都不怎么样。这些军帐好像等候着早上的贵客，而其中一些，则备有晚餐，可似乎已用过。我还亲自尝了一下—道还热乎且不太糟糕的大杂烩……我

① 这种感受并不是古斯塔夫特有的；有关这次辉煌的插曲的所有著述都提及了这点，官方的报道也有记载。——原注

已经在北京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北京郊区了。为了打发空闲，我们被派去那里进行侦察。没有碰到任何一个清兵，我们一直到了著名的城墙脚下。这些城墙筑有雉堞，惊人地高并且厚，让我们想起了巴比伦城墙。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看到城墙有骑兵布防……在我的下一封信中，会描述北京……

“10月5日，我们撤出了营地。我们收到了一批食物、弹药以及一支后备部队。我们的军队由大约4500名法军和更多的英军组成，他们总共可能有1万多人，并且配有精良的大炮和围攻炮。我们毫无障碍地向前推进，驻扎在离北京城满人区几公里的地方。从我们用来掩蔽的、称得上真正的建筑物的砖炉顶部，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筑有雉堞的巨大的城墙里面发生的事情，城墙的周长有10法里之多，通过城墙的突出可以计算进入这个大都市的无数城门……6日，我们轻装出发，去寻找清兵，我们认为他们在城市北面或西面，筑有堡垒固守。我们在东面，这使得我们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散步……在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行军中，我们只看见一座被丢弃的营地，没看见几个清兵……最后，晚上7点，在一个大村庄的出口处，我们突然走上了一条很好的道路，铺着石板，修整得十分漂亮，有几座漂亮的桥点缀着，两边是一些建筑和花坛。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圆明园——中国皇帝的凡尔赛宫前面，我们只晚了几个小时没有看到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他现在正带着他的骑兵往满洲的路上逃去。

“当我们接近时，夜幕之下，暗处的敌人把我们的两个人打伤了，其中一个可怜的皮纳先生，手腕被军刀狠狠地砍了一下，幸亏恢复得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天黑了，而且13个小时的行军已经使我们疲惫不堪，我们在这个伊甸园的城门口止步；大家都睡着了，带着最迷人的想象，梦想着这些除了几个传教士外可能没有任

何一个欧洲人曾经参观过的宫殿，我们将会无意中发现它们的秘密并且欣赏它们的富丽堂皇。”

我们认为有必要再现这封信，尽管它很长，这封信的大部分是古斯塔夫向他的弟弟介绍这个周长达 16 公里、到处散落着奇迹和杰作的皇家花园。在今天，这不再只是一个悲凉的回忆。那些在圆明园被毁前游览过的人们的描述，只能是管中窥豹，它只能留在记忆中。

“你肯定在等待我描述这个著名的宫殿，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万园之园。我向你承认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向你介绍。没有时间登上高处纵观全局，如果这些中国建筑家有按照任何一种图样的话，当然我对此表示怀疑，我盲目地随便乱走，就像我在现实中所做的一样。

“因此你想象一个大花园，种着各种最漂亮的树，灌溉着流水，开辟了无数的大道和小径，布满各种色彩、各种别致的屋顶的光彩夺目的宫殿，无数的山丘、湖泊、小溪、峭壁，梦幻怪诞的建筑，在几千米的空间展开，尽头在高山的一座城墙脚下，山边布满了亭子和各种形状的塔；最后是一个真正的中国花园。这是与我们所看到过的完全不一样的事物；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自然，一切出自人类之手，但是一切都是新的、独特的、出乎意料的、神秘的、可与最不可思议的事物相媲美，把清醒着的我们带入了这个梦想和传说的地方，带入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里。

“我们刚一进去，两座假山矗立眼前挡住视线，我们站在假山中间一条凹陷的小路上。有一段时间我们顺着这无数曲折迂回的回廊，出其不意地来到一条流过假山的美丽的小溪边，在一个巨大的池塘前，池水躲藏在睡莲叶子下面。为了节约时间到处看看，我们没有在小溪岸边这些漂亮的树荫下多作停留；走过了小溪上的一座

木桥；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小岛上，那里错综复杂的小径使我们不停地转圈并且总是把我们带回到同一个地方。忍受不了忒修斯的这个角色，并且没有阿丽亚娜的线团，我们翻过了将我们困住并且没有任何出路的这些讨厌的堤道；我们停住了脚步，尝试走了一条同样在假山之间的另一条路。我们的运气很好，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来到一个迷人的湖泊边上。在湖泊的中间，一座漂亮的宫殿矗立在浸入水中的大石基上。抄近路到达这个宫殿是不可能的。在无数曲折迂回之后，一座雕花桥提供了通往环绕这个建筑外面的众多长廊的通道。就在旁边，其他同样惹人注目的建筑坐落在峭壁上，似乎是天工之作；但是建筑风格的任意变化忽略了任何别的进入的方法，我们必须依靠拴在岸边的一些小船到达这些迷人的宫殿大门。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湖泊，要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小路上再次冒险，我们也会面对一座似乎无法跨越的陡峭山壁。在折回赫克力士擎天柱前面的那条路之前，我们探寻中国人如此诡计多端是否会没有准备任何出路，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山洞的入口，在拐角处伸入假山的里面。它通向哪里呢？不管通向哪里；相信我们，我们肯定要反复摸索地下的这些阴暗频繁的弯曲绕道。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据说是从一块岩石上开凿出来的洞穴中。水从石头表面渗出，阳光只从一个裂缝中透入；人们感觉置身于地核深处，这些地方是那么的阴冷潮湿。一位神秘的中国的神住在这里：这里是他的祭坛底部，他的镀金铜像上有各种怪异的标志。铜像脚下两尊老旧的铜制烛台上还点着红蜡烛，通常是向神表示敬意，烛台之间有一个神圣的香炉，里面装满了前来朝拜的人点的香的灰烬。我们在这个洞穴里冻僵了，只好出了洞穴，再回到那个花园里，冒着危险在那里寻找夹在假山之间、且在大树下蜿蜒蜿蜒的小路，就像它顺着的那些小溪，围绕着花园里的15个山丘，我们无法研究他们的排列，无

法把握全局。我们一会儿来到一座精细雕花的白色大理石桥上，一会儿又到了一座矮山上的钟楼脚下；一会儿又来到一个大湖泊旁边，岸边有白鹇或其他不太为人所知的禽鸟在散步。总是有一些新的惊喜，一些独特的建筑，以及这个怪异的艺术系统中的一些景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怪异。在这四周，一望无际巨大的草地从来不像我们花园里的树木那样进行修剪；他们不知道草坪；林中的一线开阔地使得我们瞥见远处有着优雅弧线的小径或者那些巧妙地布置的观赏点。他们集中了大自然赋予他们的所有资源、所有的变化莫测、尤其是所有奇奇怪怪的东西，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在这幅微型的画卷当中，他们总是给人带来惊讶。他们非常迷恋岩石；追求出其不意、奇特，他们藐视宏伟。但是这些瑕疵在皇宫前的景致中并没有让人感觉到。公园最漂亮的一部分就在那里，对此我们无法拒绝给予一个合理的赞美。在这些富丽堂皇的居所前面的这个湖泊很大，构思巧妙，湖边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小道，四周到处都是宫殿、大理石或花岗岩的平台或台阶。这是天子游玩的中心，并且这块土地应该集合了所有最稀奇最奢华的东西：漂亮的树丛，插在精致的青铜花瓶里的美丽的花卉，雕像，白色大理石柱廊，等等，等等。这里充斥着所有这些大自然的和艺术的精品。我可以给你们寄去关于此的一份长长的描述；但是，在我刚刚给你写了这些之后，我很想免去那些陈词滥调的赞美之词。现在，如果你对我们的散步还不是很厌烦的话，我们就去参观这个皇宫的内部；这不会令人更不惊奇。

“当我想到这个宏伟的皇家住宅，这个中国皇帝珍爱的居所，想起那些中国王公贵族都可能从未涉足过的绝妙的房间，那些堆满了几个世纪珍宝的陈列馆，我需要集中心思确认我的大脑中回忆起的所有这些不是一个单纯的梦，我们确实是在参观、搜索、破坏甚



至掠夺了一切(因为这是真话),并且随后我们烧毁了它。

“皇宫及其无数的附属建筑的内部首先与我们对其已有的想象不相符。一切都是用木头做成的,并且不太高。但是这些木头包裹着漂亮的虫胶漆并装饰着迷人的绘画。又一次,独特和别致主宰了宏伟。正面的大门前是一个巨大的台阶,两旁是有着黄色琉璃瓦屋顶的红色圆柱;琉璃飞檐,雕梁画栋,所有的建筑都这样。赞美这些镶板切割的精工及其展现的主题的变化和完美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毫不停留地经过了,因为我们如此急切地想要进入建筑的内部。我们踩着美丽的白色大理石台阶进入,这给大门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我们往下走入了一个铺着石板的大院子,尽头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我们将其称为御座室,不管对不对;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

“你想要在更进入之前对中国宫殿的外部有一个概括了解吗?那么就从彻底抛弃宫殿这个词所能唤起的所有想法或记忆开始,因为这里与人们在别的地方所能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比地面高出5法尺的大石基,作为建筑的平台。在这个坚固的地基上矗立着一座漆着红漆或黑漆的木建筑,犹如一块镜子一样平整发亮。没有任何窗户;或者,如果你更愿意,一切都是窗户,一切都似乎是打开着的。建筑的四面都由巨大的镶板形成——从高出石基3法尺的地方一直到屋顶整个切割而成,并且四周矗立着牢固的柱石。如果这些中国人知道玻璃,这些隔墙就起到了高高的玻璃橱窗的效果,而他们的宫殿就会像一个巨大、美妙的暖房。但是他们用贴在里面的纱纸来代替窗玻璃,这阻碍了从里面看外面的视线。这种白色的纸柔滑而透明,能很好地衬托出这些隔墙千变万化的切割。为了保护这些外表如此不牢固且以精美的装饰为最主要的优点的建筑物,需要特别炫目的屋顶,但是它巨大的凸出部分不能超过它所保护的建

筑，并且高度一点都不能降低，否则会在隔墙上投下一片巨大的阴影，就像一顶巨大的帽子戴在一个矮人头上。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雅致的圆形挑檐，与屋顶齐平，熠熠发光，且使得建筑的正面看起来更宏伟，而不是使其显得低矮。这个不可捉摸的屋顶盖着漆瓦或者釉陶瓦。

“圆明园为世界园林的典范。有一些宫殿周围都是石柱，屋顶在石柱上延伸形成一个外部长廊；藤条编成的席子作为隔墙的帘子，但这只是表面细部的修饰。一切都如此崭新并且被维护得如此好，釉彩如此光芒四射，丝纸如此纯白光洁；这些切割面上没有太多的灰尘，这些建筑确实十分迷人。不幸的是，即使在圆明园，尽管有着无上的权力，天子也无法使他的花园中为数最多的宫殿抵御得住时光的损害。大部分宫殿的漆剥落了，绘画褪色了，纱纸变黑了，切割面上布满灰尘且已凝固，而原来那么考究雅致的建筑变得如此孤独，再近一点看时，有一种悲凉破烂的感觉。室外的这些艺术品是不可避免会变成这样的。室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一切都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了。因此让我们进到里面去；不算太早，因为目前我已经让你待在宫殿外面太久了。

“刚才一直忙于介绍建筑外部，我现在要给你介绍御座室，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巨大的房间，整个地面都铺着珍稀的大理石，有着真正宏伟的外观。家具只有一个巨大的御座，摆在中间，是一件无与伦比的美丽的雕刻工艺品。房间其中一个侧面全部画满了整个北京紫禁城的全景，有一天在一次重要的接见中展示过。这幅巨画在中国绘画中是十分出色的。这是一件有珍藏价值的文物，因为画中服饰的多样性和变化性，包括各种礼仪及其特有的风俗；但是它跟其他的杰作一样被火焰吞噬了。

“离开御座室的时候，我们顺着跟花园里一样的几条小径走了

一会，来到了宫殿的房间，每一间分别都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前面是一个我之前一直跟你说起的柱廊。内院摆放着很多花瓶以及青铜制品。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到了皇帝住的小房间；这些难以进入的房间只允许一些受皇宠的人进入，在这些房间的入口，地位最高的人都要伏拜三次，叩首九次。我承认我个人不赞同这种方式；而且在我之前，很多其他人的表现更加粗鲁，正如各处的混乱证明了这一点。正门通向一个房间，或者说通往一系列令人赞美的房间，用隔板装饰并且分开，或者用金色绘画衬托的漆器，或者是雕花的黑色硬木。所有这些房间都摆满了精美的家具，柜子上满满当当摆放着各个国家和各个年代的艺术品。天花板上的中国灯笼旁边悬挂着法国吊灯。桌上摆的是镶着象牙或白银的匣子，用黄金或者欧洲来的红宝石打造的巨大时钟，这些让人想起上个世纪人们喜爱的场景。绚丽的瓷器或景泰蓝花瓶，无以计数的工艺精湛的玉制品，装在丝质匣子里的珍贵画册，上了北京漆的坛坛罐罐和箱子——人们失去了他们的秘密，中国工艺最发达时期留下的年代久远的青铜制品，黄金打造的鼻烟壶，上等珍珠串成的项链，等等，挡住了这些架子的光线。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各个时期的上百只手表，其盒子漆了最夺目的景泰蓝，或者装饰了珍珠和钻石：从法国和英国进口的珍宝，在几代皇帝的手中慢慢积累起来。我们还注意到西方君主赠送给这个崇高的天子的最现代的礼物：俄罗斯沙皇送的一把短刀，值80000法郎；一只镶嵌着珍贵宝石的黄金箱子，里面装着马戛尔尼勋爵的国书，以及其他无数的纪念品。在那些漂亮的摩洛哥盒子里，我们又找到了中国过去与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签订的所有条约；旁边则是记载明朝历史的丝质珍贵图书文物。我不能看完这些书，如果我想向你列举我们所看到的陈列出来的各种财宝的百分之一，我也无法结束。在

每一个角落，大玻璃镜子的反射增加了这些奇珍异宝。

“挨着隔板，用丝绸编织的图案描绘了中国的自然的伟大。锦缎做的帷幔用来当作门帘；绣着黄龙的丝绸垫子放在这些雕花的家具上面……再进去，梦境般的富丽堂皇使我们眼花缭乱，我们几乎不敢往前走了。当我到达的时候，人们已经拿走了最漂亮的物件：这些最稀有的物件装满了7辆巨大的车子，这些东西应该迅速送往法国建立一个中国博物馆：我们可以装满200辆车，如果我们有这么多车的话。在英法联合委员会的视察以后，这些大门向军队开放，人们开始了抢劫。那一天，我行动不了，被一个可恶的高大的哨兵困住了，因此我到了快晚上的时候才到达那里。

“这些房间的旁边是皇帝的起居室，通过一块装着纱纸镂空的隔板与前面的房间隔开。除了我们刚刚浏览的所有奇珍异品之外，这个房间又有其他一些有实际用途的物件。中国皇帝的干净的家具和衣橱：最华美的帽子、丝绸或金线缝制的拖鞋；官妃们的帽子；他专用的藏书阁，我们对此毫无兴趣；他用来审批奏折的红墨水、玉玺以及其他珍贵的物件。整个房间满是绣着龙的黄色丝绸衣服。房间里面有一个神秘的凹室，用同样质料的帷幔隔开，放着皇帝的床。跟所有中国式的床一样，这只是一个用砖块砌成的巨大的炉子，离地面2法尺高，占满了整个凹室。只不过铺的不是简单的席子，而是装着窗帘并且铺着一块与床同样大小的黄锦缎床垫。床上有很多根据这个国家流行的样式用灯芯草与织物一起编成的枕头；这些数目惊人的枕头使我无法猜出他们的用途。当我们再走进去，发现了皇帝的这个起居室有最近被使用过的痕迹。宫殿的这个部分，自然是最富丽最引人注目的，也同样被保持得很好，里外都一样。

“另一个毗邻的建筑是戏园，比我们的戏园要简单得多，并且

从任何方面都不能与凡尔赛宫的相比。这个有柱廊的巨大房间，从上到下都上了漆，但是毫无装饰。再进去一点是祖宗祠堂，毗连的房间迷宫一般，里面的装饰品和家具会使那些比我们悠闲些的参观者停下脚步。起居宫殿的每一边都有很大的仓库或储存室，收藏着中国十代人的艺术作品。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珍宝。一个细节就能使你对此有一个概念：注定要留给法国的所有这些物件都已经装箱打包，塞满了最精细、最珍贵的布料；而我们几乎还没有触及到这些大量的储存物。我将不会跟你描述那些不太重要的宫殿，达官贵人的府邸；别处也是到处都激起我们的好奇心，一眼几乎看不过来，那么令人炫目以至于我们几乎对刚才看到的物件感到了厌倦。

“很快地穿过马具房、轿子房、办事处、哨兵和下人们的住所，一切事物都很稀奇，但是如果走马观花则难以细细观赏、更不能仔细研究。

“我们回到你所知道的那个大湖泊，皇帝的房间对面的那个湖泊。湖边是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宫殿，但是布局和装饰也都很惹人注目。那里有供奉神明的宝塔，神像用黄金、白银或者青铜建造，有些体积很大；其中有一尊佛像的高度不少于25米。到处都是陈列室或巨大的接待室，中国无数的精工巧匠在里面花费了不可胜数的人力物力。这里有一些法国狩猎的工具以及附属物件；那里是欧洲船舶及其帆缆索具的木复制品。此外还有我们的水晶玻璃器皿产品普通的但完整的陈列，这些玻璃器皿在中国广受好评；一系列中国各种生活场景的微型缩影，是孩子们的玩具，他们可能连续好几年让很多的婴儿玩得很高兴；用之不竭的中国墨水储藏；一堆堆特别稀有且品质特别高的画册，是天赋的艺术家送给他们至上的君主的献礼；国家的大炮储存室，他们使用的大炮都是木制的：我在那里认出了炮架模型，白河炮台中那些大口径的大炮正是架在这些炮

架上的。长廊里面的装饰丝毫不逊色于奢华的皇帝寝宫；有着同样富丽多变的雕刻，同样多的玉玩意儿、象牙或者稀有金属做的物件：上了漆的箱子、绘画、镌刻或雕镂的工艺品，漂亮的大瓷花瓶，上等的古老中国瓷器花瓶，尤其是惊人多的各种形状和高度的摆钟。每一个房间都有一定数量的摆钟。我们到处都能瞥见一个钟面：有时在教堂的三角楣或者景泰蓝瓷器宝塔顶端，有时在一个漂亮的青铜器底座上或者绽开在一个胖胖的罗汉肚子上；钟表上总是标着它抵达中国的时间，因为从这一刻起，人们不再要求它的任何服务。中国人只追求它的奇特，而不是它的效用。除了天津，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挂钟指示时间，甚至在拥有这个稀罕物的商店里……

“除了演出室和接待室，起居的宫殿不会有很大的房间，但有无数相连通的小房间，由总是敞开的开口相连，门是室内一种不太常用的栅栏。它要么被隔热屏取代，隔热屏要么是大镜子，要么是稀有木料制成的框子，上面嵌着绘画瓷器、珍贵的布料或浅浮雕；要么是被屏风取代，这是中国发明的古典家具，是真正的艺术品。而我们一般的隔间框架，是用画布或蹩脚的壁纸覆盖！这里的框子是经过精雕细镂的紫檀壁板，常常镶嵌有象牙或瓷器饰品。

“我们占领的第一天，在我能躲过我的哨兵的一个小时里，我参观了一些依然完好无损的宫殿。什么东西都安放得井井有条；什么都没有被拆除或破坏；只有珠宝盒里的首饰不见了，但一切都证明了皇帝最近的逃亡。我来到了一个宫殿，看上去像是皇后或宠妃的房子。没有比这更华美的居所了；让我告诉你一句话，我就不需要详加描述了。

“第一个房间，非常宽敞，一个布满以假乱真的青枝绿叶的拱顶。这个房间，凉快，迷人，极其雅致，铺着华丽的地毯，再往里

面，摆放着一张华丽的雕花宝座。然后是那些毗连的小房间：闺房，卧室，更衣室，直至房子最隐蔽的角落；一切都井井有条，并摆满了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玩意儿，一个比一个吸引人。我在那里看到一些架子上放满了金子做的实心小神像，做工一般，但很值钱。我徜徉在这神奇的财宝中间，几乎不敢去触摸。我拿了一些焙烧的小泥娃娃就觉得足够了，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可以放进口袋里。我很羞愧地承认，当我看到大片的破坏，我是有点后悔我当初的正直。啊！漂亮的玉器、珐琅、象牙或景泰蓝，凭良心讲，我原可以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如果我当初能想到人们会允许正规军抢劫所有这些宝物！

“第二天，部队被允许进入这些宫殿，附近的中国人，尽管有我们的看管，已经在昨天夜里入侵过这些宫殿。一天时间里，一切都被抢走、打碎或糟蹋；镜子成了碎片；雕花的华丽宝座只剩下一堆碎片，宝座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杰作。没有被抢走的或是无法搬走的：挂钟、大瓷花瓶、大漆器、木构件、青铜器、玉器，被弄坏并砸成碎片，铺满一地；使人的内心在流血。人们在一堆丝绸、银器、书籍、瓷器、珐琅及吊帘上面来来往往；这是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劫掠，回忆起来都让我觉得恐怖。在这场罪恶的报复中，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抢了多少东西，毁坏了多少东西。我们大多数人的包里都装满了珠宝和古玩。我呢，除了在分配总数有好几百万的皇帝宝库时得到的我们这个级别的军官的四五百法郎，我据为己有的只是这些珍宝中的很小一部分。两个漆箱、一些玉器和一块瓷器碎片：这就是我所有的战利品；如果可以阻止这悲惨一幕的发生，我愿意为此付出两倍的财富，因为我内心里无数次的为此忏悔。然而我忘记了一个十分可观的份额，我没有为了形式上的总额放弃它：一盒专门供皇帝食用的燕窝。我试图得到烹调的方法，那么当我回

去的时候，我会让你遭受这个小小的美食折磨。我希望每个人都尝尝这道皇家菜肴。有谁知道我不会把它留到你的婚宴上呢？人们把它盛在一种中国瓷碗中，每个人都拿着筷子吃它……

“这个迷人的梦想怎么变成一个可怕的噩梦的呢？圆明园，圆明园现在只是一个回忆，数天以前，它是一个可能比凡尔赛宫和卢浮宫加在一起还要富丽堂皇的皇宫。它足以供整个地球上的学者和艺术家们研究好几年……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并且无疑是最后一个看见所有这些奇迹的欧洲人……我们从这些被毁坏、搜索、掠夺的宫殿出来，内心充满了悲伤：突然的毁坏那么快且那么突然地代替了财宝和华丽，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情！因此，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向你保证，我几乎觉得高兴亲眼看到那场不知道被谁点起的大火，火苗高出了我们可以为之雪耻的那个戏园：一大堆的灰烬至少是这种可怕的混乱最值得信赖且最有力的证明……①

“抢劫是一件可恶的事情，首先在于抢劫本身，其次更在于其后果。它使军队染上了一种掠夺和贪婪的习性，这是今天很难阻止的，它使我们所有的人成为商贩或小偷。9日早晨，当我们离开圆明园时，营地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人们走在五颜六色的丝绸废料和各种各样的碎片上。一些重磅绉纱铺了一地，积满了灰尘和泥土，乱七八糟地摊在地上，与很多半展开的锦缎卷子混杂在一起，或多或少珍稀或者新鲜的毛皮，官帽，各种各样的衣服。每个人都用缎子和锦缎的腰带取代政府发的羊毛腰带，用形形色色的真丝头巾取代遮阳布，这使纵队看起来特别的五颜六色、奇形怪状。这既是开心的同时又是令人悲伤的；但后者占据主导地位……

“我不知道欧洲舆论会对这次中国之役所发生的这灾难一幕如

① 八天以后，我们的联军结束了冷血的破坏行动。——原注

何评论，可能会把我们视为野蛮的汪达尔人。在不受事件影响的6000法里之外的评论是一种正当的愤慨。不过，在对我们进行如此严厉的判断之前，人们应该记得9月18日无耻的背信弃义以及向我们布下的伏击，可恨地劫持了39个法国人和英国人并囚禁起来，这种野蛮行径只能使我们的所做所为变得十分有理由。

“在皇帝住所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发现了格朗尚中校沾满了鲜血和泥土的衣服，阿代尔先生和15个锡克骑兵的行李，而恭亲王的函件却说他们受到了尊重的待遇。因此，不只是贱民应对所犯的谋杀负责，皇帝自己也想进行背信弃义的谋杀。我们从圆明园回来后，北京城为了避免同样的命运，向我们交出了11个不幸的人质，5个活人和6具尸体。死者受到了可怕的虐待，有被严刑拷打过的可怕的痕迹。他们的手腕被绑得那么紧，以至于骨头刺穿了肌肉，这些活着的受害者，身上留下了被蛆虫咬过的伤口。他们在这种情形下被饿了3天。至于那些活下来的人，他们会长时间的，也许是一辈子，留下他们所遭受的酷刑的痕迹。最没怎么被虐待的是戴斯克鲁斯，也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从这两个星期的囚禁中恢复过来。人们跟我说，我们的一个轻步兵，被送还时也是活着的，在被解救回来的三天以后就发疯死了。其他四名今天还在野战医院里，上帝才知道他们要多久才能恢复。他们被从通州运来，脚和手绑在一根竹子上，像是刚刚被放血的猪，就这样被运送到了北京；一路上，人们加以辱骂并且把他们绑得更紧。抵达后，他们被扔进一个牢房，脚、手臂和脖子上都戴了镣铐，这使得他们丝毫不得动弹，他们唯一的消遣是一些官员来对他们施以新的酷刑，并且在离开的时候，向他们做出要将他们砍头的手势。这就是事实；他们喊着要报仇，并要求明确的道歉。但能期望从一个拒绝和谈、逃到我们无法追赶的沙漠地带的君主身上得到怎么样的道歉呢？我们只有通过

废墟来为我们可恨地洒出的鲜血报仇，从此以后，我们的角色似乎只能是尽可能地对这个不遵从人类任何惯例的专制君主做坏事，掠夺他的宫殿、他的财富，而且，如有必要，他的王位。”（于北京，1860年10月11日）

继围困的威胁和在北京前面的15天的等待、和谈之后，终于签订了和平条约。10月25日，以隆重的礼仪进行了条约的签订仪式。在描述了陪同特使和总司令的随从人员以后，既有戏剧性的又有军事性的，古斯塔夫补充说：“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个著名的城市，它已经闭关自守了那么久！当然，那一天，人们向我们展示的比我们要求的更多，……我们几乎横穿整个满人区……我们沿着皇室居住区走了一会儿，只能看到围墙……丑陋、凄凉且通常很偏僻的满人区，在这个时节下显得嘈杂、人声鼎沸。我们从两排密密麻麻的好奇的人群中穿过，人群之大之密，是我几乎没见过的。官员们，沿着我们的纵队来来去去，艰难地开辟出一条通道，尽管有中国警察大声呵斥、极其疯狂地挥鞭驱赶人群为他们开路。人群中刺耳的尖叫声、嘈杂声、看客的大笑声，所有这一切混杂在一起，使这群奇怪的贱民更加兴奋，在7至8公里的行军过程中，目睹了这奇特的场景，正如我们被他们看到的场景一样。最后，我们来到了著名的礼部，离城市的一个大门不远；和平条约就将在那里签署。我从队列中溜出来，见证了这一官方仪式……

“在穿过签字室前面的院子时，我注意到在其中的一个院子里，有两排中国乐师，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向我演奏曾用来欢迎特使的令人恼火的小夜曲；在另一个院子里，站着恭亲王的随从，对面是葛罗男爵的法国护卫队，准备根据情况互相善待或是互相施压。大厅是一间破旧的房屋，根据所有中国宫殿的样子建造，但似乎要坍塌的样子。人们用帷幔掩盖这种衰败，从远处看，这挽回了一些面

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正方形房屋，入口在正面，铺着红色的地毯。房间里面是预留给贵宾的座位。葛罗男爵，在他的秘书们的围绕下，坐在右边的一张桌子上；他的旁边是蒙托邦将军，坐在另一张桌子上。在左边同样的桌子旁边，对称地坐着中国全权代表、皇帝的弟弟恭亲王，我不知道是哪个清军将军，坐在那里似乎很不舒服，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中间是书桌，上面放着条约。我们的特使两侧，挤满了一群法国和英国的军官，与此对照的是，一大群各个级别的中国官员身着盛装，上面绣着鹰和龙的补子，各种帽珠上面插着花翎，象征了他们各自的官阶和头衔。我认为永远难以再次看到这样的场面……在所有这些人中恭亲王的形象最突出，有点柔弱，但聪明，苍白，温柔，引人注目，充满了敏感和优雅。他神情冷漠，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我只有一次看到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担心我们的背叛，他要得到俄罗斯特使的全部保证，以决定接受此次庄严的和谈。对于人们为了向他担保所说的一切，他总是回答说：‘我太年轻了，还不想死……’”

和平条约一经签署，军队就能参观汉人区了，汉人区几乎和满人区一样大，但要有趣得多。“两个北京城区的区别正如居住在这两个城区的人民之间的区别一样，如此的大相径庭，虽然他们表面上属于同一个城市，虽然他们相邻而居并穿同样的服装。满人区凄凉，空洞，没有工业，没有生气，似乎有一半的地方无人居住。人们在那里只能碰到一些骆驼商队，使人想起满洲及其沙漠。在汉人区，相反地，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纷繁杂乱，一片繁忙景象，其乐无穷。人们出售或购买，大家都在忙碌，做买卖，充满活力。人们发现这个城区中心工作的中国商人很勤劳，总是忙于生意，正如我们在所有其他地方看到的……不幸的是，北京，如同中华帝国的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只是废墟一片。它的街道很容易令人摔跤；

坑坑洼洼，尘土飞扬，散发恶臭，到处都是垃圾，成千上万乱叫卖的零售商铺子堵塞了街道，他们对于那些喜欢悠闲和害怕危险的接触的闲逛者来说几乎是无法通行的。只有时间留下的一些漂亮的建筑物，三个世纪以来，人类之手都未曾触及，这些巨大的城墙，筑有防御工事的高高的城门，是强大和文明的有力证明，但现在只剩回忆，北京现在只是个传说……”

战争圆满的结局与和平条约的签署，也不应该使人忘记通州背叛的受害者。对他们家属的赔偿只是物质上的一个满足；他们值得庄严的基督教葬礼。“全军都被号召参加葬礼的仪仗队。两位主教——北京主教及其助理主教主持仪式，我们的牧师、神甫和中国合唱团的孩子们……这个感人的仪式的细节和在这个即将接收这些不幸的受害者尸体的宽敞的墓穴上的讲话，报纸应该会向你们报道。因此，我不再谈论有关它的任何细节。我只跟你们说，葬礼一结束，我就开始研究古老的墓地，是我首先发现了在中国历史上如此有名的利玛窦的坟墓……”

第二天，10月29日，人们着手进行庄严的天主教堂的重新开放仪式。可怜的教堂，曾经如此美丽，装饰得如此辉煌！我们发现她现在破败不堪，我们的心为之揪紧：残剩的油漆与寄生在破裂的墙上的植物相匹敌；部分倒塌的屋顶为被打碎的彩画玻璃窗提供了避难所，失去了主宰各个季节恶劣天气的神；杂草覆盖了教堂的整个石板地面：这就是我们悲伤地看到的35年来被糟蹋且被禁止在此崇拜上帝的大教堂。但人们在阻塞了教堂入口的植物和荆棘丛下，找到了铁十字架，最初它矗立在教堂的柱廊上；我们把它放到以前的位置上，在它的阴影下，圣堂会再现，我们对它首次亮相的庄严和教士们的道德力量很有信心。

法军11月初离开北京。第一纵队只在天津稍作短暂停留。古

斯塔夫对这个充满着活力、资源丰富的未来之城保持着很愉快的回忆。他的第二次逗留也没有破坏这一印象。结束时有一个本来可能成为悲剧的事件，但他只把它当成研究中国礼仪细节的一个新机会。

“出发的那天早上，告别了对我们很友好的主人，并送给他一头美丽的白山羊——圣经中的礼物，以感谢他的细心照顾，之后我目睹了一场十分令人好奇的、非常中国式的火灾情景。我首先告诉你们，这没有什么，损失微不足道，以便我如此轻描淡写在法国被称为灾难的火灾时你们不把我看成蛮族。它源于我们的人的粗心大意，他们不慎在其中一个住处留下了火种。当我们上路的时候，听到一声大叫：‘着火了！’我们看到身后有一个巨大的烟柱。立刻，一支部队（我所在的部队）冲向那边。睡醒了的中国人已经从各个方向冲去，喉咙里发出可怕的叫声，我们可能也是这样。由于到处都是这种情形，人们十分焦躁不安，恐惧地尖叫着；房主嚎啕大哭，胆颤心惊；好奇的人们过来围观，但是没有人采取行动，甚至没有人想到拎一桶水来灭火。幸运的是我们的人到了，几分钟之内我们就控制了火势。损失仅只有一个小宿舍，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小的房间。火势熄灭，我们正准备离开之时，看到了远处四只巨大的绿色灯笼威严地走过来（现在还是夜里）。这些灯笼在四名戴士兵帽的人手持的奇怪的工具末端摇摇晃晃，他们陪同着一位有身份的官员，手持一个树脂火把，后面拖着一条可以点燃任何东西的火种。这是中国警察去现场察看损失。这一切进行得很快，大个子马上又回去了，如同他来的时候一样。我以为事情结束了，我发现中国人对火灾进行的消防救援过程相当简单。突然，我看到从官员消失的那一边出现了一队人马，人数远远超过上一次，也比第一次更亮，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灯笼组成的真正的流动照明。远远地，这激起了我

最强烈的好奇心，这是一个巨大的黑色人群，其中两个红色的大灯笼像两只眼睛，而它的背后是其他各种颜色的灯光，勾画出怪异的线条。在这个行列的前面，魔鬼般的乐师敲出了可怕的锣鼓声和钹声。极度惊讶于这一出现，我走近被烧毁的房屋，这支队伍朝它走去。从近处看，这个怪物只是被四个中国人像宠儿一样恭敬地抬着的一个水泵。上面有成千只五颜六色的灯笼，与它名字的所有荣誉相符（对不起，双关语）的辉煌陪同。不用说，有了这种可贵的辅助工具，大火在半小时之内就被彻底扑灭了；这个工具也体现了它的价值。它威严地登上了回程；房屋得救了，可以安静地睡觉了。你们看到，中国的形式主义并不比我们国家逊色；它只是更加别出心裁。”

小分队登上了一艘小蒸汽船，这艘船将把他们运往直隶，在那里，“罗纳”号运输船，一个老熟人，准备迎接它。由于只能在退潮时才能驶向大沽，“我们不得不在星空下过夜，在已经十分严酷的天气下。我们有了一个想法，去敲现在由法国水手看守的左岸炮台的大门，他们会为我们提供最亲切的款待。清军以前的军械库，已经改建为医院的宽敞病房，尚未住进病人，现在由我们支配使用，我希望那些以后注定要住进这里的人永远不会在此度过比我们更悲哀的夜晚。第二天，暴风雨迫使我们留在河上，我们回到了炮台，我仍然可以在里面从容不迫地研究人们认为留下来有用的所有东西。晚餐非常快乐，非常美好。为了让你们对和平时期生活在中国的舒适有所了解，我抄写了我们菜单上最有特色的菜名。我跳过了汤；第一道菜：野鸭、野兔和四条上好白河鱼的串烤。第二道菜：约60个小鸟的烤串、32只烤鹌鹑、山药薯条、苹果酱。甜点：很多优质水果、糕点等。所有这些供应给18个人，全部费用大概20法郎左右。只是一个由此可以判断我们能得到什么：这还不是

这个国家的一个大市场，而只是一个为了供应英法的两三个连队而在大沽建立的小市场。

“第二天，我们起锚向公海驶去，向白河平原投去最后一眼，我们肯定不会回来了，这样说总是让人感到伤心。多少次，在船上漫长的无聊之中，我开始怀念白河河岸，那样平坦，起伏那么微小；从大沽到白河的那条路令人不快，满是灰尘或污泥，任何事物都补偿不了它的保养不善！但我内心了解一切；每一段距离都引起我曾经经历且将永远不会忘记的回忆和感动。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回到上海，我觉得好像离开了中国。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罗纳’号，整个营的官兵都回到了将其从布雷斯特带来的这艘船上。”

12月5日，经过一段乏味的断断续续的旅行，第二步兵营的官兵们在上海登陆。

古斯塔夫营现在仍没有确定最终的目的地，于是他提出请求休假并得到了批准，允许他到日本旅游一个月。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一个可敬的商人，建议他从上海出发，坐半岛轮船公司的“格拉纳达”号去横滨，这艘船也载着英国远征军司令霍普·格兰特将军及其参谋。这次旅行的简短并没有使它很不完整，关于它的叙述已经在里昂的一份报纸上发表^①，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古斯塔夫很喜欢日本。这个美丽迷人、处处壮丽的国度，马路维护得像是公园的小道；这些独特的住房，几乎处处显示出无可挑剔的整洁豪华，这种文明，当然有点原始，却不是衰落；这个可爱的民族，勤奋而礼貌，毫不知耻地顺从于保卫本土的一个高傲、独立的贵族，在这里得到了与他对中国完全相反的印象。“因为我们

① 里昂信件，1861年4月29、30日和5月1、3、4、6日。——原注

对这个国家知道得不多，它使人们如此的惊讶和感兴趣，以至于想要花上一年，也许更多时间，再多了解它一点。”所以不久以后，当因最神圣的事业滞留罗马之时，他得知，日本政府已要求法国派遣培训人员，他后悔没有能够加入这一使命的行列当中。